

魏紫丹：還原一九五七

【正文】	2
一、預謀說	2
二、變卦說	7
三、說來說去還是「陰謀說」	19
第二天，縣委王書記作動員報告，主席台上坐有文教局長宋立業和公安局長等人。	27
第三，廬山會議上毛還說：「一個肅反，一個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鬧不起來，我們黨聯繫群眾，不是拉科西，不會出納吉。個別問題一出現，很快解決，我們作風好，反革命殺了100萬，匈牙利沒殺，我們作風好，反霸、鎮反、反右。」	39
2，極端陰險	47
(1) 先發制人，	50
(2) 再後發制人	52
(3) 借刀殺人，各個擊破	53
A，大痞子唆使小痞子	53
B，激化矛盾和製造矛盾	54
C，殺人不見血	54
D，借斯大林的刀	55
E，借敵殺己和以毒攻毒	57
(5)，卸磨殺驢	63
「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68
B，從對「一封匿名信」的借題發揮，我們來解剖毛澤東這只麻雀	71
(1)，借雞頭	74
D，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後的替罪羊是斯大林和毛澤東	79
「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81
E，三借合一	81
3，極端卑鄙	86
4，極端黑暗	86
三，為飽私慾張開血盆大口，親疏通吃	96
第一，對楊開慧，鱷魚眼淚竟作傾盆雨	96
第二，眾女性心理、生理慘遭蹂躪	97
四，認透毛、共的方法論之二	98
第一，總分法就是在從對現象到本質、從部份到總體的認識基礎上，再利用對本質與總體的把握來理解現象與部份。	98
第二，內外法要求，研究問題時要入乎其內、出乎其外。	101
第一，聲聲聲討「黨天下」	105
第二，「三害」應向毛澤東那裏挖	109
第三，黨外人士有職無權	109
第四，對「黨天下」摻沙子	111
第五，清算中共政治運動的罪行	113
第六，呼喚法治	117
（反胡風一肅反運動檔案	128
第七，反對崇蘇媚蘇的「一邊倒」	129
第八，改造資產階級的問題	134

第十，要求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	141
第十一，發出「救救科學家」的呼籲	144
第十二，反對奴化教育，取消黨委制，實行教授治校	147
第十三，文藝界矛頭指向《講話》	158
第一，誰敢太崇頭上動土？唯我資產階級右派	177
第二，認識反右，是認識歷次運動的鑰匙	181
第四，打倒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反動派	187
三，認透毛、共本質的方法論之三	189
「一放，各階級就原形畢露」	193
「毛澤東建國後在創造甚麼的同時，又幾乎總在破壞著甚麼。」	198
(18) 《赫魯曉夫回憶錄》頁 659;	202
(42) (43) (44) (45) 《廬山會議實錄》頁 221, 238, 223, 333;	202
(48) 徐鑄成《陽謀-1957》，《新華文摘》1989, 2;	202
(72) 《雨花》1957, 10;	203

上篇：這是陰謀 —— 從對毛澤東發動反右派的歸因說開去

魏 紫 丹

黃花崗雜誌編者按語：“右派分子”魏紫丹教授的新著《還原一九五七》一書，無疑會成為一部真正還原了“一九五七”的學術著作。其充滿著學術精神的嚴密論證，特別是他對馬列主義、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毫無戀情和決絕之慨，猶將他對“一九五七”的痛心研究和追述，推升到了了一個更其純淨和高遠的歷史境界……

【正文】

鄧小平說：「1957 年以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 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¹我雖不以此為然，但把反右當作中共掌權後歷史發展的一塊「記黑石」，還是有道理的。鄧畢竟是共產黨人，在他說的千言萬語中，最虛偽的一句話叫做「實事求是」。這是他們對謊言的總包裝。在共產黨人中，如果誰敢對毛澤東的一生作出「禍國殃民」四個字的評價，那麼，歷史將宣佈他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顯然，鄧小平不是。

毛澤東手執反右派的鋼刀，直刺知識份子的胸膛。這祇是他殺害、迫害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民（包括中共黨員）之千古民族大悲劇中的一幕。

反右派鬥爭，眼看就要過去半個世紀了。人們對「六四」、文革都有些淡忘了；對反右運動的淡忘，倘加上一個「更」字，雖然是可悲的，但卻是不足為奇的。更由於中共一向是瞞、騙、壓，致使人們，包括專家在內，對這個運動，連作為「NO. 1」的首要問題——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鬥爭的起因是什麼？都被蒙在鼓裏。如此，不弄清歷史事件的真相和歷史人物的嘴臉，也就談不上「歷史的教訓，值得記取」。

（一）探源篇

通過對「歸因」如麻的梳理，我把它們歸納為兩大類。一曰：預謀說；一曰：變卦說。但在每一大類中的各種說法，不僅有相異之處，而且有絕然相反之處。

一、預謀說

在預謀說中，陰謀說與陽謀說針鋒相對。

毛澤東說：「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祇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祇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²

看來，判定是陰謀還是陽謀，關鍵在於「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究竟是真還是假。

第一，他當時並不是把告訴的對象心口如一地說成是「敵人」，就像他在背後說的，是烏龜王八、是鯊魚、是代表反動階級，而是偽裝慈祥地、揮灑自如地、嬉皮笑臉地稱他們為「黨外朋友」、「有志於改革的志士仁人」，給這些人散佈幻想，讓他們自我感覺得還是「蠻可愛」的。

第二，當他當眾而不是在背後講到「毒草」的時候，不但不是預警，明說讓它出土是為了「便於」鋤掉，而是刻意掩蓋這一圖謀，解除人們這方面的顧慮。凡是聽過他講話和錄音的，都可以從語義到語感上覺出，他所說「毒草」這東西往往是尚未被公認的新生事物。如馬克思、孫中山、哥白尼、路德等，這些革命家、科學家、宗教革新者；特別是他強調指出，「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馬克思主義在開始的時候受過種種打擊，被認為是毒草。現在它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還在繼續受打擊，還被認為是毒草。』」³返回「草」的本意，他舉出營養豐富的西紅柿一開始也是被當作毒草的。他為了證明這次不是撒謊，還搬出當時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為證：「是布爾加寧告訴我的。」為了鼓勵大家鳴放，不要怕打成毒草，他慫恿說：「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議論譏笑，也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另一方面，他又向大家保證「在共產黨人方面，我們要給這些合作者創造有利的條件，要同他們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關係，要團結他們一起奮鬥。」⁴

這簡直像是黨內右派在煽動黨外右派，要以「捨得一身剮」的精神向黨猖狂進攻、鬧事。……在後來的反右派鬥爭中，是絕對地這樣認識問題的。

你別看他談笑風生、心平氣和的樣子，其實他早已暗藏殺機。一個多月前，他已給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作了交代：「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裏頭有一枝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繼而又說：「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現在情況起了變化，他們不吭聲了。不吭聲不是本心，本心還是要吭聲的。」⁵他後來號召大鳴大放，其實就是引發烏龜王八都「吭聲」。

他已做好了「要準備出大事」；甚至「再到延安去」這樣「嗚呼哀哉」的結局都假設了。再往前推，在上一年度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他就說：「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前後兩個「捨得一身剮」，其精神是相反相成的。他是先下定「捨得一身剮」的決心來鎮壓文化人」的「復辟」、「鬧事」，架起了機關槍；然後才騙誘你要「捨得一身剮」，敢於鳴放，投入『幫助黨整風』這個陷阱，這個火力網。然而，你卻自多情，受寵若驚，慶倖逢上「當今」這個知識份子的「知心」人。於是百鳥就都扯起嗓子「鳴春」了。

第三，我提供兩組相映成趣的鏡頭，以資人們理解，「陽謀」到底是一種什麼玩意兒？

一組鏡頭是，1957年3月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會議上作報告曰：

第七點：「放」還是「收」？這是個方針問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同志們在討論中間是不贊成收的，我看這個意見很對。黨中央的意見就是不能收，祇能放。……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講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兩種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居其一。我們採取放的方針，因為這是有利於我們國家鞏固和發展文化的方針。⁶

請看毛澤東在此提供的這幅民主、自由的「遠景」是多麼誘人啊！其實，他講話的原稿比這個修改稿更誘人，更親切，更可愛！比如他說，胡風的文章還是可以寫的；住班房是因為他搞反革命秘密團體。修改稿上就刪去了。這麼美好的方針政策，用「放」一言以蔽之。不過，毛澤東說出口的、欺騙世人的「放」，你道它實際上是個什麼東西？說出來會大煞風景的；原來他裝在肚子裏或祇說給高幹而要暗中保密的「放」，竟是「放屁」的意思。謂予不信，請看第二組鏡頭。時間則在前一個半月。

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對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講話：

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得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⁷ [大陸直連看禁書禁聞禁文禁網禁片禁歌禁曲](#)

1957年6月10日，他又在《中央關於反擊右派份子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中說：「他們的臭屁越放得多，對我們越有利。」通過以上這些不同時間和空間的鏡頭，我們看到了毛陰一套、陽一套，左邊是人，右邊是鬼。

第四，我們再來看一組同一時空、同一場景的鏡頭。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副古代諷刺漫畫《陰陽臉》，或如川劇中於瞬息之間的「變臉」。

毛澤東看過冒廣生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對目前整風的一點意見》後，派車接他到中南海。

「老先生講得好啊！」毛顯得神采奕奕，「你講，如果說共產黨沒得偏差，那就何必整風？批評是幫助黨員糾正錯誤。我們這次整風，正如你所說的，是『愛人以德，相見以誠』。」

冒廣生自稱行年八十又五，經歷幾個朝代，從未見過今天的政治清明。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共產黨員也不會承認自己是聖人吧？

毛不住頷首傾聽。

冒稱對主席的「雙百」方針，起初懷疑會不會把思想搞亂。後來一想，各人立場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強人以苟同。國家無道，則庶人不議。人民敢說話是好事，不因其語近偏激而以為忤。祇要以國家為前提，而不是以個人為目的，那就叫「爭鳴」也可，叫「和鳴」也可。

毛以堅定的語氣鄭重宣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個方針一定不變。」

當毛澤東信誓旦旦表態的時候，冒先生那個陪他前來的兒子舒湮，卻無意中望見鄰座同志正在手握一束文稿，紙上有著毛批改的的密密麻麻的墨跡，但見露出的標題竟然是：《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你看玄乎不玄乎？

告別時，毛握著冒先生的手說：「我過幾天要到外地去。希望你老明年再來北京。」又問：「老先生有何臨別贈言？」

老先生推心置腹，以誠相告……。

「講得好呀！」毛趕上一步，用嚴肅的表情，右手搭著胸口說：「我一定牢記在心上。」

8

要知後事如何，現在已是事後，故早已水落石出：老先生被劃為「向黨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

毛的所作所為，本屬最準確定義下的「陰謀」，他卻胡攪蠻纏，卻說是「陽謀」。無怪乎作家叢維熙放語問蒼天「什麼叫『陽謀』？『陽謀』和『陰謀』有什麼區別？「張滄（他那自殺未遂的妻子）和許許多多知識份子命運的悲劇，正深藏在你那嘴邊慈愛的笑紋之中呢！」⁹

第五，如果說冒先生曾擔心「雙百」方針政策會不會把思想搞亂，是出於對黨的自作多情的話，那麼，陳其通等四人聯名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卻反映出黨內大部分人憂國憂黨的心態。毛澤東一面稱讚四人是「忠心耿耿」，為黨為民，卻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批評了《人民日報》刊載這篇文章，並且明確表態：「我是不同意他們的意見的。」他後來批評鄧拓：「陳其通四人的文章發表後，《人民日報》長期以來也沒有批評，直到今天，才有一篇社論，總算對陳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一個態。」

這篇社論說：「目前的問題不是放得太寬而是放得不夠。黨的任務是要繼續放手，堅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有些人對於黨的方針抱著不同的想法。照他們看來，這樣下去，思想將會一團混亂，文化科學發展的方向將要模糊，資產階級思想將要泛濫，馬克思主義理論將要動搖——總而言之，前途簡直是不堪設想。

「在本報一月七日所發表的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勒等四同志的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就是這種傾向的一個代表。他們的在文章中對目前文藝界狀況畫了一副嚇人的暗淡的圖畫：『在過去的一年中，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越來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當前重大政治鬥爭的主題，有些作家不敢寫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因此，使文學藝術的戰鬥性減弱了。時代的面貌模糊了，時代的聲音低沉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在文學藝術這面鏡子裏光彩暗淡了。』

「很明顯，這種估計是對於事實的一種極端歪曲。……問題是何以會有這種極端歪曲的估計呢？這是由於，到現在為止，黨內還有不少同志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實際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們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極的現象，加以渲染和誇大，企圖由此來證明這方針的『危害』，由此來『勸告』黨趕快改變自己的方針。……」

毛澤東肯定了那篇社論，並向社論作者王若水說：「我要請你吃飯。」

人們不禁會問：毛澤東為什麼要對這篇後來證明是十足的「香花」的文章，以及後來被封為大左派的陳其通等作者大張撻伐，而對於《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又大動肝火呢？為什麼你正起勁鼓勵鳴放的時候，偏偏要打擊左派的鳴放呢？何況你還承認人家是「忠心耿耿，為國為民」呢？可憐的作者之一，馬寒冰為捍衛毛澤東文藝路線，卻被毛澤東給逼得「自殺」了。這該叫做什麼名堂？曰：「捨不得孩子打不著狼。」韓信所以將樊噲撤職，是後者干擾、破壞了前者「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謀略。

如果事實要像毛澤東說的是「陽謀」的話，他們四人還會「杞人憂天」嗎？可惜他「陰謀」耍得過深，不僅矇騙了「敵人」，而且連自己也坑蒙拐騙了。天下有先見之明者，唯鄧拓，他看透了毛澤東這個人，看穿了他耍的陰謀詭計。這使毛澤東起了曹操要殺楊修之心。

第六，「這裏有鬼，鬼在什麼地方？」

為了表示對第一手資料的珍惜和尊重，我將當事人鄧拓的副手胡績偉先生的《自述》，照抄幾節如下：

毛主席說：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開過一個多月了，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指《光明日報》和《文匯報》）拿去我們的旗幟整我們。你們不是黨報，是派報。過去我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是政治家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到底是有動於衷，還是無動於衷？我看是無動於衷！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反對中央的方針，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的。

鄧拓趕快檢討。但他的話多次被毛主席的措詞尖銳而嚴厲的批評所打斷。鄧拓解釋說：過去中央曾有規定，黨的會議不發消息，主席講話未公佈前，也不引用。

毛主席說：什麼時候有這個規定？最高國務會議發了消息，為什麼不發社論？消息也祇有兩行，為什麼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宣傳工作會議不發消息是錯誤的。這次會議是黨內外人士參加的，不祇是黨的會議，為什麼也不發消息？黨的報紙對黨的政策要隨時宣傳。最高國務會議以後，《人民日報》沒有聲音，非黨的報紙在起領導作用，黨報被動，黨的領導也被動，黨報在非黨報紙面前丟臉。這裏有鬼，鬼在什麼地方？¹⁰

以上摘自《毛澤東怒批我們四小時》，以下摘自《伴君如伴虎》：

毛澤東「引蛇出洞」的政策，在中央最高領導集團中，瞭解毛澤東真實意圖的人並不多。難怪毛說：「當時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幹部都不理解。」那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也被毛認為是保守的。毛批評對他的兩次講話在「黨報上沒有聲音」，「而讓非黨報紙抓住了這面旗幟。」他表揚了《光明日報》，《文匯報》「鳴放」得好。記得鄧拓曾經對我說過：「主席說百家者兩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人民日報》不能學《光明日報》、《文匯報》那樣鳴放，學了要出亂子。」鄧拓說：「《人民日報》如果也像那樣的鳴放，也被打成右派報紙，黨中央也會陷於被動，人民日報社內部又不知要增加多少右派份子。」以後事實證明，《光明日報》、《文匯報》都被打成「右派」報紙，兩家報社的總編輯都成了大右派。因「鳴放」得好而受到毛澤東讚揚的《中國青年報》，四個正副總編輯，三個當了右派，一個被撤職受到嚴重警告處分，中青報的領導班子幾乎全軍覆沒了。可見，毛主席批評說：「人民日報按兵不動，黨報被動，黨的領導也被動，這裏面有鬼，鬼在什麼地方？」看起來鄧拓就看出有一個「引蛇出洞」的「鬼」，有個能把「陰謀」說成「陽謀」的鬼，這個鬼就在毛澤東的心裏。¹¹

以上說法，正合我意。區別僅在於，鄧拓有了不起的一點，先知先覺是也。「先」的時間跨度應在說「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之先。說這話表明，他過去就相信毛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於今尤甚而已。

陽謀乎？陰謀乎？現已剝繭見蛹。毛澤東成竹在胸，是反右派鬥爭的始作「蛹」者。但是，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為官、為民的，在過去和現在，認為毛澤東原先並沒有打算要反右派的卻大有人在，為他涂脂抹粉的摘帽右派也大有人在。這是由於人們給陰謀弄花了眼睛。最迷惑人的說法，竟然說「毛是被右派逼上梁山」的。

二、變卦說

從另一方面來論證，還可以使陰謀說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第一，李維漢的「出軌說」與預謀說中的「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互別苗頭。他說：

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彙報。五月中旬，彙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麼「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志警惕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決定把會上放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著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在這次彙報之後，我才開始有反右的思想準備。那時，蔣南翔同志對北大、清華有人主張「海德公園」受不住，毛澤東同志要彭真同志給蔣打招呼，要他硬著頭皮聽。當我彙報到有位高級民主人士說黨外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澤東同志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及至聽到座談會的彙報和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份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是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五月十五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¹²

這裏，一是更充分地暴露了毛的所謂「陽謀」，是極端虛偽的。直至後來，毛還給他私人醫生李志綏說：「有人說，你這是搞陰謀，讓我們大鳴大放，現在又來整我們。我說，我是搞陽謀，……我們做事都是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你們不聽，硬照你們的資產階級政治綱領辦，怎麼說我搞陰謀。」¹³還說：「原本想用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幫助整黨。想不到他們這樣不可靠，最壞是民主同盟，他們是男盜女娼。」¹⁴如果真如毛所說「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那為什麼作為「陽謀」主要實施人的中央統戰部長都不知道會有殲滅出籠的牛鬼蛇神、出土的毒草，即反右派呢？當他覺察出毛的這一招時，趕緊讓孫起孟去做黃炎培的工作，黃才沒有鳴放下去，免予中毛的招而劃為右派。歷史證明，他說的「男盜女娼」乃夫子自道也。這是指他政治上的流氓行為；至於他生活上的糜爛，這裏暫且存而不論。

二是眾多關於反右派的論著，都把李維漢的回憶錄作為權威論據，認為是從五月十五日毛才開始變卦的，而變卦的原因乃是出軌論：「放出了一些不好的東西。」更具體說，是羅隆基的鳴放——「馬列主義的小知識份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外行領導內行」，才促使毛下定了反右的決心。

這統統是誤會了毛澤東。因為，陰謀決不能祇靠他自己孤軍奮戰，而要靠全黨、全民去實施。他必須把所懷的鬼胎，有步驟地向人們去泄露天機。所以，五月十五日祇是毛捕捉到手的時機之一，是流，不是源。

陰謀與陽謀最外在的表徵在於，是偷偷摸摸地幹還是正大光明地幹。《事情正在起變化》這個謀劃，不僅沒有告訴敵人，恐怕連部長先生當時都是被蒙在鼓裏。因為毛在清樣上批道：「劉、周、朱、陳、彭真閱。如認為可用，請尚昆印若干份，發給中央一級和省、市一級負責同志。退尚昆辦。」在他們圈閱後，毛又批：「尚昆同志：此文請即印發中央一級若干同志並印送各省、市委、內蒙黨委，新疆、西藏不要發。北京及外地各發多少份為宜，請加酌定。」於六月十二日，毛在印發件上，又一次加上曾寫在清樣上的八個字：「內部文件，注意保存。」毛還加寫了這樣一行字：「不登報紙，不讓新聞記者知道，不給黨內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在半年或一年之後，才考慮在中國報紙上發表。」為什麼如此鬼鬼祟祟？你不是說，這是「陽謀」嗎？

李維漢論述問題，語言是溫和的，沒有張牙舞爪的「猖狂進攻」之類。但把反右歸罪於知識份子的咎由自取，這種撒謊乃黨性本身應有之義，除非你不當黨員。

第二，「猖狂進攻說」是毛澤東用來欺騙人民，作為反右派正當性的說詞的。所謂「反右派」，就是「反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

毛澤東寫於 1957 年 5 月 15 日作為向中共最高層發出反右信號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其中提出：「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¹⁵

由於這個調子是毛澤東定的，所以不僅是甚囂塵上，簡直是一切媒體及所有公開場合的輿論全然一律。同時它又是毛澤東整個反右陰謀中關鍵性的一舉，即為的是「出師有名」。所以對這個問題很有必要從頭細說。

能夠就近和長期觀察毛澤東的李志綏醫生說：「八大路線（即堅持集體領導、發展經濟、反對個人崇拜、主張實事求是等）從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後所有的政治行動——共產黨整風、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全是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總路線而做的出擊。直到 1969 年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那時劉少奇被開除出黨，並已死亡，鄧小平被撤職）毛的思想成為全國指導綱領，毛的報復才算落幕。」¹⁶

這要從蘇共 20 大說起。在大會即將結束時，赫魯曉夫作了秘密報告《個人迷信及其後果》，譴責「歷史上最兇暴殘忍的罪犯」——獨裁者斯大林。

李志綏寫道：「赫魯曉夫突來的舉動使朱德（中共代表團團長）措手不及。朱德向中央打電報請示時，表示要支持反斯大林。毛十分震怒。毛說：『朱總司令這個人十分糊塗。可見朱德和赫魯曉夫都靠不住。』」

毛又說：「你們蘇聯反斯大林，我們不反，我們不但不反，我們還要擁護。」¹⁷

毛用陰謀伎倆來騙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同志打開了我們的眼界，擦亮了我們的眼睛，增強了我們的視力。他終於把事實真相告訴了我們。我們也要進行改革。赫魯曉夫的反應是，毛說這話是在「哄騙我們」，「毛澤東簡直就是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¹⁸

李志綏回憶道：「毛在『八大』中做了開幕講話。我隨同毛出席了開幕和閉幕會議，並在後台聽了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我一聽到劉、鄧兩人的報告就知道毛一定會大為震怒。我也非常驚駭。毛的確有理由覺得中央在壓制他。劉的政治報告和鄧的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讚揚

集體領導路線，反對個人崇拜。鄧小平進一步向黨代表保證，中國絕對不會出現個人崇拜。鄧修改的新黨章中，不但刪掉『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這句話，並為毛設立了榮譽主席的職位——這些都顯示毛的黨主席職位並非終身職，黨領導要他交出權力。

「跟隨赫魯曉夫起舞，頌揚『集體領導制』的基調，特別令毛不安。如果中國共產黨真的實施集體領導制，那表示領導人之間地位平等，所有重大決策將經集體裁決。毛的重要性便會銳減。但毛要做天下第一人，他想搞個人崇拜。」¹⁹

為此，毛精神憂鬱，形體衰弱，整天躺在床上，除大小便外，不起床，甚至吃飯都在床上。他在處心極慮地醞釀一個巨大的陰謀。

李志綏說：「毛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發表的一篇演說，便是他策略的一部分。毛以國家主席的身份，召開了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毛在此會上嚴厲批評黨官僚體系，又提出『大鳴大放』號召『民主黨派人士』隨意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²⁰但是，由於某種原因「中國共產黨向來是一個體系嚴密、力量強大的排他性組織，非共產黨人士一向不允許向其建言。敢這樣做的人都被打成『反革命』。」所以，「雖然毛大力號召給黨提意見，知識份子仍一再沈默。」於是，毛於 1957 年 3 月 6—13 日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又重複了二月講話的重點，鼓勵民主黨派人士拿出「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勇氣，解除一切思想顧慮。四月底，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三度號召群眾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民主黨派人士終於展開了熱烈的爭鳴運動。」²¹

這個過程是人所周知的，並且後來還更多地獲知毛為誘敵深入而佈置的陷阱，為釣魚而準備的餌。不過，李志綏這個時期進修去了。「五月十五日回一組後沒幾天，毛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信，並在黨內高級幹部間秘密傳閱。整風運動的本質必須立刻改變。毛準備給那些發表猖狂議論的右派份子大大反擊。」²²

所以他的立論根據，是「林克的看法，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他萬萬沒料到批評的箭頭會轉而指向他本人。例如：『共產黨念的這本經，因為大和尚念，小和尚才會念……等等，形成了一個時期毛所說的『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局勢。」²³

但是，他所指的「猖狂議論」，當時並沒有發生。右派議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理論：儲安平批評大和尚的「黨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以及多次為鄧小平指責為「殺氣騰騰」的葛佩琦的「殺共產黨」等議論，統統都是發生在毛寫《事情正在起變化》半月之後。

所以，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決不會袒護右派的）黎澍，遂秉筆直書：「這個講話（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廣泛傳達以後，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幾個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學工作者中間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們被邀請在一些座談會上發言。可是，即在這個時候，這種場合，發言者也還是心存顧慮。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人們『怕釣魚』。這篇文章是反擊右派進攻的信號。既然直到此時人們還說『怕釣魚』，可見直到反右派開始時，也並沒有什麼資產階級猖狂進攻需要『打退』。」（《未完成的回憶》見《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第 171 頁）這是經過實踐驗正過的歷史結論。

一個著名的右派，他寫的文章《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在當時產生了轟動效應，曾被說成「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信號彈」。他就是費孝通，改正錯劃後當上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我記得大約是 1997 年，他在中央電視台明確否認「進攻」。他說他就不知道什麼叫「進攻」。這該算作是右派向毛澤東的「反攻倒算」或「秋後算帳」吧！

毛澤東總愛把「說話」罵成是「放屁」，好像是嗜癩有癖。這回他說「猖狂進攻」；事實證明，他這回不是放屁，而是沒屁吹風。

第三，「整黨內敵手說」。這是李志綏聽了毛關於「陽謀」云云之後，「我終於瞭解毛是心口不一。原先毛想利用知識份子將他的黨內敵手整一整的策略適得其反。」²⁴「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²⁵

他以為毛的陰謀是借刀殺人，利用知識份子整黨內敵手；反右並非預謀。所以他才有：「今日我的後見之明是，如果當時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未涉及毛，那麼『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十年，在 1957 年，而不是 1966 年發生。我們今天祇記得反右派運動時對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徑。其實毛開始是想藉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產黨整風，目標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毛未料到民主黨派人士竟群起質疑『社會主義路線』和『共產政權』的合法性。毛萬萬沒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見越來越尖銳，攻擊的矛頭逐漸指向毛本人的統治。毛不禁暫時回頭和黨內反對他的同志聯合起來。黨內領導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槍口對外，出現了大團結的局面。」

由於某種原因，他特殊的御醫身分，使他能見到、聽到人之所未能者。故能得出此一獨到之見。並且，從毛此後的一切政治行動都是為了推翻「八大」路線，這一命題出發，這個論斷在邏輯上也是順理成章的。

然而，問題出在事態的發展並不是一條線似地發展下去，而往往是節外生枝、千絲萬縷亂如麻的。即，不是一因一果，簡單明瞭；而是多因一果，一因多果，互為因果。例如，蘇共 20 大在中國的反應就不同於在蘇聯本國的反應，也不同於在南斯拉夫的反應；在南斯拉夫的反應不同於在東歐其他國家如波蘭、匈牙利的反應；在國際共運內部，在執政黨的反應也不同於在野黨的反應；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反應更不同於在資本主義陣營的反應；而且，還存在著連鎖反應。而作為綜合的反應，則是敲起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喪鐘。這便是波匈事件的爆發及其影響。

毛澤東說，1956 年是「多事之秋」。他作出兩項決斷。一項就是防止黨內出赫魯曉夫，把赫魯曉夫批倒批臭。在當時中國，婦孺皆知，赫魯曉夫是大壞蛋。李志綏的後知之明就是說的這一項。最後以揪出並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及其司令部而告終。

另一項是防止中國出匈牙利事件。毛把此件當成當務之急。波匈事件對中國影響之巨、之深，非現在中國人（外國人更別說了）可以想像的。我劃右派後，在農場勞動教養。有一個報社來的青年人，22 歲，比我小兩歲。他告訴我，他正在談戀愛，跟戀人說，中國如果發生匈牙利事件，他和別的青年人都表示要參加。結果，戀人在反右運動中進行了揭發，於是，幾個年輕人全都打成了右派。

現在我們來看看毛當時的心態，以及他是如何磨刀霍霍、咬牙切齒地在背後向他的黨羽暗傳殺機的，而在當面——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在天安門城樓上，卻給他的敵人以朋友似的笑臉相迎，使他的敵人誤以為「氓之，抱布貿絲」，而覺察不出「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茲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錄下幾段，也好拿來示眾：

「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紙是包不住火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匈牙利有那麼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第 318 頁）毛不說是由於某種共產黨極權統治，傷天害理，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怒人怨，而胡說是「那麼多反革命」；由此可以想像他下一步要作什麼文章。」

「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論和唯心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第 323 頁）

「在學校裏頭也出了問題，好些地方學生鬧事。石家莊一個學校，有一部分畢業生暫時不能就業，學習要延長一年，引起學生不滿。少數反革命份子乘機進行煽動，組織示威遊行，說是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台，宣佈來一個『匈牙利』。他們貼了好多標語，其中有這樣三個最突出的口號：『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照他們講來，共產黨是法西斯，我們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萬人就是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這一『家』也出來了。（第 332—333 頁）

「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倒是鄉下地主、富農，城市裏的資本家、民主黨派，多數還比較守規矩，他們在波蘭、匈牙利鬧風潮的時候還沒有鬧亂子，沒有跳出來說要殺幾千萬人。對於他們這個守規矩，應當有分析。……他們的老於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著。他們的子弟、這些學生娃娃們，沒有經驗，把什麼『要殺幾千萬人』、什麼『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些東西都端出來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是不是想復辟？」（第 333 頁）

「每逢颱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它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第 334 頁）

「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第 338 頁）

「現在（1957 年 1 月 18 日）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第 339 頁）

「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議論，跟我們也是對立的。他講唯心論，我們講唯物論。他們說，共產黨不能管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合作化壞得很；我們說，共產黨能夠管科學，社會主義有優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學生中間跟我們對立的人也不少。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對我們的人，毫不奇怪。這樣的人北京大學有，石家莊有，其他地方也有。」（第 351 頁）到這裏，哪些人是右派？什麼話、什麼事是右派言行？已勾劃出一個輪廓。）

「我看要準備出大事。……

「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佔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麼辦？」（第 352 頁）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實際是聲討），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第 355 頁）這裏就把反右的策略底定了。祇剩下最後一個問題了：魚要不上勾，蛇要不出洞，敵人要不『先發』，該怎麼辦？

正好在一個月之後，2 月 27 日，毛粉墨登場，在最高國務會上，隨後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天安門城樓上，以及在各種場合上，把「口蜜腹劍」表演得淋漓盡致，出神入化。以致使中國的優秀知識份子們，如著名文學家傅雷對他的談笑風生、笑容可掬、花言巧語、甜言蜜語感到如醉如狂，給兒子寫信說：「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真是藝術高手。」²⁶再往下的信，就是「真興奮。……踴躍爭鳴，……都紛紛寫文章響應，在座談會上大膽談矛盾談缺點，大多數都是從熱愛黨的觀點出發，希望大力改進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揚眉吐氣，精神百倍。」

27

再往下的信，就是妻子寫的了：「作協批判爸爸的會，一共開了十次。前後作了三次檢討，最後一次說是進步了，是否算結束，還不知道。爸爸經過這次考驗……活到五十歲了，才知道看人不是那麼簡單，老朋友為了自己的利害關係，會出賣朋友，提意見可以亂提，甚至造謠，還要反咬一口，……」²⁸他當上了資產階級右派份子。

然後的信……直到沒有了，「然後」——夫妻自殺，同歸於盡。被說成是花崗岩腦袋，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

這便是毛編、導、演的《陰謀》全劇。他的出發點是什麼？五個字：「匈牙利事件」。他在 1957 年 6 月 8 日這個血腥的日子裏，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中寫道：

總之，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祇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上既有反動派存在，中間份子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教訓，黨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鍛煉，亂子總有一天要發生。²⁹

可見，毛澤東「主動的整風」不是目的，而是「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這說明他是王八吃稱砣——鐵了心要反右的，要搞掉社會上的「反動派即右派」。

從發生匈牙利事件，到反右以後，毛澤東當面說人話，背後說鬼話。現在，人話、鬼話被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反映出反右來龍去脈、血跡斑斑的軌跡，突現出血淋淋的反右陰謀的紅線。讓陽謀說、變卦說都來個原形畢露。

顯然，用「整黨內敵手說」來說明反右的起因是太不得要領了，不是不對而是不全。所謂「不是不對」，是因為它有事實根據；所謂「不全」，是因為不是祇此而已；所謂「太不得要領」，是因為它遠非起主導作用的因素。

很可能是發生在反右之後，於 1958 年 3 月—5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治秘書室在整風中，要將林克定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後來這便發展為『黑旗事件』，是我在中南海所見，最為殘酷的政治鬥爭。有人家破人亡，有人撤職處分。這個教訓使我沒齒難忘。」，這促使李醫生將他的「整黨內敵手說」變成了他幾十年後的「後見之明」。

林克等八人向政治秘書室副主任何載提意見，說他邀功諉過，對上拍馬屁，對下專橫壓制。何向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書記楊尚昆報告，說他們有向黨進攻的議論。到三月，把他們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集團。

毛對李醫生說：「我找田家英談過了。情況嘛，大體上是清楚了。這八個人就是不滿意政秘室領導人的右傾。中央辦公廳和中直黨委，官官相護，反而打擊他們。……這八個人在去年反右的時候，是積極份子。現在反過來，說八個人是反黨份子。我說，說這樣話的人，本身就是站在右派立場，為右派說話。……」

過了五一，毛躺在床上，召集田家英、林克、何載和中直黨委的劉華峰、李東野、蕭蘭談話。指出，政秘室的運動進展得不正常。在反右運動中的左派，不可能在整風運動中成了反黨份子。

蕭蘭發言，說：「這八個人的議論，矛頭指向了中央辦公廳，指向了中央辦公廳的領導人。何況中直黨委已經作出決定，指出這八個人進行反黨活動，決定他們停職反省。」發言的語氣既激烈，而態度又昂揚。她捋了虎鬚，事情就鬧大了。

會議開了一個多月，蕭仍大力批判林克等八人。她在一次發言中，稱他們八人打的不是紅旗，是黑旗。這便是中央辦公廳的「黑旗事件」名稱由來。

李醫生說：「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恍悟毛在這次黑旗事件所使用的策略。毛的目標不但有楊尚昆，還有楊尚昆的領導鄧小平。」這次事件的結果，楊丟了中直黨委書記。中直黨委副書記李東野、劉華峰二人被下放。中直黨委辦公室主任蕭蘭被開除黨籍，後死於勞改。

黑旗事件對於說明「整黨內的敵手說」，是一個有力的例證；但對於詮釋反右的根由，卻是無力的，甚至是不倫不類的。第一是時間背景迥異。這時已結束反右，五十多萬人受到嚴懲，另有幾十萬人是內控。第二是爆發匈牙利事件的隱患已被「搞掉」。即，政治形勢改觀。第三是人物的政治屬性有別。林克等八人已被右派的鮮血染紅了頭頂。毛封他們是「去年反右的積極份子」，「左派」。何載對林克和後來文革初期劉少奇對蒯大富，都是沿用了反右的思維模式並都得到了毛澤東給予「打擊左派」的罪名，而遭到毀滅性打擊的。

毛澤東利用整風，不僅是「引蛇出洞」，而且是要知識份子激怒黨員、幹部。當時的事實正是這樣。知識份子響應毛的號召，對那些不堪忍受的政治弊端進行了批評。被批評的黨員、幹部，誠惶誠恐，敢怒不敢言。一待毛發出反右的號令，他們便懷著百倍的仇恨殺將過來。現在毛故伎重演，讓劉少奇等「黨內敵手」激怒革命小將，他把「我的一張大字報」一貼，全國便風起雲湧，高喊「砸爛劉少奇的狗頭」。祇有經過激怒，才能做到借刀殺人。

我也來個後見之明。1989 年鄧小平鎮壓「八九民運」，就是活學活用了毛的這一陰謀。現在來請齊奧塞斯庫作為參照物。奧氏調令軍隊去鎮壓群眾，軍隊卻調轉槍口將他打倒。不是抽象地打倒，而是具體地槍斃。

鄧小平呢，他將軍隊調進北京，進行思想欺騙（中共的術語是「思想教育」），然後駐足待命，與學生和群眾對壘、僵持。一則絕對無可避免地會出現某些辨論、口角，甚至過頭的言語、行動；二則他們會誤導學生去做些激進的、冒險的蠢事，使矛盾激化；三則事實證

明，他們會唆使壞人混進群眾隊伍中胡作非為，甚至殺人放火；四則軍隊中也會出些極端份子做出惹起眾惡的事情；最後，最無恥的一招是他們製造一些「共和國衛士」，算在群眾帳上。他們卻心懷叵測，裝作正人君子的樣子來宣告：

「我們是人民解放軍，人民軍隊愛人民，一定要作到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當軍隊被激怒到忍無可忍時，不惜以任何手段進軍天安門的命令一下，履帶和機關槍便會按捺不住胸膛的怒火，也不管現在是什麼時代了，祇管血洗天安門！

鄧小平笑齊奧塞斯庫妄長了一個高大的身軀，齊奧塞斯庫噬臍莫及，悔愧生前未能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

第四，還有一些說法，如錯估說，上當說，等等。

有人揭發章伯鈞，說他說毛「沒有估計到黨會犯這樣多的錯誤，現在出的問題大大超過了估計，真是『超額完成了任務』，弄得進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閔剛侯：《章伯鈞召集的一次緊急會議》，《人民日報》（1957年7月4日）

所謂「緊急會議」即有名的六月六日六教授會議。這裏章伯鈞的估計犯了雙重的錯誤。一是毛早已估計到最壞的結果；二是毛至少在三星期前已採取了斷然措施，根本不存在「進退失措」。

但，這種錯估的說法至今不絕。連某位政論家都持此說。他說：「經過了上述恩威並施以後，毛澤東以為可以控制中國的知識份子，成為會說話的黨的高級工具了。因此在1956年出現了蘇聯共產黨第20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及其後的波蘭和匈牙利事件，毛澤東自以為中國的知識份子絕不會「亂說亂動」，所以以退為進，在1957年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大鳴大放，以緩和及改善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豈料卻引來一大堆批評意見，包括一些相當尖銳的意見。毛澤東大吃一驚，一怒之下發動了反右派鬥爭，加強對知識份子的鎮壓。而為了不失他的『英明』形象，便詭稱大鳴大放是他的『陽謀』。」

他又不接觸毛澤東，怎能知道「毛澤東大吃一驚」和「一怒之下」呢？所以我猜想，他是受了待在毛身旁的李醫生的影響。

李醫生說：「毛這步棋估計錯了。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³⁰

李是持「整黨內敵手說」的，認為整民主人士不是毛的本意。其實，整兩者都是他的本意。前者是避免中國出赫魯曉夫；即反修。後者是避免中國出哥穆爾卡、納吉或說避免出波匈事件；即反右。其社會的、歷史的根源是蘇共20大及中共八大及其反個人崇拜路線；其認識根源，脫胎於列寧關於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掃除兩堆垃圾的論述和他自己在《矛盾論》中所說，不能掌握矛盾發展的階段性，認識和處理問題便會如墜煙海。所以，先反右，掃除一堆兒「垃圾」；然後，用反右中的積極份子整黨內敵手，黑旗事件，前已闡明，而作為掃除另一堆兒「垃圾」的大動作的文章，所依靠的是比林克等八人還要積極的反右極先鋒張春橋、姚文元、關鋒、王力、戚本禹輩。

所以，事實上不是毛，而是「右派」錯估了，上當了。李醫生在書的上一頁說「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下一頁又說：「知識份子這下覺得上了毛澤東的『當』。」到底誰上了誰的「當」呢？

作為例證，龍雲直到 5 月 22 日，大家已嗅出毛要收網的氣息，他還對毛表示了信賴，認為「收」是不可能的，說：「共產黨是執政黨，怎會出爾反爾，開這樣大的玩笑，讓大家把思想暴露出來，然後再整。」（見《人民日報》5 月 24 日）好像這是不可思議的。

無獨有偶。1957 年 6 月 8 日，毛澤東捕捉到罵國務院秘書助理盧郁文「為虎作倀，無恥之尤」的匿名信事件這一戰機，在《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地位，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向全國公佈了要開展一場反擊右派的轟轟烈烈大運動。工商界這天開了最後一次座談會。座談會結束後，章乃器提交一篇書面發言，反批評吳大琨、孫曉村：「這不是睜眼睛撒謊，便是健忘。這樣的辨認作風正派不正派，是值得考慮的。」特別耐人尋味的是，面對中共發出反右派的歇斯底里號召，他於結尾處寫道：

「我告訴工商界：整風運動是不定期經進行到底的；共產黨絕不會做半途而廢的事情。共產黨代表了工人階級忠誠老實的品質，是不會表面一套，裏面一套的。我們要完全相信黨的方針、政策，用老老實實、實事求是的態度揭發矛盾，幫助黨做好整風工作。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擊。整風運動從某一些角落來看，肯定會有曲折，肯定的會有過『左』、過『右』的偏向，但黨是會明是非的，是非最後也一定會明的。」（6 月 10 日《人民日報》）

他們兩位都是政治老手，竟然會上當受騙而至執迷不悟！有人評論他倆說這話，可以理解為他們對黨信賴；也可以理解為他們預感到收的可能，故意說破，希望避免這種前景。我們說，無論對他們的話作何理解，都說明他們對毛的無恥、無賴的程度作了錯誤的估計，以致見了棺材還不落淚。

張戎作為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長的女兒，根據自己的所經、所見、所聞，寫了紀實文學《鴻》。關於反右的緣起。她寫道：「1956 年秋匈牙利發生推翻共產黨政權的暴動事件——不久被鎮壓住了——也使毛大受刺激。他知道中國有一批受過教育的人都希望開放、自由。他想要防止中國發生類似的匈牙利事件，後來他曾對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表示，鼓勵人批評等於是個陷阱。……毛澤東不擔心工人或農民。他堅信這些人會感激共產黨讓他們填飽了肚子使他們過安穩的生活，他不相信這些人會起來造反。毛澤東從來不信任知識份子，他們比別的階層更喜歡獨立思考。匈牙利事件就是知識份子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僅右派上了毛的當，掉進他設置的陷阱，即便左派如陳其通等四人也掉進去了；可憐的馬寒冰竟輕於鴻毛了。位至中央部長的李維漢，雖不能說「上當」，但是他也沒有估計到「引蛇出洞」。當然，下面的黨員就更估計不到了。張戎說她母親——「1957 年春，共產黨邀請知識份子批評各級領導。我母親聽了毛澤東的一個一級級向下傳達的講話後，非常激動，整夜沒有睡意。她覺得中國共產黨真的越變越民主了，她為自己是個共產黨員而自豪。」³¹到反右時，「她打從心底覺得此事不公道：先是宣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現在卻把提了意見的人打成右派。」³²

毛澤東真的「開這樣大的玩笑」，讓左派、右派上當了！讓黨員、國人上當了！甚至開到國際上，讓蘇聯、美國上當了！

毛澤東 1958 年 3 月在成都會議上講中蘇關係指出，我們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我們講，他們不講，還說我們是搞自由主義……。這個報告公佈後，《紐約時報》全文登載，並發表了文章說是「中國自由化。」……當時蘇聯看不清，給我們一個照會，怕我們向右轉。反右派一起，當然「自由化」沒有了。

無怪乎江青說：「主席這個人，在政治鬥爭上，誰也搞不過他。」³³可見，如果真像他說的——是「陽謀」，能讓這麼多人上當嗎？能把國人、洋人玩得如此眼花繚亂嗎？當然，出河才見兩腿泥。

赫魯曉夫和許多中國人一樣，終於看出來了：「百花齊放這個口號是個激將法。毛假裝把民主和自由發表意見的閘門開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們把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用口頭或書面的形式發表出來，以便他能夠把那些被他認為是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³⁴

是的，一點不錯，正是志在「搞掉」。「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

「搞掉」是目的，「陰謀」是手段；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有一本研究反右派鬥爭的專著，書名起得很醒目《1957 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其中對赫魯曉夫上述言論抨擊道：「這當然祇是一種懷著敵意的情緒化的評論，把本來很複雜的事情看得過於簡單了。他抹煞了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

「國內一些研究者持有類似的說法。他們的理由是：……」筆者刪去的那些「理由」，大致上是本文前面的論述。為了避免重重復復，故而刪去。作者的說法是：「但是這些都僅僅說明他的思想中有發動一場反右派鬥爭的因素，卻不能說這時他已經在計劃開展這場鬥爭了。」³⁵

好一個「這些都僅僅說明他的思想中有發動一場反右派鬥爭的因素」！好一個「因素」！

要是當真地來追查「因素」，早在中共建國前夜，毛在評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中就曾說道：「他們的頭腦中還殘存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³⁶

「艾奇遜說，還是要搞亂的，並且確定地要搞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一批什麼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³⁷

「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份子，亦即歸民主主義份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³⁸

「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裏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³⁹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份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還因為……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駁斥了艾奇遜，……對於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有某些相同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⁴⁰

上述這些話，跟毛 1957 年 1 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話，「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裏頭有他們的人，拿中國來說，就是資產階級中間和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相對應，就可以判斷，在毛緊繃的階級鬥爭為綱這根弦上，早把民主個人主義的知識份子定為了敵人，當作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而當年稱作「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祇是策略上的考慮。作為「因素」，為反右派打下伏筆，是其遠因。

事實上，自解放以來，對知識份子的所有思想改造運動，都具有反右派鬥爭的因素；而反右派運動，究其本質，仍是屬於反「民主個人主義」的範疇。簡直可以把上節引用毛的那句話，改述如下：「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有那麼多民主個人主義者沒有搞掉。」

「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該書作者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是不是向黨表明，自己雖被錯劃為右派，受了很大苦難，但絕對沒有「懷著敵對的情緒」，甚至懺悔當年包括自己在內的右派份子向黨猖狂進攻，致使「弊端」沒能「消除」成，辜負了偉大領袖「確實有」的「願望」？其實大可不必。邵燕祥在該書「序」中說：「有人說反右派鬥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我以為不如說是序幕。」

一齣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九年後發生了，一革革了整十年，付出了黨組織癱瘓、國民經濟幾乎崩潰、上億人受害的代價，總算徹底實現了「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他讓世人看到了他「消除」的是什麼「弊端」！

我不能不驚歎、感佩鄧拓的先知先覺。他在中國沒有付出文革的代價前，甚至沒有反右前就說出了這樣的話：「主席說百家者兩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政策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時至今日，我們應該在鄧拓「更相信」的基礎上再加一個「更」字。孰料，以「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作為著書立說之「眼」的作者，竟然指責別人「抹煞了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夫「確實有」者，蓋非「假的」也。「假作真時真也假」，這該叫讀者說什麼好呢？

第五、知識份子是用他的知識、智力，秉持良心作出科學的判斷，以顯示其力量，創造社會文明，推動社會前進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藝術家都是如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越來越被承認其價值。毛澤東對馬寅初的打壓批鬥，說明他不僅是個暴君，而且是個昏君，弄得民不聊生，還堅持「寧要原子，不要褲子」。如果聽了馬寅初的話，今天的孩子就不會有那麼多被排斥在幼、小、中、大各級學校的門外了；今天也不用甯捨孩子，也要神州五號升天了。

我深深感到，一個正確的論點，你就想像不到它的社會作用是多麼大！反之，一個錯誤的論點被強行貫徹，它的負作用也是難以估量的。還原反右，可知對它的起因做出正確的論斷是何等必要！到底是知識份子借黨整風向黨——如毛所說「向黨猖狂進攻」呢，還是如鄧拓一眼看穿的，毛心裏有一個「引蛇出洞」的鬼呢？先知先覺者所見略同。讓我舉出吳宓教授和張紫葛教授在反右前後的言談遭遇來說明之。吳宓談到這次大鳴大放，問張：「其旨意你有省悟否？」

張說：「看不出什麼言外之意。」

「傷哉！」吳歎息，「你簡直利祿在心而思慮俱蔽。這也看不到？古人說過又說過：言甘而幣厚，其必叵測。今要開門整風，下一紙文，表一下態就夠了，何用如此盛詞大噪，千呼萬喚，言之懇懇，促之諄諄。而其鼓動對象，厥為民主黨派與知識份子。……。毛公將有事於天下書生矣！」

張惶恐問計，吳沈吟久之，說：「惟有三緘其口。」遲疑一會兒又說：「當然，不發言也不是萬全之策。被秦始皇坑掉的數百儒生，誰出過一言半語呢？」

張以為，拒絕發言，祇怕辦不到。

吳說：「正是，有這麼一個邏輯，不發言，不表態，就是抵觸，就是對黨離心離德。那麼，反正你牢記，萬一要發言，祇能歌功頌德。」又說：「歌功頌德也不一定免禍。君不見，頌明太祖『光天化日』、『天生聖人為世作則』者，竟被論為譏諷朱元璋做和尚，刺光頭，乃是『為世作賊』！」

張大為煩惱，說：「你向來運籌進退，步伐周紮，果斷肯定。怎麼今天這麼上下兩可之詞？」

吳兩掌拍膝：「情勢使然也！我再高明，也祇是塘中之魚，但能察知在投餌張罟，卻無法料定網究竟有多大。網小，但網趨餌之魚；網大，則不趨食香餌者亦將難免。設或竟是攔河網，則全塘水族將無遺類。所以，問題要看網有多大，設或你剛剛處於網緣，還可望三緘其口或歌功頌德而幸存。設或你處於網內，那就在劫難逃了。」

1957年5月初，院長胡光和黨委書記劉佑東一再至張紫葛辦公室和宿舍拜訪他，動員他在鳴放會上發言。「你是有影響的教授，務請和我們合作，帶頭把鳴放搞起來！」

他仍未發言。劉佑東邀他到他家吃茶、密談。「你太不夠朋友，鳴放會上一言不發。」

張說：「我確實對你們非常滿意，沒有任何意見，總不能地無病呻吟嘛！」

劉痛心疾首：「什麼時候話！毛主席說過，祇有兩種人沒有缺點，沒錯誤，一個是沒出生的人，一個是死人。你咒我們是死人？！你要知道，如果鳴放搞不起來，我這黨委書記就得垮台。你哪怕胡亂捏造，指著我們鼻子臭罵一頓，也是幫我的大忙，我也會無限感激你的。」

張無奈，在當晚的座談會上說了十來分鐘，全是歌功頌德。而第二天出版的院刊《鳴放每日刊》上所載他的發言記錄卻顛而倒之。他的原話是：「我認為黨群之間沒有鴻溝」，記錄改為「大有鴻溝」。原話：「我認為院黨委辦大學很在行」顛倒為「很不在行」等等。通篇無一句不如此。張氣得不行，去找劉書記。誰知他倒打一耙：「是我叫改的。像你那樣說。我能下台嗎？叫我動員鳴放，是提批評意見，沒叫我動員表揚我們！」

1957年6月28日，西南政治學院貼出了第一批反右大字報：

「張紫葛是個口蜜腹劍的大右派！」「揪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張紫葛！」

他去問劉佑東：「憑什麼把我定成右派份子？」

劉答：「我有什麼辦法？我是黨的馴服工具。那會兒叫我動員鳴放，我就動員你鳴放，這會兒叫我劃右派，我就劃右派。你不當右派我當？我給你交底吧，這右派是有指標的！在市委分配指標時，各校黨委書記爭得面紅耳赤，都訴說：我那裏政治條件好，劃不到這麼多右派！市委書記惱了，叫：放下指標，先反掉你們的右傾思想再說！我差一點兒回不來！……總而言之，你這右派當定了，除非你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毛主席出來保你。」

剛開始劃了右派，尚未限制人身自由。張又來到吳宓家，吳說：「估計當如此。」轉而安慰道：「勿怪勿惱，在劫難逃也。這回是拉開臉了。……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既甘且美，翻手為雲倡鳴放，懇請大鳴大放，幫我整風。不過兩月，把臉一拉，嘿！爾等乘我整風，

猖狂進攻！發表關於內部矛盾之光輝著作，……面目全非，語言迥異，還創造了剷除毒草之六條標準云云。於是覆手為雨，掀起反右之惡浪。……尤有進者，以神州普天下之主，親自援桴急鼓，進攻一小小之《文匯報》，且對準其中之一女兵——女記者浦熙修，聲嘶力竭，衝鋒陷陣。……我舉此數端，意在提醒你：在劫難逃者多矣。汝罹此難，萬非汝之德行有虧，舉措失當。既無愧於心，就不用戚戚於懷。天降奇禍，復何言哉！且而，我已再四演算，汝雖有不測之禍，卻是絕無性命之憂！」

說罷，叫他「趕快離去，善自保重。」握手時又叮囑說：「處今之時，惟有達人知命，聽之任之。養浩然之氣，存萬全之軀。切切不可憂傷憤激，自暴自棄。否則，古有賈誼，今有李源澄！老李氣憤填膺，已經瘋了！」（李是歷史學教授，已劃右派）（52）

我等後知有覺，當時祇是毛說的「有人說這是陰謀」中的「有人」之一，身經了反右的整個過程，今昔對比又看到如許「出土文物」，方始對其陰謀的認識由直感到達論證。吳、張的見證，既對陽謀說予以揭穿；又對變卦說予以指迷；甚至用「該縮頭時便縮頭」的烏龜法也不能自保了！

黃花崗雜誌 12 期。

上篇：這是陰謀（之二）

黃花崗 13 期雜誌。

本期連載還原一九五七——《探源篇》的第三部分。

三，說來說去還是「陰謀說」

毛澤東氣急敗壞，一怒之下甩掉了「陽謀」這塊遮羞布；現在更加無恥地原形畢露。他說：「我他們不愛，給他們自由，讓放出毒素。你講我陰謀就陰謀，大魚、小魚一起釣，特別釣吃人鯊魚。」雖然這比說「你講我男盜女娼就男盜女娼」更加無恥和無賴，但這總算是他打自己嘴裏承認了是「陰謀」。

第一，果如前引統戰部李維漢部長所說，「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這時候部長還蒙在鼓裏的話，那麼，隨後他便成為「引蛇出洞」陰謀的施工者了。

據第一號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中回憶道：

「5 月 15 日，毛澤東致送《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給中共高幹閱讀。信中，老人家把共產黨人分為馬克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把社會上各階層人士分為左派、中間派、右派。並指出『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

「這邊廂，民主黨派裏的兩個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見，獲得了『東南風轉西北風』的天氣預報。他們完全三緘其口，靜觀以民盟農工為舞台中心，以章（伯鈞）羅（隆基）為主要角色的一台踐踏知識份子、打擊民主黨派的慘劇。那邊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還在積極響應中共中央整風號召，大講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光明未來，宣傳『鳴放』，鼓勵『監督』。」

「為了把昔日的朋友製造成為今天的敵人，並讓全社會認可，毛澤東在上海發出了指示：『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鬧。』『這不叫誘敵深入，叫自投羅網。』這羅網，便是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組織、召集系列整風座談會。

「座談會是從5月8日起召開的，先後搞了13次。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發表意見，來幫助中共整風。

「座談會的頭幾天，父親沒有去。一則，他的意見早就發表過了，二則，他正拉肚子。

「李維漢很著急父親不入圈套，便親自撥電話敦請：『伯老，你一定要去參加座談，給我們中共提提意見呀。』

「5月21日，實在躲（音：托）不過李維漢的面子人情，父親去了，行前還跟母親講：『今天開會，我真不知說什麼好？』

「進了會議室，他被請入主賓席—在頭排大沙發入座。這顯然是一個必須發言的席位。果然，親自坐鎮的李維漢點名要父親『給中共提意見。』

「父親講了幾十分鐘，他談到政治設計院問題；聽意見於基層『放權於部』會，發揮管理機關的作用問題；國務院會議程序問題；及檢查歷次政治運動的建議。最後父親說：「我的講話不是靈感和一時高興，所提意見也不都是那麼嚴重。無非是希望共產黨改革體制，改善領導，在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方面前進一步罷了。」他講話的時候，李維漢一直神情怡然。父親大概以為是稱許自己的談話；殊不知，他這是在為獵物墮網而心安。」

「對李維漢而言，章伯鈞是他釣到手的一條大鯊魚，自可邀寵於毛。但遠非只此而已，在他的《回憶與研究》中還記載著如法炮製的其他 陷阱：

「工商座談會期間，有人提出真正的資本家與會不多，代表性不夠，於是又不斷擴大規模，找到了北京的吳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會鳴放，後來這些人都被劃為右派。」

第二，當時上海有人問劉賓雁：「黨中央整風的決心大不大？」劉是個年輕氣盛、忠誠直率、從不設防的人，他隨口答問：「毛主席的決心大！至於黨中央嘛，還得走著瞧。」後來傳說：「劉少奇、彭真一線，向毛主席施加壓力。」現在真相已明，當他們對毛的「引蛇出洞」陰謀心領神會時，黨中央就成為一個共同迫害知識份子的沆瀣一氣的陰謀集團。各個領導都是施展陰謀詭計的能手。他們用實踐證明：「有人說這是陰謀」是千真萬確的，現在，讓彭真現身說法。

戴煌說，他就是中了彭真的陰謀詭計而被劃為右派的。我讀他寫的回憶錄《九死一生》，感慨萬分。他的歷史能紅得滴出血來，幼年當兒童團長，十幾歲參加新四軍，後為中共打內戰，當隨軍記者，建國後到新華社，參加抗美援朝，援越抗美，還受到胡志明的器重。

1956年到外交學院調幹培訓，他是班級的黨支部書記。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那篇遺臭萬年的社論《這是為什麼》，在全國大張旗鼓地掀起了反右運動。在這之前，他沒有提過意見，寫過大字報。

反右展開之後，彭真親自召集了首都高校黨支部委員以上幹部的聯席會議，戴煌參加了，望著彭真那偉岸的身軀，滿面的紅光，誠懇的態度，聽著他宏亮的嗓音：

「反右歸反右，整風歸整風。我們黨內的同志，機關的同志，還要繼續幫助黨搞好整風。有什麼說什麼，有什麼問題還得改什麼問題。經過前一階段的整風，表明黨內的問題的確不少……我們有些黨員幹部就像封建把頭一樣，騎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拉尿，這樣的人不整整行嗎？」

「所以，我們黨內的同志應該說，而且說錯了也不要緊，和『章羅同盟』他們攻擊共產黨，企圖和黨在中國平分秋色，顯然不是一種性質……」

彭市長的一番話，引起他審視自己的黨性，心中明明有一些憂心的問題，如回到蘇北故鄉，看到慘敗的景象和鄉親的怨聲載道；以及認為，神化與特權是中國的最大隱患。這些並未積極向黨提出，幫助黨整風。

6月13日，新華社召集在外交學院學習的同志開了一個座談會。他發言了，主要是談反對神化與特權。他指出，現在已經開始了對毛主席的神化，只要是毛主席說過的話，不管對不對，科學不科學，那就一定千真萬確，一定是馬列主義真理。

他批判毛主席最近會見南斯拉夫代表團的談話。毛說，我們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還希望早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國有6億人口，打掉了3億人，還有3億人，一樣建設社會主義。可帝國主義國家能剩下多少人呢？而且人民趁機起來造反了，從而引起世界範圍內的革命……

戴煌認為，就說美國人民吧！他們今天活得好好的，憑什麼要砸掉自己的洋房、小車，去揭竿而起鬧世界革命呢？

後果就悲慘了：挨批、挨鬥、劃右派、勞改……百般苦罪，概括為一言：「九死一生20年」。

第三，引蛇出洞的伎倆，厠膿尿血的人格，賣國的嘴臉，鱷魚的眼淚。說的是，周恩來不殺王造時，王造時卻由周恩來而死。

王造時是政治學博士，29歲的大學教授，少有「安福三才子」（另二為羅隆基、彭文應）之稱，長有「愛國七君子」之名。七君子之另一，鄒韜奮對他的評價是八個字：「天真爛漫，篤實敦厚」。

所謂「七君子」，都是救國會的頭面人物，另外五位是沈鈞儒、沙千里、李公僕、章乃器、史良。在周恩來操控下，以抗日為名，大事反蔣。於1936年12月22日他們以「危害民國罪」被關進蘇州高等法院監牢。他們雖被利用，但確是出於愛國熱忱，故獲釋後，得到「愛國七君子」美名。我謂「利用」；你不相信嗎？試看，「愛國七君子」若真的愛起國來，中共又是何種態度？

1941年4月15日，《新華日報》頭版：「塔斯社莫斯科13日電」

條約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與日本天皇陛下，願鞏固蘇日兩國間之和平與友好邦交，茲特決定締結中立條約，因此雙方任命各自代表，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任命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長維拉徹斯拉夫、莫洛托夫；日本任命外相松岡洋右及特命駐蘇全權大使建川美次陸軍中將，為各自代表。雙方代表互閱國書，均屬完好妥善，當即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締約國雙方保證維持相互之間和平與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對方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第二條、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

第三條、現行條約自締約國雙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滿前一年，倘締約國雙方均未宣告廢棄本約，則有效期限即自動再行延長五年。

第四條、現行條約當從速呈請批准。批准證件當從速在東京交換。

現行條約用俄文及日文繕寫兩份，由上述雙方代表簽字蓋章，以昭信守。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即昭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立於莫斯科。莫洛托夫（簽署）；松岡洋右，建川美次（簽署）。

宣言

遵照蘇日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締結之中立條約精神，蘇日雙方政府為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茲特鄭重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州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於莫斯科。蘇聯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簽署）；日本政府代表松岡洋右，建川美次（簽署）。

消息傳開，輿論譁然，各界人士反應強烈。中華民國政府鄭重聲明，對條約涉及中國的部分宣佈無效，並指示駐莫斯科大使要求蘇聯方面澄清。

親蘇親共但又自認是中國人的人士，不僅無法面對別人的質問，也無法面對自己的民族良心，因而自己也義憤填膺。黃炎培在日記中寫道：「4月7日2時，招周恩來、董必武來，舜生、伯鈞也到，請中共表示態度。周極言蘇聯此約乃其一貫之政策，與對華毫無關係；至中共態度，決不因此變更云云。董略同。」

黃炎培等，他們的救國會經過討論，表明態度，由王造時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帥的公開信》。內稱：「今貴國於4月13日與我們的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訂立中立協定，並發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謂『滿州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完整與不可侵犯性，顯然妨害我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我們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故對於我政府宣佈其無效的鄭重聲明，絕對擁護，且深信這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公意。」

這一下可大大地觸怒了中共，同時也大大地暴露了中共的賣國嘴臉。

章乃器的妻子鬍子嬰在她寫的《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資料選輯》第82輯，第80頁）中回憶道：「1941年，蘇聯因戰略上的需要，和日本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其中有涉及中國主權的地方，國民黨報紙即借此攻擊蘇聯。救國會也發表宣言對蘇聯提出抗議。周恩來同志知道後，認為這樣做不適宜。沈衡老表示救國會要作自我檢討。章乃器對這件事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救國會發表宣言是救國會的事，共產黨無權干涉，救國會也不應該檢討。他爭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國會。章乃器退出救國會時，要我同他一同退出，我沒有接受。」半年後，他們夫妻離婚。這事我們不管，我們關心的是其賣國。

共產黨對王造時記仇在心，解放後先讓他失業，後給以迫害，七君子中健在的其他人，都當上了中央大官。而且，1949年毛澤東去蘇聯給斯大林祝賀70大壽時作為獻禮，就在民主黨派中唯一地宣佈解散了救國會，以謝罪於斯大林大元帥。

在《沈重的 1957》中載有王造時的有關此事的遺稿：1957 年寫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問題的交代」，其中寫道：

當時，「在重慶救國會的重要負責同志開會討論這件事的結果，認為救國會運動是由於日本侵略東北而起的，中國抗戰也是為著這個問題。蘇聯雖是我們最好的友邦，但是這個協定實在地對中國是一個打擊，大家認為有公開表示的必要，當場推舉我起草，張申府審查。我隨即擬了一個致斯大林大元帥的公開信，表示該項協定是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認為是很大的遺憾。張申府看過之後，旋經開會修正通過。當時我們七個人（指「七君子」－引者），除鄒韜奮同志生活書店被迫已遷往香港外，我們六個人都在重慶參加會議。（記得王炳南，張友漁同志等也參加會議。）開會決定：由沙千里謄清兩份，於次日在史良家簽字。簽名的有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李公僕、沙千里、張申府、劉清揚、鬍子嬰和我九人……」（第 106 頁）

這封公開信被說成是反蘇，反共，反斯大林。為縮小打擊面，造謠說是王造時一人幹的。

「當時黨的個別領導人按照《真理報》的調子，說成是斯大林的一種策略：讓日本的矛頭向南（專門侵略中國－紫丹，下同）不向北（不打蘇聯），免使蘇聯腹背受敵，便於集中全力抵抗法西斯德國。因此，那條約及宣言是正確的。」（第 107 頁）

王造時政治上受冷遇，經濟上處困境，心理上陷苦悶，採取了少說話，不寫作，免是非的消極態度。

1957 年的春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好一派萬紫千紅！中共中央統戰部消除對他的誤會。3 月 27 日傍晚，周總理接見了他，晚宴上，一邊給他夾菜，一邊聊天，回憶解放前那些不平常的歲月。後來又談到讓他到北京工作以及恢復救國會的問題。實在可以說是枯木逢春。王造時舒心之情，可以從他 1957 年 6 月 12 日早晨寫給周總理的信中看出：

周總理：

二月下旬我進京參加全國政協，三月間與統戰部兩度談話結果，得將 1941 年日蘇互不侵犯協定所引起對我的誤會及其間的是非問題，相與澄清，多年來私衷的悶惑，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運的是您在萬機待理之中還邀請我作一懇談。您那沖曠的襟懷，誠摯的態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種為國家為人民多方謀慮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動，永不能忘。您提出我來北京工作及恢復救國會各節，我定當從祖國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慮。同時，請您接受我至誠向往之忱，隨時予以指教，使我更能夠為社會主義建設辛勤工作，無負盛意……」

關於「恢復救國會」，遺稿記載：

「3 月 27 日的晚上，我在北京蒙周總理召見。在談話中周總理曾經問我是否考慮恢復救國會的問題（既然恢復，何必解散？－紫丹，下同）我答覆說要問沈鈞儒，史良和其他與救國會有關係的朋友（為什麼單單問你？）。周總理說，當初解散救國會是一個錯誤。毛主席看見民主黨派抗美援朝的聯合宣言沒有救國會的名字，認為是一種損失（裝迷！那是誰叫解散的？）。周總理說我當初反對解散是對的。（那就是說，第一，當初你是反對解散的，這一點先肯定下來；第二，你是對的，黨是錯誤的，別人不反對也是錯誤的。）我答覆說，我當初也不是絕對反對解散，我當初的意見是如果其他民主黨派解散，救國會也就應當解散；如果其他民主黨派還有歷史任務，救國會也就考慮不解散……（真是糊塗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當初為什麼單單提出解散救國會而不提解散其他任何一個民主黨派？現在又為什麼單單問你是否考慮恢復的問題，而不問其他任何人？而其他任何人現在都是比你更具分量的呀！你呀你！王博士。人家賣了你，你還要老實巴腳地替人家數身價）」。 （第 109-110 頁）

王造時誤以為報國有門了，積極性也上來了，熱情地投入了幫助黨整風的大鳴大放之中。他這條本來是凍僵的蛇，硬是被春天的暖氣給哈出了洞；正好給共產黨劃右派。

不僅僅鬥他現行的右派言論，還挖他反蘇反共反斯大林大元帥的歷史罪惡以及要「恢復救國會」的陰謀活動。七鬥八鬥，他受不了了，就向總理發出求援信：

恩來總理：

六月十二日晨緘上一函，並附呈在上海宣傳工作會議和上海市政協的發言兩紙，想蒙鑑察。不意即日起由上海法學會（我忝為該會副會長）及市政協政法組（我忝為該組召集人之一）召集了六天的座談會，主要對我在宣傳工作會議及新聞日報座談會的發言，作尖銳的批評，我得到了很好的啟發和教育。但在批評之中及各報發表關於我的消息，動輒冠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甚至右派份子的帽子，私衷實不勝感慨而惶惑。

多年以來，由於家庭疊遭不幸事故，加以自黨對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緘默，不敢有所獻議，誠恐言或失當，於公於私都無好處。本年三月間在京得有機緣同統戰部及救國會諸友暢談之後，相與澄清了一些歷史上的問題，複蒙我公召見懇談，猥承勉勵，精神為之一奮，私衷自矢，今後對黨對社會主義，更應竭忠盡慮，以圖報答。適值黨大力號召放鳴，廣開言路，我鑑於官僚主義相當普遍，激於愛黨愛國之情，感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顧慮，放膽為言，殊不料由於對政策的體會不夠，對社會的觀察不周，所發生的客觀效果徒加了黨和政府的困難，造成了不良的影響，此雖非始願所及，但後果責任理應由我來負。以惟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惟恐天下不亂之誚，我不僅愧對黨國，愧對我公，抑且愧對自己。我將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地作一書面檢查，以冀彌補損失於萬一。但若強我承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右派人物，則違心之言，我所不為。恐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也無裨益也。

承您關懷備至，我當此疑難，心懷又不免向往您處。誠知您正在開人民代表大會，原無暇晷處理瑣事，但向日之葵，仍期一照，不知可否由您斟酌通知上海市委或正在京參加人代會的劉述周部長，由此間負責同志約我面談，指示對我的要求，使我能夠認識問題的所在，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做好書面檢查，糾正不良影響，同時不強我作言不由衷之論。如果您認為我當面聆教更為妥當，我也可隨時入京趨謁。

我的長兒長期患精神病於上海醫院，幼兒初患精神病於南京醫院，長女神經曾受刺激在家修養，而愛人則於去年三月中旬逝世，我個人也有血壓嫌高及風濕痛之病，自顧孑然一身，原無所求。如能以殘餘年華追隨黨及毛主席和我公，作一磚一瓦之用，而有助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誠衷心所祝，殊不願抑鬱困死，徒負您臨別相期的至意。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諸希諒察。謹致

最敬仰的敬禮！

王造時上

就像我們可以「預報」準確昨天的天氣一樣，我們充當事後諸葛亮可以判斷周恩來決不會給他回信，相反，倒會去問一問他信上所說的「劉述周部長」：「王造時這棵大毒草鋤得怎麼樣了？」

可憐的著作等身的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成了被人奚落為「檢討」等身的王博士。最終死於上海第一看守所。

當七君子住國民黨的監獄的時候，宋慶齡去解救他們，神氣十足地斥責庭長道：「我們有事要找院長，他為什麼不見？就是蔣，我要見，他也不敢不見。你們的院長為什麼不出來？」

王造時被釋放出獄時，帶著他在獄中翻譯出的他老師拉斯基的名著《國家的理論與實際》一書。

當他住共產黨的監獄的時候，宋慶齡啞吧了。他至死也未被釋放，死時還帶著手銬一副。

倒是周恩來總理有情有義，《沈重的 1957》寫道：「一份關於王造時病危的報告，終於送到周恩來總理手中。」

「人民的好總理馬上打來了長途電話，要求盡力搶救王造時先生。王造時被送往上海瑞金醫院搶救……

「然而，王造時此刻已危在旦夕，氣息奄奄，帶著手銬躺在病床上。聽說周總理打來電話，他鬍鬚邋邋的嘴角漾起笑意。」（第 79-80 頁）三天後他死了。

他的小女兒王海容，因不與父親劃清界限，也劃了右派，剛在醫院動了乳房癌大手術，現拖著沈重病體邊哭邊奔，趕往上海龍華火葬場。

說了半天，還沒說王造時的右派言論是什麼呢！

1957 年 3 月 20 日《人民日報》第五版上，載有他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的「放毒」，題目是「我們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趨豐富美滿」，還配發了他發言時笑容可掬的照片。他說：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道理，大家當然懂得，實行卻不太容易。拿一個或許是不倫不類的比喻來說，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徵更難。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養，難得虛懷若穀；做魏徵的非對人民事業有高度的忠誠，更易憂讒畏譏。我想，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黨外像魏徵的倒嫌其少。」

這就是他 獲得「自比魏徵，向黨進攻」的罪名的根據。

第四，「大約三年以前，在香港的一本《華人世界》刊物上，我讀到了徐鑄成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忘記了，裏面寫到的一件事情令我至今難忘：

「反右鬥爭初期，周恩來還召見過一次時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的龍雲，要他承認和時任民革中央常委兼全國政協常委的陳銘樞，結成一個『龍陳聯盟』。如果他能答應下來，周恩來保證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變。

「儘管自己已在報紙上的一篇篇批判聲中岌岌可危，卻沒有片刻的猶豫，龍雲當時就拒絕了，他說：這真成了天大的笑話，國人眾所周知，過去我是雲南的土皇帝，土軍閥，而陳銘樞做過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代理過偽行政院院長，算是蔣介石的嫡系。將我們兩個風馬牛地捏在一塊，這事怎麼能行呢？

「軍人出身，戎馬半生的龍雲，比不得多愁善感的章伯鈞，只要他第一次不肯答應下來，那就永遠不會答應，即便如渾身都是外交細胞的周恩來，也就只有徒勞而返；或許，這事終究讓始作俑者覺得了某些荒唐，周恩來召見之後也就不見有新的動靜……」

徐鑄成先生還在文章裏提供了這段史實的出處：

「他是聽一位在國務院參事室任職的老人講的，這位老人是龍雲生前的好友。龍雲在雲南當土皇帝的時候，前者則在雲南省參議會做事。我想，無論是徐鑄成，還是那位老人，大

約不會也風馬牛地捏造出這一段情節來，他們直到行將就木前說出來，寫出來，無非是要為歷史保留一點真相……

「顯然，不經十分警惕黨內黨外有人結成聯盟、可又偏偏嗜好在歷次運動中炮製出種種『集團』來的毛澤東的授意，周恩來是不會有這麼大的動作的。」（《禪機 1957》第 462 頁）我所以寧肯逐字逐句照抄，而不轉述，一則是由於要尊重人家的勞動成果，這個資料及其觀點，是理應屬於胡平先生的，我不能掠美；二則，我認為，材料愈接近原始愈好。

不過，我們由此看到，毛澤東真是個黑心肝，爛肚子的人，始而把兩個「反貼門神不對臉」的人，硬著手脖打成「章羅聯盟」；繼而又要風馬牛地捏出個「龍陳聯盟」。前者，陰謀得逞；後者，陰謀流產。儘管毛的陰謀已玩得臻於爐火純青；。但你就相信吧：大凡陰謀家之成功，斷然只能是「得逞」於一時；試問：「章羅聯盟」於今安在哉？伴隨著「章羅聯盟，天下奇冤」的結論，陰謀家的嘴臉原形畢露，一同載入史冊。由中共左手捂、右手蓋的大陰謀家毛澤東的險惡、醜惡、兇惡、邪惡、罪惡的被全部、徹底揭穿，被全部、徹底清算，雖已拖過了上世紀末期，但決躲不過本世紀初葉。這是中國人民定要，也定能做到的事情！空口無憑，《誰是新中國》和「九評」在中國大陸引起的巨大反響，即為實證。

當然，人們也愈益認清了周恩來助紂為虐的角色。

第五，毛澤東把陰謀定為國策，人們生活在陰謀的籠罩之下，邁步在密布的陷阱之間。

5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在重慶向 4000 多名黨內外幹部發表講話時，要求打破「五怕」思想。這「五怕」是：

一，怕黨員不許放，不許鳴。李富春說，黨和毛主席都表示要大家大膽放，大膽鳴，用不著顧慮什麼；

二，怕整。他說這大概是因為「三反」、思想改造運動和其他運動時，有些人被整過，感情上還有影響。但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已基本完成，情況已不同了；

三，怕說錯。他說共產黨還常常不免犯錯誤，錯了大家可以討論、糾正。要是大家都怕說錯，怎麼鳴得起來爭得起來呢？

四，怕「圍剿」。李富春說，黨中央對「圍剿」小說《組織部來的年輕人》的情況，已經提出了批評。王蒙的作品有缺點，也有正確的一面。是真理就不會怕圍剿，真理總歸是真理；

五，怕得罪人。他說那更不必顧慮。大家鳴大家爭論，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以求得共同的認識。

5 月 18、19 兩天，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學院，共計聽取了 13 個小時的意見。

大家反映最強烈的是：黨群關係緊張，在於有些黨員對知識份子看法不對頭。人事部門只知道政治歷史，不知道學術歷史，有了什麼事情就去翻檔案袋，查老帳。黨群關係不好，還因為中間隔了一層年輕的黨團員和所謂的積極份子，他們中的不少人，根據領導的胃口逢迎領導。又根據自己的利益去使領導偏聽偏信……

陶鑄就此說道，今天沒有誰是舊知識份子了。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經過這七年，黨和大家已互相瞭解，急風知勁草，大家都是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的。他要求教授們打消一切顧慮，大膽講話，堅決揭開這兩校的蓋子來。（轉引自《禪機 1957-上》第 170 頁）

5月底6月初，有一天下午，中共北京市委負責同志找了清華、北大、師大、北農大四所重點大學的黨委書記去談話，聽取了學校鳴放情況後說：你們幾所大學老教師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翹尾巴的專家、教授、民主黨派成員多，有影響的人物多，要用各種辦法，製造適當氣氛，「引蛇出洞」，讓他們把毒都吐出來，以便聚而殲之。你們幾所大學鳴放得還不夠，因為黨委力量強，黨委書記要示弱……讓他們敢於盡情鳴放，無所顧忌。最後著重交代說，時間不多了，很快就要發動反擊，反擊開始後就沒有人鳴放了。（施平《六十春秋風和雨》；轉引自上書第260頁）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對於中央關於大鳴大放的通知，是贊成的，他更歡迎知識界的人士能給政府提意見。

在聚集的高級知識份子中間，他真誠地請求他們說：「我們黨員中有一些人，說打通思想時是我打你通，談說服教育時是我說你服，沒有想到自己也有不通之處和必須教育的地方。」

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武漢地區最近「放」了一點。但很不夠；「鳴」了一些，但很沒勁。為何放不開，鳴不起來？有人說，黨群之間隔著一堵牆。這堵牆是鋼筋水泥的，磚的木的，還是紙紮的？我們要研究它，並且不管是什麼，都要打倒它，用整風的辦法打倒它。我們省委對科學、教育、文藝是外行，今天向大家請教打倒牆的辦法。」

王任重的講話，在二十多個高級知識份子之間，產生了極大的反響。紛紛把心裏想說的話抖出來，對國家的熱愛，對政府的信任，使他們說話無所顧忌。

馬哲民，這位中南財經學院的院長更是如此。當然，他的發言也就更加尖刻。

他慷慨激昂：「解放以來，知識份子有進步靠攏黨是事實，但與黨有距離也是事實。解放以來，知識份子遭遇上有些苦水。老幹部對知識份子不信任，不尊重，看不出與反動派的分別，或者根本看不起，所以在運動中常把人民內部的問題與敵我問題混淆起來，而不少運動又是以知識份子為重點。所以人人自危，覺得國家有前途，個人沒前途，活下去沒意思。現在我們要改變這種現象……」

這是一次座談會，一次由早晨到下午六點多的座談會。報紙評論說，人們去拆「牆」了，去拆黨和非黨之間的牆了。一件無法估價的重大工程在武漢地區也開工了。（見1957年5月13日文匯報）

春華秋實。與這次會議相應的是，三個月後，為反擊右派而召集的一次省人代會議，會議對馬哲民口誅筆伐，在「華中右派的主帥」頭銜下，羅織種種罪名。

最後，撤消了他的中南財經學院院長，民盟中央委員會常委、委員、湖北省主任委員，政協湖北省常委；但保留委員。

第六，上行下效，直至農村，也都處處在搞「引蛇出洞」。我到全國劃右派最多的河南省做過調查研究。

滑縣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家鄉，窮得很。1958年初，全縣幾千名教師集中在縣城第一中學進行整風反右學習大會。

第二天，縣委王書記作動員報告，主席台上坐有文教局長宋立業和公安局長等人。

王書記說，我們這次大會的目的是，幫助黨整掉三風，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要用大鳴大放大字報的形式給黨提意見。為讓大家暢所欲言，縣委提出三大保證：第一，保

證不打棍子；第二，保證不扣帽子；第三，保證條條有答覆。保證的目的是為了達到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那樣一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幾天過去了，沒人貼大字報。王書記又作第二次動員報告，批評思想不解放；對幫助黨整風的態度就說明你是否跟黨一條心？後來又要求各個學校鳴放也要放衛星，每人每天至少要貼 100 張大字報。這就貼出很多大字報。一看內容，全是揭發誰跟誰有男女關係，幾乎有一半還畫著有男女生殖器的漫畫。

一中黃校長是個嚴肅正派的人，。當然不來這一套。他原是縣報社負責人，因看不慣縣委領導的裙帶風，被調到學校來。他的大字報是一副對聯：

唯命是從之謂德

吹牛拍馬之謂才

橫聯是「人事制度」

他找語文教師尚建遂（地區著名的書法家）揮毫；又找圖畫老師肖然畫了個漫畫：採用了齊白石畫的頭戴烏紗帽泥半團的官僚形象；黃很滿意。還有個歷史老師也在上面簽了名。

貼出以後，縣報社記者立即給拍了照。校長跟他們說：「我們的大字報質量最高，記者都照了象，他們的大字報質量都不怎麼樣，幫助黨整風幫不到點子上。」

這樣鳴放了一陣，就又召開大會，主席台上還是那些人，不過，身上都帶了槍。周圍由公安局設崗，包圍了整個學校。

還是由王書記講話：「我們經過一個多月的大鳴大放，放得好！但也暴露了一部分敵人。他們趁黨整風之際，惡毒攻擊黨的領導和各項政策。為了幫助黨整風，保證大鳴大放辯論的順利進行，我們鄭重重申三大保證：第一，……第二……第三……但別有用心的人他們出圈了向我黨發起猖狂的進攻，是屬於資產階級右派，我們必須立即向他們實行反擊！……」

當天夜裏就有十幾人自殺。被訪者目睹一個教師從塔頂跳下來（在學校東南角有一個隋代建造的古塔），喊聲很大，直聲直氣，全校都能聽見，聽了毛骨悚然。他摔死了

另一個是住在隔壁教室裏的一位老教師，用刮臉刀片割斷了喉管……領導威脅目擊者：「誰說出去，找誰說事！」就這樣封鎖了消息。。

農村的鳴放，大都是 1958 年才開始，城市的反右，已使他們風聲鶴唳。所以領導要想讓他們鳴放，比登天還難！河南省西硤縣有個區委書記跟副書記、區長劉漢昌說：「現在人都成了驚弓之鳥，你動員的態度再誠懇，再大的保證，也沒人鳴放。你說這任務還怎麼完成呢？咱們都是黨的老同志，老戰友了，誰還信不過誰？你能不能帶頭鳴放，來個以身示範？這樣一來大家就有可能解除疑慮，打開『三軍不發無奈何』的僵局。」

「好！為了黨的事業，我就來當當這個『線』。」

大家知道當年唐明皇是用綢子勒死了楊貴妃，解決僵局的。長話短說，反右一開始，上前就把劉漢昌區長打成了右派。他當然不服；最後落了個態度惡劣，從重處理，勞動教養。

如果要研究反右運動，你就到左得出奇的河南省，河南省對你的任何荒謬的問題都能提供出荒謬的事實來回答。再順舉一例：

俗話說：「猴不上竿只敲鑼。」但是，不管他怎樣敲鑼，你就是不上竿，他能奈你何？

這個省有一位張挺老師，是學校教職員工工會主席，思想作風正派，聯繫群眾人緣好。領導動員他向黨提意見，他說：「黨的知識份子政策英明，我時常心懷感激還感激不過來呢！哪裡還會有意見？」

「你這個說法就不是唯物主義的，黨再英明也還會有缺點的。黨有缺點黨就不英明了？毛主席說，什麼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嘛！幫助黨整風就是給媽媽擦去臉上的黑。」

「媽媽的臉上哪有黑？媽媽的臉是白白淨淨的，很漂亮的。我恨章羅同盟右派集團給咱們的媽媽臉上抹黑。」

這時候他還有辦法劃對媽媽如此有感情的張老師右派嗎？有辦法或沒辦法，都是無所謂的。「辦法」並不是必需品，只要黨「想辦」就會用「莫須有」三字橫行無知阻的。

共產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是伊索寓言裏「狼和小羊」的關係。狼總是能吃掉小羊的，而且吃得振振有詞：

「張挺雖無右派言論，但內心歹毒，確系資產階級右派份子。」

難道還有比這更厚顏無恥，蠻不講理的嗎？「你講我陰謀就陰謀，但是，誰也無法阻擋我陰謀得逞。」

第七，「引蛇出洞」小考。

如果說陰謀就是陰謀家的本質屬性的話，那麼，引蛇出洞就是陰謀家毛澤東施展的陰謀中慣用的伎倆之一，直到壽終正寢之前，他從未間斷過故伎重演。

引蛇出洞，源於過去軍事上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鎮反時，開始宣佈「寬大政策」，隨後糾正「寬大無邊」，結果來個「滾水潑老鼠，一個跑不掉！」。人們把這叫做「欲擒故縱」；這次大鳴大放，毛把它說成是「釣魚」，「讓毒草出土」，「讓牛鬼蛇神出籠」，「讓右派自投羅網」，「引蛇出洞，聚而殲之」。可以看出，「引蛇出洞」，從事實和邏輯上講，絕對是一個陰謀實施的過程。試想，如果是「陽謀」，明打明地說：「蛇你出洞吧！好讓我聚而殲之。」蛇會出洞嗎？

這次整風，毛澤東說是繼承和發揚延安整風的精神，實質是「一次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我聽到的是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傳達稿）；方法和目的是「團結、批評、團結」可他沒有說也要繼承和發揚了延安整風的「引蛇出洞」的謀略。

1943年8月，康生在一個訓練班上講話。他得意洋洋地傳授經驗說：「我們領導上的方針是，強調『四三決定』的民主，號召大膽講話，提倡出牆報，提倡批評領導，遇到錯誤的問題不立即反駁，也不加以壓制，於是這就熱鬧了，共產黨是半條心的問題也出來了，那時反革命的兩條心的問題也出來了……。所以你們看一看，這個暴露階段，暴露到什麼程度！」（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96頁）總結雖是康生作的，但誰都知道康生只是一條狗，延安整風中「引蛇出洞」的知識產權，當然是屬於主人的。

那時的牆報，和57年的大字報一樣，都產生了轟動效應，都落得個悲慘的下場。毛澤東去看了牆報，回來說：「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

王實味發表在牆報上的幾篇文章，事實證明，那便是他的死刑判決書。

毛澤東說：「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發源地都是在北京。」（毛選五卷第448頁）實際上應該說是王實味。其膽（有正義感，不平就鳴，有氣就出）其識（民

主思想，科學見解，平等意識），堪稱右派老祖宗。李志綏先生在《毛主席私人醫生回憶錄》中說，他在伺候毛的「一組」所接觸到的情況，和「野百合花」裏的描述是一樣的。

在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中，毛如法泡制，絲毫不差地「號召大膽講話，提倡出牆報，提倡批評領導，遇到錯誤的問題不立即反駁，也不加以壓制，於是這就熱鬧了，」反對一黨專政的黨天下，提倡實施民主政治的政治設計院，清算中共罪惡的平反委員會……諸多問題都提出來了。

至於陰謀實施的具體過程，我在前面和後面，都有論述，這裏單單只是指出一點：它與延安整風所採用的陰謀伎倆一模一樣，一脈相承。

1959 年的廬山會議反右傾，實際就是黨內的又一次反右派。毛在 8 月 11 日下午的大會上講道：「180 度轉變，我是蝙蝠，開頭屬你們俱樂部，23 日怎麼轉變了？三番四覆要求民主，很同情。每個支部都不要壓迫民主，放臭屁，通通放，讓大家講話，……對俱樂部同志也講硬著頭皮頂住，還有什麼屁要放？聽說還有十大綱領。」（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 332 頁）

所謂「也（！）講硬著頭皮頂住」的「也」，是指曾經這樣對過右派。這是年長的知識份子耳熟能詳的但對毛對彭德懷也施行過「引蛇出洞」的毒招，卻是大多數人所不知底裏的。

《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第 313 頁：四月，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在會上毛推薦大家看《海瑞傳》，號召大家學習海瑞精神，敢於批評皇帝。無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

「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希望同志們敢於提出各種不同意見」，「有些同志報喜不報憂，不把真實情況反映上來。」「我們又不打擊又不報復，為什麼不敢大膽批評，不向別人提意見？」他說，海瑞這個人對皇帝罵得很厲害，說「嘉靖」是「家家皆淨也」，還把這話寫在給皇帝的奏疏裏。以後被關進監獄。有一天，忽然拿酒菜給他吃，他很奇怪，問看監的老頭，才知道是嘉靖死了，他大哭，把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毛說，儘管海瑞攻擊皇帝很厲害，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他把《明史》送給彭德懷看了，並勸周總理也看一看。

會後，彭德懷回北京，一直到出國訪問，大約半個多月時間裏，案頭總放著一本《明史：海瑞傳》。

據五十年代後期曾任中共湖北省副秘書長、省委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梅白會回憶：會前，我去毛主席那裏，毛主席便問我：「你認不認識海瑞？」又說：「我希望中國多出幾個海瑞。」我問：「是不是『釣魚』？」他說：「不是。」第二天，在會上講了海瑞……會後，毛澤東講了希望黨內多出海瑞式的人，毛澤東又問我：「今天講海瑞反應如何？」我說：「有突如其來之感。你先打了招呼，我不感突然。會有海瑞的，出了海瑞時，請主席沈住氣。」（轉引自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上冊第 342 頁）

《黃克誠自述》：「毛澤東的策略也很高明，是引蛇出洞。上海會議上提倡海瑞精神，廬山會議前，彭德懷本不想參加，已經請假，毛親自打電話要彭參加。在廬山上，毛和幾個秀才談話裝出一個虛懷若穀的樣子，以至周小舟勸彭德懷寫信，終於釣出了一條大魚。事後毛又說：『海瑞歷來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歡迎，』『現在是右派海瑞。』他說彭德懷『到處散佈別人都行，只有他自己是海瑞』。」（第 349 頁）

生活在他身邊的李志綏就近觀察到：「毛熟讀中國歷史，深曉宮廷鬥爭中奪權傾壓……毛認為他的朝廷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更是玩弄權術的高手……因此毛這次提倡學習海瑞精

神，和先前 1957 年他用所謂『引蛇出洞』法，鼓勵知識份子批評黨、替共產黨整風一樣，都是他慣用的策略。」（《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 285 頁）仍是用同一方法，在下面抓了幾百萬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現代海瑞們下場淒慘，毛對他們毫不留情。」（同上，第 286 頁）

毛本人對此等事作何反應呢？他在為《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正確地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一書寫的批語中說：「你們是不願意聽我的話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橫獨斷』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又是『上有好，下必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大魚釣出來』……」（《廬山會議實錄》第 272 頁）毛又在 8 月 11 日講道：「我他們不愛，給他們自由，讓放出毒素。你講我陰謀就陰謀，大魚小魚一起釣，特別釣吃人鯊魚。」（同上，第 331 頁）

當他今日講成「你講我陰謀就陰謀」的時候，這總算是水落石出了。人們不禁要問：「當初你為什麼要耍無賴，說成『我們說，這是陽謀』呢？生造一個詞頭就能改變了問題的實質嗎？」

蓋棺論定：毛澤東是陰謀的化身。他不僅對敵人，對路人，對一般朋友，即便是對親密的戰友，也無不妥陰謀詭計。仍僅以「引蛇出洞」這一陰謀品種為例，加以論列。

為節約篇幅，點到就算。反了彭德懷，全國餓死幾千萬，毛在七千人大會上作檢討：「凡是中央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王若水說：「毛澤東看清了黨內形勢：劉少奇等人是同情彭德懷的，是對『三面紅旗』有所保留的，……實際上，毛澤東在大會號召大家講，不過是『引蛇出洞』的故伎。」（《新發現的毛澤東》下，第 384 頁）

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劉少奇，但是，是從《海瑞罷官》開的刀。吳?搞的是遵命文學，毛曾讚揚過演海瑞的馬連良的演出和吳?的劇本。怎麼到後來又成了「要害是罷官」，要為彭德懷翻案呢？吳被置於死地，才「悔不當初」；悔之晚矣。

毛打吳，對彭真來說就是引蛇出洞，這叫做「打了孩子娘出來」。果然，彭出來講什麼「學術問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云云。他要中央出個指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要他制訂，並且毛也不要看。這便是鋪向被打倒之路的大毒草《二月提綱》的出籠。

文化大革命起來了，毛躲得遠遠的。劉鄧派工作組，前去向他請示。他不但不事先阻止，反而心懷叵測，「一心以為鴻鵠之將至！」到事後，他一張大字報，宣佈劉鄧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革命群眾，「用心何其毒也！」全國紅衛兵風起雲湧，砸爛劉少奇的狗頭。

毛對劉的檢討說好，特別是後半更好。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他一面要穩住劉，要他坐以待斃，直到要他的命之前，還好言相勸：「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另一方面，是要看清中央其他人對劉的態度。結果，陶鑄把鬼話當作人話，順竿而上，便當上了「全國最大的保皇派」

毛對他的接班人，親密戰友，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榜樣林副統帥怎樣施行「引蛇出洞」的毒招呢？他以「不設國家主席」刺激他跑出洞外，作出反應。因為這不是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而是廢除他當接班人的問題。鬧騰了半天，撈了個陳伯達當替死鬼，進行「批陳」整風。毛澤東的難處是，為了打倒劉少奇，把林捧上了天，把林接班人的地位，定進憲法和黨章裏。僅憑他說過毛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如今，「我說過六次不設國家主席，一句也不頂，

等於零。」；就可以廢黜他嗎？就可以昭告天下嗎？朝三暮四，出爾反爾，即便國人不敢巷議，也恐難免於腹非的。

毛南巡，對各大軍區政委，司令員進行吹風，透露林的問題，又是唱國際歌，又是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像一個丑角演員，裝腔作勢，作出破斧沈舟之勢。但作為陰謀家，他卻達到目的。他是為了敲山震虎，讓林彪聽到風聲，就會感到走投無路，作出過度反應，甚至狗急跳牆。這正是他為他設計的一條自取滅亡之路。當然不能設想如折戟沈沙那麼樣地神機妙算。而是，只要林作出過度反應，毛便可變被動為主動。事後證明，毛對林真是做到了「引蛇出洞，聚而殲之」。

鄧小平從實施毛的陰謀，到對右派的殘酷懲處，可以說是把「甕」燒得火紅，簡直是做得斷子絕孫。毛澤東卻對他來了個「請君入甕」。鄧小平的三起三落，其中就有兩起兩落是毛對他玩的貓吃老鼠。我們從最後的一起一落中，例舉毛是如何對他施行「引蛇出洞」的陰謀的。

江青通過大反「經驗主義」反周，旁及鄧和大批老幹部。鄧告了狀，毛在一個批示中敲打了江。鄧借貫徹批示精神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夥同葉劍英，猛烈地向江青開炮，歷數她近年來所犯錯誤，除了這次大反經驗主義之外，還聯繫她屢次違背毛指示，「另搞一套」。讓四人幫嘗到了鄧的厲害。會後，王洪文向毛報告了江青遭到「圍攻」的情況。毛警覺到鄧說出周想說而不好說的話，與周合流，這樣一來，黨內的復辟勢力將如虎添翼。於是，毛對鄧就採用了他「引蛇出洞」的拿手好戲。

毛表態支持政治局會議對江的批評，隨後又指定鄧取代王洪文主持批江的會議，給他充分的表演機會。

鄧在他主持的會上，作了主要發言，圍繞自 1973 年以來江青等人多次另搞一套以及拉幫結派等問題提出嚴厲的批評，甚至拍了桌子。王洪文、張春橋作了檢討，江青則表示：「對問題還得消化一下，再作進一步檢討。」（《晚年周恩來》第 464 頁。以下多取材自此書。）

毛通過觀察，深為憂慮：鄧的強勢作風，如在他身後搞翻案，則是無任何力量可以堵擋的。所以，就進一步引他出洞：更委以重任，讓他接替王洪文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

政治局會議後，毛特意讓江青登門拜訪找鄧小平「談心」。毛也找鄧談話，肯定對江青等人的批評，說：你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他們幾個人過去有功勞，反劉少奇，反林彪。現在不行了，反總理，反你，反葉帥，現在政治局的風向快要轉了。毛一再鼓勵鄧要把工作幹起來，並表示：我準備找王洪文談，叫他找你，聽你的話。

鄧小平作風強勢，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一面殺四人幫的威風，江青也不得不檢討自己另搞一套所犯錯誤，承認她無組織，無紀律，自作主張，隨便亂講話，表示：「對不起恩來，劍英同志」。同時也承認了「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

一方面，鄧大張旗鼓，快刀斬亂麻地進行各行各業的全面整頓。

毛冷眼觀察，已覺察出鄧要動搖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全面否定文革，但仍在表面上不動聲色，大擺「揚鄧抑江」一類的迷魂陣，誘敵深入。特別是，毛對轟動當時的「紅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語：「孤陋寡聞，愚昧無知，三十年來惡習不改，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玩了個假要離婚的鬼把戲。據傳說，鄧批：「同意離婚。」

鄧打著「以三項指示為綱」的旗號，加大整頓力度，與江青，兩個鋼鐵公司對著幹；聲稱「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毛不承認「三項指示為綱」，只承認「以階級鬥爭為綱，其餘都是目」。何況鄧心目中只是重在「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一項？

又如，鄧在政治局會議上，居然提出應該解決「61 人叛徒集團」的問題，認為把登報「反共啟事」的責任，完全歸咎於他們是不公道的。然而，挖出這個叛徒集團正是文革的「重大成果」。尤有甚者，鄧曾對當時在上海擔任領導工作的老幹部馬天水做工作，向他透露了毛對江青的批評，並點了張春橋的名，告誡他不要與他們為伍，企圖挖四人幫大本營的牆角後被馬出賣，密報王洪文。鄧小平的所作所為，使毛澤東確認他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準備伺機予以殲滅。但為了穩住他，遂讓他繼續表演。毛對江青在大寨大談評《水滸》的「現實意義」，宣稱現在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還故作姿態地批示：「放屁，文不對題。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文革大年表》第 381 頁）

在周恩來的生命名存實亡的時候，毛抓住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寫給毛的一封信，大做文章，信中批評黨委書記遲群和謝靜宜兩人生活墮落，專斷獨行。劉冰將信交鄧小平轉呈毛主席。毛覺得那封信動機不純，矛頭是對著他的，而且覺得鄧偏袒劉。

毛多次與毛遠新談：「鄧對文化大革命有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他們罵遲群，實際上是反對我。」

1975 年 11 月 3 日，清華大學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傳達毛主席對劉冰信的批示，直接點了鄧小平的名，稱：「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一場雷厲風行的「批鄧，反擊右傾反案風」的運動，在全國展開了！

毛澤東如果再多活一、二年，鄧小平這條蛇恐怕就只有翻肚子了。在這裏，真正是「你死我活」，毛不死則鄧難活。

人們總以為，以周恩來的精明強幹，毛決不會對他也來「引蛇出洞」這一套吧！事實證明，毛對周也來。

人們多聽說毛批評周的四句順口溜：「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周從毛抓住外交部內部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小題大作，預感到，一場政治風暴正沖著他而來。慣於運用「敗狗」戰略的他，對毛堅持順守，曲意奉迎，磕頭如搗蒜，檢討如雪片。怎奈「克己從人人不諒」，終於，「毛澤東抓住周恩來與基辛格會談中的『紕漏』」，親自出馬為蓄謀已久的批周敲響了開台鑼鼓，指周對蘇聯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國的核保護傘，如果蘇聯人打進來了，他要當兒皇帝！隨後下令政治局召開會議，批判周的『右傾投降主義』。周由此經歷了晚年最大的一場劫難。」（《晚年周恩來》第 458 頁）

所謂「引蛇出洞」，正是要引出「紕漏」。下面，我們要根據上書的資料，說一說，紕漏是什麼？怎樣引出的？怎麼激化的？怎麼收場的？

1973 年 11 月 12 日，毛澤東會見了基辛格，談話的主題是「聯美整蘇」。事後基辛格寫道：「我們開始明白在這次訪問中為中國外交政策規定官方路線的並不是周恩來。」周當然更會注意到這一點，知道毛近來對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氣是來自嫌他在外交上搶了鋒頭，因而在對基辛格會談中謹言慎行，處處把毛放在前面。

會談中，基辛格按照慣例向中方通報蘇聯軍事動向，對外傳蘇聯準備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的報道，探詢中美軍事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互通情報、向中國出售武

器以及建立防止核戰爭的「熱線」等內容。為人一向謹慎的周當然知道茲事體大，請示毛後答以：現在不談，等打起來再說。

13日晚，告別晚宴結束後，基辛格臨時提議，同周舉行一次單獨會談，繼續討論一下中美雙方的軍事合作問題。周恩來不及請示毛，就談了，但並未表態，只是表示報告中央，明晨基辛格上機前再予答覆。

奇怪的是，第二天早晨，周並未請示毛，擅自表態：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雙方今後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

毛似乎正在等待著周邁出這一步，以便他出師有名，興師問罪。他把王海容、唐聞生找去談話，並讓她們立即整理出周、基談話記錄。為了不讓周這次滑過去，老於權謀的毛，授意王唐二人不露聲色地找周本人核實談話記錄。周還蒙在鼓裏，以為只是技術性問題，並未在意。

隨後，根據毛的旨意，王唐二人四處散風，說總理在這次會談中闖了亂子，被蘇聯的原子彈嚇破了膽，沒有請示報告主席，就向美國承擔了搞軍事合作的義務，接受了美國核保護傘。

11月17日，毛親自出馬，對周及有關外交人員，放出狠話：「當你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你們可以來，在後面擺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

根據毛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隨後連續召開會議，主要是批周恩來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

周又是檢討，又是解釋，又是送信，又是給自己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而毛卻認為他是敷衍過關。

早在一旁蠢蠢欲動的江青對毛的意圖心領神會，率先在政治局會議上向周開炮，想趁機在政治上把他搞臭。她胡攪蠻纏逼周交代在同美國人的會談中究竟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並按毛定下的調子，給周扣上「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弄得周連話都講不下去。

周不大相信是毛的意思，還以為又是江青在無理取鬧，所以儘量克制，希望毛能出面制止她的這種搞法。後來江青上綱越來越高，指責周「喪權辱國」，「矇騙主席」，「給美國人下跪」，逼迫他承認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根本不容分說。周對這種政治上的栽贓侮辱，實在忍無可忍。當場對江青拍了桌子，說：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

周的頂牛，正好給毛以大做文章的口實。毛隨即下令擴大批周會議的規模，並親自擬定了列席會議的名單，除了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鵬飛，喬冠華，黃鎮，仲曦東，和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章含之以及中聯部部長耿飆參加以外，還有鄧小平。這樣，批周的政治局會議就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主持人由周改為王洪文，王海容唐聞生擔任毛的聯絡員，毛通過她們遙控會議的進展。

從11月25日到12月5日，對周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批判鬥爭。為了給會議加溫，會議一開，就由唐聞生介紹情況，並傳達毛的批周最新指示和對外交工作的批評，足足講了八個小時，調門非常之高，許多用語與毛對劉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樣。諸如：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外交部不執行毛的外交方針，因此要「甩石頭」（此

語是毛對林彪所用策略，意為發出警告——高文謙注）毛還危言聳聽，說周要當蘇聯的兒皇帝！

周才猛醒過來，原來不是江青和他過不去，是毛本人的意思。行了，就按毛定的調子給自己扣帽子，潑污水吧！

會議的發言：「賣國」，「屈膝投降」，「目無中央」，「矇騙主席」，等一類提法比比皆是。牆倒眾人推。更有人乘機泄私憤，翻老帳，狠踹周一腳。

江青提議並經毛批准，成立了批周幫助小組，由四人幫和汪東興，華國鋒組成。江青開炮，甚至於提到路線鬥爭高度，說什麼「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這已是見多不怪。問題是鄧小平的發言，對周做了誅心之論，僅僅幾句話就把毛對周的欲加之罪講了出來，而這恰恰是讓周恩來深感委屈的地方。鄧並非不知道這一點，但為了重新獲得毛的信任，還是昧著良心講了出來。

周曾求見毛，當面做檢討，被一口回絕，說沒有必要，要檢討就在會上作。江青則以幫助小組的名義，責令周必須自己動手寫出檢討，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

周低首下心，唾面自乾的姿態，再加上毛剛過林彪事件，形勢剛穩，離不了周收拾這個爛攤子。對周的檢討作了批示：可以了。

怎麼一個謹小慎微的，以「外交無小事」作為秉持的人，會作出膽大妄為、自作主張的事呢？簡直不可思議！原來他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曾打過電話向毛主席請示，但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覺」。毛認定他入睡後周是決不會打擾他的。周的警衛曾記載了他在辦公桌旁團團轉的情況；事急又不能等，於是，出於關心和保護主席的安眠，便「自作主張」地做了本屬自己職權範圍之內的事。不料中招而禍從天降。

陰謀的尾聲更有意思，實際也是更可鄙。毛嫁禍於人，讓王海容唐聞生背黑鍋。他指著王唐二人說：「她們整我，整總理，在我頭上拉屎撒尿，將來就是要說她們整總理。」對此，王唐二人私下發牢騷說：「他做臉，我們做屁股。」他這般卑劣鄙俗，連兩位小姐都看他不起。

俗話說：「看了『三國』戲，低頭就是計」。縱觀毛澤東一生，一舉一動儘是做戲，一顰一蹙全是詭計。這當然不能簡單歸結於他自幼就把「三國」當成人生教科書。是複雜的原因，造成毛又陰險又惡霸的作風。毛 16 歲時寫的狂言《七絕，詠蛙。》：「獨坐池塘如虎踞，綠蔭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倒是毛個人專權，決不容他人在權力上染指；不容他人在政見上置喙的心態的活靈活現。

在這眾多事實面前，陽謀說和變卦說再也無存身之地了。況且，持那些說法的人，也多是說著說著就變換了主題，成為對「陰謀說」的論證了。

我以王若水先生為例加以說明。他說：毛「在提出這個方針時，這既非陰謀也非陽謀。毛澤東當時確實是想走一條與蘇聯不同的道路。誠然，毛開始時預料會放出一些毒草，但並沒有想到有這種規模（這話不對。第一，毛想到的比這種規模要大得多，甚至想到嗚呼哀哉重回延安；第二，毛在 5 月 15 日告知高層要反右時，主要毒草都未出土，規模仍是小得很；第三，退一步說，如果規模小到只跳出一人，此人名叫胡風，又當如何？）；他主要希望看到大量香花，他要保護這些香花。他自己也是一朵香花，被那些教條主義者指責為毒草；他現在要保護那些新的香花不被誤認為毒草而遭到踐踏。從整風以後，黨外人士，知識份子批評的尖銳程度超過了毛的預料，當時幹部的怨氣也超過毛的預料，於是，他來了個急轉彎（與

文革時幹部的怨氣發展到形成「二月逆流」相比怎樣？他為什麼沒來急轉彎？），」（《新發現的毛澤東》第 275 頁）且看他隨後在第 293 頁又是怎麼說的：

「在這次會議（1956 年 11 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可以看出（毛和劉，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訓上，劉少奇強調搞好經濟，關心人民生活，擴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要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毛澤東則強調階級鬥爭。在經濟建設的方針上，周恩來強調穩妥可靠，批判了 1956 年的冒進傾向；毛澤東則強調不平衡是絕對的，錯誤難免。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們看到了來年「反右派鬥爭」的殺機；在第二個問題上，則為其後的批評反冒進和大躍進埋下了伏筆。」

好一個「殺機」！先一年有「殺機」，「來年」動手殺，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哪裡用得著「急轉彎」呢？

由「殺機論」導致「急轉彎論」，在邏輯上，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通的；而在事實上，二論則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只有毛先有「殺機」，後來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才會有「急轉彎」，同時，這也才叫做「急轉彎」。

我所以說王先生發現的這個「殺機」好，好就好在，這使我們看到，毛 1956 年懷有「殺機」後，1957 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和宣傳會議上以及天安門城樓上，請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所表現的態度誠懇，溫柔敦厚，談笑風生，活潑風趣，甜而且美，臉上堆著笑迷迷……這一切，是為中國人形容陰險毒辣，陰謀詭計的詞語——「口蜜腹劍，笑裏藏刀」，作了一個血腥的表演。同時使人們反思到，如果不是出於陰謀，他的這番表現，與對梁漱溟的潑婦罵街，對胡風因言定重罪相比，是極端反常的，也與他「哪個蟲兒敢開口」的，不容他人置喙的一言堂惡霸作風，絕不相容的。

我在「探源篇」中擺事實，講道理，用的主要是逆推法，順瓜摸藤，順藤尋根，由果推因，由終返始。我們憑藉時空優勢，以後見之明「預報」昨天的天氣。這就使我們能夠看得一清二楚，毛用以發動反右的，不僅是卑鄙的陰謀，而且是毒謀，而且，蓋棺論定，他的耍陰謀的手段是無與倫比的，渾身充滿了陰謀細胞，可以當之無愧地稱之為「陰謀的化身」。

中篇：教訓篇（之一）

魏紫丹

把握不住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基本內涵而言「接受教訓」，就會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打了盆說盆打了罐說罐；窮於應付而不得要領；甚至，一葉障目而造成「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所以說，認透本質，乃為正確接受教訓之本。

然而，不僅對於知識份子，也不僅僅是就著反右運動，而且是對著全體國人及其經歷的現代史，應該吸取的最大教訓是什麼呢？這就是大多數人都曾直接，間接受過毛澤東的害上過毛澤東的當，因而都極有必要認清這個仍被掛在天安門前的戴著慈眉善目端莊凝重畫皮的毛澤東，到底是個什麼物件？尤其是他的徒子徒孫們使盡全身解數使廬山真面目雲遮霧罩，以防止人們去撤除天安門廣場的那堆垃圾（暴君紀念堂），好維護著他的精神不死，陰魂不散，鬼蜮繼續害人。這就更增加了認清本質的難度，同時也激增了我們解決問題的決心。

從黨史上看，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就是定格為毛澤東的本質，因此，鄧小平把毛澤東定位為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雖然他只能算是第七個領導人。可中共不承認前六個，只承認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的路線，毛澤東的思想；也因此，中共至今奉行的仍是脫胎於毛澤東為

反右派而制定的判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的所謂「四個堅持」；更因此，你去審視胡錦濤的所作所為，而不是聽他的宣稱，就會發現其基本精神仍是繼承了毛澤東反右派的衣鉢，只是，換成與時俱進的「湯」，不換左傾路線的「藥」，比起鄧小平江澤民來，不是說誰是好東西，而是靜觀乃是「一丘之貉」，動觀則是「黃鼠狼生了一窩小老鼠——一代不如一代」。這就是我為什麼費如此之大的氣力，決心要揭露出毛澤東的本質的原因。

本質既然不是外顯而是內隱，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那怎能發現毛澤東的本質呢？中國的老祖宗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注：視是看，以是為，觀是細看，由是由來，察是體察，安是樂，廋是藏匿。）；共產黨的洋祖宗說，人在其創造物中直觀其本質。這樣說來，毛的本質便寓於他一系列的行為之中；而鄧小平的「六四」血洗天安門，江澤民胡錦濤對民主思想的鎮壓、對法輪功的群體滅絕，乃是毛澤東思想的又一支響徹雲霄的凱歌！顯示了毛的陰魂繼續統治著中華大地；「你不打他就不倒」！所謂死人的「陰魂」，就是他活著時的「本質」。讓我們通過對他生前的聽言、觀行，以及審視他的主要創造物——復辟專制極權，來揭示其本質：

他置中華民族存亡絕續於不顧，乘國家之危，對祖國趁火打劫，大發國難財，以肥一黨之私。

1964年7月10日，毛對受其接見的社會黨人士佐佐木對日本過去侵略中國表示歉意時，說：「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這叫做「賊不打三年自招。」問題是，2500萬中國軍民死不瞑目呀！問題是死於南京大屠殺的30萬同胞，如果復活，還需要洗腦，使自己的思想提高到毛澤東思想的水平！問題是，做了日本細菌戰活體實驗者和其他犧牲者以及可憐的慰安婦們所遭受的生命摧殘和無法想像的心理糟蹋，都可以不必追訴，甚至覺悟到，這才是生的光榮，死的偉大！問題是，毛澤東的促日蔣火拼於戰場、日共勾搭（通過潘漢年）於私下，惡性膨脹共產黨的勢力，倒不是賣國主義行為，而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了！問題是，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作狼嚎：「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中國人民應該面東跪拜，口唱：「膏藥旗，冉冉上，日本護大共產黨！不是皇軍大大地，呼兒咳喲！哪來人民挨解放？」

毛對蔣委員長領導的抗日戰爭竭力進行破壞，對共產黨內的抗日派將領也堅決進行打擊和壓制。到後來，他反而倒打一耙，由一些民主人士中的投機者幫腔，誣衊蔣委員長，說他躲在峨眉山不抗日，待抗日勝利了，才跑下山來摘桃子。這要多麼無恥，才能面對著血與火的歷史撒下這樣的彌天大謊？當他胡說八道時，那一段歷史的見證人大多仍健在呀！在文革中，時常讀到的一條語錄是：「只有不要臉的人，才能說出不要臉的話。」

即在今日，《一寸河山一寸血》這部紀實片和大陸的電影片《血戰台兒莊》和還原歷史真相的《誰是新中國》等紀念碑式的傑作，所提供的悲壯史實，直使「中共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論者，在這塊紀念碑上碰得鼻青眼腫，頭破血流。連塔斯社記者，蘇共住延安的特派員彼得·弗拉吉米若夫都感到氣憤而予以指責：「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本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流血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轉引自辛灝年著《誰是新中國》第524頁——拙著從資料到見解，得益於該書匪淺。我願推薦該書，與讀者共用）

彭德懷打了抗日的百團大戰，就成為毛澤東眼中十惡不赦的罪行，說是犯了戰略錯誤，暴露了自己的實力。其實，早在 1937 年 8 月 22—25 日的「洛川會議」上，毛就主張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9 月 21 日致電彭德懷，算是有言在先：「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在戰略上有主力部隊處於敵之側翼，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還要在目前照樣做。」（見《毛澤東年譜》）就在 9 月 25 日平型關打響的這一天，毛致電劉少奇周恩來說：「要告訴全黨，今後沒有別的工作，唯一的就遊擊戰爭。」又說，「目前紅軍不宜過早暴露，尤其不宜過早派遣戰術支隊」，「暫時把我軍兵力一概隱蔽並養精蓄銳。」（轉引自《周恩來與毛澤東》第 236 頁）試想，正當國家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也正是「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之際，同時，中日實力懸殊正是中國抗日之大患，而你有實力卻怕暴露實力，那麼你栽培這個「實力」和留著這個「實力」，並且還要惡性發展這個「實力」，到底是要幹什麼罪惡勾當呢？

直到 1959 年廬山會議把彭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頭子，毛還在跟他沒完沒了地算這筆賬，對著彭說：「我同你的關係，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31 年是否如此？」後來又說：「整個抗戰八年，難講是合作。」

林彪迎合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

毛澤東用賣國主義統一全黨思想：「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這可是毛澤東不打自招，暴露了自己的賣國嘴臉。江澤民胡錦濤繼承捍衛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讓俄國多占地才愛國」，一傢伙把 15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眼眨也不眨地割給了俄國。當然這絲毫也無妨他們厚著臉皮大喊大叫「愛國主義」以行騙於國內外華人世界。賣國賊喊愛國，喊得自己血脈賁張，這和貪汙犯講廉政，講得聽眾掌聲雷鳴一樣，都是共產黨特有的政治景觀。

由於歷史有意展露自己的真相給人們看，所以它時常出現相映成趣的場景。1974 年 1 月 19 日，中國與侵入西沙海域的越南，爆發西沙之戰。當時，臺灣海峽在國民黨海軍和美國第 7 艦隊控制下。中共海軍艦艇往來東海、南海，都要繞道臺灣東南的公海，避免磨擦和衝突。這次軍情緊急，毛指示：「直接走」。

正在陽明山養病，被毛共稱為「賣國賊」而「竊踞臺灣」的蔣介石，對西沙戰事也很關注，看著送來的電報：「海軍導彈護衛艦四艘，清晨抵達東引島一側，企圖穿越臺灣海峽。」看後不加思索，便語重心長地說：「西沙戰事緊。」親自下令，破例向解放軍海軍艦隊亮起「請通過」的信號。

當天晚上，解放軍東海艦隊四艘導彈護衛艦通過臺灣海峽，「賣國集團」的軍隊不僅沒有開炮，還打開探照燈，助中國人民解放軍艦隊順利通過。（參看《西沙群島保衛戰：毛澤東決策的最後一仗》，倍可親網站）。這是多麼感人肺腑的場面啊！

一面是民族大義，一面是險惡的奸計：清濁分明涇渭水，愛國賣國豈容混？最令人氣憤和悲哀的是，有些浴血抗日而於戰場九死一生的幸存戰士，躲過鬼子的屠殺，卻死於毛澤東的「鎮反」之中。

第三，廬山會議上毛還說：「一個肅反，一個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鬧不起來，我們黨聯繫群眾，不是拉科西，不會出納吉。個別問題一出現，很快解決，我們作風好，反革命殺了 100 萬，匈牙利沒殺，我們作風好，反霸、鎮反、反右。」

這裏要重新提起，為共產黨反蔣衝鋒陷陣的所謂「七君子」，中共當權後，有的封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有的當了部長，唯有以博學多才鐵骨錚錚享譽知識界的王造時，始而受冷遇，繼而打成右派受迫害，終死監獄時還帶著銬，並落得家破人亡。原來。共產黨要的「愛國七君子」必須都是偽君子，決不允許你真愛國，要的是你愛國其名，反蔣其實。王博士居然真的要愛國，起草一封致史達林的公開信，反對蘇聯與日本訂的條約承認滿州國，換取日本承認外蒙古獨立。公開信的發表，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這對於共產黨無異於把娘偷養漢子的醜事公之於眾。自然也就決定了王在「解放」後不會有好果子吃。雖然他在毛所謂的「第二戰線」上，也是聲名顯赫的反蔣英雄。

應該總結的教訓是，王博士先上了共產黨「愛國」的當，誤以為共產黨真是要他「愛國」。當然不能說他愛國有錯誤，錯就錯在投錯了「主」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你若是愛國而不掛引號，共必反你；你若真愛國，就必然反共。這個必然性是客觀的。王博士等等人們主觀上沒有認識到這點；倒是共產黨對這點毫不含糊。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就在於，愛國而又親共或投共，那叫做「南轅北轍」。

後來他又上了「幫助黨整風」的當。兩「當」上得他政治生命與自然生命雙滅俱亡奄奄一息時還帶著手銬。這就是共產黨給愛國一君子，安排的下場。豈止此乎？他的子女受株連，有的劃右派，全是死於死不當死。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先生在所著《沈重的 1957》一書中寫道：「左是中國知識份子的『白虎星』、『掃帚星』。除了用『家破人亡』來形容王造時先生遭受極左路線迫害那令人潸然涕下的厄運，再也找不到合適的字眼……」（第 73 頁）

問題是，上「愛國當」者仍絡繹不絕，大有前仆後繼之勢。小人物不必掛齒，中華民國前副總統李宗仁就是中計「愛國不分先後」而回歸大陸的。他受盡利用和羞辱，後悔莫及。傲慢的勝利君主毛澤東，對他的降臣夫婦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輕蔑地奚落他們是「上了賊船」。他們也只好「吃不了兜著走。」。有什麼法子？如果不計毛的嘲弄氣味兒，「上了賊船」倒是實情。

問題是，至今中共仍然拿愛國主義來行騙。無奈，情願受騙者仍有之，助騙以牟私利者也有之。這些人既可憐又可歎，後者還既可恨又可恥。殊不知：1，毛澤東早已從大量事實中總結出規律：「從愛國主義走到共產主義，是知識份子的一條必由之路。」說明愛國主義是跳板，共產主義是賊船；2，「予豈好賣國哉？予為奪權而不得已也。」這是古今賣國賊共同的衷曲。愛國者對於賣國賊來說，不是別的，乃絆腳石一塊也，岳飛、彭德懷、王造時等，統統都是賣國賊必須踢開的絆腳石。3，「這都是屬於過去的事了，不能老糾纏，要一切向前看。」這是心懷叵測、貌似公正的說客慣用的騙人說詞。但，不能用這句話長期有效地搪塞一切；須知，「過去」在過去就是「現實」，當它是「現實」時讓人糾纏嗎？「過去論」者在這一點上打了馬虎眼。反右過去了，不談；「六四」過去了，不談；……過去復過去，過去何其多！何況我們總結歷史教訓就是要回顧過去，瞻望未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嘛！更何況，割地 150 萬平方公里的賣國條約墨蹟未乾，也能算是「過去」嗎？我們要直面現實，但忘記過去，現實就是無源之水。只要有一天沒弄清中共的過去，國人就一天擺脫不了對中共的輕信：只要一天不擺脫輕信，中國就一天沒有希望。

人們之所以抱不切實際的幻想，大多數是由於「輕信」，少部分則是由於「投機」：

關於「輕信」，謝泳先生在《書生私見》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大批乃至幾代；知識份子，再乃至幾億中國人，所遭受的苦難都可以歸結為『輕信』二字：輕信馬列，輕信革命，輕信共產黨，輕信他們的空頭支票，結果便如羊群自動湧入了屠宰場。真是千古浩歎！」（轉引自柳辛三《自由主義思想遺產發掘和繼承》，《議報》第 191 期）

關於「投機」，你只需明確無誤地知曉毛澤東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的人生鬥爭哲學，你就乾脆收起你那投機取巧心理。你就沒想一想，毛澤東是幹什麼的！共產黨是幹什麼的！政治投機者，往往自作聰明，也就往往班門弄斧。這樣的人過去有，現在更多；中國人有，洋人也是洋洋大觀：大陸是大本營，港臺海外大有後來居上之勢。作為過來人，我有太多目擊，耳聞的經歷，使我相信：「你想他的利，他想你的本。」難道為此賠了老本，甚至於賠上老命的還嫌少嗎？

紅衛兵運動，有輕信的因素，能輕信到發迷發狂的程度；有政治投機的因素，能投機到豁出身家性命的程度。當我看到他們鼻臉暄紅地聒噪「用生命和鮮血保衛毛主席」時，內心止不住要冷笑：「彭德懷當年保衛延安，才是實打實地用生命和鮮血保衛毛主席。而你們現在用的只是高分貝的口號和落井下石的打砸搶抓抄。」毛澤東暫時需要你們當炮灰，所以就發出：「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於是，用口號保衛毛的紅衛兵，就打倒了曾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的彭德懷。大家都認識到，這是毛對老彭「卸磨殺驢」。文革小組新聞廣播把小將捧上了天，他們也橫行天下於一時，就是沒有想一想，老驢功勞那麼大，一卸磨就殺掉，你們這些小驢能抵住老驢的一個腳趾嗎？房簷滴水滴滴照。果不其然，尚未「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即尚未卸磨，毛就要殺你們這些小驢了，他翻臉說：「現在輪到你們小將犯錯誤了。」從此開始批鬥你們，把你們流放到窮鄉僻壤，有的還投進監獄。

現在我再來與硬骨頭胡適對比著，說一說軟骨頭投機者郭沫若。郭對毛阿諛奉承吹牛拍馬，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到了死皮不要臉的程度，雖得到一些甜頭，但也大大地吃了苦頭。一個才華出眾的人，一輩子奴顏婢膝，狗苟蠅營，把本該，也本能對人民創造出一些有價值的精神財富來，卻全葬送了。自己生活得別說光明磊落，瀟灑豪邁了，連安全感都沒有，特別是文革期間，一天到晚，嚇得屁滾尿流，而且其多才多藝的愛子也慘遭迫害而亡；其悲慘之狀，有甚於一般人所說：「老年喪子大不幸。」

胡適沒有留在大陸，毛發動運動缺席批判他，給予大潑污水，任意曲解，惡毒誣衊，直至阿 Q 式地對真理宣判死刑。試想，如果他對中共別說是投機，哪怕只是稍稍輕信，存有幻想，留在大陸，他一生該會作何設想？還會對文化作出那麼巨大的貢獻嗎？他的兒子胡思杜，不思杜（威）卻思馬（克思），走了投共的道路，雖發表文章向中共表態，堅決認賊作父，但還是不見容於中共，仍是給劃了右派。他用自殺的辦法，結束了年輕的生命，而不是用磕頭如搗蒜的檢討的辦法，乞求高抬貴手，說明其幻想已經徹底幻滅，黨有絕人之路。鐵的事實，強烈的對比，沈痛的教訓，已經再清楚不過了。個人去從，自當明斷！

如上所列舉的事實，從毛澤東個人不抗日（養精蓄銳）反抗日（與日勾結而促成日蔣拼殺），不愛國（讓日本多占地），反愛國（迫害抗日武將彭文人王等），說到毛卸磨殺驢，又說到胡適和郭沫若的兩條人生道路。

從整個共產黨的教旨說，也是把愛國主義放在國際主義之下的。比如，當年蘇聯在東北，大舉侵略中國，中共的口號和行動，卻是「保衛蘇聯！」而不是「保衛祖國！」從各方面進行審視，可知他們提「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自己並不信`不行，只是作為一種策略，除了上述種種圈套之外，另一目的，就是為了搞統戰，或是為了轉移大陸人民的強烈不滿。

是不是毛澤東不愛國家民族人民，只是一個心眼兒為共產黨謀利益呢？有這種想法的人，還是表明他沒認清毛澤東極端自私自利的本質。

一旦他的私利與黨的利益發生矛盾時，他便毫不留情地使龐然大物中國共產黨在全國陷於癱瘓；堅決徹底砸爛共產黨的專政工具公檢法；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的眾多的老戰友`老革命。禍及廣大的幹部和群眾，讓上億人受害；經歷過日本和國民黨監獄的老幹部說，現在老毛對待我們遠比敵人的監獄都殘暴！這可不是右派給社會主義抹黑，而是老革命的具體身受。至於黑五類、黑九類本來就是生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有或沒有圍牆的監獄之中，文革中最嚴重的情況竟是許多地方遭遇到集體屠殺。嚴重的，甚至老少無存，斬草除根。

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不是本文的任務，本文旨在通過文革就像通過反右、廬山會議等等這些毛的「傑作」，來直觀其本質。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一書的作者張戎，她的父母親都是意識形態工作者，父親是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母親是市一級的宣傳部長。書中寫道：「1967年2月的某一天，在恐怖氣氛最濃時，我父母曾作過一次長談。當時母親坐在床邊，父親則坐在一張籐椅上，兩人對面。他告訴母親，他現在總算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麼回事。這不是真的要搞好『大民主』，讓一般群眾說話；也不是打倒幹部的驕氣，取消他們的特權。『文革』是用血腥的手段來擴增毛澤東個人的權力。」

「我父親說這話時說得很慢，字字斟酌。我母親問：『毛主席不是很寬宏大量嗎？他都能容得下溥儀，為何要把那些與他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的戰友置之死地呢？為什麼他對這些人就如此狠心呢？』

「父親很激動，但卻平靜地說：『溥儀嗎？他是個罪人，早已被老百姓唾棄了，留下他，他能復辟嗎？但是……』，他停住了，意味深長地看著母親。母親理解他的意思；毛澤東不可能忍受任何潛在的挑戰。不過她仍不解地問：『為什麼讓我們這些下面的人受大罪呢？為什麼要害這麼多無辜的人呢？又為什麼要造成這麼大的混亂呢？』

「父親說：『可能毛主席覺得他不把整個世界翻個底朝天就達不到目的……。』

「父親沈默了一會兒又說：『這不能叫革命，跟馬克思主義一點兒邊都沾不上。他為了個人權力，讓國家和人民遭受這麼大的災難，肯定是錯的，簡直就是犯罪(是犯罪，並且是罪大惡極。任何一個不懷偏見的人都會認同張部長的定性！』

「母親一陣揪心，感覺到大難臨頭了，她的丈夫既然這麼說，一定會有所行動。果然他說：『我要寫信給毛主席。』」

他這樣做了，他被捕了，罪名是「炮打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他被殘酷鬥爭，精神失常了……直到粉碎四人幫，都得不到平反，因為涉及到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最終還是時任四川省委書記的開明的共產黨人趙紫陽親自批准給他平了反。

作為別的什麼部長猶可說，唯獨作為專門吃宣傳飯的部長，以他這種身份，能在文革運動初期就看穿「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所具有的渺小的本質：在政治上，思想上，人格上的極端自私自利`陰險殘忍虛偽狡詐，為一己的權力欲之驅使，竟不惜亡黨亂國置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這位部長能有這種洞察力，實屬難能可貴。我認為，政治信仰，人各有志，不必強同，但能捨生忘死，堅持良心，則確證其具有令人景仰的偉大人格——這正是毛所缺乏的一個「偉大」；豈但「缺乏」？而且適得其反面：「渺小」。這樣一來，既有「偉大」又有「渺小」，符合了毛澤東思想要求的兩點論。

不過，鄧小平又對毛的「偉大」做了補充：「毛澤東同志犯了錯誤，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鄧選》二卷，第 271 頁）這樣一來，前有林彪的「四個偉大」，後有鄧小平的「兩個偉大」，合起來叫做：「六個偉大，一個渺小。」這樣就又符合了鄧小平理論把問題「說全」的要求。不過，尚需有個小小的改正，即把鄧小平說的「錯誤」，按張部長的定性，都改為「犯罪」；如此而已。

在張部長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對文革作出定性十幾年之後，鄧小平說：「搞『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同上，第 305 頁）如果，哪怕這個人是政治低能兒，又如果他不喪盡天良，他也不會說出這種冠冕堂皇而實質上無異於掩耳盜鈴的話。難道鄧小平自信能夠一手遮盡天下人的耳目嗎？別說不能，即便能，又何苦呢？像鄧這樣的大政治家會不知道逃避不了要對歷史負責嗎？你不是總愛像老和尚念阿彌陀佛那樣張口「實事求是」閉口「實事求是」嗎？這裏又驗證了我開頭說的，就是你把實事求是當作謊言的總包裝。

中國的政治家在乎「歷史」，是富有傳統的。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與實用主義者鄧小平不同，劉少奇更具有理想主義色彩，他是很在乎歷史的。由於毛想當世界革命導師，國際共運領袖，便瘋狂地倒行逆施，作出種種驚人的傻冒之舉，致使勞民傷財，中國餓死了四千多萬人，劉想要採取一些挽救措施，如搞「三自一包」等，惹火了毛。劉像是敲警鐘似的，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一頭碰到南牆上，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轉引自《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第 392 頁）。

鏡頭轉到大救星興高采烈地舉著手的情景，伴隨著五音不全的高分貝喊叫：「我們一天一天好起來，敵人一天一天爛下去。」

問題是，在海外有些人士，吃著自由主義的飯，唱著「極權主義就是好！」我在《世界日報`民意論壇》上看到，有人聲嘶力竭為毛喊冤叫屈，嫌毛禍國殃民做得還不夠，說什麼「要正確對待毛澤東」。但這個「正確對待」卻有一個不正確的規定，就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以餓死人為例，餓死的畢竟不到當時人口數的一成嘛！這樣說來。三七開也不夠正確，還是數學 0 分的毛主席的「指頭論」才具有數學的精確性；你無法否認，這死了的人數與還活著的人數相比，的確是九個大指頭與一個小指頭的問題嘛！

這些人：有的屬於即便餓死九成也輪不到他們的人，另有聲稱是黑五類。後者可能是抓住機會趕緊表態，以展示其「從人到猿」的改造成績，向黨確證自己變成了猿。所有這些人，不管你裝得多麼馬列毛，你還會比有良心的，但以賣狼奶為職業的共產黨人張宣傳部長更馬列毛嗎？可喜的是，輕舟已過萬重山；可鄙的是，猿聲依稀啼不住。這不禁使我想起我曾不那麼認同的一個觀點：人和人的差別竟大於人和類人猿的差別。

人所以「輕信」（包括聰明反被聰明誤的「投機」），是由於不瞭解物件的本質而為假像所蒙蔽，因而就失之於從主觀願望出發，抱上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所以認清本質是絕對首要的。如上所述，我們已認清毛的本質是自私。可是，世界上除了毛封的白求恩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外，還有誰不自私呢？不過在剛一解放時，我倒是聽到過一位省裏衛生廳的幹部說起過：「我跟白求恩共過事，他是一個老騷貨，手下的小護士都遭他姦汙了。」因我姑妄聽之，未曾求證，故不便率爾推翻毛論。

我的意思是說，只有舉出毛的「自私」在程度上和性質上與眾不同之點，才是他的特殊本質。他的自私具有「極端性」的特點，極端到史無前例的地步。讓事實來說話：作為他絕筆，絕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為了擴增他個人的私權，如張部長所說，不惜把世界翻

了個底朝天，其時間、其強度、其深度、其規模、其浩劫性，他自認人皆曰：史無前例；他一生殺害無辜之多，史無前例；他倒行逆施，打壓異見，大放衛星，土法煉鋼，實行人民公社化，其瘋狂性，其愚不可及，史無前例；其餓死人數之多，也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他對私人醫生李志綏說起會死人，張口就是死他幾千萬不算什麼，中國人這麼多，更有甚者，他為當世界革命領袖，不惜死去一半中國人，然後再在消滅帝國主義的戰爭廢墟上重建社會主義，所以，他不僅在殺人之實上，而且在殺人的狠毒之心上，也是史無前例；他集歷史上權術之大成，養天地邪氣，法古今壞人，所用手段之陰險毒辣，其性質之反現代，反民主，反文化，而造成最落後，最反動，最黑暗，最獨裁之政治，為希特勒，史達林所自愧弗如，堪稱史無前例；他以知識份子為敵，大興文字獄，開展諸如反右派鬥爭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焚書坑儒，自稱是秦始皇的 100 倍，自是史無前例；他為填欲壑，糟蹋小女子的身心，破壞人家的家庭，雖極為卑鄙惡劣，但與歷代荒淫無恥的皇帝相比，無法確定他已創世界紀錄，但與他假裝正經，偉大，以及被神化的莊嚴形象相比，其落差之大，則是史無前例；而最罪不容誅的是共產黨自己說，他「搞亂了人心」，「耽誤了幾代人」，實際上，他通過搞政治運動，通過洗腦，把幾代人，把很多中國人，搞得沒有尊嚴，寡廉鮮恥。正如牟宗三大師所說：「什麼叫糟蹋文化生命呢？在這裏所表現的即是人無廉恥……。今日大陸上有所謂的『四大不要臉』，其中領銜的即是郭沫若與馮友蘭。你想，誰願意不要臉呢？誰能沒有一點廉恥之心呢？……大陸上，黃帝的子孫，那能沒有廉恥之心呢？為什麼能夠出現『四大不要臉』呢？難道說郭沫若，馮友蘭就願意不要臉嗎？這都是毛澤東糟蹋的！這都是共產主義糟蹋的！才使得人無廉恥。這『四大不要臉』不過是因為他們有名氣，易受注意，而特別舉出來。事實上，豈止這四個人而已，一般人誰敢有廉恥之心呢？」（《從儒家的當前使命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轉引自《黃花崗》雜誌第六期第 87 頁）現在我民族，民風日下，已到墮落的程度，始作俑者，豈一「殺」字而可抵其滔天之罪乎？！我這才算領會了，西方史學家為什麼把寫史與「憤怒」聯繫在一起？同時也足見，毛的自私，專門損人利己，已到登峰造極無以復加而致使天怒人怨的地步！。所謂「史無前例」的「史」，非但中國史也，猶為世界史也。

中篇：教訓篇（之 二）

毛澤東的極端私有有四大本質特徵：極端貪婪，極端陰險，極端卑鄙，極端黑暗。這似乎是在謾罵，其實不然，猶如對著「四大不要臉」說：「你們不要臉！」這不是在罵人，是在陳述一件客觀事實。如果你改述如下：「你們有錚錚鐵骨，崇高的人格，頭可斷，血可流，絕不出賣純潔的靈魂……」他們倒要懷疑你在用鐵勺打臉——打得不痛挖得痛哩！

說他極端貪婪，是指他吃獨食，言是一言堂，行是一意孤行，從動機和結果上而不是從策略上說，他決不與任何人利益均沾。至於他作為口頭禪的所謂「為人民服務」，我以書本與生活相結合，深切地體認到，所謂人民，黨，無產階級……就是指毛澤東自己，並且只是專指毛澤東一個人而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劉少奇都成了老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頭子，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那麼，新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副司令呢？轉瞬成為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毛這時候處於萬般無奈下，就又請出了鄧小平，並吹捧他是如何如何「人才難得」當隨即棄之如敝屣時也不說什麼難得不難得了，又成了「鄧小平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那麼，誰是無產階級呢？咱們從「卑賤者最聰明」中找吧！一般認為，掏糞工算得上是卑賤者；但勤勤懇懇的掏糞工時傳祥卻是被無產階級打倒的對象；如不嫌麻煩，就一直找下去：周恩來，四人幫，華國鋒……我想，任何一個人在毛當政下，都是全被剝奪了任何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任何一個普通人的自由權利。包括你周恩來是終身總理！這就說明，毛澤東霸佔了這些政治概念，就反映了他在實際的政治上吃了獨食。為人民服務就是為毛澤東服務。蘇共特派員說得對：「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

的工具罷了。」至於黨，那就是：他=黨，黨=他。如果誰想染指，他就叫誰滅亡；如果他發現，黨竟然不是他自己獨佔的玩藝，那他就斷然癱瘓這個黨，毀滅這個黨，叫黨滅亡！

或有人問，他既然是一個具有超帝王思想的人，民主之死敵，那他為什麼還能提出：「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和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呢？他還標榜開明地說：「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46）

蘇聯解體，檔案解密，揭了他的老底。原來，按他「有意識地」，並不是「留下民主黨派」而是正好相反。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電史達林說：「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就都應該退出政治舞臺了，這樣將會加強中國革命的勢力。」

史達林否定毛的意見，於1948年4月20日復電說：「中國各在野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反對國民黨集團，所以應該長期存在，中國共產黨將不得不同他們合作，反對中國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同時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佈為聯合政府，從而擴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礎，孤立帝國主義及其國民黨代理人。應當考慮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後建立的中國政府，就其政策而言，還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產主義政府。目前還難以預料這將持續多長時間，至少在勝利後會是這樣。這也就是說，暫時還不能實現土地國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沒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業資產階級的財產，也不能沒收大土地佔有者以及依靠雇傭勞動的中小土地佔有者的財產。要等到一定時候才能進行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產黨以外，也還有其他政黨參加人民陣線。」（47）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對主子的命令，唯命是從，一切遵照執行。這裏能夠發現和說明的幾個問題是：1，毛澤東從來都是按著他的需要編瞎話。2，這時是1947年，遼沈，淮海，平津具有戰略決戰性的三大戰役，是發生在此後的1948年的9，10，12月，一方面的事實是國民黨還有很大實力，另一方面的事實是民主黨派正充當毛所謂的反蔣第二戰線的主力軍，恰如鷹犬垂涎三尺地起勁追逐著前面搖晃著的骨頭。正值此時，毛卻打算完他們的蛋，實行「黨天下」，自己獨吞預期的果實。3，反右派鬥爭針對的是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毛在評美國國務院的白皮書中已埋下反右的伏線，如再往前追溯，「李銳在訪問過程中揭露一段頗有分量的史實，他說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說過，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見金鐘《回首十年說批毛》，《開放》2003.12.）更可以追溯到，早在毛澤東在1925年的《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一文中看出毛對知識份子的敵視態度。王丹訪問許良英的《撥開「反右」運動的歷史迷霧》中說：「此文發表於1925年12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年2月的《中國農民》月刊第二期和1926年3月的《中國青年》第116——117期，1952年重刊於《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已面目全非，文中把知識份子分為三類：（一）『反動知識階級』包括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專院校教授和學生，屬於大資產階級，是『極端的反革命派』，是『民族革命之死敵』；（二）多數『高等知識份子，包括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專院校的教授和學生，屬於中產階級其右翼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以當作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三）『小知識份子』，包括中學生，中小學教員，屬於小資產階級，『是我們的朋友』。」王丹說：「這是『知識越多越反動』濫調的濫觴。」（王丹：《我們在寫歷史》第144頁）4，經過大鳴大放，他發現民主黨派當真要行使互相監督的職能，便又暴露出他要消滅民主黨派的心跡。他於那篇背信棄義，惡名狼藉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後來添加道：「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這是我們的願望，也是我們的方針。至於各民主黨派是否能夠長期存在

下去，不是由共產黨一方面的願望作決定，還要看各民主黨派自己的表現，要看他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這裏當然無需提出這一同樣的問題：「至於共產黨能否存在下去，還要看共產黨的表現，要看他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因為「人民」就是毛自己。而於最後，可能是「人民」看到，經過反右派後各民主黨派的表現，猶如演傀儡戲，由共產黨牽著線，叫走走就走走，叫扭扭就扭扭，完全傀儡化；搖尾乞憐，跟屁逐臭，徹底走狗化了，才暫且恩准它「長期共存」，作為花瓶，以觀後效，以騙觀瞻。

一則由於毛的本質，二則由於列寧的教唆，兩者決定了毛一則以槍桿子——暴力奪取政權，二則絕不與人分享政權。他外奪黨權，用「人海戰術」表現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內奪私權，也是殺人不眨眼。殺 AB 團把一個軍副排長以上幾乎斬盡殺絕，搞得潰不成軍等等，以前種種內鬥不再追述；為了鬥倒王明，周恩來，他捧起劉少奇，並封為白區正確路線的模範，欽定為自己的接班人，卻因為劉屢屢「正確」，功高震主，就要把他打成頭號走資派，經殘酷鬥爭，死時「白髮三千丈！」有一本書，《左傾二十年 1957——1976》，顧名思義是反左的，可書中卻這樣陳述毛對劉的迫害：

就是在 1966 年 8 月的時候，毛澤東還沒有打算徹底打掉劉少奇……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央領導機構調整決定中，劉少奇名列政治局常委第八名，雖然不是原來接班人地位，畢竟還是黨的高級領導人——起碼名義上是如此。8 月 20 日以後北大貼出一批攻擊劉少奇的大字報，毛澤東派陳伯達前去阻止。9 月 14 日，毛澤東在劉少奇按《炮打司令部》的口徑所寫的檢討稿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10 月 18 日，首都紅衛兵三司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清華大學出現「打倒修正主義頭子劉少奇！」的大標語後，毛澤東 10 月 24 日說：「把劉，鄧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讓紅衛兵看看《阿 Q 正傳》。劉，鄧兩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許劉鄧革命。」「對劉少奇不能一筆抹殺。」（第 316 頁）後面又寫道：（1967 年）1 月 13 日深夜的時候，毛澤東還派了秘書把劉少奇接到人民大會堂談話。他親切地接待他，一上來就關心地詢問：「平平的腿好了嗎？」劉少奇告訴毛澤東：「沒有的事，是個騙局。」

的確，是個騙局：1 月 6 日，王光美在中南海家中，接到一個孩子的電話：「平平在學校作完檢查，回家的路上，被汽車把腿軋斷了，現在送到北大附屬醫院，要馬上截肢，請你趕快來醫院！」王光美拿著電話，兩眼直了……劉少奇說：「馬上到醫院去！」他們調車，趕到了醫院，不見平平，卻看見另外兩個孩子被當作人質，扣在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手裏。幾個造反派一見劉少奇來到，也都麻了手腳，這時一個孩子跑到王光美身前：「媽媽！他們就是為了要抓你！」王光美隻身迎上去，向人們說：「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回頭，她向造反派們嚴肅，氣憤地質問：「你們為什麼用這種手段騙我？」造反派不敢正視，望著天花板，回答：「這是江青同志支援我們搞的……」

現在，毛澤東關心到平平的腿，臨別時，還親切地把劉少奇送到門口，囑咐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第 318 頁）

如果我們在開始為假像所惑時，我們尚可說：「毛澤東這時還沒打算徹底打掉劉少奇。」可在真相大白之後還這樣說，是何異於屠夫在捅刀之前還在豬脖頸上搔癢讓它靜以待宰，好減少掙扎帶來的麻煩，你就說他這時還沒打算宰豬呢？

情景雖然一模一樣，但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卻不是屠夫與豬的關係，而是兩位元中共最高領袖之間的最親密的戰友關係。我們事後想起來，毛澤東當時表現的那種親切，關懷，慈祥，尤其是他說「好好學習，保重身體」時呈現的貓哭老鼠狀，真叫人出一身冷汗！又真

叫人噁心得出一身雞皮疙瘩！馬上毛就要「劉克思」去見馬克思，還要諄諄教以「好好學習」難道是要他發揚「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嗎？

偽善真惡，冷酷殘忍，陰險毒辣，卑鄙下流，與前述的「六個偉大」各司表裏，相反相成。別看林彪提出了「四個偉大」，那是他對毛「看人下菜碟」，他對毛是知人知面又知心的。他確知毛的為人是「一旦得罪，得罪到底。」但他既然碰上了這種吃得餓，吃的毒的「吃獨食者」的泰山壓頂，也就難能避免如劉少奇先被定為接班人後被徹底打倒的同樣的命運了，但他對毛不抱幻想，既不做檢討以求毛，也不虛與委蛇以騙毛，而是作最壞的打算。雖最後折戟沈沙，但總不像劉在最後關頭還對毛存幻想，自己承擔路線錯誤的責任，辭去國家主席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企求毛高抬貴手，息事寧人。毛親切握手，教以「好好學習，保重身體」打發他走人。但毛心硬如鐵，對他是一不作，二不休。我們現在再回過頭去看看，劉的下場是多麼淒淒慘慘，窩窩囊囊！

難道即便是個兔子，具有了吃獨食的惡習，也會連窩邊的隱身草也都要吃個精光嗎？作為當時毛，林，周之後的第四號人物陶鑄，由於竟對毛如上「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的講話信以為真，就對劉少奇採取了毛御定的「要允許劉鄧革命」的政策。結果，眾所周知，他被打成了中國最大的保皇派，迫害致死。試想，僅是遵旨保劉，就罪當致死，劉本人還會有活路嗎？更別提「允許革命」云云之類的欺人之談了。再說卑躬屈膝的周恩來，林彪說他像個老當差的，絕對沒篡權的心，毛對他也不放過。因為他在黨內外，幹部群眾中威信高，毛認為自己的權力於無形中流失，所以也要對他來個借刀殺人。殺劉少奇借的刀是林彪，殺周恩來借的刀是癌細胞。他不准他動手術，以致失去治療最佳期，讓他先於自己而死。並且，死後還降低對他的評價。我有一位也是右派的朋友，當時看到周的悼詞，感到無法理解：「為什麼沒有寫『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這一說，引起我的同感，因為連史達林那樣的重重大殺人犯還被毛硬說成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哩！我到美國後，看到1999年第9期《爭鳴》上，載有《汪東興私藏「毛檔案」被抄家》，其中有毛拒絕參加周恩來追悼會時說得幾句話。1976年1月12日，毛說：「為什麼要我參加總理的追悼會？我還有不參加的權利嘛！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誰送給總理的？我和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總理，就鬥爭過不少於十次。不要勉強，建議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參加。」

1976年4月3日，4月6日，毛出席政治局會議時說：「悼念總理，是反對我老毛，罵我秦始皇，我比蔣介石還殘暴。炮打江青，春橋，洪文，他們的總後台就是我老毛。」4月5日，4月6日，毛對華國鋒，王洪文，汪東興等說：「（天安門）廣場，外地，都搞得火熱，悼念總理，要鄧小平上臺，這都是針對我的，要打倒我，我是『豺狼』的後臺。」5月？日，6月？日，毛多次和毛遠新，張玉鳳談到接班人：「我擔心華國鋒同志，我走了，他頂不住，會倒向右。軍隊聽我的，跟我的。我走了，會聽國鋒，錫聯嗎？我看不會，大多是聽幾個老帥的，還有那個老帥頭兒（指鄧小平）會翻案，會翻天！」他已打倒了鄧小平，但仍對他的「翻天」耿耿於懷。6月？日，十月？日，毛和華國鋒，毛遠新，汪東興，陳錫聯，江青等人談話：「國鋒頂不住，要找江青。她有膽，不怕鬧翻天；但江青結怨不少，東興，錫聯呢，江青都和你們鬧翻天過吧。」6月？日，毛召集了華國鋒，汪東興，江青，毛遠新，陳錫聯等人，講到中央人事安排時說：「江青今後怎樣安排？我看還是在黨務上，抓黨務的要硬，不能含糊，左右搖擺的，這一點江青有資本，能管理好；但她跟不少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不和，要改。改好七七八八才能夠格做黨的工作。」5月？日，毛對汪東興，毛遠新，張玉鳳等說：「我死後，建議小張（張玉鳳）搬出中南海，在中組部，中聯部安排個副部長來鍛煉一下，還年輕嘛！」

可是，又據張玉鳳回憶，主席在 1976 年 7 月 15 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提出政治局常委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江青聽後，要主席再重複一次，並問：「洪文，春橋呢？」主席當即指著江青說：「你好幼稚！」舉手往左右方各斬一刀，說：「老師，王(洪文)，張(春橋)都不進！」（《動向》2004 年 5 月刊）

如照此欽定辦事，則這個黨天下，實至名歸為「毛傳侄，家天下」了。至於為什麼未照此辦理？只有待檔案解密，方可得知。

如此這般，毛在一息尚存時，把政敵一個個殺的殺，囚的囚，貶的貶，把新黨羽培植起來，把家人——女兒，侄兒，侄女，妻子，甚至情婦也安置在黨的領導核心；機關算盡而千慮一失者，是他「東征於朝，長子死焉！」否則，中國不也有了自家的「金正日？」國人有為的為此而感謝彭德懷，說：「剷除了那個壞種羔子，是為國除了一害。」

審視他一生的所作所為，說他極端貪婪，吃獨食，有一點假嗎？

中篇：教訓篇（之 三）

2，極端陰險

說他極端陰險是指他用心險惡，極端陰狠毒辣，專搞陰謀詭計。因為他的本質是極端自私，決定了他的動機和目的便見不得天日。比如，他死前遺言如有一句憂國憂民、關心國計民生的話；你看能把「偉大」宣傳得怎樣地山呼海應吧！現在好了，這方面的話一句也沒有，有的卻是把自己的家人，甚至是沒法稱呼的人（要是按革命群眾的說法來直呼，就是稱作「破鞋」；他老毛這種行為，叫做「搞破鞋」）都安排得停停噹噹。你總不能讓大家知曉，主席奄奄一息，仍念念不忘關心「破鞋」大事。於是，只好把檔案絕對保密起來，以免「有損」。「有損」一詞尚未入中外詞典，是共產黨許多政治術語中的一個，類似黑社會的黑話，意思是：「有損毛澤東形象，有損共產黨形象……」華國鋒用「有損」一詞造句說：「政治局有過決議嘛！由你、錫聯、登奎三人負責清理，分類解決其中的一些極為敏感、『有損』的檔案，可以由東興同志代保管。這是主席健在時，也是這樣做的。」（見前《汪東興私藏「毛檔案」被抄家》）

保密是中共捲裹膿血的重大措施，雖然他們之間有時狗咬狗兩嘴毛，但得利集團的共同利益，使他們都願意掩住漆黑一團的內幕，而鄧小平的《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選二卷第 255—274 頁）便是一篇《「家醜不可外揚」論》。至於毛本人，則是既要做大婊子，又要樹高的牌坊。對於這種二者不可兼得而又偏要兼得的人，你還能指望他光明正大、說真話，不搞陰謀詭計、不說假話嗎？斷然沒有可能。仍以他迫害劉少奇為例：文革初期，他「隱居」起來，跟李志綏說：「讓他們去鬧，我們先休息一下。」劉鄧到杭州向他匯報運動中的情況，劉鄧走後，他心懷叵測地說給李志綏：「讓他們去處理運動中的問題，我還在休息。」（47）

劉鄧趕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主張派遣工作組。電告毛澤東，毛復同意。

當學生與工作組的矛盾到不可開交時，劉少奇、鄧小平於 1966 年 6 月 11 日，在文革匯報會上指示李雪峰、吳德：打右派學生「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13 日，劉少奇批轉中南局和西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指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份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鬥爭和戴帽」（見《文革大年表》）

第 120 頁）他們把毛澤東對右派「引蛇出洞」的惡毒陰謀，來了個東施效顰。他們在「引」學生的「蛇」，卻不知道，這樣一來他們本身這條「蛇」正好被毛「引」出了「洞」。古人有言：「螳螂方慾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慾啄而食之也。」火候一到，毛宣佈派工作組是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攻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無毒不丈夫的大巫斥責小巫：「又何其毒也！」往下便是前述《左傾二十年》中提到的毛對劉的貓哭老鼠那一段。不過，該書沒有提到在文革中已傳出的情況：毛對劉自我批評說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立即在私下說：「甚麼老革命，老反革命。」只要有這句話，劉的問題就定了性，就等於判了死刑。其它的鬼話連篇，便只能顯示毛之偽善、之陰險、之卑劣、之詭詐的醜惡嘴臉了。

看清了反右後發生的事，也就找到解開前事的鑰匙。反右派的手法就是這個樣。他已經為《人民日報》寫好反右派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卻仍對隨後就要被劃右派的冒廣生老先生說：「講得好呀！我一定牢記在心上。」並且牙是牙、口是口地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個方針。一定不變。」

至於他對《文匯報》，剛剛還對該報的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當面誇獎道：「你們的《文匯報》辦的好，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真是辦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看你們的報，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工夫再看其他報紙。」同時他還肯定了《文匯報》關於電影的討論，說道：「這次對電影的批評很有益……電影局不理是不對的。這次爭論暴露了問題，對電影局和寫文章的人都有益處。」（49）

前言餘音繞樑，後語接踵而至：「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文匯報在春季裡執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向無產階級舉行了猖狂的進攻，和共產黨背道而馳。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幫助整風』的嗎？假的，真的是一場欺騙。」（50）結果，以羅隆基為帥，下有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能幹的女將蒲熙修等工作人員，劃了一大片右派；當然敲電影鑼鼓的鐘惦棠自是在劫難逃。

他這是老一套，比如從前對胡風，臨逮捕前一兩天還指示周揚派人穩住他。對彭德懷、劉少奇、林彪也都是這樣……

這裡存在兩個問題：一個是為甚麼人們識不破他這個「老一套」把戲？我以為，一開始識破他是不很容易的，但成為「老一套」就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水平和智慧水平了，問題只是，你絕對地怎麼也不會料到他作為領袖會這樣壞！這樣不講人格！這樣卑鄙下流！會是這樣像一個死皮癩臉的下三賴！第二，詭計多端的毛，怎麼總是玩弄「老一套」把戲呢？其實，他在具體運用上還是耍了些花樣的，只是大同小異，萬變不離其宗而已。從哲理性上講，這是由於，反映本質的現象必然具有反覆呈現性。人們從這裡發現有跡象可尋，尋覓出他行為的軌跡，認識到他行為的規律性，這才會對他作出有力的對應。說句老話：往往兩個歷史過程會出現驚人的相似，驚人的巧遇，驚人的偶合。這種碰巧是常見的，不是偶然的，是必然性的存在形式。這個「反覆呈現性」很重要，如能發現，能緊緊抓住，就會認識：「虎走千里總吃肉，狗走千里總吃屎」，「象牙出自象口，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並且還能見微知著，不失時機地掌握事態發展的火候，如麥熟一晌，蠶老一時，立秋 18 天寸草結子，水成冰於一瞬，「20 世紀 90 年代，蘇共亡黨，蘇聯亡國。世界上第一個由共產黨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夜之間灰飛煙滅。」（見《蘇共亡黨十年祭》）同樣。今日中共，處處星火，防不勝防，窮於應付，惶惶不可終日，正處於倒台的前夜；這就是中共今天的處境、。中共高官們當

少先隊員時的呼號：「準備著，為共產主義而奮鬥！」「時刻準備著！」現在改為：「一夜之間，灰飛煙滅」「時刻準備著！」

我們再來對以下的毛的反覆呈現性，加以觀察：1959 年反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開始於神仙會，與 1957 年反右派鬥爭開始於大鳴大放，何其相似乃爾！憑空捏造出彭、黃、張、周軍事俱樂部，要他們交代，反黨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這與憑空捏造出章羅聯盟冤案的做法又是如出一轍。巧中之巧，由神仙會到反右傾是抓住甚麼戰機、借題發揮的呢？是抓住一封信。這和大鳴大放轉入反右派抓住一封信，借題發揮，在人民日報上裝腔作勢發出嚎叫：「這是為甚麼？」（社論）又是不謀而合（實質是同[為陰]謀而合）。毛說：「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與瞪眼說瞎話，編造右派進攻的形勢「黑雲壓城城慾摧」，從神似上講，近乎字字相印。鬥爭對象彭德懷憂國憂民，代表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向危害國家、民族、人民的錯誤以至罪惡作鬥爭，是站在歷史的正確方面，右派為民請命也和彭一樣，代表民意、得民心。毛為掃除彭廣泛的社會基礎，將反右傾引向下層，又抓出 360 多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與反右抓了 460 多萬右派份子（包括中右，最近官方的解密數字）的做法一樣，抄襲了反右用的「引蛇出洞」的陰謀詭計。請看《鴻》書中所描寫的真情實景：

「四川省負責人開完廬山會議後，帶著印有彭德懷在廬山發言的文件回到成都。文件發到 17 級以上幹部，要他們對彭的觀點表態。（劃右傾卻不限於 17 級以上）

「我父親已從李省長處聽到了一些廬山會議的爭論。在他參加的『考試』會上，他對彭德懷的信作了一些含糊的評論。回家後，他做了一件以前從沒做過的事：暗示我母親這是一個又一次『引蛇出洞』的圈套……。

「在母親的『考試』會上，她很驚訝地發現其他許多人似乎都已聽到風聲。一半以上的同事對彭德懷的信表示憤慨，說他對毛的政策批評是『顛倒是非』。」（第 170 頁）

「成都市糧食局長和郵政局長曾是彭德懷部下老紅軍，兩人都說同意他們德高望重的老司令員之觀點，他們還加上自己在農村的經驗來支持彭的意見。我母親擔憂這些老紅軍知不知道這是個陷阱，如果知道，他們仍說出自己的心裏話，真是英雄！……支持彭的老紅軍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解除職務，下放體力勞動。

「由於許多共產黨幹部同意彭德懷的觀點，清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運動再次撼動全黨上下。這次的教訓是：不准對毛澤東提任何批評和意見——即使明顯是他的錯誤。幹部們都看到：不管你的職位有多高，也不說你過去的功勞有多大，只要觸犯了毛澤東，一夜之間就淪為階下囚……。」（第 171 頁）這裡所說的「教訓」是極端消極的，迥異於我所說的「教訓」，但，這的確確是大多數人，甚至於是絕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教訓。唯其如此，人才能昧著良心顛倒是非，如：「一半以上的同事對彭德懷的信表示憤慨，說他對毛的政策批評是『顛倒是非』。」到底是誰在顛倒是非呀？不僅毛在顛倒是非，而且這些自保的人也在用「顛倒是非」來包庇毛。同樣，反右時，因為右派給共產黨提的意見據說都是「顛倒是非」，才激起左派們憤慨得「義憤填膺」，幾乎要腦漿崩裂而亡！也唯其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多虧這些奉迎毛的左派以癌細胞的速度增殖，毛澤東的陰謀才能屢屢得逞，中華民族才能陷於深重的災難——共產黨自己也承認是「浩劫」

由於毛心太狠、手太辣，雖然把玩弄陰謀詭計搞得爐火純青，進入化境，但隱藏於偽善背後的凶相已逐漸暴露；極端自私的居心已為人們識破，估計不會有多少人從真心裏認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出於公心；自以為得計的鬼把戲已玩得露了餡兒，發生林彪事件後就玩不靈了，人民群眾大都識破毛的「老一套」。毛陷於孤家寡人，喟然而歎曰：「是在反對我老毛啊！」

「老一套」的「套」，不是指細節，因為細節有真相有假象，而是指邏輯。一個極端自私的人，出於實現極端自私的動機和目的，能來正大光明的嗎？不能，任誰也不能，只能搞陰謀詭計，這便是邏輯。至於把「陰謀」說成「陽謀」，只能表明說者癩皮。我在 1957 年，當即查了辭典，「陽」字部根本沒有「陽謀」這一條目，倒是有「陽奉陰違」、「陽狂」、「陽痿」等等。餘孽們繼承毛的衣鉢，鸚鵡學舌——當人們認透毛的本質，說他是「民族敗類」時；餘孽們油腔滑調，以「民族勝類」相反駁。餘孽和主子一樣，以為生造一個詞頭，就可以改變事物的本來性質。不過，這倒是得了毛倡導的無理纏三分的學風之真諦。作為範文，大家記得，毛澤東批右派的文章，寫得是何其洋洋灑灑、痞裡痞氣、咋咋唬唬！現在再來看看：其中有幾句算得上不是裝腔作勢、假大空謬、男盜女娼？而目前中共與其幫忙、幫閒者的文章，其痞子氣、其土大王氣，即毛氣，可以說是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無理蠻纏，理虧氣壯，打腫臉充胖子，不管別人噁心，只管自以為得意、自以為得計！

毛澤東的陰謀詭計之危害，使我民族痛心疾首，若不徹底地進行揭發、批判，讓人人皆知、個個喊打；否則，共產黨定將以之為傳家寶！定將繼續得逞！定將繼續害人成災。

毛的一切鬼蜮伎倆的方法論，皆根源於其陰謀哲學《矛盾論》。毛澤東關於《矛盾論》之為用，其精義在一個「借」字，我歸結為「三借」：一曰：「借刀殺人」；二曰：「借題發揮」；三曰：「借頭過關」。

一曰：「借刀殺人」。

這裡，毛遇到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他要殺的人豈肯引頸就宰？另一個是他要借的刀別人豈肯拔刀相助？毛的招數是，對前者「引蛇出洞」，對後者威脅利誘。具體步驟如下：

（1）先發制人，

毛說自己是「老子不為天下先」，「你打我先不還手，不但不還手，還要退兵三十里。」「我讓了你，你還打，那麼我也就動手了，你怎麼打過來，我就如法炮製，照樣打回去。」（51）

事實正好相反，毛一生的重大行動都是為天下先的，戰略上都是主動出擊、打對方於措手不及的，即如「誘敵深入」，表面現象是敵人先打過來了，其實是你的「誘」在先。這不僅是毛澤東思想，而且馬列主義也是如此說：「革命總是進攻的，」毛總是先拋出圈套、先設陷阱、先發制人於猝不及防，事後聲稱：「不為天下先」，製造假象，欺世盜名。對於毛來說，「欺騙」就是其陰謀的形成性要素，其目的是把陰謀掩蓋起來，把主動出擊、蓄謀害人，顛倒成是由於被害、被侵犯才起而自衛，好像他是一只被人欺凌的善良無辜的兔子，只有無可奈何，兔子急了才咬人哩！

反右之前，他將緊握的拳頭縮回袖筒去，先裝兔子，甚至於還要掬出笑臉裝孫子，給對方一點甜頭兒，一點兒讓步；其實是為了佈置好火力網：他允諾知識份子獨立思考（這對知識份子比物質利益更具誘惑性），讓其鳴放的內容，即整黨的內容是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敏感的知識份子把它叫做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三害」所以，也正好撓到了知識份子的癢處。）。然後又信誓旦旦地保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了讓你有 100% 的安全感，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說：「黨外人士可以自由參加，不願意的就不參加。」隨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重申毛的話：「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看！還有比這更保險、更寬鬆的條件嗎？但由於歷次運動，特別是剛經過反胡風、肅反運動，殺雞過多、驚猴過甚，以至千呼萬喚不出來。對此，毛的辦法是猴不上竿只敲鑼。於是有幾隻猴子出出探探……逐漸成群結隊，……

跟著下不害怕，……大家一起，跳河猛擠眼。結局是任何人的想像力也達不到的如下情景：說的是「言者無罪」，做出來的是言者家破人亡！

要知朝綱事，鄉下問農民。農民說：「知識份子讓毛主席當猴子給耍了！」我向一位老農要問個究竟，他回答道：「你們是把書讀通了的，怎麼會那樣說？共產黨就是要鬥出你們的真話。這樣說吧：如果美國人來問你糧食夠不夠吃，你也說『不夠吃』？」

就大多數右派來說，是這樣的。但也不盡然。前面我曾舉出的那位守口如瓶的老師，卻以「內心歹毒」劃了右派；無獨有偶，《人民日報》卻有一位根本沒有言論，而以「骨子裡」反黨，劃了右派。還有我舉出過的吳宓和張紫葛兩位著名教授的見證，足以揭破毛說的「我讓了你，你還打，那麼我也就動手了……」云云，是何等地虛偽，以及他的「讓步」意味著甚麼？

裝出「讓步」是他毒辣的一手，殺人不見血，冤死你，還要你落個「國人皆曰可殺！」這是他的拿手戲，也是「老套子」。1956年，在我的感受中，這一年是沒有政治迫害，能靜下心來鑽研業務、向科學進軍的一年，對知識份子說，是少有的黃金歲月。誰都沒想到毛澤東會在1957年說：「去年下半年，階級鬥爭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識地要緩和一下。但是，你一緩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地主、富農以及一部份富裕中農，就向我們進攻，這是今年的事。我們緩和一下，他進攻，那也好，我們取得主動。正像人民日報一篇社論說的，『樹慾靜而風不止』。他要吹風嘛！他要吹幾級颱風。那麼好，我們就搞『防護林帶』。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75頁）劉賓雁是看透了這一點的：「1956年的寬鬆，顯然又是毛澤東在那裏搞他的『文武之道，一張一弛』。」（見《毛澤東一手定乾坤》）

廬山會議前的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4月上海會議，直到廬山會議的神仙會，毛允許批「左」，批評他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帶來的特困局面。這便是他「反擊」右傾機會主義之前的所謂「讓步」。

災難是以讓步為先兆的。文革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最大災難，之前，毛也作了最大的讓步：從暫時交權，把他搞的爛攤子交由劉、周、陳、鄧去擦屁股；到更大得不可設想的讓步是他在七千人大會上，擰著鼻子作了個假檢討。樣子是退、是讓、是給甜頭，實際是醞釀災難。小讓一小災，中讓一中災，大讓一大災。並且是，如果你接受讓步，去嚐甜頭，就會如民諺說的：「人只見利而不見害，魚只見餌而不見鉤。」所有事實證明，無一例外的結果都是讓步使你大難臨頭！果然他後來一翻臉，就反起單干風、黑暗風、翻案風，……直到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就是對劉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和其他在「出氣會」上出氣的人的反攻倒算。

痛定思痛：有沒有躲災躲難的歷史經驗可資借鑒呢？有：

上策是，根本不上賊船。我上面舉出胡適先生，但他不上賊船似乎有某種必然性。我再舉出一位年輕時據說是左傾的激烈分子的余紀中先生，他上賊船有極大的可能性。可是，他是一個有大經歷、有大見解又有良心的報人，曾親自目睹斯大林恐怖的大整肅——列寧的戰友布哈林等被審的實況。以布哈林曾任《真理報》和《消息報》總編輯這樣的布爾基維克理論家，都打成托洛斯基右派份子，裡通外國的間諜；這絕對是斯大林為消除異己羅織的罪狀，其理至明。整個審判必對余先生有極大衝擊，讓他看到共產黨權力鬥爭可怕的一面，堅定了他畢生反共、篤信三民主義的立場。（參看傅建中懷念三十年代的余紀中：《何處尋行跡》《芝加哥時報》2002年5月17日轉載《中國時報》）這裡所以稱道胡適、余紀中的主意為上策，在於他們一往直前，無左顧右盼者也。反之，則曰：「人沒主意必受窮。」窮者，窮途末路也。

中策是，發覺是上了賊船，毫不猶豫拔腿就跑，切勿耽於幻想執迷不悟，要學司馬璐先生走人。「脫去金鉤走鰲魚，搖頭擺尾不再來。」

中下策是，已成「塘中之魚」，要學吳宓教授有個清醒的頭腦，聽天命，盡人事。特別要警惕所謂的「讓步」，不要從「讓步」中幻化出「希望」；而是要看清他的「讓步」只有三種含義：或是為度過他暫時的難關，或是為騙取人心、欺騙輿論，或是一個陷阱、一顆糖衣炮彈，所以當你一看到「讓步」或「甜頭」，你就要警醒地意識到：「黃鼠狼要來跟雞拜年嘍！」雖然這已是中下策，總比束手無策，引頸以待，刀快脖子長要稍好些，至於，精神崩潰，胡踢亂咬，辱己賣友，以圖僥倖，那就是下之又下，為人所不齒了。

寫到這裡，看到報載：連戰與胡錦濤會談。會談不怕你會談，只是要記住國共交往慘痛的歷史教訓，並以之衡量你的所作所為，才是上策（始終不能忘記「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千方百計要發揮台灣三民主義模範省之燈塔效應）；中策是盡其所能，要指明共產極權應搞政治改革，先民主後統一，如馬英九公開聲明的「六四不平凡，統一不能談。」；下策是為虎作倀，與虎謀皮只為壯選舉之聲勢；下之又下之策是，賣黨求榮，使國民黨死無葬身之地，因而為人所不齒、落下千秋罵名。孫先生創建，蔣先生繼承之中國國民黨，李登輝、連戰等人妄想把它毀在自己手裡！難道你們就沒有想一想，大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歷經內憂外患而不亡者，何也？無他，只因孫先生立黨、立國根正、根深，具有堅韌不拔的生命力之故也。君不見，孫先生的死敵、三民主義的死敵（遠非一般敵人），也不敢彰明叫著地反對，只能極盡歪曲孫中山和三民主義之能事；這也說明，我中華民族真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優秀民族，絕大多數人是認「國父」的，極少數人認賊作父是大失人心的。尤令人衷心鼓舞的是，喜看年輕的一代，孫先生的青年信徒，甩開一切無恥背叛，重建中國國民黨，從此，思想、信仰，變成不可戰勝的一往無前的力量！青年人將使青天白日再現輝煌，更加燦爛！敢問路在何方？重建共和，重建中國國民黨，重建大中華民國——三重建並舉，乃是歷史的必由之路。

（2）再後發制人

從政治（不是軍事）上說，他所諱言的「先發制人」，是側重於陰謀策劃，當然也要配合以行動，作用是為「後發制人」創造條件；而他聲稱的「後發制人」，則主要是大打出手，但暗中謀劃也是不可或缺的。先發的是他，後發的還是他，不管先發制人、後發制人，但總歸是要「制人」則是一成不變的。我出監獄後，到農村監督勞動，發現農民把毛澤東思想的「思想」當作動詞。一位農婦發問：「毛主席不睡覺，夜裡也大睜倆眼兒思想？」他還是要睡覺的，只是在醒著的時候，就思想著：如何「制人」？「與人奮鬥」，對毛來說就是「其樂無窮！」

在他的意念中，始終在琢磨人、制人、殺人，而在決策中則是從誰開刀，借誰的刀？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從吳晗開刀，由江青跑到上海來借兩個文痞張春橋、姚文元的刀。

毛澤東說，吳晗的《海瑞罷官》，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就是海瑞。所以問題就不是學術問題、藝術問題，而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了。就像右派向黨進攻、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進攻一樣，這次為彭德懷翻案是又一次向黨發動猖狂進攻！於是他要發動「反擊」，「是你吳晗先動手的嘛！樹慾靜而風不止嘛！我是不為天下先、後發制人的嘛！」

讓我們來揭穿兩個老底：首先，是他首倡學海瑞、宣傳海瑞，並曾對《海瑞罷官》編劇吳晗、演員馬連良予以表揚的。說實在話，吳晗幹這差事，全是為迎合主子心意的，不料中計而給主子借了「頭」。就連彭德懷也是輕信了他「提倡學習海瑞精神」的鬼話而栽了沒底觔斗的。

御醫李志綏旁觀者清，在回憶錄中寫道：「毛這次提倡學習海瑞精神，和先前 1957 年他用所謂『引蛇出洞』法，鼓勵知識份子批評黨、替共產黨整風一樣，都是他慣用的策略。」（該書第 285 頁）這層意思，我在前面「引蛇出洞小考」一節中已作過詳細的論述。

這在《矛盾論》上的原理是，構成矛盾的前提條件是矛盾雙方必須處於共同體中。「引蛇出洞」就是把你調進他佈置好的戰場裡，納入可以造成你死他活的共同體中。

其次，他這一手叫做：「打了孩子娘出來。」也可算做是「引蛇出洞」。果不出毛所料，批了吳晗就會揪出來他背後的一串兒人馬；彭真、鄧小平、劉少奇。

文革的開展，正是這樣按圖索驥的：吳晗—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四家店（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劉鄧司令部。

可知，一切都是預謀。毛所謂的「後發制人」不是別的，而只是他「先發制人」的後續步驟。只有這樣理解問題，才是搶救了歷史的真實：先發，引蛇出洞，毛也；後發，聚而殲之，也毛也。這樣才能讓毛嫁禍於人、加禍於人的真相大白於天下，也才能使沉冤得申。

（3）借刀殺人，各個擊破

毛所有解決矛盾的方法，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借刀殺人」。既然毛認定矛盾鬥爭是絕對的而團結一致是相對的，所以總是有矛盾可利用、有刀可借的，就像總是有頭可殺的一樣。

A，大痞子唆使小痞子

毛說他從馬克思主義學了四個字：「階級鬥爭」。他對千頭萬緒的馬克思主義道理，也概括為四個字：「造反有理」。他的哲學《矛盾論》就是鬥爭哲學。他的主要政治手段是搞社會運動，這地方運動、那地方運動，這部門運動、那部門運動，以及全國規模的大運動；大運動、小運動，運動之中套運動。這便是他散佈仇恨、搞鬥爭哲學的展開式。他要在運動中製造矛盾、激化矛盾，讓鶴蚌相爭，他好玩借刀殺人的毒招，週期性地玩弄挑撥離間，興風作浪，分而制之、分而治之、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之。「老毛不死，國無寧日」，此之謂也。

在運動中，依靠的對象就是他要「借」的「刀」，鬥爭的對象就是他要「殺」的「人」。由於他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情況下，在政治上有不同的「主要矛盾」需解決，所以就會有不同性質的運動和不同的人來充當打手和被打倒者。單從打手來說，從土改中的「革命先鋒」，到文革中的「紅衛兵，造反派」，所有運動中的積極份子無一例外都是「痞子」。例如在反右運動中，把「言者無罪」的許諾變成以言治罪的惡魔醜行，本來是毛澤東言而無信、自食其言的一貫行徑。可痞性十足的郭沫若卻把「言者無罪」說成是「無罪者言之無罪。」無怪乎大陸知識份子把他定為「四大不要臉」之首。

當然，首上有首。《人民日報》1957 年 7 月 3 日，登載嚴信民的文章說：「（1948 年夏天）有一天上午，我專程到九龍章伯鈞寓所去談話，有李健生（章妻）在場。我介紹了解放區情況，談到各種政策，最後談到統一戰線，談到周總理對他的期望。我看到章伯鈞的臉色蒼白，他猛然站起身來，顫抖地喊叫：『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流氓。』」

《人民日報》8 月 11 日登載吳晗揭露說：「1949 年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前，羅隆基到北平，毛主席和周總理都接見了他。現在有人揭發：羅隆基見毛主席之後就對他的朋友說：『毛主席這個人很厲害狡猾，比歷代統治人物都兇。』」

當時我 24 歲，雖已劃了右派，但喝共產黨的迷魂湯，對毛的盲目崇拜還未醒過來，故讀到對毛的這樣評價，簡直吃驚得目瞪口呆。於今，所有事實都已再清楚不過地證明，毛是大小

痞子的總頭子，所謂「政治運動」，就是痞子頭子唆使大小痞子去進行群體屠殺；農民殺地主，革命殺反革命，老粗殺老細（焚書坑儒）、左派殺右派，左傾殺右傾，文革派殺走資派，造反派殺保守派……如果毛說，知識份子附著在五張皮上；那麼，他自己呢？以我看，他是附著在痞子上：「痞之不存，毛將焉附？」人們之所以把他搞的運動定性為「痞子運動」，是因為痞子在裡面起主導作用，即矛盾的主要方面。這也正符合了痞子哲學《矛盾論》的原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事物的性質。毛還說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事物的本質。

B，激化矛盾和製造矛盾

比方說土地改革，你憑白無故沒收人家的土地，就已經傷天害理，為甚麼還要殺害 300 萬地主呢？這純粹是為了製造矛盾和激化矛盾，最終目的是要借農民的刀殺向國民黨，並且促使農民踴躍獻刀。事實正是這樣：「分了人家的田，殺了人家的人，國民黨回來你們還會有活路嗎？」所以，一畝或幾畝地換一個或幾個兒子，喊著「保衛鬥爭果實」，去迎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反右也是如此：鳴放期間，全國上下，各個單位，都在幫助黨整風，那些共產黨的官僚主義分子、主觀主義分子、宗派主義分子、教條主義分子、腐化墮落分子……被「幫助」得如上了熱鍋的螞蟻。正在走投無路，叫苦不迭時，毛一聲「反右！」令下；這些共產黨人應聲回答：「得救！」，遂懷著百倍的憤怒、千倍的仇恨，手執鋼刀直刺右派份子胸膛，紅刀進去白刀出來。到了文革時，對待劉少奇，也是如法炮製，故伎重演。所以，《矛盾論》應該叫做「製造矛盾」論。挑撥離間計和各個擊破是毛的拿手好戲。

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衣鉢，用激將法把人民子弟兵激怒得用履帶捲起學生的血肉之軀，用機槍射出成排的子彈在學生血肉之軀裡爆炸開花！以達到殺 20 萬，保共產黨政權再苟延殘喘 20 年之目的。在《中國思想運動史》中，是這樣記載著鄧小平這段思想史的：「顯然，只有把事情弄到用戰爭解決問題的程度，才能玉石俱焚，才能把政治對手一網打盡。應該說，這才是真正的『有計劃的陰謀』。」（頁 398）

C，殺人不見血

毛跟李志綏說：「這次一整，可能整出幾十萬個右派吧。我們還是老辦法，一個不殺，一開殺戒，類似的就都要殺掉，就沒有界限了。這一條還是延安整風時定下來的。」（51）天呀！「言者無罪」變成了有可殺之罪，只是皇恩浩蕩，才沒有「一開殺戒，類似的就都要殺掉」。我對毛的寬大政策是深有體會的：在文革中，一打三反時，我的一位右派老師（我劃右派的條件之一，是對劃他右派表示不滿，說他是個大好人）被「寬大處理」。造反派引他的例子動員我交代「罪惡」時，，說：「他犯有『惡攻』（惡毒攻擊毛主席、共產黨、社會主義）罪，本該槍斃，但他坦白的好，竟免於刑事處分。」你再也想不到他犯的甚麼「惡攻」罪值得槍斃？原來是他畫的毛主席像穿的是單衣；而畫時是冬天，所以他是居心叵測，想凍死毛主席！

李醫生對毛的話的理解是：「也是那時我才真正瞭解被打成右派會有甚麼樣的遭遇——許多人被撤職，送去勞改營『改造』，摧殘致死。毛總是毫不留情地打擊他的政治上的敵人或對手，誰敢於冒犯他的，無不家破人亡。他說不殺人，可是『改造』帶給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無非使人更加痛苦地走向死亡世界而已。」（53）

我以身受、目擊，來為李醫生的見解作證。當把右派趕進勞改營的時候，正值由於反右而帶來的大躍進方興未艾之際，黑夜白日連軸轉，大放衛星。你想人會給累到甚麼樣子呢？別人我不說，舉我自己一個例子，我解大手時都禁不住要打盹，仰臉朝天坐一屁股屎才被摔醒（實際還帶幾分癲症）。再加上飢餓難忍，可以說，全國的大饑荒提前降臨到勞改隊。由於超限度的疲勞、飢餓和拔白旗、掃暮氣，反對消極怠工、裝病論堆的文武帶打的運動，以及不是

一兩天如此，而是遙遙無期，因而自忖熬不出頭的沉重的思想包袱，等等因素，知識份子累死、餓死、病死、尋死上吊投河奔井者如秋木落葉蕭蕭下；報載，社會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高潮滾滾而來，元帥升帳、衛星上天，右派份子卻是發了瘋似的掀起死亡高潮！埋都埋不供。可悲可歎的是，有的右派死後還懷揣著對黨表忠貞的遺書，有的黨員右派把身後的幾角錢當作「最後的交黨費」。他忘了他已被開除了黨籍。

毛何殺人哉？餓死者歲也；累死者缺乏鍛鍊也；病死者天命也；死於非命者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也：即便是不服改造而遭槍斃也者，一曰：自作孽不可活，再曰：非我也兵也。毛主席總是有口可借、有刀可借的。毛澤東從來不曾殺過「伯仁」呀！林昭、馮元春、劉士弟、儲安平、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賀龍、陶鑄、張聞天、李立三、鄧拓、吳晗、田家英、傅雷、老舍……認真把名單列下去，可以列出成千上萬，上十萬、上百萬、上千萬！這些都是毛澤東不曾親手殺過的「伯仁」呀！再拿延安整風說吧，真的「一個不殺」嗎？許多回憶錄寫出許許多多血腥的場面，令人慘不忍卒讀。這些作者們僥倖沒有被殺，他們不稱自己是「虎口餘生」、「劫後餘生」、「法西斯屠刀下的餘生」……如陶鑄的夫人曾志卻稱自己是《一個革命者的餘生》。這些餘生者都保持了革命的「紀律」，把災難製造者，歸功於康生，極少數人提到彭真，只有個別人指出禍根、因而做出「有損」的事情；相反的一端是，甚至有人不避噁心而為婊子大樹牌坊，說甚麼如不是毛主席如何長、如何短，那就更不可設想了……這樣形成的主旋律。就是常態下的黨文化。

D，借斯大林的刀

我在網站上讀到一篇中國外交家的演講，他是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駐英大使的冀朝柱。我大致判斷他是一個對黨對國有責任心的人。他批評毛一開始執意「一邊倒」，而拒絕了與美國建交的現實可能。「按照毛主席的話說，先掃淨房子，然後再請客。現在建交不建交不是大事。先把國內肅清反革命、土改都搞好了，以後再說。這樣就是中國本來可能一開始就跟美國正式建交，如果當時這樣的話，可能中國發展得更快。因為那個時候蘇聯的斯大林也不敢對我們怎麼樣，兩個超級大國，我們在中間，是很好的，但是由於主席這樣做，使很好的機會就失去了。」並且他從「美國表示對中國內戰不干預」，斷定當時即可收回台灣。

難道說，這樣好的事你冀朝柱先生能想到，給猴掰眼的毛澤東反而能笨蛋到打不清主意嗎？問題在於你們兩個人是同「黨」異夢：你做的是強國夢；他做的是獨裁夢。所以他一心一意僵持「一邊倒」：「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若依你說的去，那便要走英美的路了。雖然共產黨曾大聲疾呼過，中國要實行英美的民主政治；那只是投像你這樣的知識份子們之所好，居心騙你上賊船而已。毛澤東自己在 1945 年 10 月 9 日，答英國記者甘貝爾時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今天右派的鳴放也未超出這點。茲再摘錄數則《新華日報》，以資印證：

「這說明英美在戰時也還是尊重人民的言論出版等民主自由。英美兩大民主國家採取這些重大措置，正說明英美兩國是尊重和重視……其他黨派和他們所代表的意見和和力量的…。同時，（他們）也有一些批評。他們的批評對不對，是另外一回事。這種民主團結的精神，是值得讚揚和提倡效發的……全國各黨派能夠融洽的為共同目標奮鬥到底，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們極應提倡和做法的。」（1942 年，8 月 29 日）

「單說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國家，這是人人公認的。英美人民有各種民主權利……為了國際的地位，必須從保障基本的民主權利開步走。恐懼是懦夫，疑慮是自私，反對便是倒行。我們再度呼籲：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1944年2月1日社論）

「我們尊重並且願意接受美國朋友善意的批評和建議，正如我們對孤立主義提出批評，應受到尊重一樣，這也是從彼此激勵互求進步以加強兩國人民的合作出發的。我們絲毫不心存恐懼，認為美國朋友的批評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3月15日）

「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家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4月19日）

「像林肯總統和羅斯福總統那樣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產生的領袖，是雖在戰時也一點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實行的。他們不害怕民主的批評和指責，他們不害怕人民公意的宣洩，他們也不害怕足以影響他們地位的全民的選舉。他們不僅不害怕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們堅決地維護支持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們才被人民選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11月15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國，曾經產生過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威爾遜，也產生過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民主領袖羅斯福。這些偉大的公民們有一個傳統的特點，就是民主，就是為多數的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美國現在是反法西斯戰爭中聯合國四大主要國之一，擔負了徹底消滅法西斯、消滅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責任，從美國的革命歷史，從美國人民愛好民主自由的傳統精神，從美國人民的真正利益，我們深信美國將繼續羅斯福的民主政策。不會忽視世界各處，尤其是中國人民的聲音，人民的要求。」（1945年7月4日）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9月27日社論）

這是共產黨自己說過的話，毛澤東把在1957年重複過這些話的知識份子都劃了右派。就是在現在，誰要再重複這些話，輕則算是自由化言論，重則判為顛覆罪。問題在於，毛共要借斯大林這把刀子，斯大林的血腥屠殺，受到赫魯曉夫的揭露，蘇聯人稱他為「暴君」、「劊子手」、「罪犯」。可是，毛澤東說：「你們不要這把刀子，我們要拿起這把刀子，我們要充分利用這個武器。你們蘇聯反對，我們不反，我們不但不反，我們還要擁護。」（《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111頁）

鄧小平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鄧小平文選》二卷第293頁）可見毛打內心裏不是不知道冀朝柱所說的道理——英美的民主制度優越於俄國人的共產制度。但，他要的是斯大林的刀。真地說起來，殺人魔王斯大林在毛澤東面前，也只能算是個小巫

所謂「借斯大林的刀」，就是指共產極權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也就是國家絞肉機。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領袖個人專政，」所以也就是維護毛澤東個人的絞肉機。上面提到的那些被害人，就是都被投進了這種機器裡。有些人把毛反蘇認作是他的民族氣節，甚至把他視作民族英雄，實在是天大的誤會。他反對的不是蘇聯，而是蘇聯和世界共運中的反斯大林主義，他始終堅持「一邊倒」的原旨，現在的「一邊倒」就是倒向斯大林的屍體，維護他最黑暗、最殘暴的陰魂在中國不散，在毛澤東身上借屍還魂。斯大林的刀子並不是單個一把刀子，而是一台國家機器，隆隆作響的絞肉機。毛反的是赫魯曉夫丟刀子，這個鬼名堂叫做「反修」。這只能說明他反動透頂，與民族主義不沾邊！

並且，毛澤東要和赫魯曉夫爭奪對斯大林世界人民領袖地位的長子繼承權。為此，在國內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發瘋地要創造奇蹟，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在外交上批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舉起反帝、反修、支援亞非拉第三世界革命的大旗！這一切都做到利令智昏的地步；刮得人民全國規模地一貧如洗，餓殍遍野；想借第三世界的刀殺向帝修反和擁戴自己做霸主，但卻往往又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E，借敵殺己和以毒攻毒

這裡是指他向敵人借刀，諸如策動當時正在剿共的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拉攏舊軍閥馮玉祥、龍雲等為共利用而與政府搗亂；唆使大文閥 魯迅、郭沫若等亂起鬨，使國無寧日。大凡在國民黨內部進行的策反工作都屬此類：李濟深、蔡鋌階等的反蔣；程潛、李宗仁、吳石等的吃裡臥外；宋慶齡、何香凝等以極左面貌出現……

進一步說，所有統戰工作，也都屬此列：在大鳴大放中「表現最惡劣」的民盟，其實是在反蔣中為共產黨「火中取栗」最勇猛、最激進的一個知識份子政團；又如在文革中，聯「美帝」反「蘇修」；現在拉攏華僑、台灣國民黨親民黨、外國見利忘義的政界商界人士和分化瓦解民運等等。都是拉一批打一批、用明天的敵人來打倒今天的敵人……作的都是這篇借刀殺人的文章。

在大陸社會中、企事業單位中、在幾乎接連不斷的運動中、處處充滿了人斗人、人暗算人、人出賣人。就是毛作的概括：「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另有一句與之相補充的話，既真實、形象，又令人不寒而慄：「別看我們現在坐在一條板凳上，一亮底牌，我們就是敵我矛盾！」即便就是夫妻在一個被窩中，一掀被子就可能是敵我矛盾。毛澤東在任何角落裡都可以兩面借刀。

在敵對群體中，以毒攻毒這一手來得更毒。康生曾道破其中秘訣，就是，給老鼠屁眼裡塞進豆子，縫住，憋得它們實在受不了了，就會互相撕咬。（參見電視劇《吳玉章》）我對此深有體會：在勞改隊的時候，這些右派們動不動就破口大罵、大打出手；互相揭發、爭相告密，好像都是紅眼仇人。我當時想起曾讀過的《王若飛在獄中》，實在有點佩服人家左派為理想而奮鬥的精神；詛咒右派「真不是種東西！」

我當時根本沒想到「這都是毛澤東糟蹋的，這都是共產主義糟蹋的。」（牟宗三語）。也不知道這是康生（共產黨）的諸如此類的毒招使中毒者毒氣橫生。在勞改隊的加工廠，制酒車間，有些埋在地下的大缸，缸口與地面平，許多碩鼠落入缸底，缸表面很滑，它們拼著死命往上躡，一躡幾尺高，一鼓作氣，再衰三竭，當他們絕望之際，便開始互相咬得嘰嘰叫、血淋淋，死而後已。現在想起來，康生的毒招原來是來自仿生學呀！他們對人洗腦，即，對人進行「從人到猿」的思想改造，把人們（很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都返祖為生物了。人類利用瓢蟲殺蚜蟲、抹碘酒以殺菌；共產黨把這種借力使力的辦法變成借刀殺人，用於人類自身，通過階級鬥爭，讓同類相食、相殘、相殺。！《矛盾論》上明明說：「解決不同質的矛盾，要用不同質的方法。」——怎麼能把這種達爾文主義用之於人類社會呢？《矛盾論》在毛手裡變成了人吃人的哲學。

反右時，各民主黨派互相揭發，右派之間互相揭發，右派家屬、親友與之劃清界限，等等，都屬此類。

共產黨內部的派系鬥爭也是「人吃人」的性質。令人詫異的，是辛灝年先生經過考證而指出的下面的「歷史的事實」：

昔日，中共李立三的江蘇省委竟能夠為了激發武裝暴動的「革命激情」，而如此大批地殺害自己同志；此時，中共的王明，為了捍衛他自己剛剛到手的權力，又將會怎樣地「借刀殺人」呢？

先看當時的中共中央領袖王明是怎樣向他的俄國主子「匯報」的。王明在他給共產國際的匯報文件《關於四大全會前反立三路線的經過》一文中，曾明確地寫道：「羅章龍把一切托陳，被開除，來歷不明及我們一部份同志幾十人在一個旅社開會反黨，使我們 25 個同志，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在上海被捕犧牲。上海東方旅館 25 人被破獲是羅章龍派王拙夫—唐虞告的密。」

按照王明的話來判斷，就是 25 位共產黨員在東方旅社被捕一事是共產黨自己告的密，並且告密者是反四大全會的首領之一羅章龍「同志」。但是，台灣的中共黨史學家王建民，卻在他的《中國共產黨史稿》中卷，第 99 頁，引用《中共透視》第 144 頁的材料，同樣明確地揭露說：「關於何孟雄被捕，乃陳紹禹之告密」。而陳紹禹就是中共領袖王明。

辛先生對此進行了科學的考證，得出了可靠的結論：「綜上所述，事實就是，以何孟雄為首的中共四大全會反對派，在他們於 1931 年 1 月 17 日於上海東方旅社舉行『全總黨團』反對四大全會的會議時，恰恰是因為中共自己的告密，才遭遇了國民政府的逮捕。」（《所謂左聯五烈士（下）》，《黃花崗》季刊總第 5 期第 128 頁）

是王明告的密，沒有錯；並且是堅決充當米夫和王明的狗腿子、因而首次當上了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長的康生（趙容、土地老爺，都是他的化名）干的。《毛澤東與康生》一書作者巴彥泰先生查詢出線索：當年在中共中央職工部部長劉少奇身邊工作的張瓊，在 1979 年 4 月回憶，當時人們都在議論：「有的人值得懷疑，何孟雄他們被捕了，為甚麼土地老爺安然無恙？」有一天，幾個湖南老鄉在劉少奇家聚會，張瓊遇到謝覺哉，謝當時曾是中共中央辦的《上海報》的負責人，他十分感慨地說：「人心隔肚皮麼！孟雄他們被捕，為甚麼趙容卻很安全？我百思不解。」

關於何孟雄等人被捕究系何人告密，還有其他方面的材料。

吳濱沐原是中共黨員，1930 年 8 月被捕後叛變，當了國民黨中統特務。1949 年以後，被中共公安機關逮捕關押。1967 年 11 月吳在交代材料中說：「1931 年 1 月，我在國民黨龍華警備司令部裡，碰到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龍大道、羅石冰等人，何、龍和我以前就認識，羅與我關在同一牢房。」「據何孟雄、龍大道、羅石冰講，他們被捕是黨內有人有計劃的陷害，是利用敵人屠刀屠殺他們。」「他們一批人何年何月入黨，工作簡歷，甚至連本人都記不得的細節，敵人都知道的一清二楚。沒有黨內人告密，是不可能掌握那麼詳細的材料的。」「他們到龍華司令部以後，每人只提審過一次，只是核對一下材料。」「所以這是一個叛徒告密的問題。」當時能掌握何孟雄一批人歷史情況的絕非一般黨員。康生曾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長和部長。吳的這個交代材料寫於 1967 年，那時康生掌握生殺予奪大權，即使他知道，也不敢點出康生的名字。然而另有一個中共變節者，早在 1933 年自首聲明中，就直接說出了是康生出賣了何孟雄等人。

這個人是王雲程，擔任過上海工聯黨團書記、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共青團中央書記。1933 年 2 月 24 日在其自首聲明中寫道：「共產黨內在其派別鬥爭中，經常使用暗殺或告密手段，借刀殺人，如何孟雄等 20 餘人都死在趙容（即康生）等所領導的赤色恐怖之下。」還有很多人在自首書中直接點名趙容在 1930 年「被捕叛變」、「出賣同志」。外國有些書刊也有所披露。1972 年，莫斯科思想出版社出了一部名為《蘇中關係》的書，作者是奧*博*鮑裡索夫和波*特*克羅斯剋夫。該書內有這樣一段話：「30 年代初由於康生參與的背叛活動，

上海的共產黨人遭到鎮壓，使黨受到重大損失。」（詳情，請參閱《毛澤東與康生》）這是共產黨借國民黨的刀，來替他們消除異己。

再看毛澤東是怎樣借國民黨的軍隊來消滅張國燾的軍隊的？司馬璐在《中共歷史的見證》中寫道：

張國燾原來打算西進，紅四方面軍遇黃河對岸大雪封山，只好北上。9月13日，「毛派」中央電張國燾表示「十分佩服與歡慰」。10月一四兩個方面軍在貴寧會合。周恩來趕到同心城局「歡迎」張國燾，隨後就挾持張國燾於旺堡，再轉保安、毛周又以張國燾的名義調動四方面軍，直接指揮徐向前、陳昌浩繼續「西進」，待九軍、三十軍相繼渡河後，毛又電令其餘部隊留原地迎敵，因此，已渡河的紅軍陷於孤軍苦戰。11月10日，中央軍委將河西紅軍正式命名為西路軍。建立河西根據地。打通新疆，連接蘇聯，原是張國燾的構想，為毛周所反對。現在這個張國燾的「西進路線」卻成為毛周用來消滅四方面軍的手段。1937年3月，渡河的紅軍從兩萬兩千人，打到只剩幾百人逃到新疆。張國燾留在陝北不斷接受批鬥，毛周聯手打倒張的目的總算達到了。（頁513—514）

司馬璐還說，組織上對我們說：「當發現一個同志不可靠的時候，最好是能通過敵人的手把他幹掉。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既可以為我們組織上除去隱憂，又可以增加我們的政治宣傳資料。否則的話，只好我們自己動手了。」（頁126）

毛的一切鬼蜮伎倆的方法論，皆根源於其陰謀哲學《矛盾論》。毛澤東關於《矛盾論》之為用，其精義在一個「借」字，我歸結為「三借」：一曰：「借刀殺人」；二曰：「借題發揮」；三曰：「借頭過關」。

一曰：「借刀殺人」。

.....

（1）先發制人，.....

.....

（2）再後發制人

.....

（3）借刀殺人，各個擊破

.....

A，大痞子唆使小痞子

.....

B，激化矛盾和製造矛盾

.....

C，殺人不見血

.....

D，借斯大林的刀

.....

E，借敵殺己和以毒攻毒

.....

（4），殺人殺個死

毛對你一旦起殺機，要砍你的頭，你央求道：「能否只砍我一條腿，留我一條活命？」他會斬釘截鐵地告訴劊子手：「說砍頭就砍頭，決不能拿原則做交易！」

A「毛真的要堅持『殺人要殺個死』嗎？從毛對鄧小平的處理是『留黨查看，以觀後效』，說明也不盡然。」

用歸納法解決問題，你就必須把天下的事例歸納完，不能有例外，就是要做到「盡然」。這樣來搞「證實」是很難的。另一條思路是舉出反例，僅僅只用一例，這樣來搞「證偽」，倒是比較容易做到的。我為了證明我的結論成立；推翻鄧小平這個例子。就成為必要條件。如果這個例子推不翻，我說毛「殺人要殺個死」的結論將被證偽。

我想了幾條：鄧小平原是毛路線上的人，被稱為「毛派」；他有很大的革命功勞；他參與毛的許多重大罪惡行徑，是共犯；特別是他直接指揮反右，殺氣騰騰，喝知識份子的血以自肥，用知識份子的血染紅頭頂。毛曾想讓他當接班人，只因他和劉少奇走得太近，毛才另選林彪，1967年7月16日，毛曾對中央文革成員王力說：「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鄧出來，鄧至少是常委。」（毛毛《鄧小平『文革』歲月》第46頁）即便在這個時候，毛仍未放棄把林、鄧往一塊捏；鄧小平說：「『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要我跟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同上，第37頁）毛雖把他打成二號走資派，但對劉少奇起殺機時對他並無殺機，所以在八屆12中全會上把劉永遠開除出黨，而沒有開除他。當他曾表態：「一萬年不翻案」，毛說他「人才難得」，讓他第二次復出的時候，他雖曾昧著良心奉迎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批周；給周以致命傷；但他更多的是逆著毛的意志而搞的那許多方面（甚至全面）的「整頓」，直到最後使毛堅信不移，這個「老師的頭兒」（鄧小平）在他死後「要翻天」。這是毛最嫉恨的，因而，毛就對鄧有了殺機。問題也就出在這裡：到底是為了甚麼毛對鄧竟沒有一桿子到底、殺人殺個死，反而會刀下留人呢？這時候再用上面那些理由就解釋不通了。因為，如果他要念上面那些，劉少奇、林彪、彭德懷……都應該刀下留人；甚至右派也不應該反。陳毅就說過，反右是卸磨殺驢，對不住人。這到底該怎麼解釋？難道毛的本性不是「無殺機則已，起殺機就要殺人殺個死」嗎？

解答這個問題，正好就是揭示了《矛盾論》的靈魂所在：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毛從最骯髒方面對此加以利用；總歸他要的所有陰謀詭計，無一例外，都是這個「靈魂」附於實體之表現。

無奈天到這般時候，毛實在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保夕。情況的確如此，以此謂毛的生理生命可，謂政治生命尤可。林彪事件已基本上為文化大革命敲響了喪鐘，毛的身心已大喪元氣，多賴周恩來助紂為虐，毛作垂死掙扎的灰頭土臉方始改觀。凍僵的毒蛇一旦得到復甦，毛這時候就又要批周，批宰相、批大儒、批投降派、批林批孔批周公，都非空穴來風。只是因為，「批周民不依」、「批周必大亂」，才沒敢明批。但在上層內部的批周卻從未休止過。周恩來在死前在醫院同有關人員憤然提到：「他們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歷史上雖犯過錯誤，但幾十年來還是努力為黨、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周恩來的最後歲月》第352頁）。毛是多麼想在全民中搞一場批周運動啊！但這事對他已是「挾泰山以超北海，不能也，非不為也。」同理可證，對鄧小平的未置於死地，也是此時、此地、此條件下的產物：「不能也，非不為也。」

毛陰謀一世，落了個「贊成的少，反對的多」；一輩子以「運動群眾」為能事，而成就「霸業」；到現在，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全國廣土眾民山崩海嘯、風起雲湧，兵鋒直達黃龍府。「四五運動」剛過，毛第二天給華國鋒、王洪文、汪東興說：「廣場，外地，都搞得火熱，

悼念總理，要鄧小平上台，這都是針對我的，要打倒我，我是『豺狼』的後台。」（見前）據說，毛真的變成了他自己說別人的：「向隅而泣的可憐蟲」。他面對著自己過去的「過五關，斬六將」，譬如，對著解放軍的入城式，群眾箠食壺漿以迎王師，他本該趾高氣揚，卻是淚流滿面長歎息！周恩來的秘書說：「毛澤東晚年時，常常落淚，有時不能自己。陳永貴去看他，他握住陳永貴的手，講不出話，淚如泉湧。陳永貴也跟著痛哭不已。毛澤東請常年跟隨他身邊勞累過度而住院的護士長吳旭君看電影，看到解放軍入城，痛哭失聲，以致滿場哭聲，電影未能放完……」（《走下聖壇的周恩來》第128頁）《矛盾論》上說，矛盾向著自己相反的方面發展。玩弄群眾、運動群眾的毛，發展到了相反的方面，嚐到了群眾運動的滋味。陰謀詭計、作惡多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政治性命。這就是必然的規律。「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豪情不見了；「我們是秦始皇的100倍！」的驕橫不見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狂熱不見了；鎮反、肅反、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殺氣騰騰不見了……「俱往矣！」一切都走向了反面，一切都等待著歷史法庭的嚴峻審判。

讓我們還是回到鄧小平，大膽地假設，毛又多活了二年，把局面又挽救了過來，那樣，你想，鄧小平會兇多吉少、死多活少，還是會相反呢？

B 知毛者，莫若鄧小平。

何以這樣說呢？因為鄧有雙重的大經歷：大起大落，能上能下，使他體認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更使他體認到：「翻案大得人心」；而他由「毛派」被貶為走資派，又使他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克服了常人認識的局限性：如果沒有機會入乎其內，則會產生「不是個中人，不解此中情」的局限；如果不出乎其外呢，則又會造成「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情由。就是在這樣一個堅實的基礎上，鄧復出後，才敢開鋼鐵公司，大刀闊斧進行全面整頓，在國人面前故意與四人幫（實即與毛）互別苗頭，甚至我在火車站工作的一位學生告訴我：「車輪旋轉的速度，都可以反映出鄧小平的復出；列車前進時喊著：『老鄧！老鄧！』」這時，鄧小平認定，非如此破釜沉舟不足以在毛後之中國，讓天下人對他歸心。這是他對毛的生命及政治瞭如指掌，因而對毛撮了總，估了堆，才作出的實用主義大手筆。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說：鄧認為「時間，機會對他來說，都太珍貴了」，說他「早已將個人政治前途甚至生命置之度外」。這話是對的，但女兒不一定理解父親的深遠用意；別人當然就更不明究竟了，比如《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先生就指責道：「不過以筆者之見，時間，機會固然難得，稍縱即逝，但慾速則不達，導致後來政治上的大翻車，豈不更可惜？而且對於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來說，僅僅不怕被打倒是不夠的，還必須考慮個人的進退攸關整個大局，否則只是一種匹夫之勇，不足以成大事。」

「事實上，正是因為鄧小平在推行『全面整頓』時不知戒急用忍，一味逞強躁進，急於抓出成效來，結果被黨內文革派抓住不少『辮子』密報給毛澤東，從政治上殺回馬槍過來，最終導致大局逆轉。」（第581頁）

「鄧小平不成熟」？這種評論真是隔著門縫看扁了鄧小平！鄧小平對於這一層，恐怕會不止一思、再思、三思吧！舉世公認的成熟的政治家周恩來卻是說鄧比他幹得好啊！不過，二人是各有各的「矛盾論」。周恩來他總是以「毛」之矛，攻「毛」之盾；而鄧卻不時以「鄧」之矛，攻「毛」之盾。讓我舉例說明：鄧在反高崗、饒漱石中是嶄露頭角、立了頭功的。高饒反的是劉少奇、周恩來，反的內容也正是毛要反的，所以高饒實際上是毛的人。鄧反高饒是違背毛的原意的。鄧為甚麼要反呢？又為甚麼能取勝呢？簡單說：高饒如果得逞，對於鄧的仕途將是一個莫大的阻力；維護劉、周於他仕途有利，這就是鄧要反的原因。而他所以能取勝，是高饒陰謀篡權的把柄落到他手裡，同時，他深知毛是陰謀家，卻最嫉恨他身邊有像

他一樣謀權的野心家。這樣一來，高饒「刮陰風、燒陰火」（毛澤東語），徹底完蛋；劉周受到高饒攻擊的錯誤因中毛意，所以毛還要他們檢討；與此同時，毛也不得不失掉心腹干將；所以我說全盤皆贏的鄧小平，是有勇有謀的成熟的政治家。我的另一個意思是說，他吃透了毛，並高於毛。比如說，大躍進他是跟毛的；批判大躍進時他則是跟劉少奇的，二人同聲相應地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難道他不是明明知道這是非常觸怒毛的嗎？這一點是政治平庸如我輩者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我們推斷，大概是鄧看透毛錯誤的嚴重性及品質非常惡劣，已失去黨心、民心，政治上走下坡路，劉的威望正在升高，在全國、全黨已營造成功的「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的政治心理氣氛中，劉鄧合手，毛已基本上被架空，成為一具偶像。{在這裡，我剛從《觀察》網站看到一個信息，是周恩來死前的談話記錄，證明我以上推測是對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編者按：即七千人會議）。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編者按：指毛澤東）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老總、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澤東辭去主席。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但是，天有不測風雲！毛不按牌理出牌。任誰也想不到毛寧肯發動一場反黨武化大革命政變，拼上老命，拼上亡黨、亡國、千百萬人頭落地，也要把旁落的統治權重抓在雙手瀝血的魔掌之中。鄧根據黨史形成的規則和程序，就只能估計到，毛最好的歸宿是他們為他安排的中共名譽主席。這便是我們能設想到的當時鄧的所思、所為、所據。與此相反，周恩來是既不會這樣想，更不會這樣做的。

周打的是另一路拳。他是怎樣在毛連續攻擊之下敗中求存呢？他採用的致勝之道是甚麼呢？就是「敗狗戰略」。在他的十八般武藝中，最拿手的一件是「檢討」。他是領袖人物中檢討最多的一個。毛在他奄奄一息時還要通過「檢討」來降低他的威信。但他總能以「心誠則靈」的檢討「回敬」毛，結果是毛周雙「贏」。周的民望如日中天，毛則成強弩之末；《文匯報》僅僅透露一絲批周的風聲，全國的讀者便是聲聲討伐：這可算一明證。上面我們就是用毛不敢明批周這一道理說明：毛為甚麼沒敢置鄧於死地？接著我們還要用毛採取殺人不見血的手段，最終置周恩來於死地這一事實，來說明毛是堅持要「殺人殺個死」的。《晚年周恩來》一書，提供的就是字字有據、字字滴血的鐵證：

「在年初大病一場以後，急於安排後世的毛澤東非常擔心自己活不過周恩來，而一向在政治上態度曖昧的周恩來如果在他身後帶頭翻文革案的話，以周在黨內外的聲望和手段，一呼百應，失去了庇護的黨內文革派根本不是對手。這就是毛隨後在周治病問題上的態度，讓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機的緣故。

「周恩來是在 1972 年 5 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規檢查時，偶然發現尿樣中有幾個紅血球和形態異常的細胞。周的保健醫生不敢掉以輕心，馬上又做了第二次檢查，請北京各大醫院最著名的細胞病理學、泌尿、腫瘤專家對檢查結果進行會診鑒定，確診周恩來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因為事關重大，醫療專家們爭分奪秒，隨即派人聽取天津、上海兩地專家的意見，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與此同時，專家們又翻閱了國內外大量的參考資料，開會進行討論，認為周恩來本人目前沒有任何症狀，病變尚在早期，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癒率，而一旦錯過時機，發展成晚期膀胱癌，後果是嚴重的。

「根據討論的意見，醫療專家們隨即向中央寫了書面報告，詳述周恩來的病況，力陳爭取及早治療的好處和疾病發展的不良預後（這是專家們的委婉說法。實際上，膀胱癌一旦錯失早

期治療，結果只有等死——高文謙注），並制定了切實可行的治療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為按照中共黨內保健制度的規定，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的治病方案，必須經由毛澤東批准後才能實施。

「然而，毛澤東的表態卻令人感到十分蹊蹺。他通過汪東興向負責周恩來保健的醫療專家們傳達了四條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

「醫療專家們深知時機對於治療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對中央作出這樣的決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寫信向毛澤東陳情，卻遭到了顯然是深知內情的汪東興的阻嚇。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們談話，讓他們先『穩住』，強調中央這樣的決定是『保總理』的，說：你們要聽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慮全面的問題，可能過一段時間再看。

「這樣一來，對周恩來的治療工作便拖延下來，失去了早期發現後及時治療的先機，等到後來一切都已經晚了。這讓醫療組的專家們後悔莫及，覺得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不過，由於這件事涉及到毛為人品質中最惡的一面，明擺著把周推上死路，時至今日仍然三緘其口。大陸官方更是諱莫如深，惟恐這種殺人不見血的事情揭露出來，損及毛的『偉大形象』。」（第377—379頁）

說明毛澤東不敢公開批、就內部批，明殺不成、就暗殺，向人借刀不成、就向癌細胞借刀。總之是「殺人要殺個死」；難道這還需要我再著一字嗎？

（5），卸磨殺驢

陳毅對反右派運動很有意見，說這是「卸磨殺驢」，對不住朋友。這些朋友曾為共產黨奪取政權衝鋒陷陣，貢獻了人力、物力、財力、軍力、道義力量，確實為共產黨拉了套。其實，仔細想來，毛殺害的劉、林、周、陶、彭、賀……一大批共產黨人及黨外統戰人士，誰沒有拉過套呢？這些內容前面已經說過，後面還會提到，這裡就暫不多說了。值得提請引起深思的是，兩點：一是想一想周恩來這樣的老黃牛都逃不脫毛的屠刀，你還要設想毛會對右派情有獨鍾嗎？可就有人冒充「糊塗」，今天還在網上說甚麼毛的確開始並沒打算反右，只是真的冒出許多右派言論如「平反委員會」……這和說毛搞文革是為了摧毀黨內官僚體制，開始並無意害劉一樣，都是「沒」認識到毛的心是多麼黑，手是多麼毒！因而起到了美化毛的動機的作用。前述，四川省委張宣傳部長出於愛黨而揭露出毛髮動文革的真正動機的罪惡性。還有一個人，就是王明，我在文革時偷聽蘇聯電台，聽到他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毛澤東發動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變》，其中，指明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是：「活著不被打倒，死後不被清算。」這也就說明了毛為甚麼要讓許多人（比如周恩來、田家英等）一定要死在他之前？很自然的，他如有可能，會讓鄧小平死在他之後嗎？人們所奇怪的，連讓劉少奇活著當個農民也不讓；謎底不就昭然若揭了嗎？從這裡引出另一點，就是要你想想這些有汗馬功勞的元勳們的下場，然後及於自身：光憑你替共產黨撒了撒謊、捧了捧場，就想撈到稻草嗎？「妄想」是你的權利，不過我要提醒你，可別在臨死前學吳晗咬破舌頭，寫四個血字——「悔不當初」——啊！

二曰：「借題發揮」。

常態的人生，總是逢山開路、遇河架橋，順理成章地解決問題。毛澤東的一生則總是借題發揮。所謂「借題」，就是製造藉口找說詞；所謂「發揮」，就是小題大作、興師動眾。比如，藉著胡風給中共中央的一封關於文藝問題的上書，毛澤東就親自動手打出個「胡風反革命集團」來，共抓出2100餘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檢查73人。最後，正式定為胡風

反革命集團分子 78 人，劃為骨幹分子 23 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懲處，胡風本人判刑 14 年，剝奪政治權利 6 年，文革中加為無期。毛死後，落實政策的結論則是：全屬無辜受害。

(1)，毛還要讓「借題發揮」滾雪球，而成為一環扣一環的鏈條。這原是出於權謀的考量；又因因果循環，造成了情勢：「借題」已屬不正派，但毛總是硬將「謬論」變「真理」，故而，只有求助於，第一巴掌的錯打要用打第二巴掌來「證明」該打；接連用第三巴掌、第四巴掌、第五巴掌……繼續沒完沒了地證明下去。

A，以子虛烏有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出現為藉口，借題發揮，又開展了一個造孽更加深重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即肅反運動，並且還規定了反革命占 5% 的基本估計，而使肅反嚴重擴大化。

我當時 22 歲，在解放那年初中畢業，算是歷史清白，可因家庭問題，在肅反中整得我死去活來；又因沒有查出我個人的任何問題，所以沒有給處分，當然我也就不屬於「擴大化」的範疇了；我甚麼都不是，只是落個「鬼剃頭」，醫學上叫做「斑禿」，就是頭髮呈星羅棋布，圓片狀脫光；身上也出現一條條的紅道道，奇癢難忍。醫生說是「神經性皮炎」，並偷偷告訴我：「是嚇的！」而那些後來劃為右派的肅反對象就不像我那樣幸而只是一場虛驚了；他們受足了人間苦罪！

到反右時，說我對肅反不滿，就又成了劃我右派的一條罪狀。這非但是我，而且是很大一部分人劃右派的原因。這個「不滿肅反」，和不滿鎮反、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以及農業手工業合作化、私人資本主義改造，合起來就叫做「反對五大運動、三大改造」，誰佔其中之一者，就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

B，毛利用反右派鬥爭搞借題發揮滾雪球，可就滾出了天字第一號的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篡改黨和國家的總路線，毛按著權力私慾來確定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劃定某人的階級屬性，進一步再胡謔個「階級鬥爭為綱」，於是便想打倒誰就打倒誰。這樣就導致毛澤東把黨內外的大多數人置於自己的對立面，他自己就真正成為了「一小撮」。

李志綏醫生說：「毛往後所有的政治行動—共產黨整風、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全是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總路線而做的出擊。」（《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 173 頁）「八大」的總路線是甚麼？是：「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 117 頁）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稱之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但毛澤東不以為然，他認為「八大」的決議是錯誤的，還堅持回到七屆二中全會的提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雖然在 1957 年五一節前夕，毛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各民主黨派及知識份子時說：「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向自然開戰，」隨後，歷史真相就已經大白，這是陰謀家拋出的劇毒蜜餌，導致巨大的魚群中毒而亡。毛澤東一石投二鳥：一是毛自稱的「釣大魚」、「引蛇出洞」、「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陽謀」得逞；二是藉口反擊右派的「猖狂進攻」，進而證明仍然存在著「尖銳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以推翻「八大」的決議。從此出爐了一系列鼓吹階級鬥爭的文章。

這些文章中，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是《人民日報》6 月 8 日的社論《這是為甚麼》，指出寫恐嚇信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一個月後毛在上海講：「這次反右派鬥爭的性質，主要是政治鬥爭。階級鬥爭有各種形式，這次主要是政治鬥爭，不是軍事鬥爭，不是經濟鬥爭。」（《毛澤東選集》五卷第 445 頁）在青島會議期間寫了《1957

年夏季的形勢》，劈頭寫道：「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中間指出：「和城市一樣，在農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會主義或者是資本主義，這樣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個鬥爭，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取得徹底勝利。這是整個過渡時期的任務。」（同上，第 456，458 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寫道：「（1958 年）5 月 5 日至 23 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還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輕率地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的正確分析，認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就為階級鬥爭擴大化提供了理論根據。」毛「認為我國當前還存在著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和資產階級右派；另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兩個勞動階級（工人、農民）。（第 123 頁）。對這些無稽之談，暫且存而不論，倒是首先證實了李醫生關於毛要推翻「八大」總路線的正確論斷。如果從這樣一個迂迴曲折的深度來論述：反右是「毛想利用知識份子將他的黨內敵手整一整」（，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 190 頁）也是不無道理的。但是，如果說，「其實毛開始時是想借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產黨整風，目標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第 195 頁）這就錯得太離譜了。一則在毛的眼中，知識份子（包括為共產黨賣了命的李公僕、聞一多）都是民主個人主義者，是他實行專制獨裁的主要障礙物，是他的眼中釘、肉中刺，是定然要拔除的，也就是說，右派是一定要反專制獨裁的。對反右的起因，我是圍繞著「匈牙利事件」進行論證的。而有的人說：「許多書刊、文章多將當時的國際形勢—由蘇共『20 大』引發的『匈波事件』以及國內形勢—各地爆發了許多起的罷工、罷課和上街遊行事件這些表面現象，視為『反右運動』的起因，認為是毛澤東『錯誤地估計階級鬥爭的形勢』而引致擴大化的錯誤。其實『反右運動』具有更深層次的因素，即這是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在上層建築領域的發展，即使沒有『匈波事件』和國內的罷工遊行，也是必然要發生，遲早要到來的。」（馮治軍《毛澤東與鄧小平》第 213 頁）我認為說得好！比我分析的深刻。二則，「反冒進」是甚麼性質的事件？人民日報社論說是對右派做的「可恥的內應」。毛認為是「離右派只有 50 米」。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民主黨派、知識份子，尤其是右派份子，大多是「反冒進」的，而不是擁護毛澤東「反『反冒進』」的。請看我的例證：人民日報載，全國工商聯主任委員陳叔通 1957 年 5 月 16 日發言：「希望領導上認真總結一下是保守思想對社會主義造成的損失大，還是盲目冒進造成的損失大。」22 日，羅隆基就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還是「冒進」這個問題發言，他認為，從 1956 年以來主要是冒進，而不是保守。這不是哪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哪個部的問題，而是全部的冒進。張奚若、陳銘樞等指責毛澤東「好大喜功」更是使毛長久地耿耿於懷，毛說，好大喜功，看是好甚麼大，喜甚麼功？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裡也有兩種：是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還是合乎實際的好大喜功？我們是好六萬萬人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這種胡攪蠻纏的跪辯，令人難辨他是厚顏無恥而可惡，還是理屈詞窮而可憐？千萬別讓我們聽到如法炮製的狡辯：「是革命派的厚顏無恥，還是反動派的厚顏無恥？我們厚的是無產階級之顏，無的是馬列主義之恥。」

6 月 10 日《瀋陽日報》刊出張百生、黃振旅的文章《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課題》，說：「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面冒進」。例如農業合作化，「我們的農具同兩千年前沒有甚麼兩樣，就這樣一窩蜂似的組織起來，很多是變相的強迫命令，幹部水平低、工作混亂、非生產人員增多、生產積極性降低（比單干時）等毛病就在所難免。」

1958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報載：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言說：「黨內外的右派份子利用我們工作中的個別缺點，大事向黨進攻。說『500 萬畝水地是人命換來的』，是『秦始皇磨民』；說 1956 年各項工作都『冒進』了，

這些『都是領導上的腦袋發熱造成的』；說批判『甘肅落後論』是『無的放矢』；說 1956 年春召開的區委書記會議是一個『冒進』會等等……。經過全民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特別是經過了傳達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在黨內清除了孫殿才（原省委常委、副省長）、陳成義（原政法黨組書記、副省長）、梁大均（原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情況大變，一個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前邁進。1956 年的水利工程六個多月的成績就等於 1957 年的十倍。原來準備十年基本上擺脫乾旱威脅的願望，現在看來，只要苦戰三年就可以實現。」

1958 年 7 月 15 日人民日報載：廣西反出的黨內右派集團，從 1956 年 6 月開始，「就打著『反冒進』、『反主觀主義』的旗幟，極力詆毀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生產取得的巨大成就，攻擊黨的領導，進行破壞團結的活動。1957 年 6 月，中央宣佈處理因災餓死人事件時，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發展到最高峰。硬把因災餓死人事件說成是合作化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所帶來的惡果，併進而全盤否定廣西的工作成績，認為黨在農村工作上『犯了路線錯誤』，要求『重新估計農村工作』，要省委『肯定錯誤』。」

1959 年，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在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中問及「你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話對嗎？」毛答：「一切事物都有兩重性，這話也有兩重性，對，怎麼樣？不對，又怎麼樣？」李說：「如果說對，那就意味著精神的力量是無限的，就是主觀唯心論。」這時毛看到旁邊有人在暗暗制止李達，便氣呼呼地說，「不怕，說吧，不劃右派！」由此可見，把反冒進的人和觀點，毛是將之劃歸於右派的。毛澤東認為「反冒進也促進了右派的進攻。」周恩來順著毛的思路，作檢討說：「反『冒進』的錯誤是嚴重的，幸而由於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及時糾正，還由於這些錯誤受到黨內外幹部和群眾的抵制，同時，也由於資產階級右派從反面教育了我們。因此，才使這個錯誤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得到糾正，沒有繼續發展成為更嚴重的錯誤。1957 年春天，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向黨猖狂進攻的時候，他們利用反冒進的錯誤，全面否定 1956 年的建設成就，把 1956 年躍進中的某些缺點，擴大為『全面冒進』，併進一步否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成就。在這個嚴重的階級鬥爭面前，我開始覺悟，因而在 1957 年 6 月政府工作報告中，徹底拋棄了對 1956 年建設『冒進』的錯誤估計，堅決肯定了 1956 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這是一個認識上的轉折。這是從敵對方面得到的教訓。」（轉引自《周恩來與毛澤東》第 398 頁）。這在說明，民主黨派、知識份子反毛澤東的冒進的。是與反冒進的領導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毛澤東怎麼會利用他們、他們又怎麼會去整「那些『反冒進』的領導」呢？這正好是把事情說了個相反。毛澤東對這一點很清楚：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是反冒進的社會基礎，所以只有反右之後，反「反冒進」才能奏功；同時，他對反冒進的人，也以「右派」相預倣，相歸類——據毛說，兩者相距只有 50 米。這也是借殺右派之刀，殺向「反冒進」者，而且使後者無還手之力。

C，批周恩來的「反冒進」，只是毛批周「借題發揮」大鏈條中的一個環節。王若水在《新發現的毛澤東》一書的第八章中有詳盡的說明：

在 1957 年 9 月到 10 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開始指責 1956 年的反冒進。他說，1955 年來了一個高潮，1956 年吃了虧，來了一個右傾，來了一個鬆勁，掃掉了一個「多快好省」和「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給右派進攻以口實（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 349 頁）共產黨應該是促進委員會，只有國民黨才是促退委員會。這是毛第一次對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務實派的批評。會後，人民日報在 11 月 13 日社論中要求批判右傾保守思想，說有右傾保守毛病的人，「像窩牛一樣爬得很慢」，「這是把正確的躍進看成了『冒進』。」社論還號召：「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躍進。」

11月2日至21日，毛澤東率領中國代表團到莫斯科去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大會，赫魯曉夫在會上宣佈了蘇聯的雄心：要在15年內趕上或超過美國。

好大喜功的赫魯曉夫刺激了另一個好大喜功的毛澤東。他在會上建議赫魯曉夫再加把勁，用十年的時間在主要經濟指標上超過美國。他用這種形式來暗示蘇聯的勁頭還不夠足。至於中國，毛說：「我們15年超過英國。」（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第163頁）

其實毛澤東的真正目標不是英國，而是蘇聯。蘇共已在內部確定了一個沒有宣佈的目標：從1959年起，在12年內（即到1971年）達到共產主義。毛澤東正要同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中國的經濟建設怎能落在蘇聯的後面！

然而，八大通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和周恩來主張的反冒進方針，對雄心勃勃、急於求成的毛澤東無疑是一個障礙。

年底，毛澤東到華東去了將近一個月，其間，還在杭州召開會議。會上表揚了安徽的治淮工程，並用這個例子來批評右傾保守。他說，安徽人民1957年一個冬季就搞了16億土方，超過過去七年，說明原來的計劃低了，保守了，應該批評右傾保守。批評右傾保守就很舒服，越批評越高興，要愉快地批評右傾保守。毛還採取了一個異乎尋常的辦法：指名道姓地批評了周恩來。（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637頁）

從八大以後，毛管的事可是越來越多了。一是反右派，一是批判反冒進。這兩件大事都是他親自抓的；接著就是大躍進、人民公社。第一個五年計劃，毛自己也知道沒有經驗，所以他開始時沒有多插手。後三年開始插手，「以農業的躍進促進工業的躍進」，結果弄得國民經濟失衡，在反冒進中窩了火。現在要開始第二個五年計劃，他要親自出馬了。為了證明工業並非高不可攀，他當然要表現出，由於他的領導，中國經濟面貌立刻大變。從八大後，毛髮動了一個又一個對所謂右傾保守思想的攻勢，矛頭指向周恩來等人。他必須貶低別人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績，以此顯示出自己的高明。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是這場緊鑼密鼓的第一個高潮。毛找了九省二市的第一書記參加，後來加上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會議的重點是反冒進。會上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條》，印發了周恩來、李先念的反冒進言論作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更加嚴厲地批評反冒進，批評周恩來和陳雲。會上氣氛緊張，毛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洩了氣，六億人一洩了氣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錢，要不要反？這些東西要反，但反冒進首先沒有把指頭弄清楚，十個指頭只有一個長了瘡，就只講一個長了瘡的指頭。十個指頭問題要搞清楚，這是關係六億人口的問題，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要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洩氣？如果當時不提反冒進，只講一個指頭長了瘡，就不會形成一股風，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條綱要、促進委員會這三個東西。這些都是屬於政治問題，而不屬於業務問題。

1月12日，毛說：我就怕六億人民沒有勁。不是講群眾路線嗎？六億人民洩了氣，還有甚麼群眾路線？看問題要從六億人民出發。又說：我對分散主義的辦法是消極抵抗，還要小會批評，當著眾人批評。小範圍不行，就開中央全會，總要有點壓力。毛還尖銳批評了印發的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說這篇社論講，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說沒弄清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是資產階級的方法；社論中引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的幾句話來說明反冒進，「是用毛澤東來反對毛澤東」。他在這篇社論上批注：「不看」、「庸俗辯證法」、「庸俗馬克思主義」、「尖銳地針對我」。

1月14日說：反冒進傷了很多人的心。水利、辦社、掃盲、除四害都沒勁了。

1月15日，毛澤東搬出「用地方壓中央」的辦法，大大表揚柯慶施。說柯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黨代會上所作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很好，要大家學習「柯老」。這個報告把中央許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許多同志不動腦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裏羅列事實。16日，毛澤東又拿出柯文，當眾問周恩來：

「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周恩來回答，我寫不出來。

毛接著說，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沒有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激情，是寫不出這樣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693頁）

周恩來在19日晚上作了檢討，說：反冒進是一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並表示他對錯誤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寫到：「攻其一點或幾點，儘量誇大。不計其餘。這是一種脫離實際情況的形而上學的方法，1957年右派份子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用的就是這種方法。我黨在歷史上吃過這種方法的大虧，」「人有十個指頭，要使幹部學會區別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上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不平衡是普遍規律。從不平衡到平衡，又從平衡到不平衡，循環不已，永遠如此，但是每一個循環都進到高的一級。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

南寧會議，確定了今後不再提反冒進，進一步肯定了毛澤東的不受約束的權力。毛後來也承認，如果沒有南寧會議，搞不出總路線來。（《毛澤東思想萬歲》第251頁）

「宜將剩勇追窮寇」，毛不善罷甘休，於是，又有一連串的會議，繼續批判反冒進。

2月18日，在北京召開政治局的擴大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當天，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親筆寫的社論《反浪費反保守是當前整風運動的中心任務》。毛在會議上說：不要一講缺點，就搞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中國六億人口、1200萬黨員，能沒有一點缺點？反冒進反得那麼厲害，把群眾的氣洩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進攻，群眾的氣就不高，我們也倒霉。我們這些中央委員，你就那麼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毛說，右派把你們一拋，拋得跟他們相距不遠，大概50米遠。又說，如果說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或者是反馬克思主義，而反冒進是馬克思主義，那馬克思主義就在中國變了樣子，把搞得少的叫馬克思主義，搞得多的不叫馬克思主義。我不贊成反冒進叫馬克思主義，贊成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這個冒進好嘛，使農民多搞了水利嘛！毛還說：今年下半年你們就看到要有一個大冒進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還要厲害。

陳雲、李先念和薄一波紛紛在會上作檢討。毛又擺出寬大的姿態，說，南寧會議還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過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緊張，先念同志現在還睡不著覺，吃安眠藥。何必那麼緊張。今後還是靠你們這些人辦事，此外沒有人。

陳雲講到分散主義問題時，毛澤東插話說：

政治設計院究竟在哪裏？章伯鈞說國務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滿意，他要有權參與設計。我們政治局委員可不可以參與設計呢？過去這個五年計劃，實際上是無權參與設計。我是主席，也沒有參與設計。每年的年度計劃，總是請你簽字，叫做強迫簽字。我有個辦法，不看。你強迫我嘛，我事先沒有預聞，事先沒有接觸嘛。老是在國務院討論，總是拿不出來。千呼萬

喚不出來，為甚麼不出來呢？說沒有搞好，等到梳妝打扮一跑出來的時候，我們說不行，時間遲了！這事實上是一種封鎖。

毛還批評說：有人想把大權攬過去，讓黨委搞點小權。這樣就沒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於黨委、政治局、書記處，只能有一個核心。毛重申要「大權獨攬」。

周恩來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作了自我批評，說：在經濟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問題沒有及時地向中央請示匯報，即使請示報告了，也是材料數字一大堆，使中央來不及進行仔細的分析研究。

再接著三月份的成都會議。毛在會上作了六次講話，多次批評反冒進。「反冒進是個方針性的錯誤，南寧會議提出了這個問題，有許多同志緊張，現在好了。講清楚的目的是要使大家有共同的語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絕無要哪個同志不好混之意。」

他在3月9日說：「兩種方法的比較，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南寧會議批評了『反冒進』的錯誤。究竟應該採取哪一種，我看應該採取『冒進』。很多問題都可以這樣提，例如除四害，一種方法是除掉四害，一種方法是讓四害存在，除四害也有兩種路線，有快有慢，快一點能除掉，慢一點除不掉。執行計劃，一種方法是十年計劃、二十年搞完，一種是十年計劃、二三年搞完……。兩種方法要比較。苦戰三年，改變面貌。但『一天消滅四害』、『苦戰三天』，這就不是馬克思主義了。」「以後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反冒進這個口號不好，吃虧，打擊群眾。反右傾這個口號為甚麼不打擊群眾呢？反右傾所打擊的就是一部份人的官氣、暮氣、嬌氣、驕氣，一些人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些東西應該加以打擊。」

3月19日，成都會議期間，毛為重印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部份按語寫了說明，其中說：「我們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料到1956年國內方面會發生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把反冒進與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匈波事件和右派進攻相提並論。而且，在3月25日的講話中和在王任重發言時的插話中，也反覆說這兩個「沒料到」。（這裡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李醫生說毛本意並非要反右，而是要借用知識份子鳴放來整那些「黨內敵手」，那些「反冒進的領導」，這是和說毛想利用知識份子去打倒赫魯曉夫或鎮壓匈波事件的鬧事者一樣，是太過離譜了。李醫生為甚麼會這樣？下面的情況很能說明問題：「毛同我談到反右派運動的情況，問到我醫學界的反右。我毫無所知，回答不出。毛詫異地說：『你可真是「山中不見人」了，你到協和醫院去看看那裏的大字報。那裏有你的老師和同學，同他們談談，回來告訴我』。」（《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202頁）原因找到了，是他太缺乏對「山外」的接觸，受到只入乎其內、不出乎其外的局限所致。——紫丹）

3月20日毛又說：「搞社會主義有兩條路線。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還是轟轟烈烈、高高興興好？」「一潭死水好，還是不盡長江滾滾流好？」

4月上旬，毛還說有些人是「觀潮派」、「秋後算帳派」，如果今年得不到豐收，還會有人出來說「我早就有先見之明，還是我的對」。到那時又會刮颱風的，黨內中間偏右的人是觀潮派。

針對周恩來的「穩妥可靠」，毛澤東批評說：所謂穩妥可靠，結果是既不穩妥，又不可靠。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老是穩、慢，就會出大禍。快一點就會好些。對「穩妥派」的辦法是到了一定時候提出新的口號，使他們無法穩。毛為了使冒進變成可取的，就換用了「躍進」這個

名詞，說：「冒進」是「穩妥派」反對躍進的口號，我們要用「躍進」代替「冒進」，使他們不好反對。

毛在修改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做的工作報告時，加了一段話：「一個馬鞍型，兩頭高，中間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產戰線上所表現出來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也即躍進——保守——大躍進，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嗎？馬鞍型教訓了黨，教訓了群眾，」

周恩來在會議上，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在經濟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問題沒有及時地向中央請示匯報，更沒有經常地系統地向中央反映情況。即便請示了，報告了，也不是「毛毛細雨」，而是「傾盆大雨」，材料數字一大堆，使中央對於需要作出決定的問題，來不及進行仔細的分析研究。周恩來在開始準備這個發言稿時，他說一句秘書記一句，有時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話來；秘書建議自己走開，讓周恩來安靜地構思，秘書走開後，周獨自在辦公室坐到凌晨兩點多。後來還是在鄧穎超的勸說下，周恩來口述，秘書整理成文。在秘書整理的稿子中，有一句「我和毛主席風雨同舟，朝夕與共」，周恩來刪掉這句話，他嚴肅地對秘書說：在延安整風後，可以這樣說；整風前，他和毛主席的關係不能引用這句成語。「這說明你對黨史知道得太少！」他說這些話時，幾乎流下了眼淚。（可見周知道，毛對他的「借題發揮」是源遠流長、沒完沒了的——紫丹）秘書發現，在起草這個檢討的十多天裡，周恩來的頭髮又白了不少。（《廬山 1959》第 132 頁）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毛要把周的總理撤下來給柯慶施干，只是別的中央領導人都通不過，才算作罷。

1958 年 5 月 26 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及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其他同志的信中不無得意地說：「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毛總是強詞奪理，就像他把「陰謀」改成「陽謀」就自以為得理一樣，現在他用「躍進」來代替「冒進」就又自以為理直氣壯了。其實不然，這樣做，絲毫也掩蓋不了他原本的無理，相反，卻暴露了他原本的無恥——紫丹）

毛澤東到底為甚麼要如此大動干戈、反反覆覆強調批判反冒進呢？（上面這些，夠得上是懶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了吧？其實，我從該書該章摘抄中，還刪去好多重複的絮道和海闊天空的哲學議論呢！）一句話，是為了他個人的大權獨攬；包括想打倒周恩來，以及隨後更大的「借題發揮」滾雪球。

但是。對毛批「反冒進」的「借題發揮」，認識至此，還只能算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二是，這裡面還包含著毛的更加勃勃的政治野心，第八章的題目可謂是畫龍點睛之筆，一語破的之言：「誰將是國際共運的領袖」？從此我們看出，毛開始了他類似當年在井崗山的，如今卻是在世界範圍內的要當國際「山大王」的征程。

（2），慾加之罪，何患無詞？

問題的重心在於，毛對人總想「慾加之罪」，而後置於死地。

A，茲舉其犖犖大端：

毛當權初期，宣佈安定人心的政策，一些在逃的地方紳士、保甲長、地主富農分子、國民黨下層黨政軍憲人員……紛紛響應，返回家鄉，向當局報到，希望被恩准安居在家，老實生產。原本在家等死的，聽了政策，也以為有了活頭。

風雲突變，所有媒體大事宣傳糾正「寬大無邊」的右傾思想；還編造謊言，說群眾反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講寬大。」一夜之間，出動大量軍警搜查逮捕：一網打盡，一個跑不掉！我所在的城市，第二天，居民探頭探腦打開街門，互相打聽鄰居「都逮走了誰？」血色恐怖，人人自危。

你經過「鎮反」嗎？就是把「反革命」一汽車、一汽車拉出去槍斃！全國數以百萬計地關、管、殺！

在清除國民黨的「殘渣餘孽」的同時和之後，矛頭也對準了知識份子。這裡僅對其「借題發揮」的「題」，點到為止，不再展開。1950年7月，江青多次提出批判《清宮秘史》；8月開始，上海商務印書館將50餘年出版的一萬五千多種書籍，先後在「肅清資本主義社會反動思想及封建思想出版物」的藉口下，毀去絕大部份，只剩下不到一千種；1951年2月毛為人民日報寫社論《應當重視武訓傳的討論》；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學校教職員和高中以上學生中普遍開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後擴展到整個知識界；1954年9月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發表李希凡、藍翎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毛很讚賞，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一封信》，並批評壓制小人物，也指出，《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影片」。隨後開展了對文藝界領導以及對紅樓夢研究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傾向」的批判，並改組《文藝報》編輯部；1955年5月，由於胡風上書中央，遭迫害，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三批《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其中大量為私人信件，毛親寫序言和按語；1957年2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3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繼續鼓勵大膽批評共產黨；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並熱誠號召黨外人士幫黨整風；月底，毛在天安門城樓最後一次鼓勵黨外愛國人士幫助黨整風；5月在黨內高層，秘密傳閱毛文《事情正在起變化》，佈置引蛇出洞；6月起草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抓住匿名信，8日，為人民日報寫社論《這是為甚麼》，在全國猛烈開展反右派鬥爭；7月為人民日報寫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提出流氓無賴的「陽謀」說，在上海幹部會議上講話《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青島省市書記會議寫出文章《1957年夏季的形勢》，國務院通過《關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參加整風運動和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的決定》硬性規定，都必須參加，從前黨中央和毛主席說的參加和退出完全自由，就這樣一來，統統算是沒說，知識份子活該上當；在這期間，各媒體發表了像飛蝗遮天似的文章，都是在「擺事實，講道理」的幌子下扯謊撻炮、血口噴人；8月公佈《關於勞動教養的決定》，就算是挖掘好了活埋右派份子的墓坑。

B，從對「一封匿名信」的借題發揮，我們來解剖毛澤東這只麻雀

「這是為甚麼」——《人民日報》的這篇社論，掀起了一個全國規模的迫害知識份子的腥風血雨的反右派大運動。有些人總喜歡賣後悔藥：「要不是那封給盧郁文的匿名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實行下去，該是多麼美好啊！」這話實在讓我感觸良深，不得不誠勸諸君：「再也別賣這種後悔藥了！」此前的「反胡風」運動，就有人說：「要不是他給中央寫30萬言書，怎會鬧出那麼大的禍事？」此後的廬山會議，反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又有人說：「要不是彭德懷給毛主席上萬言書，會議原定是反左的呀！」直至毛生前發動的最後一場運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面對著毛的這場垂死掙扎，也還是有人說：「劉冰給毛主席的信，控訴遲群、謝靜宜的腐化墮落，專橫跋扈，幹嗎要由鄧小平轉交？主席當時就在北京嘛！讓他老人家誤認為矛頭是指向他的，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說到借「信」為題，我乾脆循著前面的思路把問題扯得更遠大一些，把它的荒謬性放到顯微鏡下。這個問題就是，

要不是蘇共中央 1963 年 7 月 14 日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怎會惹瘋了中共給他來個「九評」呢？這個問題遠大到足以影響蘇聯解體、東歐易幟、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瀕於滅絕。「九評」的第一評是《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開宗明義說道：「蘇共領導發表這封公開信和隨後採取的一系列行動，已經把中蘇關係推向破裂的邊緣，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推到一個空前嚴重的階段。」現在我們已經看清：不管說一千條理由、道一萬條理由，而九九歸一的一條是，毛澤東要跟赫魯曉夫搶世界領袖斯大林的這個老盆，才是中蘇鬧反、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分裂的根本原因。斯大林說，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毛澤東說，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美帝國主義運用馬列主義的原理，促成世界格局的改變，乃兆端於此。

所以，就「信」說「信」，只能知其表而不知其裡。還是讓我們返回本題，來看看毛澤東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這是為甚麼》，是怎樣出籠的吧！

據參與其事的原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回憶：「6 月 7 日，毛澤東主席找胡喬木和我到他家中談話。當我們一起到他臥室時，發現沒有其他人參加這次談話。

「我們剛坐下來，毛澤東主席就興高采烈地說：今天報上登了盧郁文在座談會上的發言，說他收到匿名信，對他攻擊，辱罵和恫嚇。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發動反擊右派的好機會……

「毛澤東主席說：這封恐嚇信好就好在是黨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員；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個有名有姓的人署名。當然署名也可以作為一股勢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們廣泛地聯想到一種傾向，一股勢力。本來這樣的恫嚇信在舊社會也為人所不齒，現在我們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這樣的恫嚇信就顯得很不尋常。過去幾天，我就一直考慮甚麼時候抓住甚麼機會發動反擊。現在機會來了，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動反擊右派的鬥爭。社論的題目是《這是為甚麼》，在讀者面前提出這樣的問題，讓大家思考。雖然社論已經把我們的觀點擺明了，但還是要讓讀者有個思想轉彎的餘地。魯迅寫文章常常是這樣，總是給讀者留有餘地……」（宋連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始末》）你只用玩味一番他說的「我就一直（！？）考慮甚麼時候抓住甚麼機會發動反擊」這一句話，就可茅塞頓開，作出清醒的判斷：抓匿名信，只是借題發揮；要反擊，這一點是板上釘釘子，定死了的。產生任何幻想都是自欺；散布任何幻想都是欺人。你就認定吧，即便是躲過初一，你也別想躲過十五！即便他沒有「這一個」機會強詞奪理，也仍會捏造出另外一大堆說詞。歷史已經用屢試不爽的事實，確證了這個令冷血動物「其樂無窮」的真理。

C，由於「借題發揮」，原本正義的也變成了邪惡。就以土地改革為例吧：土改不論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說，還是從人道主義說，都具有歷史的正義性。可這個事情由共產黨來做，就變成一場圖財害命、令人髮指的傷天害理的劫難了。這是為甚麼？就是因為它的目的是邪惡的，毛澤東這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借刀殺人、借題發揮、借頭過關之間也。如果你反對他的邪惡，他不說你反對的是他的「邪惡」，而混淆視聽地給你扣一頂帽子，說你是站在黃世仁立場上，反對白毛女，反對貧下中農！他便以貧下中農的恩人自居，迷惑貧下中農，讓他們認不清到底是誰害苦了他們！直到數千萬農民在被餓死的前一秒鐘，還在默念著：「他為人民謀生存，呼兒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在台灣就不存在借題發揮的問題，而是正宗正項地體現了「耕者有其田」本身所具有的正義性。

又如三反、五反，如果正規正矩地搞，對於廉政建設、對於淨化社會風氣，都會大有裨益的。但因為目的的邪惡，就決定了其手段之慘絕人寰！徐平華先生被劃右派的原因，是他對親歷的三件事提出質疑：一是在朝鮮戰場上「槍殺戰俘」，並且連指導員向他解釋說：「這是上級指示」；二是在人民大學，他和張志新（烈士）是一個系，他們系裡一位很漂亮的女同志

給蘇聯專家當翻譯，被蘇聯專家姦污懷孕，後來下落不明。他要追問，張志新叫他不要管這些事：「一切黨都會有妥善安排，要相信黨。」第三個意見是有關三反五反運動的：「朝鮮第五次戰役結束後，因為人海戰術，部隊傷亡慘重，我所在的 63 軍 188 師所剩的人員很少，這時候奉命換防整編，所謂『整編』就是各單位分散在防空洞裡搞三反五反運動，每天檢查思想，批判鬥爭。我們連隊有位馬司務長，回民，是傅作義起義人員，北京人，他被當作『老虎』批鬥，叫他交代過去的罪惡，這是我參軍以來第一次看到的內部鬥爭場面，馬司務長被綁在柱子上，嚴刑逼供，嘴巴都打腫了，究竟他貪污甚麼都是疑問，誰也拿不出證據。我當時年輕，歷史清白，黨支部吸收我成為核心組人員，小組分三班，日夜輪流批鬥他。大約一個星期後，馬司務長也沒有交代甚麼『問題』。最後黨支部決定押送他到團部集訓。馬司務長走後不久，有個朝鮮『阿爸吉』慌慌張張跑來連部報告，說有位中國『吉文棍』死啦死啦的。指導員派我們三個人去掩埋，我到現場一看，原來死者就是馬司務長，他的頭部有槍孔，身上也有多處槍孔。原來不是甚麼去『團部集訓』，而是秘密執行槍決。因死後掩埋的不深，被野狗拉出來吃的時候，朝鮮『阿爸吉』看到才跑來報告的。

「馬司務長的被殺，給我思想上極大震撼，我反覆在想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難道是騙人的嗎？槍殺放下武器的戰俘、秘密處決馬司務長，像一場惡夢似的使我記憶難忘。」

我也曾親睹這樣慘不忍睹的場面，我們學校斗「貪污犯」也是摔打逼供，爹呀娘呀，鬼哭狼嚎！十分之九以上是假案，即便是真的，也不能如此殘忍呀！中國人作了幾輩子的孽，給逢上這樣一個暴虐無道之君。一個人只有一條命呀！再說，誰無妻兒老小……？

現在中國，反貪污也並不是反貪污，是「與時俱進」的借題發揮。由於幾乎無官不貪，所以，只要上級領導出於政治上需要，想剷除誰，就反誰的貪污，如江澤民反陳希同，一反准成，決不會撲空。小貪污犯（下級）總會有把柄在大貪污犯（上級領導）手中。如果你把領導服侍好，就保管你萬事大吉。江澤民說了：「該抓就抓，該保就保。」本來，只要貪污就該抓，這是法律；但出於政治考量，該保的人，不但不抓，還管保你能步步高陞，甚至提升到最高層的核心領導的位置上。有時候，為了轉移對這個貪污黨的極大民憤，迫不得已抓幾個斬首示眾，也只是中共找「替罪羊」的慣技而已。

三曰：「借頭過關」。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第十七回，寫了一段曹操借頭的故事：「卻說曹兵十七萬，日費糧食浩大，諸郡又荒旱，接濟不及；曹催軍速戰，李豐等閉門不出。操軍相拒月餘，糧食將盡，致書於孫策，借得糧米十萬斗，不敷支散。管糧官任峻，部下倉官王堂，入稟操曰：『兵多糧少，當如之何？』操曰：『可將小斗散之，權救一時之急。』堂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堂依命，以小斗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聽，無不嗟怨，皆言丞相欺眾。操乃密召王堂入曰：『吾慾問汝借一物，以壓眾心，汝必勿吝。』堂曰：『丞相慾用何物？』操曰：『慾借汝頭以示眾耳。』堂大驚曰：『某實無罪。』操曰：『吾也知汝無罪；但不殺汝，軍必變矣。汝死後，汝妻子吾自養之，汝無慮也。』堂再慾言時，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門外一刀斬訖，懸頭高竿，出榜曉示曰：『王堂故行小斗，盜竊官糧，謹按軍法。』於是眾怨始解。

「次日，操傳令各營將領：『如三日內不並力破城，皆斬！』操親至城下，督諸軍搬土運石，填壕塞塹。城上矢石如雨，有兩員裨將避而回，操掣劍斬於城下，遂自下馬接土填坑。於是大小將士，無不向前，軍威大振。城上抵敵不住。曹兵爭先上城，斬關落鎖，大隊湧入。李豐、陳紀、樂就、梁剛都被生擒。操令皆斬於市，焚燒偽造宮室殿宇，一應犯禁之物；壽春城中，收掠一空；商議慾進兵渡淮，追趕袁術。」

這個倉官王堂當了替罪羊，他的頭，算是「羊頭」；殺那兩員裨將是要殺雞給猴看，所以說，他倆的頭，就算是「雞頭」；這些都是消滅敵人的手段，殺敵軍將領李豐、陳紀等，則屬最後達到消滅敵人之目的。毛澤東的「借頭過關」，也完全是循此行徑：借羊頭，借雞頭和殺敵頭。毛的「殺敵頭」，在策略上總是「槍打出頭鳥」，「擒賊先擒王」。

（1），借雞頭

A，中國第一號大右派章伯鈞說：「老毛是要借我的頭。」（見《往事並不如煙》）這個「借頭」的性質是借「雞頭」，是要殺雞驚猴。因為當時的形勢是，國際上有蘇聯的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中國也跟著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這對於毛無異於「同著和尚罵禿驢」，匈波事件又引起中國的「懂得氣象學的螞蟻出洞」；在中共黨內，強調集體領導、反冒進都是針對著毛的，國內知識份子鳴放、工農和學生鬧事都威脅著共產黨的獨裁專制。毛為堵塞這股民主洪流，治亂世用極刑——據王若水判斷，1956年毛就起了「殺機」。1957年反右派，借右派的頭殺雞給猴看，殺一儆百，來鎮壓國家的和黨內的不滿和反抗，所以就不僅僅是借章伯鈞一個人的頭的問題，而是要借右派這個群體的頭。這一點，劉賓雁先生在給丁抒先生《陽謀》一書作的序中說得再清楚不過了：「毛澤東及其同夥刻意營造的那種特殊環境——長年的賤民地位與非人的生活條件，是對『右派』的慢性槍決。事實證明，這種『慢性槍決』並不比斯大林處置政敵的手段更人道；對於最終仍然死於非命的許多右派份子來說反而要痛苦得多，對於統治者卻更為有利。一百萬餘名『反面教員』（毛澤東語）散佈在全國各地，朝夕出沒於數以億計的人們面前，無疑是對於所有中國人的無言的警告：哪一個膽敢對中共稍發異議，便必定會得到同樣的下場！而那個下場是令人不寒而慄的。」

「被剝奪一切而又身敗名裂卻苟且生存下來的那些右派份子，時時刻刻起著反面教員的作用，向人們昭示著：在中國做人，切不可誠實坦率，切不可過問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惡感，切不可違反當權者的意旨，切不可對任何人寄予同情和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將把這些戒條牢記心間，並傳給自己的子女。」

毛澤東對右派的借頭，除了用以「儆猴」的手段意義外，還要達到更根本的目的，即具有「殺敵頭」的意義，這就是要從政治上（相當一部份從肉體上）消滅這些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極權，也即毛澤東個人專權路上的攔路虎——篡權前夕毛就在評白皮書中定性為「右派」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劃右派後，毛又說：「羅隆基、龍雲實際是反革命，定為右派，以示寬待。」（《廬山會議實錄》第333頁）

在這裡就充分地顯示出，毛的反右派，從本質上講是反人民，你可以從任何一個右派觀點都是為民請命，反對毛的倒行逆施這一點上得到證明；從量上講是把右派作為人民的一部份來反的，這是他一向慣用的「槍打出頭鳥」的策略。吳祖光曾說他沒有理由要反知識份子；這說明吳尚未認透毛的本質與知識份子的本質，及其之間的關係。毛的本質決定他要反知識份子；不反知識份子，不是他的本心，不合他的本性。因為他要搞一人專政，獨霸天下，只有實行愚民政策才能達此目的。知識份子的本質是獨立思考，嚮往民主自由。結合當前形勢來說，廣大的農民（包括貧下中農），吃盡強迫他們入社，剝奪他們的土地、牲畜、農具，征公糧、賣餘糧，幹部欺壓的苦頭，而舉行退社、鬧事；學生因為升學、就業、學校各種問題而罷課、遊行示威；工人因工廠官僚主義管理，各種政治的生活的不公正待遇、體制方面問題更大，出現罷工、鬧事等。這些棘手的問題，和國際上蘇聯反斯大林，東歐波匈事件，世界各國共產黨的退黨風潮，與國內一系列政治運動積累下的欠債，和社會主義改造急躁冒進，好大喜功帶來的惡果纍纍，這就形成了一種危機四伏的政治經濟大壞局面。毛澤東雖表面上發表了很多假裝大肚漢的言論，但內心裏卻是朝最壞處著想，寧肯把困難估計得更多些。他沒有進行改革的打算，而是下了最保守、最反動的決心，要打殺「出頭鳥」。知識份子是人

民的先生，是人民中的出頭鳥；右派是知識份子中的出頭鳥；民主黨派是鳥群。果然，他得逞了，一經反右，他倒行逆施所帶來的對人民的種種危害，工人、農民、學生都不敢提了，更別說鬧事了；更別說資產階級的意見了；連周恩來們的反冒進，也只有請罪的份了；一切正確的言論、行動都偃旗息鼓了；一切禍國殃民的做法，都能興風作浪，暢行無阻了。

B，還有一種，殺雞不是為了儆猴，而是為了設宴。1949年毛澤東去蘇聯為斯大林慶祝70大壽，作為壽禮，強迫救國會「自動」立即解散。這就是為斯大林奉上的一桌慶壽百雞宴。因為救國會曾在抗日期間登報聲明過，反對斯大林大元帥與日本訂立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條約（蘇聯以承認滿洲國獨立換取日本承認外蒙古獨立）。在反右派時，把「陰謀恢復救國會」又作為劃王造時右派的一條主要罪狀。這使我想起了年羹堯的一個血淋淋的故事。說的是，在宴席上，一位客人發現碗裡有個蒼蠅，因為客人知道年是個殺人魔王，為避免年濫殺無辜，就裝著沒事，把蒼蠅硬是吃進肚裡。可是，並未躲過年的眼睛。下一刀菜上來——哎呀，不是菜，是一顆人頭！廚師的人頭！老毛上的是「反動組織」救國會和右派份子王造時的人頭。

文革初期，毛澤東打倒羅瑞卿，只是因為羅反對林彪的個人崇拜和「突出政治」；可羅並不反對毛，而是死心塌地地擁毛。毛所以要打倒羅當然還有別的原因，主要是為了向林借刀殺向劉少奇，才先殺掉羅瑞卿這只雞向林上供的。在《毛澤東與康生》一書上說：「羅瑞卿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做保衛工作，一直受到信用和重用，那麼為甚麼毛澤東會同意打倒羅瑞卿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如他給江青的信上說的，為了借朋友的力量去「打鬼」。因此也可以說，打倒羅瑞卿是毛澤東同林彪作的一筆政治交易。」（第69頁）另有一說是，毛借林之刀殺向羅，是為打倒劉少奇掃清道路。由於極權政治全是黑箱作業，人們只能靠有限的資料進行推理，因而得出的說法各異；但性質無異，都是毛要借羅瑞卿的人頭。

「九一三事件」後，毛又用林彪的頭作為「雞頭」，設宴招待『三老四帥』。11月14日，毛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人員時發表講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們『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甚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師」。其實反擊「二月逆流」的主帥是毛親自加以支持的江青。

毛在陳毅的追悼會上對張茜說：「陳毅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好同志，陳毅同志是立了功勞的。」「林彪是反對我的，陳毅是支持我的。」他還面向其他人說：「我就一個親密戰友，還要暗害我，陰謀暴露後，他自己叛逃摔死了。難道你們在座的不是我的親密戰友嗎？」談到「二月逆流」：「那是陳老總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的。都是政治局委員，在一起議論一下有甚麼不可以？又是公開的。」

毛在軍委會議上說：「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楊、余、付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連聲說：「翻案，翻案，翻案」。翻雲覆雨，一至如此！（以上談話，轉引自《毛澤東與康生》第167、174頁）

對比劉、林，我們看到，他們被借刀的命運是相同的。在延安毛也曾向劉借刀，殺向王明和周恩來；而最後下場，二人又都是作為毛的敵人而被消滅的。

文革中間，毛所以要提出「還我長城！」並打倒「要揪軍內一小撮」的王、關、戚，那也是為了收買軍心而特意殺雞酬軍的。

另外，還有一種特殊意義的「借雞頭」，就是讓敵人殘忍地屠殺自己的黨員，以「取信於」敵人。司馬璐在《中共歷史的見證》中寫道：

用反共的面貌和組織消滅反共的力量。因此，為了培養一部份共產黨的「反共威信」，以便掌握反共機構的關鍵位置，犧牲一些小共產黨員就不可避免。例如中共著名的特務熊向暉在蔣介石的親信胡宗南身邊，利用反共面目，殺過不少共產黨人，是一個很著名的故事。（90頁）

（2）借羊頭——「替罪羊」機制

A，四人幫是五人幫的替罪羊

四人幫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替罪羊。這是因為：一，四人幫替的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罪惡，這個罪惡是史無前例的；而毛澤東則是比斯大林、希特勒的罪惡都更大的罪犯。二，四人幫不是賊王，不是罪魁禍首，是爪牙，是嘍囉，所以不能承擔首犯的罪責。說四人幫是毛澤東的替罪羊，恐怕普天之下鮮有否認者。但「鮮有」畢竟還是「有」，不然何以一個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追究文革罪責竟只拿四人幫是問而不再往上追究呢？

對此，中國人都心照不宣，不是「不宣」，而是或裝糊塗，或敢怒而不敢言。西方輿論界就不那麼認帳了。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採訪鄧小平：「對西方人來說，我們有很多問題不理解。中國人民在講起『四人幫』時，把很多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說的是『四人幫』，但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你就看鄧小平怎樣「王顧左右而言他」吧！鄧回答：「毛主席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的性質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份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毛甚麼時候把國家從危機中挽救過來過？恐怕說成「把國家推向危機」，倒更合事實。——紫丹）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還會比共產黨更黑暗嗎？）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應該說，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後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面，包括哲學、政治、軍事、文藝和其他領域，都有創造性的見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後期，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你知道，我們黨在延安時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為毛澤東思想，把他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正是我們遵循毛澤東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偉大勝利。當然，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創造，包括老一輩革命家都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建立和發展。主要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但是，由於勝利，他不夠謹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當部份違背了他原來的思想，違背了他原來十分好的正確主張，包括他的工作作風。這時他接觸實際少了。他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制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這不僅是毛澤東同志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發展起來了，頌揚個人的東西多了，整個政治生活不那麼健康，以至最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鄧小平文選》二卷第303頁）說了半年六個月，還是沒有回答：為甚麼「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

奧女士插問幾個別的問題，就又返回到這個問題，而且扭著不放：「你們對『四人幫』進行審判的時候，以及你們開下一屆黨代會時，在何種程度上會牽涉到毛主席？」由於對鄧的回答顯然是不滿意，才接著問：「這是否意味著在審判『四人幫』和開下一屆黨代會時，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會提到？」鄧回答的要點是：「但是審判『四人幫』不會影響毛主席。」奧問：「你是否肯定，今後事情的發展更為順利？……」鄧答：「不能低估『四人幫』的影響。但要看到，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的廣大人民對『四人幫』的罪行是痛恨的。這表現在『四人幫』橫行、毛主席病重、周總理去世時，1976年4月5日天安門廣場爆發的反抗『四

人幫』的群眾運動……。」這裡表明鄧死心踏地地要四人幫當毛的替罪羊；一是在罪行上替罪；二是在群眾「痛恨」的對象上當替身。關於第一點，我要學著毛的口吻說：「沒有毛，四人幫頂個屁！」關於第二點，我要表揚毛，因為他說了實話：「這都是針對我的，要打倒我老毛，我是『豺狼』的後台。」這一點，毛就成了群眾的「知心人」：他知道群眾嘴上說的、筆下寫的對四人幫的痛恨和揭露其滔天罪行，其實心裏指的是「我老毛」啊！群眾也是把四人幫當做毛的替罪羊來指桑罵槐的。這是禿子頭上的虱子一明擺著哩！可鄧小平卻不老實。難道他真不在乎全國人民對他的撒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嗎？還是情有可原——共產黨一天不撒謊日子也過不去？鄧小平隨意要撒謊，實質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奧問：「很顯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後才能逮捕『四人幫』，到底是誰組織的，是誰提出把『四人幫』抓起來的？」鄧答：「這是集體的力量。我認為首先有四五運動的群眾基礎……。」在鄧回答後，奧的發問就把鄧的掩耳盜鈴（或說沒穿衣服）揭個昭然。她問：「你說『四人幫』是少數，全國很多人反對他們。他們這些少數人怎麼可以控制中國，甚至整老一輩的革命家？是否他們當中有一個是毛主席的夫人，他們的關係太好，你們不敢動她？」在鄧答「有這個因素」及但書後，奧又問：「是否毛主席對江青的錯誤視而不見？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樣的人？」鄧答：「江青是打著毛主席的旗幟幹壞事的。」當然忘不了但書：「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奧女士不等鄧說完就打斷他——不是插問，也不是肯定，而是一句斬釘截鐵的否定句：「我們不知道。」鄧接著說：「江青打著毛主席的旗幟搞，毛主席干預不力，這點，毛主席是有責任的。江青壞透了。怎麼給『四人幫』定罪都不過分。『四人幫』傷害了成千上萬的人。」把「實事求是」掛在嘴上的鄧小平，竟說「毛主席干預不力」；毛主席就有「這點」（原話！）責任！要按你說，毛主席該是個多麼軟弱的人物呀！他該是多麼喜歡保持被動呀！你說：「江青壞透了！」但人們不免要問：「比毛澤東還『透』嗎？」國人皆知，江青在法庭之上公開坦承：「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毛主席叫我做的。我是他的一條狗：他說要咬的，我就咬。」你說：「怎麼給『四人幫』定罪都不過分。」這固然不錯，但按共產黨的政策規定「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那麼，首惡者、罪魁禍首、賊王毛澤東該當何罪？應該承認，所有四人幫的罪惡，再大也只不過是毛的罪惡的一個部份，而且「都是毛主席叫我做的」。

奧問：「對江青你覺得應該怎樣評價，給她打多少分？」鄧答：「零分以下。」「零分以下」者，負數也。這是數學概念。它的社會意義就是，如果一個人得零分，他就沒有了人性，已經算不得是人了；如果得負分，那他就是人性之大敵，危害人類的害人蟲！以這個評價作標準分來衡量毛澤東，他就更是「零分以下」了。所謂「更是」，就是這個負數的絕對值更大。按照我前面對他的本質已作出的分析，他的得分應該是負的極大值。從數學概念翻譯成生活概念，就是壞極了，糟透了，無以復加了！就是罪大惡極，死有餘辜——雖九死而難能抵其罪於九牛之一毛！

從前造神時曾有如是說：「願天下的樹都成為筆，願天下的河都成為墨，願天下的人都成為詩人，那也書不盡毛主席的恩情！」現在只用將「恩情」還原為「罪惡」，便真相大白。被稱為「中國的良心」的劉賓雁，在《誰是反革命》一文中說：「仔細回顧一下的話，1949年以後毛澤東各個方面的決策幾乎全是錯的，包括外交政策——沒幹一件好事。」被視為中國最有骨氣的知識份子之一、著名戲劇學家吳祖光為史若平教授《寒冷的夏天。1957 風雲錄》一書所寫的序言《從 1957 年說起》，是這樣結尾的：「我何嘗不打算說毛澤東幾句好話，但是實在連一句好話也找不出來。他的那些詩詞只不過是他暴虐專橫的遮羞布，只有他的一句『詞』可以概括一切，就是：『不許放屁！』此外就是孽債如麻，不須說了，是誰也說不清的……」（轉引自《開放》2005 年二月號）誠哉，是言也！毛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

啊！應該把「四人幫」實至名歸為「五人幫」。這才是沒有迴避奧女士問：為甚麼「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

B，毛澤東、共產黨創造和利用各式各樣的替罪羊，形成一種替罪羊機制。

文革中發生的「大鬧京西賓館」的風波，讓毛意識到軍隊與中央文革的關係非常緊張，而毛這時正要軍隊介入運動，控制混亂的局面。毛為了平息軍隊的不滿，故作姿態，向軍隊對之意見最大的陳伯達、江青開刀，讓陳、江當了替罪羊。於 1967 年 2 月 10 日，毛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江青、王力參加。毛在會上大發雷霆：「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指陶鑄）。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裡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我查了記錄，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要不就是沒有說話。陳伯達講了話，江青插了話。」陳受到批評後很緊張，幾次透露想自殺。但是中共剝奪人的自由，做的非常絕，讓你非但沒有言論自由，而且沒有不言論的自由；讓你非但沒有活的自由，想死也沒有自由。大家都知道，自殺也要獲致罪名，叫做「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叫「畏罪自殺」。這次，江青指著陳的鼻子罵：「你給我自殺！你給我自殺！你自殺，就開除你的黨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氣自殺嗎？」被稱為「老夫子」的陳伯達，還專門查找了「自殺」的馬列主義理論根據：「我查了書，拉法格是自殺的，列寧還紀念他，證明共產主義者可以自殺！」（《文革大年表》第 180 頁）「其實，批陶的決定正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陶鑄在政治上被拋出來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江青不過是拉上陳伯達將此事提前捅了出去罷了，就像早先在文革運動中屢屢幹過的一樣。」（《晚年周恩來》第 198 頁）三年後，毛決心要打倒林彪，就寫出《我的一點意見》：「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絕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又讓陳先當替罪羊，展開「批陳」整風；著手批陳、著眼批林，暫且麻痺林彪和掩國人耳目。從此，老夫子銀鐐入獄，先生休矣！

毛共罪孽深重，內裡早已腐爛透頂，但還要硬撐偉大、光榮、正確的表子，所以就亂找替罪羊：黨內找、黨外找，非但在中國找，外國人也不放過；非但在人間找，老天也不放過。汝未聞「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討債」的謊言乎？

在這裡我不能不提到河南省的信陽事件，一個專區餓死了一百多萬人。這本是毛澤東的「人禍」所致。《中國大逆轉》中說：「1960 年冬，毛澤東終於找到了替罪羊，他說：全國有 1/3 地區形勢大不好，『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1960 年 11 月 15 日毛澤東在中央精簡幹部和安排勞動力 5 人小組《關於中央一級機關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情況的報告》上的批示。）中共信陽地委按照毛澤東劃定的框子，提出報告說，該地區大量死人，『性質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是敵人利用我們工作中的錯誤，打著我們的招牌，進行大規模的最殘酷的連續半年之久的階級報復』（1960 年 12 月 12 日中共信陽地委的報告）。中共中央立即肯定了信陽的報告，要求全國三類社隊迅速掀起整風整社高潮，『徹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復辟勢力』。當時，河南省曾派出幹部，駐豫人民解放軍野戰部隊也派出全副武裝的團隊，將信陽地區各縣、社、隊的幹部分別集中看管起來，人人過關，對一批為完成毛澤東提出的任務而習慣強迫命令、壓制和迫害群眾的幹部，大體上也就是在合作化運動和實行統購統銷政策中被提拔起來，又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得勢的『新惡霸』，處分的處分，判刑的判刑，槍斃的槍斃。各省各市都為此處理了一批幹部，以證明問題主要出在下層，將上層應付的責任遮掩過去。」（331 頁）

C，另有一種不是替罪羊，而是掩罪羊，是借他的羊頭，好掛起來賣狗肉，以掩蓋他的罪惡和醜惡。例如李立三，他的存在，就標誌著毛澤東在處理犯錯誤的同志的原則是「懲前毖後，

治病救人」八個大字，來掩蓋毛「以殺人如兒戲」（周恩來語。見《毛澤東與周恩來》第100頁）。李立三在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現身說法，發言的題目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但是，掩蓋罪惡、製造假象、用紙包火，都只能是轉瞬的事情。《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一書，用事實真相說明毛的權力是建立在赤血白骨之上的。就連作為「羊頭」掛的李立三也未能逃脫殘酷折磨、被逼自殺的可悲命運。

在黨外例如對宋慶齡，好像只要收買下一個宋慶齡，就等於收買下了孫中山，也就同時收買下了三民主義的商標權。然後毛澤東就可以有資格振振有詞：「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我們完成了孫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毛澤東選集》五卷，第311頁）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剛才吳祖光所引毛詞「不許放屁！」那是他對別人的苛求，對自己則是大許特許的。我不說別的甚麼，只請讀者想一想：毛澤東是怎樣完成民主革命的？——他讓全民啼饑號寒，餓死4000多萬人，就是他完成民生主義的標誌嗎？他焚書坑儒，殺害幾百萬知識份子，在黨內外實行個人專制獨裁，即便是國家元首，都可以任意戮殺，這就是他完成的民權主義嗎？：先是讓日本多佔地；後是一邊倒、稱臣斯大林，破壞中華文化、文物古蹟，讓馬列洋教跋扈；再後是揮霍中國人的血汗、餵養國際毛派殺人政權……這就是他奉行並完成了民族主義嗎？所以，與其他說「完成了」，倒不如由他自己來宣稱：徹底破壞了孫先生的民主革命，「完成」了專制復辟；才算是以身作則，「不許放屁！」

在國外，掛霍查這個羊頭，是代表「歐洲的一盞社會主義明燈」的。掛卡斯特羅這個羊頭，是反駁「和平過渡」，樹立「戰鬥過渡」這竿旗幟的（蘇修把古巴當成「和平過渡」的例子，卡氏說，他們是「戰鬥過渡」）。不過，古巴很快就給中共翻臉了。當中共大事宣傳「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時候，人民大眾卻毫不客氣地給予冷酷的諷刺：「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只有一個阿爾巴尼亞！」後來阿爾巴尼亞也都「嚴重傷害了我們的民族感情！」

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反右令中說：「多數人的批評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學傅鷹教授那種尖銳的沒有在報紙上發表的批評在內。這些人的批評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關係，他們的批評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評往往是惡意的，他們懷著敵對情緒。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毛澤東選集》五卷，427頁）毛澤東都感覺到意見「尖銳」了，可見是夠尖銳的。傅的發言，指黨員回報他人思想情況是「特務」，指黨員在位無能是「木頭牌位」，還提出「民主治校」。換上任何一個人都會跑不掉劃「極右派」的。可毛澤東手大遮天，保護了他，只要他不劃右派，掛起他這個「羊頭」，就足夠說明，凡是劃右派的，即便意見不尖銳，但都是「惡意」的，「懷著敵對情緒」的。當這個羊頭的價值過期作廢時，在文革中便成為了「漏網右派」，和新罪名：「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黑幫分子」、「資產階級黑線專政的大學閥」，被批鬥、被抄家、被打罵、坐噴氣式、被送進「勞改大院」，是北大「黑幫」中被打得最重的一個，經受了殘酷折磨……毛澤東的「善意論」，哪裏去了？

D，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後的替罪羊是斯大林和毛澤東

共產主義的一切罪惡、一切弊端，暴露於世，而遭遇徹底失敗的時候，某些原教旨主義者跑出來打圓場了，說甚麼他們實行的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原汁原味的共產主義，而是扭曲了的假共產主義，且沿用了中共批蘇共的「九評」中最後一評《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上的教訓》一文的概念，說所有到此為止，毛、斯等所實行的都是假共產主義，人們要從中吸取教訓。

這個學說降世百多年來，曾受到擁護，並且擁護到狂熱的程度，其中包含著大量的博學多才、思想深邃、熱心濟世的世界級的偉人，而且這個學說在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是放在統治思想的地位的，在中國，至今仍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如果誰說，把馬列主義放在「百家」中算是平等的「一家」，那就要被批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也一直有人在反對。但馬克思主義者曾經洋洋得意地說，這些反對派屢屢宣佈駁倒了馬克思主義，可他們卻仍然繼續在駁。以之說明馬克思主義是駁不倒的。這是因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個理論駁倒另一個理論不是靠打嘴官司可以解決問題的。靠甚麼呢？這就是馬克思正確地指出的：要靠實踐、靠工業。而實踐具體地推翻了共產主義這一事實，卻是無可辯駁地符合了「事實勝於雄辯」的真理。這也同時說明，我們的態度並不是「凡是馬列贊成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馬列反對的我們就要贊成。」。而是站在事實上說話。

縱合公理和婆理，我認為作為一個學派的馬克思主義和其他學說一樣，作為一家之言都有存在下去的權利。但，若要罷黜百家，獨尊一家，並用它來建立一種共產主義極權制度，那就不止是行不通，而是毫無例外地被實踐證明：哪裏這樣做哪裏便充滿血腥與貧困。這是在十幾億人口的地區，以犧牲成億的人命為代價，在上一世紀做實驗的結果。如果有人（在中國和海外都仍大有人在）仍不死心，則需考慮：1，人類付出的代價還不夠沉痛嗎？你還準備再拿出多少人作犧牲品來作你的「真」共產主義烏托邦試驗？2，人類竟然會「愚蠢」到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都未能把這麼「美好」的社會制度實驗成功，那說明甚麼呢？是人的問題還是主義和制度的問題？斯大林主義者、毛澤東分子們如果繼續不死心，那就只有像蘇聯、東歐那樣循著毛澤東「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邏輯，繼續失敗和滅亡下去。3，中國共產黨所以還能苟延殘喘，甚至迴光返照，是由於它背離了馬克思主義，而滴注進去資本主義的救命湯。這在中共的統治史中是屢試不爽的：所有砍資本主義尾巴、刮共產風的時候，就等於是率獸而食人，導致國民經濟大破壞，瀕臨於崩潰，而往資本主義一「倒退」，例如搞點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形勢就立即起死回生；而更見效驗，更具根本性轉變的是：「辛辛苦苦 30 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你說的那個「真共產主義」，胡錦濤正在付諸實施，這就是他在搞的「馬克思主義工程」。竊以為這是「蝌蚪趕鴨子——急於找死。」請聽我再做一番細說端詳：

共產主義帶著先天的不治之症來到人間，使人類遭受到一場浩劫。毛澤東看準它最適於自己篡國奪權的目的，就把共產主義用三民主義包裝起來，起了個名字叫做「新民主主義」，以迷惑和騙取到人心。這也曲折地說明，任何時候三民主義都是大得人心的。毛澤東在黨內一再交代，要打孫中山的旗子，要打三民主義的旗子。

事實上，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是發揚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借鑒了世界的包括馬克思主義，也包括資本主義的現代文化——擇其善者而從之；同時也清醒地看到它們的弊病——其不善者而改之。

事實上，每當毛倒行逆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就偷偷摸摸地參雜一點「三民主義」當做救命湯來喝，如大饑荒後實行的那一套放鬆的政策就是一個例證。事實上，應該把他的口頭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乾脆改成「三民主義，一抓就靈」才合乎實際。

更具說服力的又一典型例證是鄧小平實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他引以自豪的、值得他大吹大擂的改革開放的豐功偉績。而這又是人人都承認的明顯的事實，但是，你想了沒有——他在改革中深得人心的是甚麼東西？是從哪裏取來的？這回不是右派道出了真情，而是，

從上層的左派，到農村的得利的基層幹部。他們所發出的牢騷和責難，便道出了真情實況，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辛辛苦苦 30 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好一個精闢的概括！「退到解放前」竟會如此大得民心，而卻使毛分子如喪考妣！他們說風涼話：「國民黨反動派又回來了！」更說甚麼「人民政府」應該改成「國民政府」、《人民日報》應該改成《國民日報》、《紅旗》雜誌應該改成《藍旗》。雜誌。後來《紅旗》還真的改了名，當然不可能是《藍旗》，而是改成了《求是》。他們對《紅旗》易名心存憤懣，不說「求是」是「求是」，而氣急敗壞地倒著讀：「是毬！」竟把自己的喉舌說成「是毬」了。

我們還要通過反右派運動，說明一下「借頭過關」中借雞頭、借羊頭和殺敵頭三者的關係：前面已經說過，對右派借頭的性質主要是殺雞給猴看，而且毛確認右派是敵人，是反革命。現在還要說，右派還當了共產黨的替罪羊。突出的例子是，1957 年 8 月 8 日《人民日報》的報導《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漢陽縣一中學生因升學問題鬧事，報導說學生提出了三項要求：「一、公佈招生比例；二、全國統一招生；三、城鄉招生比例一致。但是，李副縣長出來答覆，他們不聽，縣委派宣傳部長等來解釋，他們也不聽。有個學生喊了一句：『頭頭都在縣委會！』學生們又湧向縣委會去了……。」鬧事的過程，前面已做過交代，現在要提出問題：學生鬧事是為了「爭取受教育的權利。」這有甚麼不對？犯得著槍斃三個、判刑四個嗎？況且，毛說過，「過去我們跟人民一道反對敵人，現在敵人不在，就剩下我們跟人民。他們有事，不向你鬧，向誰去鬧呢？向蔣委員長去鬧嗎？他到台灣去了。只有向工廠的廠長、合作社的社長鬧，向鄉政府、市政府、向人民政府鬧。」（轉引自《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 75 頁）又說過：「對於少數人鬧事，第一條是不提倡，第二條是有人硬要鬧就讓他鬧。我們憲法上規定有遊行、示威自由，沒有規定罷工自由，但也沒有禁止，所以罷工並不違反憲法。有人要罷工，要請願，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誰想鬧誰就鬧，想鬧多久就鬧多久，一個月不夠就兩個月，總之沒有鬧夠就不收場。你急於收場，總有一天他還要鬧。凡是學生鬧事的學校，不要放假，是來他一場赤壁鏖兵。這有甚麼好處呢？就是把問題充分暴露出來，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鍛煉，使那些沒有道理的人，那些壞人鬧輸。」又說：「除了大規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亂必須武裝鎮壓以外，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段其瑞搞的『三一八』慘案，就是用開槍的辦法，結果把自己打倒了。我們不能學段其瑞的辦法。」「對少數壞人，除了最嚴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鬧，不要開除。要留在原單位……當反面教員。清華大學那個要殺幾千萬的大學生……這種人代表反動的階級，不是個別人的問題，簡單處理，爽快倒爽快，但是反面教員的作用沒有儘量利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353 頁）

毛針對全國發生的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退社所說這些處理的原則，也完全適用於漢陽一中的學生因升學的問題而起鬧事。可現在為甚麼要抓住三個槍斃、四個判刑，把他們當做替罪的羊、儆猴的雞呢？又為甚麼進而如報導的題目所示，把大右派、「華中主帥」馬哲民也拉來當作替罪羊、儆猴雞呢？這說明，毛說話，不管對黨內還是黨外，都是說一不一，說二就二的。對照事實可知，毛若不把你認定為敵人，你還有可能僥倖苟活；一旦他認定你是敵人，你在政治上、甚或肉體上就難有活路了。反右派運動壓根就兼具借羊頭、借雞頭、殺敵頭的性質。

E，三借合一

我們還要進一步綜合地指出：借刀殺人、借題發揮、借頭過關，往往是借一而得二或得三。土改就是「三借」合而為一的例子：土改的本來目的是為了實現孫中山先生所說的「耕者有其田」，以便解放生產力。這是一個正義的革命的偉大舉動，正如後來台灣做的那樣。但，經毛共一借題發揮，正義變成了血腥的邪惡，革命變成了徹底的反動：借農民的刀砍掉 300 萬顆地主的頭；借這 300 萬顆頭堵死農民的退路；只有跟著毛主席鬧革命，上刀山、下火海，有進無退才有活路——「為了保住鬥爭的勝利果實，衝啊！」這樣一來，就又借農民的刀和農民的頭來「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再更進一步發揮，就產生了「大救星」之類的無恥謾言。看透這一點的梁漱溟，為農民生活的悲苦慘狀而鳴不平，除了被毛破口大罵外，共產黨還造輿論說：「黃世仁、穆仁智都出來為白毛女抱不平了！」——這一點又是一個多麼荒謬的借題發揮啊！可以說，土改是毛共活學活用《矛盾論》，以製造矛盾、利用矛盾、挑撥離間，各個擊破，漁翁得利的一個範例。共產黨的勝利是把實行土改作為主要保證的。而共產黨的一切陰謀、一切罪惡，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典型的表現。

中篇：教訓篇（之 六）

毛的「三借」是一貫的

為了說明毛心黑手辣，拉一派、打一派，從肉體上消滅不同意見，進行「三借」不自今日始，茲順舉「富田事件」引以為證：

1929 年 1 月，朱毛率紅四軍撤離井岡山，一路上受到強大敵人的圍堵追擊，損失慘重，投奔到政權鞏固、物質充足的東固山。這裡的領導人李文林，是中共江西省委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8 年任中共贛西特委委員兼秘書長，紅二團黨委書記兼團長，次年任紅二、四團政治委員，1930 年任中共贛西南特委常委兼軍委書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常委兼黨團書記處書記、秘書長，紅軍學校校長，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行委」是中共中央為了便於統一行動而將中共、共青團與工會三組織合併而建立的機構，成立於 1930 年 8 月——馮治軍注），為江西紅色政權的創建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毛澤東在 1929 年 6 月 14 日給林彪的信中高度評價了李文林，並把東固根據地與井岡山、贛東北及湘鄂西等根據地相提並論，稱之為「李文林式」的根據地。

李文林親率一連隊伍，從興國的蓮塘趕到永豐龍岡，接應朱毛與紅四軍。兩支隊伍會合後，在東固召開了會師大會。毛在大會上說：「上有井崗山，下有東固山。紅四軍是鐵軍，紅二、四團是鋼軍！我相信，東固山和井崗山最終一定會聯結起來，造成工農武裝割據的大塊革命根據地，最後一定可以解放全中國！」朱毛紅四軍受到東固鄉親們挑著整豬整羊慰勞，並籌集大量棉花、布匹為四軍做寒衣。李文林還送了 2000 銀元和大量子彈、給養，給予四軍。毛澤東、陳毅、粟裕都對東固根據地稱讚不已。陳毅有詩：

東固山勢高，峰巒如屏障。

此是東井崗，會師天下壯。

粟裕有言：「這塊（東固）根據地對於我們發展贛南、閩西起了很大作用。由於有了這塊根據地軍民的掩護，我們從從容容地休整了一個星期，恢復了體力。」

如果你原先不知道這整段歷史，光憑閱讀到這裡就往下想像，你是無論如何想像，想像力再豐富，也不會想像到會有如下的結局：

毛澤東於 1931 年 5 月 30 日，於萬泰縣古坪村，槍斃了省行委書記李文林！臨刑前，李文林高呼：「共產黨萬歲！」時年 32 歲。

毛澤東的陰謀手法和步驟，大致如下：

第一步，打一派、拉一派，借刀殺人；其標誌為「二七會議」：矛盾是絕對的，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核心觀點，處處有矛盾，時時有矛盾，每事有矛盾，每物有矛盾，問題就是矛盾，差異就是矛盾，沒有矛盾就不成世界。贛西南特委內部在工作上存在意見分歧，併發展成派系鬥爭。一派以李文林為首，包括李白芳（特委秘書長）、龍超清（特委委員、西路行委書記）、叢允中（特委委員、贛西南路行委書記）、曾炳春（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常委兼軍事部長）、郭承祿（特委委員、北路行委書記）等人，是多數派。後來這些人悉數被毛槍斃，無一倖免。另一派以劉士奇為首，包括曾山、陳正人等，是少數派。這些人都成為毛培植的私人勢力。

為了嚴厲打擊李文林派，毛澤東於 1930 年 2 月 7 日在陂頭召開了聯席會議，這就是中共黨史上有名的「二七會議」。會後，毛澤東發出第一號公告，認為「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地布爾甚維克化。」

在毛澤東主持下，槍決了贛西南特委郭士俊、羅萬等所謂「四大黨官」。劉士奇寫給中央的報告說：「二七會議主要的意義，是打擊了黨內的机会主義取消思想，開除了大批的地主富農，使黨的路線走向布爾甚維克的精神。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為毛澤東後來利用打 AB 團來剷除李文林派，埋下了伏筆。

第二步，用打 AB 團捏造罪名，來借題發揮；由於毛的親信李韶九大搞逼供信，不但下令打人，還親手掌刑。濫殺無辜，激起「富田事變」。

毛澤東僅憑謠言，說是打下吉安後繳獲的文件涉及 AB 團，有一張收條便是蘇區一個地主用真名簽字的，這個地主是李文林的父親；便誣陷李文林是「AB 團總首領」。其實，所謂「文件」、「收條」，誰也沒有見過，況且，李文林的父親也不是地主，也不識字，根本不會簽字。從頭到尾，全是胡說八道。毛通過手中前總委書記的權力，在第一時間突然拘捕李文林。毛的如意算盤是利用當時肅反擴大化的混亂局面，將李文林及其同黨誣陷為 AB 團一舉剷除。

中共江西省最高領導人的被捕，令廣大軍民震驚與困惑不解，軍中出現對毛澤東及總前委不滿的情緒。

這場打 AB 團的運動來得極其迅猛，毛澤東將捕人權下放到團級，殺人權下放到師黨委。加上沒有任何的政策指導，很快就變成濫捕濫殺。在毛澤東及前委導演下，一個月的時間，紅一方面軍四萬人中就殺了幾十個總團長（AB 團的總團長）、四千四百餘個 AB 團。其中大部是江西的紅軍將士。這次被稱為「黃陂肅反」。有的老幹部回憶說，當時黃陂沙灘上，屍橫遍地，水都染紅了。

毛澤東及總前委致信江西省行委：「黨內地主富農分子現舉行大規模叛變，此問題在贛西南還是異常嚴重，必須運用敏捷手段立即鎮壓下去。」信中指令省委，「務必會同李同志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李同志」就是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總政治部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

李韶九揮舞著「尚方寶劍」，一到富田（省行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機關所在地），便立即驅兵包圍了省行委。逮捕了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

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金萬邦（省軍事部部長）、周冕（省政府財政部部長）、劉萬清（原紅四軍政治部主任）及任心達等八人。

李韶九等肅反人員發狂似地連續捕捉、審訊，使用地雷公、線香火、拷打、鐵烙、割乳、燒陰戶等各種殘酷、卑鄙的刑法（1930年12月段良弼給中央的報告）。李韶九大搞逼供信，不但下令打人，還親手掌刑。當時曾任中共安福縣縣委書記的汪安國回憶李韶九抓他AB團後審他的情況：「他擺出一副關公似的臉孔，大聲吆喝說，你是AB團嗎？快把你們的組織說出來！當時，桌上放了好些木棍、長竹片、烙鐵、繩索等刑具，我知道這是用來對付我的。當然我不能誤供我是AB團，於是，兩個大漢把我的上衣脫光，繼之李韶九親自動手，燒紅烙鐵在我背上腿上烙呀、燙呀，這我怎麼能受得了呢？我觀此情形知道，供認是死，不供認也是死，與其不供認受苦遲死，不如供得早死個痛快，就在這個思想支配下，供認了我自己是AB團。這樣李韶九才把我放下來。」就是這樣，李韶九在五天五夜刑訊逼供，屈打成招，在省委省蘇兩機關及政治保衛隊共破獲AB團120多名，要犯幾十名。槍斃省委交通和技術書記17人。第二天又槍斃24人，其中省行委7人。霎時間，江西省行委、省蘇政府機關和整個富田村野，陰雲密布，腥風血雨，到處瀰漫著紅色恐怖！老百姓驚恐不安，竊竊私語：「不得了啦，紅軍在殺紅軍，共產黨殺共產黨，湖南佬在殺江西佬……」

12月9日，李韶九帶著一個排從富田到東固紅20軍（由江西地方武裝組成）駐地，計劃在20軍中更大規模地抓AB團。174團政委劉敵聞訊後，於12月12日上午發動屬下一營官兵包圍了20軍軍部，捉起了李韶九（後逃脫）和毛澤東親信軍長劉鐵超，李帶來的一個排也被繳械，釋放了被捕的謝漢昌等人。下午，劉敵與謝漢昌又率部趕到富田，包圍了省行委、省政府機關，收繳警衛連的武器，釋放了被當作AB團而逮捕的100多人。毛澤東的親信曾山和古柏趁亂逃走。這就是震驚中共的「富田事變」。

15日夜晚，由段良弼為代理書記召開省行委第一次擴大會議。叢允中在會上報告了李韶九捕人刑訊的經過和原因，叢允中慷慨激昂，說李韶九捕捉AB團，大肆殺人的「近因」是，總前委書記毛澤東企圖將江西的忠實幹部一網打盡，造成清一色的毛黨，以穩穩地做皇帝；「遠因」是贛西南二中全会開除了劉士奇的黨籍，劉是毛的走狗。

第三步，對李韶九來說，他是「殺雞頭」，是為毛澤東擺宴；對毛澤東來說是「殺敵頭」，用肉體消滅的辦法來解決反對意見。來黨同伐異，斬草除根。據不完全統計，死在這場政治陰謀中的紅軍官兵與黨政幹部，達兩萬人之多，江西黨政幹部不剩幾個，至於紅20軍，從軍長蕭大鵬以下至副排長等全體幹部統統被拘捕，幾乎全體被殺，潰不成軍，番號取消。

1932年2月，陳毅調任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他對江西蘇區內肅出那麼多AB團給驚呆了，反對憑刑訊逼出的口供捕人，並釋放許多名「嫌疑者」。這可觸怒了李韶九。李冷笑著說：「過不了多久，我就要有匹好馬、好槍了！」陳毅聞之大怒：「老子是有好馬、好槍，誰敢來！」但李韶九品質極壞，且有毛澤東的尚方寶劍，陳也不得不加以提防。

有一天，陳毅被召去開會，暗忖說不定會像李文林，有去無回，遂特意交代年輕的妻子蕭菊英：「我去開會了。等到今天下午六點鐘我還沒有回來，你就快走，到你老家信豐藏起來。如果我沒事，我會派人把你接回來的。」

她等到六時，仍未見歸，誤以為是當作AB團抓走，其實沒被抓，是路遇敵人襲擊，馬被打死，遲至八時方歸。陳毅四處尋找愛妻不見，她竟跳井自殺了。陳毅撫屍痛哭，送葬回來，深夜憤書，吟詩挽妻：

泉台幽幽汝何之？

檢點遺篇幾首詩。

誰說而今人何在，

依稀門角見玉姿。

檢點遺篇幾首詩，

幾回讀罷幾回癡。

.....

尾聲：李韶九骨已成灰，毛澤東還要他當「替罪羊」。

蘇區中央局和代理書記項英認為：富田事變是「因為過去贛西南黨的路線和工作錯誤的結果——黨內一股無原則的小組織派別的鬥爭。」演進而成的。周恩來也批評毛澤東反 AB 團「簡單化」、「擴大化」、「乃至苦打成招，以殺人為兒戲」。王明上台，比李立三更左，他根據蘇聯的肅反經驗和國際「反右傾」的指示，認為「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而項英領導的「中央局解決富田事變的路線是完全錯誤的」。本來李文林已被項英釋放，當改由毛澤東取代項英任中央局書記後又再次拘捕李文林，並變本加厲，大事殘殺江西地方領導人。毛澤東是以反王明的左傾路線而起家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這是唯一的一次擁護王明路線。這裡就隱含著毛反 AB 團的險惡居心；同時，20 年後，毛輕描淡寫地承認了「錯誤」，卻找了李立三、王明，尤其是李韶九當了替罪羊。建國初期，他回答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說：「這是一個問題，那時兩次左傾路線占統治地位，肅反審查搞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輕信口供。在處理問題上，擴大化，簡單化，錯殺了自己人。」50 年代又說：是「李韶九搞的，搞得一塌糊塗。」（資料基本上是從《周恩來與毛澤東》第一、二章轉引而來，其中不乏照抄之處；也參考了其他材料如《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等）

毛澤東製造和處理這次事件的原委和始末，就是一部活脫脫的《矛盾論》，或者反過來說，《矛盾論》就是一部「窩裡斗」哲學。就詞的本意講，矛盾原本就是專指自相矛盾、內部矛盾、窩裡斗說的；即在「子」的內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果是到「子」的外部，以「子」之矛攻「人」之盾，或以「人」之矛攻「子」之盾，那就根本構不成矛盾的情景了，就不存在尷尬了。按《矛盾論》的原理講也是如此：構成矛盾的前提條件是，矛、盾雙方必須居於共同體中。例如炸彈，引起爆炸的矛盾雙方，一方在彈殼內、一方在彈殼外，就爆炸不成了，就構不成矛盾了。例子不勝枚舉，數學中正數與負數、物理中正電與負電、生物中雄性與雌性，各成一對矛盾；但正數與負電、正電與雌性、雄性與負數等，就不能構成一對矛盾，因為它們互為外部。所以，「內部」就是「矛盾」唯一的時空界定。人云亦云、有口皆雲的所謂「外部矛盾」，就說白了，誤入歧途了。對抗、對立、敵對、衝突、鬥爭、侵略、自衛、差異……組成了能夠用到「外部」的相應的詞彙。外部可以有不對抗、不衝突、不侵略……。友好、妥協、和平……的時候，內部卻沒有不矛盾的時候。我所以特別強調理論思維首重概念，不是咬文嚼字、專掘概念；而是因為進行邏輯思維靠的是概念與概念聯繫形成判斷，判斷與判斷聯繫形成推理；概念一混淆，判斷和推理就必然會跟著全都亂了套。貫穿毛澤東一生的個人的內部矛盾是甚麼呢？答曰：「既要最荒淫無恥的婊子又要樹高過世界屋頂的貞節牌坊。」這就是他自信能夠實現、其實無法實現的政治野心的實質。因為解決矛盾的途徑是，只能取其一，所謂「二者不可得兼」；如可「得兼」，就不存在矛盾了。毛澤東必然失敗的根源就在於，他雖研究了一輩子矛盾，但他的「人心不足蛇吞象」的個性硬要他超越矛盾。

從實踐上講，毛澤東在《矛盾論》中總結的基本上是內戰的經驗，而毛澤東最為熱衷和最為拿手的是「窩裡斗」。你可以在相形之下提出問題：以國內外講，他恨日本鬼子和蔣介石；恨誰狠呢？以黨內外講，他恨蔣介石和劉少奇；恨誰狠呢？以世界共運內外講，他恨赫魯曉夫和尼克松；到底恨誰比較狠些呢？從理論到實踐，毛澤東堅信不移，他的政治野心的實現或失落，取決於中共、中國、世界共運的內部矛盾的發展和結局。這就是他最為重視「內因」（即內部矛盾）的緣故：毛澤東的《矛盾論》是不打自招地表明：「國之內戰、黨之內斗，其元兇——捨我老毛其誰歟？！」而且事實也證明：老毛不死，國無寧日，黨無寧日，甚至要攪得天下大亂！

3，極端卑鄙

上面我們揭示了毛極端自私的兩個本質特點：極端貪婪和極端陰險，現在要說第三個特點：極端卑鄙。但這一點前面已多所涉及，況且在下面「三」裡還要作進一步的揭示，所以就不在這裡單獨論述了。接著來論述第四個特點。

4，極端黑暗

說他極端黑暗，是指他政治目的落伍、反動，政治過程黑箱作業，思想陰暗，道德淪喪，生活糜爛，造成中國社會比歐洲中世紀黑暗時期還嚴酷、還禁錮、還黑暗。

（1），政治目的落伍、反動，僅為一己之政治私慾就要人民做出無限犧牲。

反右派鬥爭的實質，就是毛澤東要扛住歷史的閘門，堵塞民主的潮流，倒撥歷史的車輪，抗拒世界現代文明的進展。

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中國掀開了現代史的第一頁。繼續挺舉和捍衛這面三民主義旗幟的，是領導北伐、打倒軍閥的蔣總司令，是領導浴血抗戰、取得中國近代史上反侵略戰爭第一次全面勝利的蔣委員長。從此，中美英蘇並稱「世界四大強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是治國無能、亂國有罪的毛澤東，反民主共和之動，復君主專制之辟，推翻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建立了「人民共和國」其名的法西斯政權。從此，大陸同胞陷入挨「解放」之中；中國人民站出來了！（開鬥爭會時，總是喝斥鬥爭對象：「叫他站出來！」）

對這個政權的定性，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至今仍未獲「改正」的右派份子林希翎女士，當年把它叫做「封建的社會主義」；林彪副統帥在《571 工程紀要》中寫道：「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壓的絞肉機，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他是一個借馬列之皮、效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相形之下，總設計師鄧小平就說得輕描淡寫多了。他在回答奧女士「是毛主席選擇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國王選擇繼承人那樣」時說：「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他談到「搞特權」時說，「這是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鄧小平文選〉二卷第 305 和 292 頁）可鄧小平「自己」（也是自己！）卻把第三代和第四代接班人，連兒帶孫一併「選擇」了出來。所以，也就甭單說某人或某事「是沿用了封建主義的做法」或「封建主義殘餘尚未肅清的表現」了。乾脆說：「這是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鄧小平理論發展的就是這個東西。」說是「科學體系」絕非誣指，李銳先生提供旁證：1950 年 5、1 勞動節，是毛親手加上了最後一句口號：「毛主席萬歲！」的。當年孫中山曾怒斥、力拒別人喊他「萬歲」，認為既推翻了帝制，就要消滅這一套封建玩藝。至於到文革時，「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更是喊聲震天動地，讓他過足了皇帝癮。

從大學生到副統帥，到總設計師，三個人程度不同地都承認了毛共政權是封建主義性質的。而我則說，它只承襲了封建主義的糟粕；馬克思說的封建社會的「脈脈溫情」；孔子說的「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溫良恭儉讓」；孟子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老百姓說的「納了糧，自在王」等等，都叫毛驗明正身，執行了槍決。還有，在經濟上，封建社會還有大量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即便按馬列的說法，農民也還有半獨立人格。可解放後呢，說地主、富農、資本家是剝奪者，他們共產黨要剝奪剝奪者。而農民的遭遇又怎麼樣呢？共產黨搞了借刀殺人、借題發揮、借頭過關的土地改革，農民剛分到土地，不久就來了合作化，土地便又倒手被變相剝奪了去。接著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吃飯在公共食堂，組織是軍事化營（生產大隊）、連（生產隊）、排（小組）；生產戰鬥化，勞動是大兵團作戰；生活紀律化，農民成了社員，一切行動聽指揮，完全身不由己，甚至連農民的生活資料如家禽、家畜、樹木樑櫟、銅杓鐵鍋……也被無償地收公，屬於他的財產只有隨身帶的「一雙筷子、一個碗，還有一個舖蓋卷。」別說你的財產權，即便你自己的身子，也成了「磨道的驢——但聽喝」，任人調撥。你是個六、七十歲的老人，也得服從命令上山去大煉鋼鐵；有的小腳老太太用手巾包幾個石子搬來運去。農民連封建社會的半人格也沒有了，反而又兼具奴隸社會的奴隸身份了。當然，不止是農民，而是全民！北京大學才女、當代中國崇高人格的代表、右派份子林昭女士，以「中世紀的遺址」、「奴隸社會」，直接定義這個「極權主義」政權；歷史學家辛灝年說：「中國大陸全體人民，在實際上便成了在奴隸制度下的，無任何人權與民權的奴隸而已。」（《誰是新中國》第 567 頁）這是何等地準確、透徹、全面、毫不含糊啊！說中共政權是封建主義固然有道理，但它卻更具有奴隸制度的特徵：士、農、工、商不就是士奴、工奴、農奴、商奴嗎？黑五類不就是黔面的罪奴嗎？

孫中山先生說他的三民主義是發財主義，為大家謀發財。這個主義不但不侵犯私有財產，而且增加你的私有量。但是，決不能損公肥私。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任何人、任何黨派不可得而私也。革君主的命就是要將天下還給天下人，是謂「天下為公」，是謂「博愛」。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兇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選集》。五卷第 198 頁）他聲嘶力竭地教唆不要講良心，不要仁慈；想達到甚麼目的呢？我們經過痛苦的觀察、血淚的體驗、科學的分析研究，得知毛的共產社會，是封建社會、奴隸社會、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擇劣組合：極端貪婪地「共」別人的「產」，就造成了「人人為公，天下為私」的局面。天下為最高奴隸主毛一人得而私也，再擴而大之，成為全世界的奴隸主，這就是毛的終極關懷；說別的，都是假的。據別人揭露，右派份子章伯鈞早已對中國這種局面有所覺察，他曾說過：「中國這樣大，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當時黨員數），統治著五億農奴，非造反不行。」（1957 年 7 月 9 日，《人民日報》）

揭示毛政治上的反動落後、開倒車，可以從他的極端獨裁、濫殺無辜、路線鬥爭採取肉體消滅、階級鬥爭為綱、破壞科教、文化、藝術、生產等等數之不可勝數的各個方面；但考慮到中國的主體是農民，按毛澤東思想講，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是解決農民問題，而農民又是毛打天下的主力軍。因而，弄清毛是怎樣對待農民的，其他問題自當皆可觸類旁通。

如上已述，土地改革，農民分到土地，這是得到的唯一實惠。但也不是白吃的午餐，而是以前線上農民的兒子積屍如山為代價（當毛主席拿著紅藍鉛筆，在跟解放軍將領笑談「人海戰術」、規劃攻城戰役的時候，說：「我們準備犧牲 20 萬戰士，。拿下這座城市。」這時候就會有 20 萬個活體，通過毛的筆尖變為屍體。）。隨後合作化，土地就又給「共產」了。叫農民繳公糧、賣餘糧，實行統購統銷，用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盤剝農民，用戶口政策使農民淪為二等國民。受到不平等待遇，例如就業、子女升學、衛生醫療、統銷物品及其它緊

缺物品憑證票券等的供應；特別是在餓死的四千多萬人中絕大多數是可憐的農民；而毛澤東哄騙得他們團團轉的，是讓他們殘害地主、富農及其子弟，平時歧視他們，佔他們的光，讓他們干髒活、累活。得低工分，貧下中農優先干俏活（活輕工分高，例如培養一種肥料菌種「九二〇」。因他們缺乏科學知識，又不肯鑽研，結果都失敗了。反正只要高工分拿到手就算。民謠作證：「九二〇，九二〇，養了一班兒寄生蟲。」）；在開會，或運動中，要地富站到或跪到前面挨鎮壓、挨鬥爭，是家常便飯；還要做懲罰性的義務勞動：剝奪一切權利，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這就使貧下中農產生優越感，感謝毛主席讓他們翻了身，把地主、富農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輪到了我們在你們頭上拉死拉屎了！」到了憶苦思甜的時候，還可以給他們甩一臉鼻涕、唾沫。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永遠跟著毛主席，世世代代不忘本！貧下中農並且被嚇唬：地富夢裡都在想復辟，一旦地富復辟，我們就要千百萬人頭落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然後就言出法隨，就唆使農民鬥爭幾個階級敵人，要他們交代復辟夢、變天帳。這就是為甚麼毛把農民害到這一地步，還能受到「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歌頌的原因。河南省副省長、河南大學老教授、民盟中委、河南省主委、右派份子王毅齋先生，因看到農民受共產黨的危害，而又不辨好歹，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憤然說道：「黨團員帶頭賣餘糧，現在沒啥吃，餓死這些孬孫，活該！」（《河南日報》1957年7月26日）要說「活該」，不僅是農民活該，知識份子也活該，民主黨派也活該，你王老也活該，我劃右派、住監獄也活該；誰叫我們以擁護邪惡的共產黨為進步、為光榮來？埋怨「活該」無濟於事，不如總結教訓而利於行。但願你、我、他，誰也不要再辦「活該」自食其果的蠢事了。

由於毛極端自私的本質，決定了他「寧負天下人」；把「為人民服務」當作「羊頭」掛，。而實際上置人民於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的苦難之中，走共同貧困的道路。這便是毛所謂「革命」的真諦。和充分體現這個真諦的年年革、月月革、天天革的革命的歷程，請看他的革命哲學——下面我要原字原句，照抄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封面標明「高等教育哲學教材」，由郭建寧主編的《當代中國哲學綱要》第114頁上的「1，窮社會主義」（無需我指明，這是具有官方性質的觀點）：

列寧說過：「由於歷史進程的曲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愈落後，它由舊的資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係就愈困難。」60年代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中，明確地否定了列寧的上述觀點。他寫道：「列寧說過『國家愈落後，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就愈困難』現在看來，這種說法不正確。實際上，經濟愈落後，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就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難。人愈窮，越要革命。」毛澤東這段話，反映了他越落後越容易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信念。而這一信念，又集中體現在他對「一窮二白」的讚賞上。

毛澤東最早論述「一窮二白」的意思，是在1956年2月，當時還叫「一空二白」，是他在2月14日聽取34個部委匯報時的插話中提出的。他認為中國工業發展的速度可以超過蘇聯：「中國的好處，一曰空，二曰白，一點負擔都沒有。美國在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也是很快的。蘇聯開始也是白。富了不行。」後來公開發表時，改為「一窮二白」。這是在1956年4月《論十大關係》的末尾，他說：「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不高。從發展的觀點看，這並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科學技術水平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1958年6月1日，《紅旗》創刊號發表了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文章說：「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這裡，毛澤東看到一張白紙沒有負擔，但卻忽略了一

張白紙也是沒有基礎啊。（紫丹按：毛未曾「忽略」，只是白紙更利於他筆意縱橫、肆意揮毫。他說：「唐僧這個集團，豬八戒較簡單可以原諒，孫悟空沒有緊箍咒不行。」可見不簡單即不白，就要戴緊箍咒，即戴右派帽子。）

在由衷地讚賞「一窮二白」的同時，毛澤東對「富」表示了深深的擔憂。他認為，現在中國人生活水平低，文化水平低，「中國變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準，她就不需要革命了。西方世界的財富已成了他們的缺點，這些缺點使其不再想革命……。他們生活的高水準，還沒有我們的文盲來得好。」

據此，他對農村中富裕中農不敢冒富大加讚賞，認為是好事。他在 1958 年 3 月 23 日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河南的富裕中農有好東西不讓幹部看，裝窮。無人時才向貨郎擔買布。我看很好，這表示貧下中農威力大，使得富裕中農不敢冒尖，這說明社會主義大有希望。」

1959 年底和 1960 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經過階級鬥爭，搞臭了地主『富農，農民以窮為榮，以富為丑，這是個好現象，這說明貧農已在政治上壓倒了富農，而樹立了自己在農村的優勢。」他還對外國評論「窮是中國躍進的動力」的觀點表示讚賞，認為這話講得好，因為窮就有壓力，就要革命，就要不斷進取。「富了，事情就不妙，中國現在不富，將來富了，也一定會發生問題。」

1964 年，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不僅表示了對資本主義「富」的擔憂，同時也表示了對修正主義「富」的擔憂。他說「不要老是掙錢，掙來了錢就亂花錢……。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按政策，必要時可以收買，對無產階級知識份子，為甚麼要收買？錢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圍的人……。蘇聯高薪階層，先出現在文藝界。」

文化大革命末期，毛澤東以窮為榮的思想發展得更為嚴重。1973 年 6 月，他說，中國是個很窮的國家，我看，越窮越好，就想革命啊！1975 年 9 月，他在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還說，中國現在還很窮，窮了好，比你們富好，人一窮，他就要鬥爭。

從以上毛澤東的論述可以看出：窮是光榮，窮要革命，窮比富好，富了，就不妙了，是貫徹毛澤東社會主義觀的一個重要思想。

* * *

抄書至此，喟然興歎：就算是歷史上的暴君加昏君，也只是暴虐無道、驕奢淫逸，只顧自己享樂，不管百姓死活，或因昏庸無能搞得民不聊生。有誰像毛一樣，居心（居然是居心！）要讓老百姓掙扎在飢餓線上以保持其所謂的「革命性」呢？他惟恐人民不窮、不白，他不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畫最新最美的畫圖！相當初，人民跟他鬧革命，流血犧牲，不就是為了過上好時光嗎？現在成了屎殼螂攆屁撲了空：「目的是沒有（？）的，革命，革命，再革命！革命就是一切！炮灰就是革命的價值觀！」

因為我出獄後又在農村監督勞動十六、七年，所以對農村、農民比較瞭解。農民把這種飢餓政策理解為「餓鷹策略」。他們說：「打魚人只有讓漁鷹總是餓著肚子，它才有下河逮魚的積極性，一但吃飽，它就懶了，不動了。」他們還有諸如此類的一系列只有文盲才會有的說法：「社會主義制肚（度）——社會主義是專門制人民的肚的」；「社會主義腫（總）路線——社會主義是一條叫全民浮腫的路線」；「社會主義高草（潮）——農民聽幹部宣講毛主席編寫的《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說：「合作化前，從沒見過田間的草長這麼高；原來這就是主席說的『農村的社會主義高草』！」；「人民公社是瞧糧（橋樑），共產主義是天堂——入了公社，瞧著糧食大車小車都繳上去了，恐怕到不了共產主義就全都進了天堂」；另有，農民與布谷鳥對話：

」布谷布谷！你吃的啥飯？」

「菜湯糊糊，菜湯糊糊。」

「你咋不吃五穀？」

「糧食制度！糧食制度！」

為了革命，必須「餓鷹」。這就無怪乎誰主張發展生產力，毛就給誰扣上「唯生產力論」的大帽子，給予斗倒斗臭了。文革時，哪個領導人提倡「抓革命促生產」（本是毛提的左傾口號），他就指責你意在以生產壓革命。

毛澤東思想是主張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這個革命勝利了，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一階段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中國的命革了一個段落，就該由中國的工農用小米加步槍去解放那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二的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洋階級弟兄。假定全世界一片紅彤彤，革命化了，即都過上喝大鍋清水湯和三人的布票夠買一條褲子的日子，這時若問：被激發出的「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的勁頭是否該指向外星球？以爭當「世界革命導師」為革命唯一目標的毛澤東，已死不瞑目於陰曹地府；雖然他的徒子徒孫們掀起一陣陣毛澤東熱為其招魂，但他已變為分子、原子、電子、質子、毛子……重新組合而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經過一個輪迴，毛澤東總算對農田作出了有益的貢獻，實現了產生於延安整風時的毛澤東說的「狗屎可以肥田」。而後，於 1957 年又產生了一個同價命題：「毒草可以作肥料」。

（2），政治品質極端惡劣；政治制度獨裁極權，他個人可以恣意妄為，無法無天。

鄧小平一再申誡：「毛澤東同志的錯誤，決不能歸結為個人品質問題。」（56）毛個人的品質太惡劣了。顯而易見、不爭的事實是，從政治上說他是個陰謀家，從人品上講他是個淫棍。鄧對這一點不是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嗎？所以他只有雙手摀住這個裹捲著膿血的包，把毛的「錯誤」歸結為制度方面的問題，「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致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甚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58）

這個「不好的制度」壞在甚麼地方呢？他指出五點（用毛制定的、鄧執行的「六條標準」衡量，鄧的如下言論，肯定該劃極右派、大毒草一紫丹，下同）；

1，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這是 57 年右派向共產黨「猖狂進攻」的第一條）。

2，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甚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而變成了個人領導。（蒲熙修揭發羅隆基在床第之上說過「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領袖個人獨裁」的右派言論）

3，革命隊伍內的家長製作風，除了使個人高度集權以外，還使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家長式的人物，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這一點，北京大學右派學生王書瑤早已深刻指出：「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史達林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甚至

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不應把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搞成毛澤東同志多次批評過的貓鼠關係，搞成舊社會那種君臣父子關係或幫派關係。

4，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的形成，同封建主義影響有一定關係，同我們黨一直沒有妥善的退休解職辦法也有關係。（儲安平說得更徹底，廢除黨天下，不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5，搞特權，這是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主義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比較少（「比較少」也是還「有」。你鄧小平也不得不承認從前是多、少的問題，而你們卻把它變成為有、無的問題了。現在已看得很清楚，國民黨時期的民主比你們要多得多！儲安平在解放前就指出了。）。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

由於鄧小平在文革中受到某種程度的迫害，所以他不像華國鋒那樣純粹的得利者處處搞『兩個凡是』，而是承認毛犯了錯誤。但又由於他也得利不菲，曾是參與毛罪惡活動的重要共犯，而且為今後利益盤算，他就採取了以「逮住老鼠」為目的的機會主義、實用主義態度，僅僅指出和否定一些連他也不堪忍受的弊端，相反，如果他與華國鋒配合，也搞「兩個凡是」，那就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這樣一來，別說逮鼠了，連貓的本命也完蛋了，這裡存在著不可調和的衝突。那麼，不搞「兩個凡是」，只認「實事求是」行不行？沒門兒的事。因為他和共產黨都「實事求是」不起。這就是為甚麼鄧要求「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原來講要實事求是，以後加一個要恰如其分，就是這個意思。」（59）這個意思的「妙諦」就是絕對不能完全實事求是，只能實事求是到一定程度為止，例如，把罪大惡極只許說成是普通的錯誤；完全的錯誤只能承認是三分錯誤；錯誤的主要罪責要找替罪羊林彪、四人幫來承擔；留下的，鄧自告奮勇要分擔，並還要把被毛打發去見馬克思的劉少奇、周恩來也拉來陪綁，「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接著說：「當然，在那個條件下，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既然「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那還說甚麼「我們也確實沒有反對過。」？既然如此，還說「應當承擔」云云，這在邏輯上怎能站得住腳呢？人們不禁要問：「鄧是在自打嘴巴，還是在說廢話！」

鄧小平不是居心要說廢話，而是護毛氏利益共同體心切，所以居心要說的不是廢話而是謊話，「真實情況」是他居心要騙人。所謂「恰到好處」，就是，該實事求是就實事求是，該撒謊就撒謊；做婊子與樹牌坊兩不誤。再想一想，難道真的如他所說，「都沒有反對過」嗎？周恩來、陳雲等反冒進，毛整肅得他們還輕？差一點兒把總理換成柯慶施，有人統計，光是1958年，毛就批「反冒進」13次。後來硬是讓周恩來坐了二、三年冷板凳，比在延安那次整得他還厲害！難道這是屬於「沒有反對過」嗎？再者，毛為甚麼要批鄧子恢「小腳女人」呢？劉少奇在「三面紅旗」、「三自一包」、「四清運動」等問題上不也總是與毛「褲襠裡放屁——到兩岔裡」嗎？彭、黃、張、周為甚麼被打倒？甚至小人物鄧托、田家英為甚麼要自殺？對此屈指難數的，還有比這更多、更隱密的「真實情況」，作為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比任何人都瞭解得更清楚。所以人們會向鄧總書記發問：「你的許多說法，是自欺呢還是欺人？還是如蘇聯駐聯合國大使維辛斯基說的：『誰不願意信誰別信，誰也擋不住我撒謊！』？」

因為是假話，所以就往往前言不照後語。毛的罪大惡極，本具有陰險毒辣、荒謬絕倫、卑鄙無恥的、流氓的性質，但鄧小平忌諱歸結為毛主觀的品質問題，而要拉「客觀」，即歸結為制度方面的原因。可這就與以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官定說法撞了車！

社會主義是帶著病入膏肓來到人間的，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洩露了這一天機。當時鐵托把斯大林的罪惡歸結為「是一種制度的產物」，「這裡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是一種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為了捂蓋子，發表了兩篇文章，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與鐵托針鋒相對，理直氣壯地斷言：「斯大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為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

事到如今，出現了難題：是「糾正」毛澤東的私人品質，還是「糾正」社會主義制度？鄧清楚地知道，毛的品質是臭而不可聞也，一揭，臭氣熏天，準會喪盡黨的「歷史光輝」，甚至陳雲說：「我們這些人也站不住腳。」自然的結果，便是毛與黨偕亡。鄧小平根據「貓論」的基本原理，決定不學赫魯曉夫揭露、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品質」，權且對《再論》這個經過政治局正經八百的討論而作出的定調，來個不宣而廢；鄧要來「糾正」社會主義制度，但也並不真糾正，只是輕描淡寫、吞吞吐吐地說成是「受了歷史上封建主義的殘餘影響」而已。與鄧小平的「殘餘影響論」相比，倒是林副統帥對這個「沒有毛主席就沒有」的「新中國」的社會性質，說得痛快，態度老實：「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他是一個借馬列之皮、效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571 工程紀要》）林說的「互相殘殺」是不太對的，因為絞肉機掌握在毛手裡，只是他單向地殘殺臣民；林倒是被逼，想「互相」一次，可惜也沒有成功。

鄧小平以毛「晚年的錯誤」劃框框，以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為遁詞，把罪責推給中國的歷史文化。現在讓我以鄧和林的共識一家長制為例，來進行剖析：

鄧說：「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直比較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鄧小平選集》二卷第 290 頁）

這首先與眾所周知的事實不合，誰不知道他的專斷獨行的劣根性其來有自？跟遵義會議前，肉體消滅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英及富田事件大屠殺一脈相承的，遵義會議後的延安整風，殘酷鬥爭，冤殺無辜，不是鐵的史實嗎？

其次，又與邏輯相背：說不通怎麼後來會來一個突變呢？問題的實質是，這段期間劉少奇、鄧小平這些毛派分子掌權，對主子的家長制逢迎有加；周恩來、李立三等這些原非毛派的分子，都已成為惡婆婆面前臨淵履冰的小媳婦；汝不見毛對周恩來等欺人太甚、至死方休嗎？待中共受蘇共影響，在八大上提出反對個人崇拜，把以他的思想為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從黨章中去掉，他便一觸即跳；及至廬山會議，彭德懷站在非常正確的一面，又以非常正確的途徑「觸」了一下，他便歇斯裡地跳了八丈高。

事實是，不僅他是搞家長制的，其他中共領袖，如鄧所說：「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都是搞家長制的。」（同上，289 頁）讓時間順延至今，你鄧小平是不是搞家長制的？他江澤民是搞甚麼制的？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你們的家長制使你們的國家機器變成了絞肉機。鄧又說：「這種現象，……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同上）——這總算是應該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之外的因素吧！辛灝年先生曾指出過：「他們硬要將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拉來為中共的犯罪現實作替罪羊罷了。」（《誰是新中國》第 564 頁）

試看與中國文化不沾邊的國際共運：被毛奉為教皇的列寧、斯大林，「唇齒相依」的金日成父子，「天涯若毗鄰」的霍查，全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波爾布特，……哪一個不是搞家長制的？哪一國的絞肉機不是機器隆隆，血肉橫飛？波爾布特政權，竟能夠絞殺 200 萬人民，包括 20 萬華僑，而柬埔寨人口總共還不到 800 萬人呀！

說它是封建主義，不錯，但它更惡劣，前面說過，它拒絕了封建主義的精華部份；說它是法西斯主義，更對，但它在消滅私有制，把人民剝奪得精光這一點上，在思想控制上，卻是德、意、日任何一國法西斯所望塵莫及的。北大右派學生領袖譚天榮在物理系同學的辯論會上發言道：「現在的出版自由還不及資產階級社會，比不上希特勒德國……比希特勒的檢查制度還要糟。」說它是吃人的社會，這是明擺著的事實，成個、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上億地吃！它的領袖是吃人魔王，吃肉不吐骨頭。總之，把它與甚麼相比，它總比甚麼都壞，所以就別比喻它是別的甚麼了，它就是它自己，是讓人人充「公」、天下為「私」的共產制度。

毛黑、手黑、政治操作過程是黑箱作業。最近，張戎的書《毛澤東：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問世，簡直是引起一片驚呼。書名便回答了驚呼的原因。前香港總督、牛津大學校長彭定康在《泰晤士報》上評論道：「誰是 20 世紀最邪惡的暴君：希特勒？斯大林？波爾布特？讀者在讀了張戎的書後都會確信：中共前主席毛澤東是最邪惡的暴君。張戎重寫了現代中國歷史，這是一本具有爆炸性的書。」英國的《每日郵報》評論道：「沒有幾本書是注定可以改變歷史的，但這一本書將改變歷史。」《觀察家報》說：「這本書所揭露的事實，將會把我們對毛澤東的看法全部都推翻。」《每日電訊報》說：「20 世紀犯的最大的錯誤中，西方的左派、政客等對毛澤東的熱情是最愚蠢的。」左派固然愚蠢，我是右派，右派就不愚蠢嗎？同樣愚蠢。問題是中共的黑箱太嚴密了。張戎夫婦在 12 年中查閱了很多檔案，但是，裹捲著最大量膿血的檔案的大本營，被鐵封在中國。所以，我以受共產黨半個多世紀迫害的經歷斷定張戎有朝一日仍會感歎：「事實證明，我的這一想法，還是將共產黨估計得太好了。」——這句話寫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 451 頁上，是與毛 22 年朝夕相處的李志綏說的，我作出這個「斷定」的根據有二：一是每次新的檔案材料解密，都會讓世人再次目瞪口呆；二是，毛澤東、共產黨之壞，是能把人們的想像力考驗垮的。無論你往多壞處想像它，當新的材料暴露時，你仍會重複一次李志綏先生的經驗：「事實證明，我的這一想法，還是將共產黨估計得太好了。」我再舉一個人所周知的例子：許多人，包括林彪、「四五運動」的群眾和民主人士，都覺得罵毛為秦始皇就夠狠了。但毛卻回答：「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 460 個儒，我們坑了 46000 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 100 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這個例子說明，你估計他的壞，只是他實際壞的 1%。在別的地方也然，只不過，他不一定像在這裡這樣恬不知恥地承認就是了。

張戎說：「毛澤東的真實人生確實告訴了我，也告訴了人類，其實民族的災難是人禍，中國人是毛澤東要稱霸世界的野心的實驗品。」（見《世界週報》NO. 1109 第 20 頁）她說的話很平凡，道出了平凡的真理，卻揭示出毛最本質的品質，和中共製造的悲慘人禍的罪惡之源。

順著鄧小平的思路，便會提出：制度與人是甚麼關係？制度是制（約）人的，又是人制（造）的。共產制度與毛澤東是壞制度與壞人的關係，於是乎，毛澤東選擇了共產極權制度，和共產極權制度選擇了毛澤東，彼此是如魚得水、如虎添翼；毛澤東造就了共產極權制度，和共產極權制度造就了毛澤東彼此是雞蛋互生、狼狽為奸。所以說，毛澤東壞多很，共產極權就壞多很；共產極權壞多很，毛澤東就壞多很，互相促進，推波助瀾，惡性膨脹，壞上加壞，卒致壞到「史無前例」。認定這點，就不會為換湯不換藥所迷惑。如果一個領袖人物如陳獨秀，或瞿秋白、彭德懷、胡耀邦等，身上具有與共產極權不相容的素質，則必定遭到被排斥的下場。所有能如魚得水者，皆為一丘之貉。牟宗三說：「共產黨耍的那些文字魔術，都是沒有意義的話，你聽他那些話幹甚麼呢？偏偏有些人利用這個機會，去捧葉劍英、鄧小平，你捧他作甚麼呢？其實，說穿了，還不是一丘之貉。當年鄧小平作副總理的時候，還不是順

著毛澤東的話轉，還不是一樣地拍馬屁。根本的關鍵在於共產黨的本質即是徹頭徹尾的摧殘、斲喪人的廉恥。」（同上引牟宗三語）

至於毛澤東與孫中山創建的三民主義、共和制度，則是壞人與好制度的關係。壞人必然要破壞好制度。因為，如鄧所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而他偏偏要「任意橫行」，要「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所以他就要選擇具有奴隸主、封建主，兼具法西斯性質的一人專權的共產制度了。這也就是他為甚麼要選擇「一邊倒」的個人政治動機。張戎震撼世界的新書要說明的，歸結為一點就是：「他（毛）的一生從頭到尾就是推翻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復辟了封建君主制。」（《世界週刊》，NO. 1109）換成鬼話來表述，就是：「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只要是生活於其中、秉承良心、敢於正視現實的，都和李志綏先生一樣，認清了所謂的「新中國」是復辟了清朝般腐爛的舊中國：「這幾年的生活，對我的精神是極大的打擊。我所期望的『新中國』（引號是李志綏原有的一紫丹），已經是《紅樓夢》中的賈府」（《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 340 頁）以同樣的鐵的事實根據，以同樣的不可反駁的邏輯論證，運用同樣的精確的語言文字，表達同樣明朗而毫不含糊的科學觀點，得出同樣的如泰山般堅挺不拔的結論的，是辛灝年先生的嘔心瀝血的巨著《誰是新中國》；僅從書名，就可以窺知其論述主題具有極大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毛為使這個血腥的制度，社會的腫瘤，不被人民割除，不被黨內修正，他在選接班人上煞費苦心，算盡機關，要留下惡性腫瘤的遺傳基因。他選劉少奇，廢掉；選林彪，廢掉；病中交班，選周恩來，也作廢；選王洪文、鄧小平、還有不知何故胎死腹中的毛遠新，統統作廢；最後選了華國鋒，「你辦事，我放心。」對此，〈晚年周恩來〉一書揭露真相，說明他並不「放心」：

「鑒於黨內外翻案勢力的公然挑戰，毛澤東決定加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和部署身後的人事安排。他知道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不得人心，讓人傳話給張春橋，要他『讓一下』，轉而點名指定『老實人』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上迷人耳目；同時以『生病』為由，把和周恩來靠得太緊的葉劍英『掛』起來，改由與毛遠新關係密切的陳錫聯出掌軍權。 [大陸直連看禁書禁聞禁文禁網禁片禁歌禁曲](#)

「事實上，毛澤東的這種安排，骨子裡打的主意仍是讓黨內文革派掌權。為此，毛在把華扶上來後，又特意向他交代：『如有事，找江青。』二月五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擴大傳達至黨內外群眾。」（第 604 頁）

說明毛澤東耍陰謀，活到老，耍到老。本文前已指出，他要在死後要江青作黨的領導人，「抓黨務的要硬，不能含糊、左右搖擺，這一點江青有資本，能管理好。」這就決定了華只能是個橋樑人物，華對此也心知肚明，所以他要「一舉粉碎四人幫」，以防他們過河拆橋。但他在劫難逃，終未躲過鄧小平的過河拆橋。華祭出「兩個凡是」也無法改變自己的政治宿命。毛在政治上為所欲為，到了荒唐的程度。他把選定的接班人載入黨章和憲法。可黨章和憲法上都明文規定，黨和國家領袖是要在全國代表大會上選出的。下一屆你毛澤東當不當主席？從法理說，不能鐵定。你都不一定當選，卻把你的接班人法定下來，這不太滑天下之大稽了嗎？其實，在黨文化裡，這一點兒都不足為奇。看一例而知天下烏鴉一般黑：惡貫滿盈的齊奧塞斯庫，被人民處死。卻是在此前召開的羅馬尼亞全國黨代會上，全票當選的最高領導人，當然也少不了暴風雨般的掌聲長達 X 分鐘。這種「激動人心」的場面我們不是司空見慣了嗎？它足以說明：共產制度下的憲章、黨章、代表、代表大會、群眾集會等……，統統不過是分文不值的擺設一類的玩藝。不過，毛的做法也太奚落了這些玩藝兒。在這裡也同時說明，你再也別把經過導演的所謂的群眾呀，代表大會呀的山呼海擁，看成是得民心的表現了。說不定「激動人心」的下一步就是完他的蛋！我將此命名為「齊奧塞斯庫現象」。赫魯曉夫鞭屍

斯大林；華國鋒在「主席屍骨未寒」（江青語）時就一舉粉碎他的文革派；這都有點兒齊奧塞斯庫現象的味道兒。

中篇：教訓篇（之 七）（3）， 思想意識腐朽、生活作風糜爛。

毛澤東思想是一種極端落後、腐朽、反動透頂的思想，是封建主義、奴隸主義、社會法西斯主義之擇劣組合，是國產的糟粕與「一聲炮響」送來的洋垃圾之雜拌。一句話，他改善從惡，集一切 落後、反動之大成。

長期跟隨毛身邊的李志綏，在回憶錄中寫道：「毛從未跟我用過『現代化』這個詞。毛不是現代人……」（第 120 頁）

曾對毛澤東有過深入研究的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說：「我特別重視毛絕口不言『現代化』這一事實。李志綏由此而推斷他不是一個現代人，也是毫無可疑的。我想這件事的重要性主要在於反映了毛對於現代世界的驚人無知，這個無知表現在 1949 年以後他的所有決策上面，從人口問題、大躍進的畝產萬斤和土法煉鋼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最高指示』都是明證。他之不具備起碼的現代知識，尤其集中地暴露在他關於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種種描繪上面，……特別值得研究。他的思想基本上未出康有為《大同書》的範圍，有時甚至倒退到漢末張魯的『義捨』、『義米』等簡陋的教團組織上去了。1958 年 10 月山東范縣搞了一場三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方案，訂下畝產兩萬斤糧食的指標，還附上了一首『吃喝穿用不要錢』的順口溜。任何稍具現代常識的人都只能把這件事當作笑話看。但是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竟作了如下的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緊嘛，三年不成，順延也可以嘛。』

「舉此一例，即可見毛的知識和思想究竟達到了甚麼樣的程度？我並無嘲笑毛之意。特別是我記起了 70 年代海外的中國的知識份子，包括許多著名的學者科學家，對毛的『遠見』曾怎樣崇拜過、歌頌過，我更不能對毛加以譏評了。我故意不提大陸上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不但沒有說話的自由，而且也沒有沉默的自由。

「毛雖然屬於『五四』的一代，但是他和『民主』、『科學』是無緣的。」（54）

我再提供一個旁證，說明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毛澤東根本不屬於新文化運動的文人群。在研究《毛澤東的文化性格》的一書中寫道：「一個頗可揣摩的現象是，致力於新文化運動的文人，特別是革命隊伍和黨內的文化人、知識份子，成為毛澤東的私交朋友的卻不多。」而他的朋友如章伯釗，自己就承認：「反動，而不反共」。其實，他的所有狐朋狗友如張瀾、李濟深、張治中、邵力子、程潛、柳亞子等，任誰都可用此言以蔽之。

毛不僅僅是「對現代世界的驚人無知」，而且其性格的剛愎自用與政治上的極端反動相結合，鬧出許多既可惡又可笑的事情。他在國內的倒行逆施就不提了；現在要說，1973 年 11 月 12 日，毛澤東不解地問基辛格：「為甚麼你們國內，對『水門事件』這個屁事那麼在乎？」毛作為權力無邊的帝王，怎麼也不理解「水門事件」：怎麼因為幾帶膠卷就能把一個總統給彈劾掉？不解還不算，他還要向美國民意挑戰：你們彈劾總統，我要邀請尼克松總統訪華。！他的這一舉動，惹得美國人民非常反感。如果美國人民憶起當年毛譏諷他們的國務卿艾奇遜現代史知識等於零，那麼，現在是否會反唇相譏毛的現代民主政治知識等於負數呢？因為他在現代民主政治面前竟要起二百五！這個事例倒是能幫助人們理解：為甚麼袁世凱當了大總統還一意要當皇帝？兩個稱呼，標誌了兩個政治範疇：共和和帝制。

毛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意思是披著馬克思主義衣冠的皇帝。其實他對歷史上的許多昏君的暴虐無道、荒淫無恥之處，往往倍加稱讚，如對殷紂王殺進諫的老幹部比干，認為「當然要殺掉」；李志綏說：「武則天疑心過大，告密過濫，殺人過多。」毛說：「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這些人的陰謀呢？將想殺死她的人殺掉，有甚麼不應該？」（55）從這一點看，更應該說他是「斯大林加武則天」。我相信將來中共的檔案一旦解密，你就去看揭去周吳鄭王假面具的毛周圍的人，包括所有的黨政要人、軍事將領，是如何地互相告密、互相出賣以邀寵於毛的吧！李志綏說毛把侍候他的所謂「一組」的人，都變成小人。這個事實，還應該更加擴大，毛要全國的人經過思想改造都變成康生那樣的小人（康是在毛跟前受寵至死的唯一人），互相誣陷，狗咬狗，窩裡斗，「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單以告密成風，冤獄遍全國，就足以說明毛澤東既是秦始皇的，又是武則天的 100 倍了。

他對斯大林的態度，像對待一切暴君一樣，總是在使壞方面比高低。他說他要擁護斯大林，肯定斯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七分功勞，指的正是他殘暴地虐殺本國人民、輸出革命亡我中國的所作所為；毛不滿意的，所謂「三分錯誤」，決不包括斯大林不執行列寧廢除沙俄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與日本訂的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條約，也不包括日本投降後蘇軍進入我東北大肆姦淫擄掠；倒是包括斯大林為了自身利益要中共真心聯蔣抗日。斯派王明回國貫徹他的旨意，但遭到毛的抵制，在延安整風中把王整得身敗名裂。可見毛反對好人卻贊成好人某些壞的方面；擁護壞人卻反對壞人某些相對而言「好」的方面。

本節揭露了毛極端自私的四個本質特徵：極端貪婪、極端陰險、極端卑鄙、極端黑暗，和在兩方面的惡劣表現：當國家民族與他的黨利益發生矛盾時，他損國利黨，以肥他一黨之私；當黨與他個人權慾發生矛盾時，他竟置黨於癱瘓、瀕於滅亡之地，以肥他一己之私。現在談第三方面：他怎樣對待他的親人，首先是妻子？這就進入了中國固有文化所說的「修身、齊家」的層面

三，為飽私慾張開血盆大口，親疏通吃

你說毛澤東能自私到何種程度？如上所述，他為了私利，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可以不抗日、假抗日、破壞抗日，甚至開展種植鴉片大生產，幹這種亡國滅種的罪惡勾當；在他掌權之後，仍倒行逆施，破壞民族經濟、民主政治、民族文化、固有道德……成為民族敗類第一人，信拈一例，即如對文物古蹟的破壞，就超過日本侵華所造成的劫難。同時他又是黨的敗類：連敵黨懸賞都捉拿不到的中共要人，都慘遭他下的毒手……他不僅把國家、把人民、把他的黨當作犧牲品，而且把自己的妻子（中共的新名詞是「愛人」），前的、後的、好的、壞的，也都當作犧牲品，所以說，他也是家庭的敗類。不知道那位強辯說「毛澤東是民族勝類」的人，會不會再一次強詞奪理說：「毛澤東是家庭勝類」？

第一，對楊開慧，鱷魚眼淚竟作傾盆雨

眾所周知，楊開慧無論作為妻子，還是作為共產黨員，無論賢德、才能、貌美、體健都是罕見的完美無瑕，她為了對黨、對毛堅守忠貞，竟犧牲了自己年輕的生命。這是多麼令人肅然起敬啊！可惜負心漢毛澤東在她為他被捕和犧牲（1930 年）之前（1928 年），早已把她犧牲了一與 18 歲的賀子貞宣佈「由同志的愛轉變為夫婦的愛」。開慧正在受苦受難，堅貞不屈，堅挺地捍衛著美好的恩愛姻緣的時候，他卻在背信棄義，與新人尋歡作樂。之後，當敵人的子彈使她腦袋開花的時候，他正在與一位黃花姑娘玩得心裏樂開了花。及至到延安建立小朝廷之後，賀子貞對毛在長征路上體貼入微的關照，便成了過時的黃花。賀子貞變成了楊開慧，毛「詁」新詞強作愁：「我失驕楊又失賀，鱷魚落淚流成河」。他抹了一把眼淚，就又倉促上陣，又把與藍蘋的搞腐化「轉變為夫婦的愛」。這時他的「愛」路就廣闊多了，還

有碧眼金髮、洋為中用。到了北京，他坐上金鑾殿，那就可以為所欲為地選妃子，糟蹋下一代、下兩代，遍及全國。他的妃子中，不乏有夫之婦，被霸為己有，破壞了別人的家庭，讓這些家庭「榮幸」地演出一幕幕悲劇，榮幸中之姣姣者，幾乎做到了大管家汪東興說的全家人「一鍋煮」，把姐姐妹妹和嫂嫂都煮進去了。大管家譏笑說：「她的媽是死了，不死的話，也會來。這一家子真是一鍋煮。」他同李醫生說：「主席年紀老了，是不是覺著活不久了，要大撈一把。否則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興趣，怎麼大的勁？」（《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348頁）

第二，眾女性心理、生理慘遭蹂躪

他霸佔一位女機要員，不讓人家結婚。他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寫了一首《七絕*為女民兵題照》：「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妝愛武裝。」這首詩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寫出的。他硬是不允許她結婚，毛跟她同居時，她說毛將她「作為洩慾器，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玩弄女性，過的是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毛聽了非常生氣，一腳將她踹到床下，就此爭吵起來。衛兵聽到，便闖入，一看此景急忙退出。你再也想不到毛不要臉到啥程度！毛竟能指示汪東興立刻開她的批鬥會，也不想汪在會上要批評、要鬥爭她甚麼！當然鬥爭是一定要鬥爭的，執行偉大的指示不能走樣。

是的，毛一貫是把女人當作洩慾器，當作性奴；而叫做「同志的愛」或「夫妻的愛」，只是毛澤東思想慣用的表達方式。被大救星「愛」的那群天真爛漫的少女就更可悲了。一則在心理上變得寡廉鮮恥，如李醫生所述：「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權勢，在在都使這批年輕無知的女孩耳濡目染之後，逐漸墮落。多年來我看著舊戲不斷重演。她們在成為毛的『女友』後，不但不覺得羞恥，反而日益趾高氣昂……一個個變得驕縱，仗勢欺人而難以伺候。看了這麼多被毛腐化的女孩後，我才開始覺得，江青走過了相同的道路。在延安初和毛結婚時的江青也許真的和今日十分不同。也許毛也使江青墮落了。」（同上）

二則是生理的蹂躪。「毛陰莖包皮過長，平時又沒有清洗乾淨的習慣，很快受到了傳染，成為滴蟲攜帶者。此時及以後，凡是同他有這種『特殊關係』的女人，沒有一個不受到傳染。她們受感染後，請我治療……。但光是治療毛的『女友』無濟於事。有一次毛問我為甚麼原因治不好。我說明，需要他同她們一起治療，在治療中不能發生性行為，只能等待治療完畢，檢查無滴蟲以後才可以。毛嗤之以鼻，根本不相信他自己已經受傳染。他說：『你們醫生就會小題大作。我根本甚麼感覺也沒有。』我向他解釋，這種病一般在男子沒有甚麼症狀，成滴蟲攜帶者，對自己沒有甚麼特殊的害處，但是可以傳染給沒有這種病的對方。毛聽了以後說：『既然對我沒有甚麼害處，那又有甚麼關係，何必大驚小怪的哪！』我又說，一旦傳給了江青，就會成了一個不好說明的問題。毛笑了笑說：『這不會，我早就同她講，我老了，不行了，辦不了事情了。』我又勸他把局部洗乾淨。他的回答很乾脆又醜惡，他說：『沒有這個必要，可以在她們身上清洗。』我聽了以後，從心裏感到噁心，幾乎要嘔吐出來。」（同上，第349頁）

外人知道他是個暴君，嗜殺成性；是個陰謀家，陰險、毒辣、詭詐；……可誰會知道他竟然能夠如此庸俗、卑鄙、下流、無賴，簡直是侮辱了傳染傷寒病的虱子！如果不是內中人，無論如何是不知此中情的。被林彪冠以「四個偉大」、被鄧小平評以「兩個偉大」的這個龐然大物，你能想像到竟是個衣冠禽獸！凌鋒先生在《魔誕：群魔亂舞》一文中寫道：「80年代，中國有一位著名的學者，也是老資格的共產黨員，在香港告訴我，毛看中了毛岸英的老婆，才把毛岸英派到朝鮮，決不是甚麼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69）在毛給兒媳的信中也透露出這層信息。這實在是另一種意義上的「人不可貌相」。可見一個人自私到了極端，就

會私慾猛於虎的。有道是：「虎毒不食子」。斯人也而干斯事也；實在是鐵石心腸，血盆大口，粗細都下，親疏通吃。令人詫異的是，斯人也而又有斯言也：

「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紀念白求恩》，《毛澤東選集》四卷本第 621 頁）我們不以人廢言，但他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人，是具有極端自私自利之心的人。從這點出發，他便成為相反的「五種人」：一個流氓無賴、荒淫無恥、破壞人倫、卑鄙下流的人，一個陰謀陽謀、兩面三刀、陰險邪惡的人，一個喪盡天良、絕滅人性、嗜殺成性、極端兇惡的人，一個道貌岸然、趣味鄙俗、十足虛偽、極端醜惡的人，一個打倒一切、獨霸一切、製造災難、禍國殃民的人。

總之，毛澤東之為毛澤東，可以概括為「一個極端」（極端自私自利）、四個特徵（極端貪婪、極端陰險、極端卑鄙、極端黑暗）、「三個敗類」（民族敗類、黨的敗類、家庭敗類），以及上面說的「五種人」。毛澤東就是共產黨的人格化，毛澤東的本質就是共產黨的本質。認透本質，對總結經驗、接受教訓是必要條件和必然聯繫。具體的教訓可以有無數條，但歸根結底就匯成一條：吃虧在於沒有認透本質。認透了本質，老實人可以克服「輕信」的毛病：不老實的人應該剷除「投機」的心理；想對中國的民主事業作出貢獻的人要徹底清算改良主義。從反右派運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至今的事實又反覆證明：共產黨已全然堵死了改良之路。對共產極權搞改良主義有甚於搞「緣木求魚」，「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患……所以倒更像是「與虎謀皮」；「與虎謀皮」，葬身虎腹，前車屢覆、後車之鑒也。今後怎麼辦？甩掉幻想（即甩掉改良主義），堅決打倒黨天下！人間：「要搞暴力革命嗎？」答曰：「革命是無法搞『按圖索驥』的。」

四，認透毛、共的方法論之二

就像我寫上一篇「反右探源篇」主要是用逆推法那樣，我寫「毛澤東本質篇」主要用的是總、分法和內、外法。

第一，總分法就是在從對現象到本質、從部份到總體的認識基礎上，再利用對本質與總體的把握來理解現象與部份。

最近台灣舉行了毛澤東的影展，據說他「微笑」的魅力傾倒了觀眾，甚至於有的認為，過去不應該把毛妖魔化為殺人魔王。這使我認為，是蔣中正先生實在對不起這些（僅限於「這些」）台灣人，使他們沒能親身領受足毛主席的「微笑」。我已讀到領受足毛微笑的大陸人，在網絡上傾吐的自己的感慨，望人們都來分享。我這裡再向讀者推薦著名作家、曾劃為右派的叢維熙的一句話：「張滄（張滄是作者的也劃了右派的自殺未遂的愛妻）和許許多多知識份子命運的悲劇，正深藏在你那嘴邊慈愛的笑紋之中呢！」（《走向混沌》第 87 頁）用總分法就會看出「微笑」滴瀝著的億萬人的血淚！台灣這部份觀眾就是缺乏對毛的總體認識。

總分法是正確認識毛澤東和中共的科學方法，別說中共一向是黑箱作業，即便將來檔案解密，不用此法，仍可置你於煙霧之中。俗話說：「問路問來人。」司馬璐就是過來人。他說：「研究中共黨史的一個最大困難是，中共原始文件本身，經過權力鬥爭，或路線改變的影響，時時被否定或篡改。甚至毛澤東本人的著作，經過一再刪改，不同年月的版本，說法就大不相同。所以，要鑑定一份中央文件的真偽，足夠的原始資料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有關中共的全面知識，以及閱讀的判斷能力尤為重要。」（《中共歷史的見證》，頁 418。）這就充分說明了我說的「總分法」運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如果你認清了毛極端自私自利的惡劣本質，他是一個自私到「家」的人，對他的妻子們都可以翻臉不認、拔扈無情，難道你還指望他對你比對楊開慧更有情意、更有愛情、更有親情、更有友情、更有同志之情嗎？認清這一點，就請你放棄一切幻想吧，包括投機心理在內！

如果你認清了毛澤東從來就是性格暴戾、專橫獨裁，從大殺 AB 團、延安整風、鎮反、肅反、三反、五反、破口大罵梁漱冥、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文革……從肉體上消滅意見相異者李文林、袁文才、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周恩來直到小人物田家英，……可知，他是決不許可「哪個蟲兒敢開口」的。難道他會許可他早已認定是美帝國主義第五縱隊、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知識份子在藝術上百花齊放、科學上百家爭鳴，並用鳴放來幫助共產黨整風即把鳴放同時引入政治領域嗎？這就簡直像狗嘴裡吐出了象牙一樣，絕對不可能是真的！在我身上曾發生過一個生活小故事，頗具啟發性：我買了「象牙筷子」，回到家，家人一看，說：「你上當了！它是塑料製品」。「怎麼可能呢？你們看筷子上刻的那金光閃閃的四個字！」人家把筷子遞給了我，我又看，脫口而出：「竟然興來這一套！」原來那金光閃閃的四個字是：「像（！）牙筷子」！這個小故事提醒人們：「如果一隻狗，從嘴裡吐出一顆牙，說是象牙。你可不能輕信。因為如果它本質上的確是隻狗，那是無論如何吐不出真像牙的，最具欺騙性的，就是『像牙』。」

實際上，除掉毛 1957 年春季為了「引蛇出洞」而拋出「像牙牌的雙百方針」，對知識份子好到反常的程度外，你把他的骨頭砸碎也是砸不出真正的「雅量」、「寬容」、「開明」、「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因子來的。可鄧小平連「陽謀」那一把壺也不提了，逕直地厚著臉皮三番五次說：「1957 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份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鄧小平文選》二卷第 345 頁）這句話可以表達為這樣一個公式：「殺氣騰騰（原因）——決定反右（結果）」可是這位以「實事求是」而香名昭著的鄧大人，卻在以「殺共產黨人」而臭名昭著的右派份子葛佩琦的華崗巖腦袋上撞得粉身碎骨：他無法解釋這個基本事實，是在毛決定反右半月之後，葛佩琦才「騰騰」的，其他，如所謂「右派三大理論」也都是在之後而不是在之前「騰騰」的。原因怎麼會發生在結果之後呢？實乃咄咄怪事！怎麼「結果」竟然捷足先登，而「原因」卻姍姍來遲呢？這是甚麼邏輯？鄧小平以「騰騰論」作為「當時反右的確有必要」的根據，實在是蠻不講理地撒謊！也許，毛澤東衝著鄧小平一向堅持的這類邏輯，才說：「那個小個子的前途，不可限量。」

據知內情的陳伯達說，鄧小平主持一次省市書記會議，「說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要書記們趕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論，否則晚了，收集不到了。陳聽到『很驚訝』，他認為，人總會說錯話的，這樣收集，牽涉太多，『反右搞得那樣擴大化，鄧小平同志有很大責任』，」（《重新審視陳伯達》，《開放》雜誌 2005 年三月號第 42 頁）我也認為鄧對反右負有很大罪責，劉少奇、周恩來反倒相形見绌。鄧是整風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甚麼壞事都是他按照毛意、加碼辦的。他本應坐被告席上接受審判，現在卻以庭長面貌出現，並宣佈判決；這不成了秦香蓮的案子交陳世美處理了嗎？荒唐之極！歷史全被顛倒了。我們有責任還原歷史，還原 1957，只有如此才能對得起前人、今人和後人！

所謂「還原歷史」，就是還它以原貌。就著總分法來說，就是有總有分：有分無總，只見樹木；有總無分，只見森林。我是怎樣把握這一點的呢？可以從我區別對待鄧小平與柯慶施作為例子。柯的左遠比鄧小平令人深惡痛絕。反右派應該是柯大展身手的大好時機，可他並未表現得像鄧小平那麼惡劣，因而就未受到我對他像對鄧那樣的大張撻伐。

許多寫關於反右的文章，涉及到上海，都寫那一位「毛主席的好學生」如何如何緊跟，好像他表現得最惡劣。總的來說，我對他也是恨之入骨，但我認為，對壞人也不能冤枉。柯在反

右中，還真是沒有實行他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請看我所瞭解到的他在這方面的某些表現：

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來報批的內定右派。《勞動報》總編馬達，總工會領導認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匯報黨組書記欽本立，還有唐海，文匯報領導認為他倆夠上右派。解放日報副總編馮崗，解放日報認為他夠上右派。報批時，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替他們幾位解釋了幾句。柯慶施說：「這幾個同志是缺少經驗的問題。他們是有錯誤，不能做現在的工作了，給他們一點處分也是應該的，但不要劃右派。右派劃多了不好。這些人還是可以用的。」當時在場的解放日報副總編王維回憶這段往事時，說：「柯老的這些話都是最關鍵的一些話。在當時的形勢下，如果不是柯老講了這樣的話，石西民一個人是保不下來的。」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市第二商業局整個局裡沒有劃一名右派。當時的商業二局局長裴先白說：「我們是搞食品供銷的，有的同志講些怪話……我們就沒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沒有問過我。」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科委係統的科技人員沒有劃一名右派。當時的科委主任舒文回憶說：「上海市委召開一次常委會議，柯老主持。……會上發了兩個科學家的材料。從當時看來，他們的言論超過劃右派的標準。柯老把這兩個人的材料印出來交給大家討論，讓每一個人發表意見，會議開了一整天，每個人都發表了意見，大家意見不統一。這時，柯老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把這些人劃成右派對國家有利還是不劃成右派對國家有利？二、這些人都是從國外回來參加祖國建設的。他們為甚麼回來？說他們反黨，不過是思想上有些轉不過來，他們絕不會反黨。柯老的這種傾向性意見啟發了大家，一致認為還是不劃右派為好。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響是，科委係統的研究人員一個右派都沒劃。」——，在這兩個「漏劃右派」中，有一位始終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過關的情節。在反右派鬥爭 45 年後頗為詫意地回憶說：我 1957 年提出「科學院應該由科學家來管理，得罪了領導，引來了麻煩，但是沒有把我劃為右派。」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的外事系統沒有劃一名右派。

還有，關於在大學生中抓右派的問題，柯慶施告訴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光：「應該實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柯慶施的著名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1957 年 12 月 25 日在中共上海一屆二次黨代會上的總結髮言）報告裡有這樣一句話：「某些單位經過實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後，如果確實沒有發現右派份子，那就不要去進行反右派鬥爭」。這是何等鏗鏘有力的聲音！大家知道，五七年的反右一直延續到五八年。有一部份「五七」戰士實為五八的兵。身為市委第一書記的柯慶施同志在那種形勢下能喊出這麼一句，是有千鈞之力的。這個報告是公開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在上海這次黨代會前後，不只上海一地在開黨代會，與此同時，各地都有人在做報告。我粗粗對比了一下，更加體會到柯老這句話的來之不易。此說一出，雖不能力挽狂瀾，但擋住了一大批優秀人物被劃進中國 55 萬右派之中。由於柯慶施堅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雖然劃了 15419 名右派，但是，相對數還是比別處明顯「落後」。（鄧偉志《如何評價柯慶施》，《黨史縱覽》2003 年第 9 期）比如說，河南省就劃了 70869 人。

同理，陳伯達是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一貫地「左」，自不用說，但他在反右中就沒有胡喬木表現惡劣，起碼他沒為《人民日報》寫過一篇反右的社論，而胡喬木卻是反右社論寫得最多，最惡毒的一個！

我們既然認為，對壞人也不應該冤枉，那麼，對毛澤東也當然不應該妖魔化。在這個理論原則指導下，我們來審視實際情況。實際上，毛澤東之壞，之反人性，之罪惡滔天，遠遠超出常人的想像，所以直到現在，只存在估計不足的問題，有關資料仍大量密封於黑箱裡，尚不存在妖魔化的情況。相反，面對著官方的，民間的，政論的，傳記的，散文的，詩歌的，戲劇的，影視的，充斥著無恥的編造，肉麻的吹捧，無限制的美化與神化，興「熱」作浪；「妖魔化」論者哪裏去了？怎麼瞎了，聾了，啞了呢？總分法要求從總的傾向與個別表現相結合地看問題，而不要抓住芝麻丟掉西瓜，明察暗訪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最後我還要提醒一點：如果他本身就是妖魔，並且是妖魔中最惡最惡的惡魔，超過了斯大林、希特勒，那麼，當人們說，毛澤東是惡魔，難道這是 妖魔化他嗎？這你就明白，為甚麼沒有人出來橫挑鼻子豎挑眼地指責，事實上不存在，只是自己想出的「妖魔化」斯大林、希特勒的問題了。

第二，內外法要求，研究問題時要入乎其內、出乎其外。

所以需要「入乎其內」，是因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例如，前面我提到的作家黃秋耘，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家得知一個政治信息——邵放下電話，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由此，他便對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陰謀得出判斷：「這個『急剎車』的措施可能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直到 5 月中旬才決定下來。周揚那一級的高級幹部（他當時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至早也到 5 月中旬稍晚一些時候才確知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後，一天也沒有耽擱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當天（5 月 18 日）晚上就暗示給我。」今天看來，他作出的判斷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準確的。難道他是未卜先知的事前諸葛亮嗎？他用切身的體驗回答了這一問題：「事後聰明，人皆有之。最可貴的卻是事前的聰明。但，政治上的先見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於敏銳的觀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於準確的、及時的情報。比方那一個「轉」字，哪怕我是個『小諸葛』，5 月 18 日晚之前，也是無法想得出來的。只不過由於偶然聽到的一個電話，才『頓悟』起來。」（《風雨年華》）這為「入乎其內」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證。

但是，如果僅僅入乎其內而沒能出乎其外，就會「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李志綏之所以太離譜地認為，毛髮動知識份子幫助共產黨整風是想借知識份子的刀，殺向那班「反冒進」的「黨內的敵手」，而不是預謀反右。結果他說，毛感到上了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當。對此原由，我在前面已對他不瞭解外情，作過詳細的分析。

我對於反右派鬥爭，也可以說是「入乎其內」的，但我「入」的「內」太小，只知道挨鬥爭的過程和感受，並不知道人家怎樣策劃對我的鬥爭；對全國的總形勢也只限於讀到的報紙和聽到的報告；受到勞動教養處分後，和勞教、勞改的右派互通信息，擴大了我的「內」的範圍；及至粉碎四人幫大後來，我才讀到幾部反映反右派的作品，那也多半是作者看著共產黨的臉色寫的，充其量是打個擦邊球以譁眾取寵，並不敢真正正視歷史和現實。在我到海外之後，才接觸到一些右派朋友的，和當年是反右積極份子現在良心發現了的朋友的回憶錄；也讀到一些這方面的國內外學者的論述和論著，其中《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鴻》。、《晚年周恩來》和《九死一生 20 年》、《陽謀》等給予了我較深的印象。

當然，另有一種「入乎其內」是屬於惡性腫瘤般的「入乎其內」。但這在大陸卻不是個別的現象，這是經共產黨 長期「洗腦」的結果，是腦袋瓜裡裝進個『小毛澤東』（王若望語），思維進入了怪圈而不能自拔，所以對人、事、物的觀察，每每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視錯誤為正確，視怪誕為正常，視謬論為常理，這是在認識共產黨方面患的需要動大手術、需要進行化療的癌症。宋代思想家、教育家朱熹說過：「既知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也就是說，要治療這種病症，就必須首先要跳出怪圈，出乎其外。最可怕的是這類人多半是諱疾忌醫，而且利令智昏，執迷不悟。

話反過來說，如果只出乎其外，沒能入乎其內，那就會「不是個中人，不解此中情」。為甚麼清官難斷家務事呢？就是因為家務內部有許多曲曲折折、沓沓晃晃的隱情，遠非三言兩語的問答和站在局外的望一眼所能弄出個所以然的。比如，都承認斯諾這個洋大人是個中國通，先別說他對共產黨的隱情（毛總是故意佈置迷魂陣，騙他）通曉得怎樣，光是他把毛澤東說成是打著傘旅行的「孤獨的和尚」，就可想而知這個「中國通」是多麼可憐了。天知道他在世界上散佈了多少諸如此類的以訛傳訛、扭曲事實的故事？所以作為鄭重的學者，一個局外人，一個外國人，既要認清自己具有「旁觀者清」的優勢，又要認清自己具有「洋鬼子看戲」的劣勢。總之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太過洋洋得意。仍以「和尚打傘」為例，就算洋大人知道了這個歇後語的意思是「無法無天」，但因你自幼就浸泡在法制教育和法制環境中，這就使你很難能領略到浸泡在帝王術中的毛澤東說的「無法無天」的語意方面的皇權無邊、老子天下第一和語感方面的「我是政治流氓，我在乎甚麼？」的原汁原味。這和毛澤東不解地問基辛格：「為甚麼你們國內，對『水門事件』這個屁事那麼在乎？」有點兒異曲同工。無獨有偶，英國記者麥克法誇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說甚麼毛實行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是「自由化政策」；說甚麼吳口揭發批判「章羅同盟」的發言是反毛的；以及對毛和劉、周等之間關係的描寫，我讀後認為，簡直純屬一派「海外奇談」。

倒是最近我讀到一些關於反右派的著述，其中不乏反右鬥爭的某些原滋原味，這是因為作者具有難能可貴的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努力，他們是很可敬的。但又因他們的某些「懷舊」情緒，準確說，是有點「斯德歌爾摩綜合症」，把從前憑父輩之德、之才本應得之譽、之位，謬歸於黨的恩澤，把事情弄了個適得其反。其實是他們有大恩於共產黨，後者知恩不報，反而為仇，其後代理應理直氣壯地為父輩雪恨，討個公道才對，卻多少局限於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封閉體系的方法論，來觀察問題。而致於美中不足。但，這是跟那些御用學者固執於這個自我封閉的體系，進行惡性的循環論證，給毛澤東塗脂抹粉，惟恐「有損」，是太大的不同的。對於他們來說，只是驅除出共產黨派駐進腦子裡的工作隊的問題。

在當前中共黑箱政治和檔案大多嚴密封鎖的情況下，知情者的著述就顯得格外值得珍貴。我對共產黨、毛澤東本質的認識，除了自己的身受、觀察、與人交往和一般的閱讀外，得益於《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廬山會議實錄》、《晚年周恩來》。者頗多。李志綏、李銳和高文謙的身份使得來自他們的材料有很高的可信度。例如，多虧他們的翔實的論據，否則，我怎能得知，毛澤東極端自私自利；毛的賣國主義；周恩來最終還是被老毛用殺人不見血的狠毒手段害死的呢？

這個內外法的道理，余英時教授在寫給《當代中國研究》的出版祝詞中，說得清楚明白：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中英文刊物之所以在西方能別樹一格，主要的原因是它們的作者群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大陸，但同時又在西方受到了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較長期的訓練。他們是在中國大陸成長的，因此有來自生活經驗中的內在知識；他們已熟悉西方學術界的操作方式，因此又能超越主觀的限制，對中國大陸的最近演變做客觀的瞭解和深入的分析。這種主客交融、能所兩忘的境界正是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所追求的。而他們竟能自然的結合了起來，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一九八九年以後，許多過去親自參加過中國大陸開放改革的知識份子也大批地來到了西方。他們和八十年代起先後進入西方學術主流的中國留學生匯合在一起，更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研究隊伍。他們將對於當代中國的研究作出特殊重要的貢獻是可以預期的。我個人尤其高興看到他們今後能通過《當代中國研究》，將研究成果直接傳佈給海內外的中國讀者。

本刊的作者並不是「隔岸觀火」式的所謂「中國觀察家」（China Watchers），他們都有為中國大陸的繼續開放和改革貢獻一份力量的悲願。歷史已一再證明，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由於種種不得已的原因暫時寄居海外，往往能發揮意想不到的學術和思想上的效用，促進中國的現代化。今天已不是傳統的時代，世界已縮小為一個「地球村」了，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也不會再興「遠托異國，昔人所悲」的慨歎。相反的，他們大可以把「異國」當作為中國儲才之地，潛心研究，一起在更長遠的意義上報效中國。

余教授反覆強調這個內外法的運用，他為阮銘《鄧小平帝國》一書作序，寫道：「從作者所引用的大量文獻而言，《鄧小平帝國》顯然和一般置身事外者的客觀研究並無不同，但是我們通讀全文，便會發現作者本人最初也曾參與了這個帝國的創建。作為一個參與者，他是身在廬山之中的，然而作為這部帝國興衰史的撰寫人，他卻能跳出廬山之外，因而看清了廬山的真面目。這樣主客統一的著作確是不多見的。這是此書最能吸引讀者的所在。」

總分法和內外法，是相互為用的。要想能夠做到從總體上。本質上把握人和事物，就必須用內外法；而入乎其內和出乎其外在一個人身上，在某一方面往往不能雙全其美，就會產生偏差，而糾偏就要藉助於總分法。這是在本篇中用來還原歷史和總結歷史教訓的主要方法。這個方法在上篇中也有所運用，如在「引蛇出洞考」一節中就是用總分法說明毛在反右前後一貫是施展這一陰謀詭計的，陰謀已形成陰謀家的本質特徵。當然，在本篇，也還運用了上篇用過的逆推法，如用毛大殺 AB 團說明他嗜殺成「性」，喪失人性，推知他誠邀幫助整風不可能是真，殘酷地反右才是本意和本性。又如，下篇將要用到的窮舉法，以及我在下卷《較量正未有窮期》中主要運用的「前瞻法」等，本篇也曾加以運用。我認為任何方法也不能孤立地運用，因此，我在每一篇裡，對所有這些方法，都是有主、有從地配合著綜合地運用的，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單用某一方法。

終篇：右派言論篇（一）

關於毛澤東反右派的起因，我們分析了遠因，近因，他本人品質的原因和共產制度的原因。至於，反右運動的性質、過程及其歷史影響，這將是我在下卷：《較量正未有窮期——從反右派運動的過程及其後果說開去》中，要展示和研究的課題。這裡，只能囫圇吞棗地說上一句：「鳴放的中心內容，是具有民主個人主義理念的知識份子，要共產黨兌現自己的民主承諾。」不管右派是自覺還是自發，是居心反黨還是不曾有反黨的動機，但中心內容就是要毛澤東實現他說的甜言蜜語。比如他再三散佈的美麗的政治幻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勝利後的主要任務，就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在這個國家內，『有一個獨立的民主政府，有一個代表人民的國會，有一個適合人民要求的憲法』；『經濟是向上發展的，農業、工業、商業都大大的發展，並由國家與人民合作去經營，訂定八小時工作制，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對外國和平通商，訂立互利的協定』；『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種優秀人物的天才都能發展，科學與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國沒有文盲』；『軍隊不是與人民對立的，而是與人民打成一片的』。毛主席說：『這就是中國的現代國家，中國很需要這樣一個國家。有了這樣一個國家，中國就離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變成了自由平等的國家；離開了舊中國，變成了新中國。』」（轉引自《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124 頁）。像這樣意思的話毛百說不厭，在共產黨的報紙上可以說是連篇累牘，甚而至於在《解放日報》社論《切實保障人民權利》中，說了如此決絕的狠話：「革命與反革命的分野，只在於要不要民主、給不給人民以民主自由。」這句話中的「只」字，就意味著不給任何其他選擇，也不允許有任何的動搖，表明結論的決絕。社論接下來說：「而民主與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權、政權、財權及其他自由權利是不是得到切實的保障。」（1941 年 5

月 26 日) 如果以此來衡量中共八年來的執政; 不來拐彎抹角那一套, 乾脆地說: 「中共就是反革命! 」——這是在客觀事實上, 與他自己的邏輯上, 會一致地得出的結論。在這一點上, 劉賓雁也是這樣認為: 毛澤東「把 1949 年那場革命變成了反革命。所以, 用毛澤東的邏輯來重新來一次定性的話, 反革命就不是胡風, 而是毛澤東了。」(見《誰是反動派》) 右派之所以為右派, 撇開具體的表現形式, 就其言論的本質功能而言, 就是會提醒人民認識到這個「一致地得出的結論」。八年來共產黨執政的事實, 說明共產黨歷來的所作所為, 相對於他的民主承諾來說, 完全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它廣為宣傳的「人民『選擇』了共產黨」, 是不打折扣的謊話, 按實情說, 不是「選擇」得逞了, 而是「欺騙」得逞了。如果說共產黨, 或者說毛澤東有甚麼了不起的地方值得人們「驚佩」, 那就是, 其欺騙之能量竟能如此之大! 能使受騙者舉著拳頭要打倒揭露事實真相者。這也是反右運動能夠轟轟烈烈地展開, 工農能夠義憤填膺地反擊自己真正利益的代言人, 全國能夠一致起來自掘墳墓的根本原因。

因此, 通過反右我們有一個發現: 毛澤東騙人(包括對他的戰友和政敵, 知識份子和人民大眾)的絕招, 是讓你自掘墳墓。

雖然大鳴大放是毛澤東的一場最卑鄙無恥的陰謀詭計, 但畢竟又是一場全國規模的空前絕後的大講特講實話的大運動。而這些實話就是為共產黨掘的一個大大的墳墓, 共產黨的所有作為, 都是一步步地時快時慢地向這裡進軍。我絕對相信, 共產黨最終會在這裡葬身。這是既不依共產黨又不依右派的意志為轉移的。

鄧小平所指出的「制度不好」的方面, 早在 20 多年前右派就比他更廣泛, 更正確, 更有高度和深度, 更由於指出得一針見血便更振聾發聵, 因而更具時效和療效。當時的實情是這樣的: 右派從宏觀上講, 還不是要反天, 而是要「補天」, 正如王造時被打成大右派後給周總理信中所說: 「以唯恐天下不治之心, 招致唯恐天下不亂之誚。」又如原載於北大校刊 123 期姚仁傑同學的文章題目所示: 「黨啊, 我們批評你, 是真正愛你! 信任你」。也如被保留下來證明「反右正確」的五個大右派樣板之一的彭文英, 當時表明心跡說的: 「例如反革命分子, 他處處找大廈的岔子, 目的是推翻大廈; 我也來談談這裡有缺點, 那裏的窗子破了, 我是來為大廈補缺的, 為的是使大廈更好……」直到死前, 他還堅持: 「那不行, 這是重要的原則問題, 一定要講清楚。絕不能把幫助救火的人, 說成是趁火打劫, 這是完全錯誤的, 我一定要講清楚。」更如劉賓雁, 只是出於為了中國好和中共好的單純動機, 才給毛澤東寫了信: 「……請您注意: 一, 黨內高級幹部中, 一個特權階層已經形成。他們已完全脫離了黨組織與群眾的監督, 成為新的貴族……二, 在多數工礦企業中, 黨的組織處於癱瘓狀態。東北的一些工廠中, 黨員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機關中, 黨內健康力量不得伸張, 佔優勢的仍然是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有些機關黨員領導幹部政治熱情衰退……者竟達三分之一以上……關於黨與群眾關係的普遍惡化, 就無須寫了」。毛澤東在半年以前, 也曾發出過「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的警告。但這類話只能由毛澤東本人說, 別人要議論這樣的可能性或現實性, 就意味著對黨的「誣蔑」, 犯了「攻擊」罪。

劉賓雁後來才知道: 就在寫這封信的前十三天, 即 1957 年 5 月 12 日, 《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他寫的關於上海鳴放情況的報導《上海在沉思中》, 毛澤東看到, 當即批示: 「看來, 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 而是想把事情搞亂」。已經下決心發動反右運動的毛澤東, 顯然是把劉賓雁看作是「要在中國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亂」的「右派」代表。但毫不知情的劉賓雁卻還要如此多情地進言, 這就真是毛澤東後來嘲笑的「自投羅網」了。(高伐林《我怎樣自投「右派」羅網: 劉賓雁回憶半個世紀的往事》)『但是, 凡是稱得起「右派言論」的意見, 都的確是擊中了要害。他們的悲劇大多是, 本想給惡狗治好狂犬病, 卻被毒汁四濺的惡狗反咬了一口。你若用前瞻法, 讓時間順延, 你就會看到毛澤東這只惡狗, 瘋狂到何種程度? 彭

德懷政治把脈後的診斷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越來越狂，越狂越熱，任意逞瘋狂，瘋狂到天不收地不留，直到瘋死；直到死後，屍體上的瘋毒、瘋菌仍在中國大地上傳播著像「猩紅熱」瘟疫一樣的「毛紅熱」，掀起一陣陣的崇毛狂。

發狂啊發狂！上帝讓一個人滅亡，先讓你發狂。

一，右派言論大觀

要翻出當時的右派言論，讓現在人看了也不能不浩歎其真知灼見。可惜這些警世良言不但未被採納，而且遭致了人身家國的大災大難。從而，我們也看透共產黨遠不是不堪造就，不可救藥的問題，而是你打死瘋狗還是讓瘋狗繼續成千上萬地咬死人的問題。直接了當地說就是，除了打倒黨天下，別的說法 and 做法都是自欺欺人，自誤誤國，繼續自掘墳墓。

現在，讓我掛一漏萬地列舉出當時右派言論的主要之點，供人們撫今追昔，以史為鑒，使打倒黨天下的民主運動，能夠前見古人，後見來者。

第一，聲聲聲討「黨天下」

儲安平指出的「黨天下」三個字，不僅找到了萬惡之源，而且將毛澤東關於國家民主化，聯合政府等等一系列誘人上當的謊言及其搞專制復辟的真實嘴臉，置於光天化日之下。作為歷史人物的儲先生之所以偉大，是今天的人們仍受他的啟示，認定，如不廢除黨天下，不僅目前的一切弊病如貪污、特權，發展權貴資本、對群眾巧取豪奪，鎮壓異議人士（包括群眾上訪），壟斷一切媒體並強迫媒體造謠，取締宗教信仰自由，群體滅絕法輪功。。。。。。這些浩劫將會持續下去，並且日益表明，胡錦濤上台，不僅在作惡上江規胡隨，而且又創糟蹋人權的新記錄。

反右前後，大半個世紀的時間提供的確鑿無疑的歷史結論是，毛澤東是民主的死敵！共產黨是民主的死敵！「死敵」也者，不是民主死，就是共產黨亡。有民運人士與虎謀皮，說：「只要實行民主，還是讓你們共產黨來領導。」這無異於告訴厭氧菌：「只要人民能吸到充分的氧氣，保證把你放進氧氣裡讓你大活躍而特活躍！」

儲安平的「黨天下」論，有的放矢，具有歷史觀的深度，世界觀的廣度；對現實是一針見血，言簡意賅，句句珠璣，天下傳誦，先睹為快；越雷池犯禁忌，明星隕落，而其奇文益彰，天馬行空，不廢大江千古流日夜！所有右派的言論，都是對萬惡的「黨天下」的有力舉證，病理解剖，沉痛控訴和嚴正審判；激情一點的，便會聲聲血字字淚，甚至喊打，喊殺！也就是鄧小平後來迭次喋喋的所謂「殺氣騰騰」。意見間的相互呼應，協調補充，使意見的總體宛然形成了一個滴水不漏，美玉無瑕的完整系統。無怪乎歷史學家翦伯讚說：右派言論好像是「集體創作」。（61）但這只是不謀而合，而不是鬥爭會上聲討的那樣，每個右派的言行都是有陰謀，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地向黨進攻。事起之因，很可能是對有目共睹的事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想當年，儲安平先生話音一落，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老先生立即喝采，直呼：「very good！very good！」

43 年後，曾任《新觀察》主編的戈揚女士憶起該文，仍是不勝感歎，讚不絕口：「現在重讀『黨天下』，真是句句珠璣，不忍失手啊！」（《爭鳴》2000 年 4 月號）我上面說的「句句珠璣」就是從她這裡抄來的。這便是右派言論中的核心觀點，是對「老和尚」致命的當頭一棒！請看原文：

儲安平：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解放以後，知識份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於「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單位大小，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

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們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甚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樣的想法。從而形成了今天這樣一個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義突出，黨群關係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導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個，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沒有一位黨外人士，是不是黨外人士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子子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儲先生決不是逞一時之興，逞口舌之快，想發驚人之語，或是為一時，一事所激怒而發出的憤激之言。否。這是儲先生的思想本色。有人寫文章揭出「『黨天下』的原版」，指出儲先生於十年前，1949年3月8日發表在他主辦的《觀察》雜誌上的專論《中國的政局》，其中第四節寫道：「坦而言之，今日的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

「在今日中國的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而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

「共產黨的對人只有『敵』『我』，跟他們跑的，他們可以承納，不跟他們跑的，他們一律敵視。一切都以實際利害為出發，不存在任何人情與友誼。

「要捧一個人，集體地捧起來；要攻擊一個人，集體地把他打下去。

「公平的反面就是極端，共產黨的極端作風，實在大大地限制了他獲得同情的範圍，亦減少他獲得成功的速度。

「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是不是這樣呢？不僅中共，包括蘇共在內的百多年國際共運所提供的史實，可以斬釘截鐵地回答：「是。」這個回答是對上述關鍵詞「無」和「極端」的有力肯定。毛澤東，斯大林的一己之私，共黨的一黨之私，都是極端的；其殘酷暴虐，殺人如麻，無民主，無自由，無人權，無恥謊言也都是極端的。

鄧小平回答得也夠斬釘截鐵：「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甚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

（62）鄧小平不是公然申明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制度與「自由」是不相容的嗎？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難道這就是「六四」大屠殺的理論依據嗎？可惜，至今仍有眾多改良主義者的熱面孔貼著這個專制的冷屁股在自作多情。對比之下，我們就更加珍視，更加懷念儲安平先生這位不是政客，而是不可多得的偉大的民主政治家了。正如章伯鈞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甚麼》後與史良談的：「有人對我說，儲安平的話擊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著寫社論的。而且一再拈出盧郁文來，盧郁文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丑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

二年後，1959年9月8日《人民日報》報導說，農業科學院研究員陸欽范，「污蔑共產黨『已成為一個權利集團』，惡毒地說共產黨是『世襲』，『比起土地私有制來更是真正的封建』；詛咒黨確『終究會被時代的車輪所拋棄』。」

人民日報，6月6日（凡不註明年份的，即1957年，下同）載，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人說：「每個黨員並不等於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反黨、反組織，這不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在省裡還好點，愈到下面愈成問題，區委書記和鄉支書就可以命令一切。」

人民日報，6月11日載：6月10日在民盟的座談會上，候補中委陳新桂仍然說他完全同意儲安平所說的共產黨的「黨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根源。他以為不足的是儲安平不曾進一步指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根源是甚麼，他認為「黨天下」的思想根源是無產階級專政。他說，從蘇聯無產階級專政中發生斯大林錯誤，從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中發生的匈牙利事件，證明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政治制度是有問題的。他還說，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的專政。這樣，共產黨在貫徹政策的時候，首先要信任共產黨員，再就是信任青年團員，再就是信任靠攏黨的人。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果不產生宗派主義，不產生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是不可想像的，不形成「黨天下」是很難想像的

光明日報，6月25日載，中國青年報記者詹宸說：「共產黨就是黨天下，沒辦法，這是根本制度問題，我完全同意儲安平的意見！」「共產黨不僅是以黨代政，而且有黨無政。」

人民日報，6月25日載，湖北省中南財經學院院長、民盟湖北省主委馬哲民說：「中共不少領導同志……認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們儼然為『天生的聖人』。這就等於基督教說『我代表上帝』了。」

浦熙修約樓邦彥和彭子岡一起去找費孝通談「黨天下」的問題，她問道：「黨究竟該在國之內還是國之上？」（《大公報》7月8日）

人民日報，6月28日載，山東青島民盟成員曲北韋在市政協會議上發言：「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力屬於共產黨？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

人民日報，6月29日報導《南開大學反擊右派的鬥爭》：「在小組和班的會上，歷史系一年級一班的學生姚安全，口口聲聲說葛佩琦，儲安平說的是『事實』，統購統銷就是搞糟了，人民生活水平就是下降了。他認為『三害』是主要的敵人，而『三害』的根子則是『黨天下』，要反對『三害』，要想不動搖黨的領導是不行的。」

人民日報，6月22日登載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劉地生的文章中說，消滅「三害」的根本方法就是消滅其產生的條件。這些條件是「僅允許聽從命令，而不尊重人權，不倡導獨立思考。」並說：「共產黨是國家的領導黨，但這不等於說共產黨就是國家。因為中國有六億人口，而共產黨只有一千二百萬黨員。決不能說一千二百萬黨員的利益就是六億人民的利益。。。。我覺得應該改變以往把黨放在國家之上，以黨的利益代替甚至超過國家利益的做法。今後制定政策方針應該先從六億人口的利益出發，不應該先從黨的利益出發。任何一個黨派的委員會或支部，除開對那個黨的機關或黨員之外，沒有權力對黨外的政府機關或行政人員發佈命令或指示。」

終篇：右派言論篇（二）

肖子超是華南墾殖局的一個科員，1957年他曾提出這樣的建議：

1、建設社會主義是可以通過不同的道路來達到的。如南斯拉夫就是走的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不同的道路；在中國，全國要建成社會主義是必須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但是，具體地區卻不一定需要那麼長。因此，他以為，「以廣東的人力物力條件，如果單獨搞，在時間上可以縮短很多。」

2、他認為廣東土改中的偏差主要是由於南下幹部對廣東的情況不瞭解所造成的。

3、他認為：「廣東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以發展農業為重點的方法是不恰當的，應以工業為重點，根據廣東目前情況應著重發展輕工業，尤其是輕工業中的農產品加工和食品工業。」他認為，現在所以搞得這樣糟，是由於領導幹部系外來幹部，而廣東本身又不是一個獨立政權組織的緣故。」

4、他認為在語言系統上廣東自成格局：「以廣州話為基準的廣東語言，在語言三要素上和北京語系都有很顯著的區別」。

廣州近二十年來的發展，證明這個科員的思考是非常有價值和遠見的，建立經濟特區的想法，也就是這個思路。但在1957年，提這樣建議的人卻被說成是要建立「廣東人民共和國」，而成了「右派」。（《1957年知識份子民間的言論活動》）

中國共產黨聲稱自己不是農民的黨，也不是小資產階級的黨，更不是資產階級的黨，雖然這些階級在社會上是合法的，但作為階級的思想在黨內是非法的。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思想是屬於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政治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利益代表全人類的利益，所以共產黨的階級利益就是無產階級的利益。怪事就出在這裡：領導全國工會組織的李立三之所以下台，是因為：毛澤東提出「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他便提出：「生產長一寸，福利長一分。」他主張工會要為工人階級謀福利，就犯了「福利主義」的錯誤，據說正確的方針應該是「把工會辦成教育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的學校。」等等。到反右時，被劃為右派份子的高元，是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廳檔案處處長，有16年黨齡的共產黨員。據報紙

上說，他認為「工人並不是為了社會主義建設參加工會，也不是為了學習共產主義參加工會，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參加工會的。因此工會的本性就是保護，至於共產主義學校作用，無產階級專政支柱作用，黨聯繫群眾紐帶作用，都不是工會的本性，而是黨強加於工會的。」高元認為，工會存在的客觀基礎，是國家有官僚主義分子，違法亂紀分子，國家不可能不犯錯誤，國家可能會侵害工人的利益。資本主義對待工人的一套，在我們國家中都有，只是分散而不集中罷了。所以需要工會和政府唱對台戲，需要工會來保護。這篇報導說，「今年4月，國家調整某些消費品的物價，高元在同志中間散佈他的謬論：國家對工人一方面增加工資，一方面又提高物價，這是國家對工人耍手腕。全國總工會應該對此發表聲明，表示遺憾。」高元還說：「黨只注意長遠利益，不能代表工人群眾的目前利益，或切身利益。有了黨的領導，工會就不能很好地保護工人群眾的切身利益，黨就成了礙手礙腳的東西了。」他還提出：「工會法規定全國只有一個工會，是否合適可以考慮。工人可以自己組織工會，不一定參加全國總工會。」（原載11月11日，人民日報。我轉載自《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頁484）

可見「黨天下」是要專一切人的政的。工人階級自己的組織，工會不是為自己謀福利和保護自己利益的，反而是共產黨用來專工人階級政的紐帶，給自己成員洗腦的共產主義學校！

第二，「三害」應向毛澤東那裏挖

人民日報轉載陝西日報6月12日刊登的陝西師院講師王尊一的文章，題目是《「三害」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開宗明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不是存在在個別機關或個別學校裡，是在目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普遍地存在著。那麼我們要根除『三害』是不是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掘一下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確有偉大的功勳，但從此共產黨驕傲起來了，以為天下是我們打的，政權應由我們掌握，好官我自為之，人民只能聽從共產黨的命令、指揮和擺佈，人民哪有憲法上賦予的思想、言論的自由？」

「元朝時候，把全國人民分為四等，。。。。。。當時統治權在蒙古人手裡掌握，其次才是色目人掌握，漢人和宋人只是處於被統治的地位罷了。我們把這種政治叫做『民族壓迫』。再如清朝入關以後，政治要職都設復職，如內閣大學士和六部尚書，滿、漢人各擔任一職，滿人官品高，漢人官品低，滿官有職有權，漢官有職無權。這種政治我們也把它叫做『民族壓迫』。但是，反觀今天，全國人民也可分為四等。。。。。。國家機關，學校，企業的首長，也是多復職。正的總是由黨擔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職無權。。。。。。這種政治制度，應該叫它個甚麼名字，我也不知道。」

「。。。。。。另外，一切討論變成了形式，嚴肅認真的討論根本展不開。領導上對待恭維，奉承，吹牛拍馬的人認為是積極份子，認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或陞官。對待在政策、號召上稍存懷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認為是思想落後，不進步，保守頑固，甚至戴上反黨，反人民和反革命的大帽子。這樣一來，誰還敢對黨提出一個字的批評呢？」

第三，黨外人士有職無權

說到有職無權，此乃「黨天下」題中之義。別說副職，有一位正科長，有些政策文件科員（黨員）已經知道了，可對他仍在保密。試想，他怎會有職有權呢？無怪乎——

章伯鈞說：「我這個部長，就是守靈牌。」

民盟中委彭文應說：「民主黨派是電話總機，客人，眉毛，尾巴，包打聽，拍馬屁。」他認為中共的幹部政策是「大材小用，小材大用，優材劣用，劣材優用，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用非所長，用非所願，有才無德，有德無才，德才俱無，有罰無賞，賞罰顛倒。」（人民日報，8月25日）

教育部副部長林漢達說：「我不是講我個人有職無權，而是說整個教育部都是有職無權。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發通知下去，不靈，加上國務院，還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聯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門有甚麼用？肯定你有成績，就有成績，說有偏差，就有偏差。」（人民日報5，21）

8月6日北京師範大學舉行全體大會，揭露和批判文學家黃藥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有人揭發他在中文系整風會議上的反動言論：「黃藥眠說他當系主任是有職無權，是被人當玩具玩，並說這與黨的整個領導和制度有關。他說有職無權的根源在於黨把知識份子看成是不可靠的小資產階級。他認為不能死記住列寧的個別詞句，像唸經一樣，一提到知識份子就對他們有對抗情緒，總是把知識份子當成異己分子。」（8月7日，光明日報）

民盟中委，河南省副省長王毅齋說：「有職無權使你等於是個花瓶，招牌，牌位；這是黨外人士最感痛苦的事。」（河南日報，5月18日）

民盟陝西省委宣傳部長張性初揭發民盟中常委，陝西省副省長韓兆鶚：「他造謠說『有職無權』，是『被人牽著鼻子走的』，『作副職是給人拾遺補缺的』，是『點綴品』！」（陝西日報，8月20日）

時輪已滾動進21世紀，我們插問一句：如今中國政壇上的人大，政協，民主黨派，群眾團體（如工會等）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是否仍是眉毛、點綴品，紙花，花瓶，招牌，位牌，玩具，泥菩薩，電話總機，客人，尾巴，包打聽，馬屁精，狗腿子，應聲蟲，留聲機，助紂為虐，被人牽著鼻子走的出賣靈魂者？有另一種人物，如李慎之等，作了難能可貴的堅持，秉持良心說話，辦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應該說是我民族優秀文化的傑出載體，卓越的傳人，樹一代風範，在右派中也屬鳳毛麟角。1956年波匈事件發生時，他任職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毛澤東派秘書林克去徵求他的意見。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蘇聯東歐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在革命勝利後建立起一個民主的制度。結合中國的情況，他認為「我們的大民主太少」，「應當成立憲法法院」，「我們應當搞大民主」。只有讓人民對國家大政方針有討論的權利和自由，才能免蹈蘇聯覆轍。這可惹火了民主死敵毛澤東，劃右派自然是沒有跑的了。毛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份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習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這是李先生終生與專制主義所打的遭遇戰犖犖大端之一。之二是與鄧二世在血洗天安門所遇，他憤而掛冠：「決不在刺刀下做官」。之三是，他一篇文章《風雨蒼黃五十年》，不僅給小人得志的江三世舉辦的國慶盛典大潑冷水：「就為準備這次大慶，據說花掉了起碼是上千億的錢，一切的一切都是國踵事增華。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這種壯觀的場面的國家應該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也許只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指責他們是一樣的小丑，一樣的跳梁。而且為中共掌權50年的歷史定論為：「歷史剩下的竟是謊言。然而，據說我們一切的一切都要遵從的原則是『實事求是』。」文章引用了蘇共20大以後意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的一個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黨專制必然導致個人專政（獨裁製）。」

實在是，英雄所見略同。據光明日報 7 月 1 日所載，羅隆基私下曾對浦熙修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個人獨裁政治。個人崇拜的根源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對知識份子來說，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總比社會主義制度好些。」

第四，對「黨天下」摻沙子

6 月 10 日的瀋陽日報刊出了瀋陽師院張百生，黃振旅七千餘字的長文《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課題》。主題是挖掉「三害」的根子。它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分析肅反運動擴大化是在主觀主義思想指導下，寧左勿右，打錯了好人，破壞了法制；從理論上是受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事業越發展敵人越多的錯誤理論的影響。肅反幹部只是執行中央的指示，所以，「根子在北京」。他們質問：「胡風問題已過了兩年，為甚麼還不公開審判？我們要求黨中央，如果打對了就立即公開審判，如果錯了就馬上開釋，並恢復其名譽。」

文章還具體批判了「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面冒進。」對於「黨天下」，他們認為中共使「自己變成了特權者，陶醉於自己是開國元勳，有汗馬功勞，應當有權有勢的泥潭中，陶醉於自己是特殊材料製成的自我欣賞裡，總以為自己是最優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傳自己偉大，光榮，正確，把自己擺在國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黨即國家，國家即黨』的氣派。由於黨對一切問題有最後決定權，從組織上又不信任非黨人士，就會把黨外一切逆耳的忠言拒於千里之外，這就使黨從思想上到組織上開始脫離群眾。黨雖擁有一千二百萬黨員，但這僅是占全民總數的百分之二弱而已。。。。。。難道百分之九十八的非黨同志都無德無才，應當絕對服從百分之二的人的主張，當這百分二人的『順民』麼！

黨所以喪失威信，黨員腐化，是由於「有了特權，漸漸忘記了革命的真義，喜歡奉承，作威作福，思想硬化。解放以後很有些人看到入黨是攀登仕途的拐棍，有權有勢，官高祿厚，步步高陞。於是蜂擁而至，『爭取』入黨，在黨員和黨組織面前，極盡其拍馬的能事，偽裝積極，唯唯諾諾，唯命是從，歪曲事實，欺上壓下。。。。。。以博取黨員和黨組織的歡心，達到入黨之目的。」

「解放後這幾年來是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有的也只是形式，不僅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連資本主義的假民主也沒有，憲法成了一紙空文，黨可以不遵守它。實際上是一黨專政，是黨中央政治局少數人獨裁。黨內也沒有民主，下級組織和黨員只能貫徹黨中央的指示，決議。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是有職無權，只有執行決議的義務，沒有參與決策的實際可能。黨是太上皇，威武神聖的。一手托著馬列主義的聖經，一手拿著國家政權的寶劍，誰敢提出異議，不是被扣上反馬列主義的鐵帽，就是被帶上『莫須有』罪名的手銬。選舉只是變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個人，誰也不知道自己選的人是怎樣的，他代表自己說了些甚麼。至於集會，結社，出版等，都必須在黨領導下進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這怎能體現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是對人權的侵犯，嚴重破壞法制，必須改變。」

「應該實行直接，普遍的競選，讓代表們能夠真正代表本選區大多數選民的意見，對本區選民負責。應該讓人民自由組織新的黨派，社團和出版報刊，以便廣開言路，監督政府，。。。。。」

「國家大事誰說了算？在憲法規定是『人大』說了算，而實際上，『人大』不過是個泥菩薩而已，全權都操在黨中央手裡。『人大』只是走走形式，舉手通過，完成立法手續。幾年來很少看見『人大』對國家大事進行過真正的討論，很少看見委員提出重大動議，卻偶爾看見他們一些無關疼癢的考察記在報上發表。。。。。。『人大』和『政協』就像兩朵紙花一樣點綴民主的門面。當然，錯不在『人大』和『政協』，責任在黨中央。黨對『人大』與『政協』說來，成了超政府，超憲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黨代政，而且是以黨代憲法，以黨代『人大』。。。。。。這樣少數人的專斷，肆無忌憚地發號施令，不發生錯誤倒是不可思議的了。

要改變這種獨裁誤國的現象，必須把黨從『人大』與政府之上拿下來，把政府置於『人大』之下，使『人大』成為真正的權力機關。『人大』代表必須經普遍的競選產生，一定要選出才高德劭者，才能起到真正的代表的作用，不要按各黨派『政治分贓』的比例瓜分席位。要設立各種專門組織，集中最優秀的各種專家參加工作。『人大』常委會應該是專職的。人民代表不應兼任政府之職務。應該創辦『人大』的有關刊物，向人民宣傳政策，刊登消息和討論的重大問題，監督政府工作等等。至於黨對『人大』怎樣起領導作用？我們認為這就要靠黨員代表的作用。只要共產黨代表人民利益，黨員在人民中享有威信，人民一定選他進去。」

共產黨把人民，特別是青年要求民主，都歸結為要的是資產階級民主，而對資產階級民主又長期地加以詆毀、醜化。從張百生、黃振旅的文章看，人們對資產階級民主還是嚮往的。馬哲民說得很形象：共產黨對青年說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不好，其實這好有一比，過去有個大和尚同小和尚上山，小和尚看見一位姑娘，問大和尚這是甚麼，大和尚說這是老虎。大和尚問小和尚愛甚麼，小和尚說我愛老虎。共產黨和青年說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是老虎，其實青年還是愛它的（《長江日報》6月26日）

天津日報，5月27日報導了中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部召集的中學教師座談會，會上第三女子中學的民盟盟員、歷史教師黃心平提出了一個根除「一黨專政」的政治主張。他說，「我有一個觸及共產黨利益的意見，只要不殺頭，我就提出來。是甚麼意見呢？我認為，現在既然允許民主黨派存在，各民主黨派的黨綱又都要求走向共產主義，同時各個黨派又都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為甚麼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一黨執政有害處，像共產黨已經整過三次風了，但如今仍然有嚴重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通過這次整風是不是能夠徹底消滅這些缺點，還使人懷疑。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來輪流執政，由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就好得多。因為這樣做可以刺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為人民服務。問題是共產黨肯不肯放棄政權。我本來打算將這意見寫成文章投給報社的，只怕不給刊登。」

《天津日報》發表了幾篇文章，批判他的言論。6月23日，又登了黃心平的一篇長文——《談「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他寫道：

「我的意思是，現在不能實行各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是否將來可實行。如果主張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輪流執政，就是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取消社會主義，此話從何說起？又是根據甚麼事實而得出這樣的論斷？」

「我懇告發表與我不同意見的諸位先生們，你們的意見盡可與我不同，可以從理論上駁斥我，以理服人，但切勿用帶有誣蔑的話對我人格橫加污辱。」

章伯鈞對「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那時黨員數），統治著五億農奴」的黨天下局面早有所預期：「非造反不行」。他嚮往資本主義表現出的活力：「為甚麼還有活力？就因為有多黨制度，有民主制度，有眾議院和參議院，有在朝黨和在野黨。光緒皇帝為甚麼完蛋？就因為沒有民主。資本主義為甚麼還沒有完蛋？就因為有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是：你不行，我來；我不行，你來。在朝的罵在野的，在野的罵在朝的，這在我們叫做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他們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說，資本主義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說，有互相抑制，互相監督的作用。」（人民日報，6月19日）

他內心深處有一個「輪流執政」的政治理念，但不曾明說。因為他跟中共交道打多了，早知「和共產黨合作不容易，共產黨是老虎。」他只是試探著提出一個增加決策民主性的方案：「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

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裡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他特別指出，「國務院開會，常拿出成品，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這便是被批鬥的三大右派理論之二：政治設計院。

盧郁文批判過諸多右派言論之後，反駁章伯鈞說，章伯鈞先生不讓把成品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國務院會議上大討論而特討論，他說一通，我說一通，然後表決，這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方式，表面看來是民主的，實際上並不能取得一致。他說，章先生這個意見我不能同意。他認為事先把文件經過各方充分協商，準備成熟，拿出來討論通過，這正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是它的優越性。（人民日報，5月26日。這時毛正在引蛇出洞。）

如果說，拿出成品再「充分發揚民主」，讓與會者這個表示「衷心擁護」，那個表態：「揭誠擁護！」。。。。。。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的話，倒也是的確符合事實的。但要說是它的優越性，。。。。。。這不禁使人想起，被毛澤東奸污並傳染給她滴蟲病的女孩，對李醫生說的：「主席真偉大，樣樣都偉大，真使人陶醉。」左派之所以為左派，誠如是也。

人民日報，6月28日載，武漢華中師範學院教授、民盟成員艾瑋生說：「當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一個領導，一個被領導，……互相監督是解釋不通的。」「民主黨派只能在共產黨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見，譬如共產黨提出一個文件，民主黨派便在文件上改幾個字，像『之』改成『的』字，『我們』改成『大家』等。民主黨派只能施工，不能設計。所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應該改變。」

第五，清算中共政治運動的罪行

章伯鈞是從源頭上對「黨天下」來一個「摻沙子」；而被毛澤東包辦的「章羅聯盟」這場婚姻中的另一角色羅隆基，則是用「平反委員會」來清算黨天下罄竹難書的罪行。對於右派理論，儲安平和章伯鈞是無獨有偶，再加上羅隆基便形成鼎足而三：黨天下；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

九三學社副秘書長李毅說，我們社會主義學院現在就有好幾個同志睡不著覺，心裏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悶在心裏難受。有人說，領導上應該從政治上，組織上作出進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撐腰，公開講講不准打擊報復。

據此，羅隆基說：「要毛主席出來講話保證，那是笑話。要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具體方案，就是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甚麼委屈都來申訴。」他認為這樣做有三個好處：「一，可以鼓勵大家提意見，各地知識份子就不會顧慮有話無處說，而是條條道路通北京了；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雖然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講話。有人擔心在這次的『鳴』和『放』以後，還會有『收』和『整』。在過去運動中受委屈的，要給他們平反，就可以使他們減少同黨和政府的隔膜。」「二，平反的機構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原領導機構分開。這幾個運動過去是共產黨領導著搞的。平反時，除了領導黨以外，還應該由各民主黨派人士參加，說明運動有成績，也為受了委屈的人解決問題。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黨派的，其實共產黨內也有。三，現在誰都不能保證在下級機關裡不發生打擊報復事件，有這個機構，敢打擊報復的人，知所畏懼；受到打擊報復的人就有路可走，他們可以提出控告。」「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使它成為一個系統。」（人民日報，5月23日）

這個問題是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過的；搞錯了的要平反。毛只是想抓幾個典型，平平反做做幌子，以收到殺也英明放也英明，吾皇萬歲，萬萬歲之萬民擁戴。如果來真的「有冤伸冤」，那麼，斯黨也而有斯領袖也的黨天下能還得起這筆錢債，物債，血債，淚債嗎？只說殺人一項，不說更多的勞改，勞教，管制，批鬥。。。。。。毛就像按比例劃右派一樣，搞的是按比例殺人。1951年4月30日毛親手所寫的「轉發西南局關於鎮反問題給川北區黨委（胡耀邦）的指示的批語」：「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不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況者可以超過這個比例，但須得中央局批轉，並報中央備案。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萬，已捕及將捕人犯一萬，已殺七百，擬再殺七左右，共殺一千四百左右就夠了。」（63）

那時報紙上正在猛批「寬大無邊」的右傾思想，幹部都是以殺人不眨眼以示其革命堅定性的。我家那個八百多人口的村莊，殺了一個「偽鄉長」，兩個「投敵民兵」，兩個「地主狗腿子」（他倆的罪行是，揚言「國軍打回來再說。」）。定比例本已非法，何況從來都是超額有功，下面總是超額殺人爭相立功呢！

當年羅隆基斥責國民黨：「如今的黨治，在內政上以黨治國，是以黨亂國；在外交上以黨治國，是以黨亡國。」（64）這是公開發表在《新月》上的，所以蔣和毛對他反對一黨專政的政治理念都很摸底細的。這就是他雖然反蔣，蔣介石還給他部長當，國防部，外交部之外任他挑；而他擁毛，擁共，毛共卻沒有讓他當部長，出於無奈，才從林業部份出個森林工業部讓羅當部長，隨後他劃右派，這個部便也撤消了。

新聞日報編輯部揭露王造時透露給該報副總編陸詒的訊息：羅隆基聽完毛在最高國務會議的報告後，說：「到現在再來提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足證共產黨統治中國這幾年到處都是錯誤。」人民日報7月5日對鬥爭會的報導，標題是：《羅隆基說：足證共產黨統治中國處處是錯》。當然，這也「足證」：成立「平反委員會」系統是絕對必要的；而所有當時的鳴，放，總括地說是「足證」了「足證」。同時，所有對「足證」的反駁，你找不出一件不是虛偽的，強詞奪理的，能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盧郁文，小丑一個，固不足掛齒。吳晗，歷史學家，飽學之士，就是他能把不存在的東西巧飾成「事實」，胡說一起：「章羅兩人原來是兩個把頭，爭權奪利，勾心鬥角，互不相下。過去，他們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盟內爭地位，爭各自黨羽的安排，建國以來，章羅在民盟中央，除了鬧人事糾紛以外，從來也沒想到要替人民辦點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在匈牙利事件之後，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提出之後，他們對國際和國內形勢的估計，以為要變天了，共產黨站不長了，民主黨派大有可為了。章羅兩個多年冤家突然變成『章羅聯盟』了，兩個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氣了，一個腔調說話了。」

（人民日報，7月16日）可是，當迷霧澄清，真相以「章羅聯盟，天下奇冤」載入歷史時，歷史學家吳晗又該怎樣向歷史作交代呢？早在毛捏造「章羅同盟」罪名前20天，吳批「平反委員會」：「這個意見涉到兩個問題：一個是他對黨領導的三反，五反，肅反等機構是不信任的。一個是他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一個最高權力的立法機關，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這樣一個協商機關，下降或者改變為司法行政機關，這和這兩個機關的性質是不符合的。」可是，即便在被毛背信棄義地篡改後而正式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仍然寫著：「我提議今年或者明年對於肅反工作全面檢查一次，總結經驗，發揚正氣，打擊歪風。中央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員會和政協委員會主持。」試問：毛澤東的意見涉不涉到這兩個問題？（65）這不啻是吳吃了毛一記耳光。「不啻」還非真的，真的是毛通過批《海瑞罷官》一耳光打得他命歸西天。因為他死前頓悟到「悔不當

初」，咬破舌頭寫了這四個血字，所以能「立地成佛」。佛說，縱有彌天大罪，也抵不住「悔改」二字。

史良的賣友叛盟，比吳晗有過之無不及，可以說是司法部長對「章羅聯盟」下的判決書：「章羅聯盟的反動綱領是甚麼呢？主要是：一，他們宣揚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主張民主黨派和共產黨輪流執政，反對我們國家政治體制和基本政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二，他們反對黨對國家事務的領導，首先是反對黨對知識份子和科學文教事業的領導，要黨的領導退出高等學校，推出科學文教機關；三，他們反對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和監督，篡改民主黨派的政治方向，利用民主黨派組織作為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工具；四，他們抹殺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否定黨所領導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肅反等歷次革命運動的偉大功績，煽動反黨情緒，企圖倒算翻案；五，他們在知識份子中間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個人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的科學文化，反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阻擋知識份子思想改造以及和工農相結合；六，他們篡改《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報刊的政治方向，作為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宣傳陣地，鼓吹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七，他們宣揚帝國主義侵略陣營的強大，誹謗社會主義陣營，散佈國際局勢緊張的空氣，反對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八，他們實行排斥打擊左派、欺騙矇蔽中間派、拉攏擴大右派的組織路線，安排爪牙，控制組織，奪取民盟的領導實權，反對民主黨派長期以來發展組織的正確方針，破壞重點分工的協議，招兵買馬，蒐羅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參加民主黨派，在民主黨派建立和擴大反動組織基礎等等。」（人民日報，1958年1月26日。）她在文革中雖苟活下來，但也受到猛烈批判和人格羞辱。

光明日報，6月3日載：陳新桂說，政治運動，成績的取得，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所以，僅以「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個別的難免的」這個公式來作結論，未必一定正確。過去幾次運動產生的副作用太大，最嚴重的是助長了唯心主義。比如，不從調查研究出發，事先擬定打擊的對象的數字，對運動採取寧左勿右、否定一切、大膽懷疑的辦法，等等，都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不相符合，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歷次政治運動還產生一些副作用，如人為地製造了「牆」和「溝」；把人分為「積極份子」和「落後分子」。運動中湧現出的「積極份子」有的是以片面地反映和密報別人的問題而獲得這個稱號的，所以，有的老教授說，他們是「靠運動吃飯」。另外，在運動中也有的人養成看行情辦事。有人這樣說過，在運動中「要避免挨打，就得打人」。這些人簡直是敗壞社會道德。

在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右派言論選集》中，載有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言論：「總說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績是主要的，偉大的，偉大個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說起思想改造就搖頭，甚麼『成績是主要的』，趕快收起吧！三反思想改造的時候，要我作檢討，撤我的職，都是當眾搞的；徐懋庸（黨委書記）撤職，若干黨員在這件事上作檢討，卻是悄悄地搞，待遇太不公平。。。。。。三反，思想改造的檢討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認，要重新寫過。」

「我們歷次運動中常常捕風捉影，就去搜家，結果只道個歉。但有教條主義和特權思想的人，是不知道思想有創傷是不能一下子磨滅的。憲法規定人民權利不受侵犯，但民法，刑法都沒有公佈，人民無權，憲法沒有保證，這是肯定的違法，是不能保障憲法的實現的。」

「知識份子迫切要求信任，老是像民族資產階級一樣改造，改造，甚麼時候才信任我們。」（毛整人的陰謀為甚麼總能得逞？除了應用毛的吃人哲學《矛盾論》加以解答外；被整的對象包括後來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林彪等，都是要把禍水引入別人田。我們尊敬的教授也未能免俗；難道民族資產階級就應該永享改造，改造嗎？他們遭遇的災難還不夠沉重嗎？同是天下受害者，譴責害人蟲應同聲！）

「劉真（徐懋庸的繼任）問向誰爭自由民主，他自以為問得很巧妙，其實這問題很好回答。向誰爭人權？向侵犯人權的人爭人權。向誰爭民主？向不民主的人爭民主，向誰要自由？向不給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現在事實如何呢？選先進工作者，選人民代表都是指定的，這民主麼？三反時 xxx 教授被叫做 x 犯 xx，隨便把人關起來，這自由麼？」

長江日報，7 月 3 日載楊展時致毛澤東主席的「萬言書」中說：「我承認，我們黨執政七年，總的來說，成績是主要的，可是。在知識份子政策這個個別問題上，如果我不照公式說話，那我就不能不說，缺點是主要的。不！更恰當點說，是失敗的。」「也由於缺乏瞭解，對知識份子的估計當然也就不能恰如其分。這使我們對知識份子出現了或冷或熱，不知究竟如何措手的情況。有時（這是主要的），感到知識份子思想落後，歷史複雜，政治態度『不明朗』，心裏一煩躁就紮紮實實整他們一傢伙；有時（這不是主要的），感到他們還有點知識，有點技術，對社會主義還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則又不免寶貝長、寶貝短的對他們『統戰』一番。知識份子們被我們一時放在火裡，一時防災水裡，一時打入十八層地獄一時又捧上三十三天。入地時，滿肚子委屈牢騷，深悔當時自作聰明，『沒聽朋友的勸告到國外去看看風色』，癡心妄想跟著共產黨跑了一場，還是不免頂著一個『反革命分子』的下場。不但自己死了不清白，連妻子兒女也抬不起頭。上天時，心驚膽戰，不知何年何月『，龍顏大怒』又一個倒栽蔥摔了下來。七年以來，他們像童養媳婦在阿婆手下過日子一樣，提心吊膽，戰戰兢兢，說起來是『一家人』，實際上卻不得不小聲小氣，輕手輕腳，處處看顏色行事，憑這樣還惟恐自己出差錯惟恐被家裏人抓住小辮子。」「按照我們黨的估計，知識份子似乎只是一個愛國者。他們愛祖國，可是留戀自己在舊社會的地位，嚮往著資產階級民主，而對我們黨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並不熱心，有距離，甚至反對。」「這個估計是很不正確的。」「正是因為這個估計錯了，才使我們黨對知識份子的政策全部都錯誤了。」「在一種強烈的、莫名其妙的、十十足足的宗派情緒的支配下討厭他們，冷落他們，處處用懷疑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他們，甚至一足踢開他們。而尚以為未足，並通過歷次社會改革運動一次加次三次殘酷地打擊他們，惟恐斬殺不絕，千方百計地從精神上加以折磨：農民所不忍施之於地主的，我們悍然施之於知識份子；工人所不忍施之於資本家的，我們悍然施之於知識份子。在這些運動中，知識份子因不勝精神摧殘，不勝鬥爭之辱，不勝我們的『董超薛霸式的幫』，跳樓赴水仰藥刎頸投環切腹而死的，擢髮難數！毫耄無逃，孕病不免，（華南師範學院在肅反運動中有五詩六命的事）天神共憤，道途咨嗟！把我們這種屠殺的方式和法西斯強盜奧斯威辛的方式相比，我以為奧斯威辛的不但顯得拙劣幼稚（無論如何，總還得劊子手親自動手），且倒還乾脆仁慈！如果說，斯大林同志不免因為他對同志殘酷屠殺而逃不過歷史的斥責，我看，我們黨也很難不因對已經『歸順』了我們的知識份子的屠殺而受到歷史的斥責。我黨之屠和暴秦之坑終將同成為歷史上兩大無法湔滌的污點，不能不使人萬分痛心！（於此，我們卻聽見台灣的熱烈的掌聲！）」「可是，我們還居然心安自得地說：成績是主要的！」

光明日報，6 月 5 日載，范樸齋說：「有人說：『一系列的運動、改造，有的人把人性也改掉了。』這豈是我們改造的目的？但他們不敢分辯，說道理也說不通，只好忍受。許多人由此逐漸產生了消極情緒，這也錯，那也錯，感到人性喪失，見人低頭，還有甚麼生活意趣呢？」

遼寧日報，6 月 8 日載，大連工學院講彭聲漢在中共旅大市委宣傳會議小組會上發言。他說，民主的實質在於思想應絕對自由（表現在我們憲法上就是言論，結社集會的自由），組織上則少數應服從多數（投票選舉政府）。有人說：「過去有些事情民主少了些，集中多了些，並不是不民主。」又說：「今後應在民主與集中之間尋求一個適的比例」——這是在玩弄名詞，在耍花樣。過去不民主，就應該老老實實承認錯誤。

肅反是對自己人專政。所謂「肅反走的是群眾路線」，群眾是誰呢？我把它大致分為四種：打手；走上風的；走下風的；被斗的。如果硬把它說成是群眾路線，那亦不過是「打手」路線而已。肅反鬥爭拆散了多少個幸福的家庭，摧毀了多少堅固的友誼。在和平時期發生這些事情是很反常的，它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

北大俄語系教授魏荒弩批評道：「中央決定肅反對像有百分之五，這是太主觀了。……這樣就產生了超額完全任務的現象……許多人被迫自殺，但還被扣上畏罪自殺之名。……肅反是集反憲法之大成。」「肅反運動是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

北大哲學系羊華榮同學在大字報《重新估價肅反》中說：「肅反有如下缺點：1 侵犯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斗錯了人，關錯了人，迫壞了人，迫死了人」；2 破壞了法制，損害了憲法，損害了民主自由，如限制一些公民通訊自由、人身自由、無根據的搜查、看禁和逮捕。3 促使了黨員與非黨員之間的牆更高、溝更深，少數黨員在肅反後，在人民頭上高視闊步。4 摧殘了人們應有的感情，破壞了多少家庭幸福，拆散了多少鴛鴦，損害了多少友誼……」

浙江日報 6 月 27 日載有人揭發省文聯主席宋雲彬跟他說過：「土地改革搞得糟，文化事業慘遭破壞，許多民間藏書幾乎被燒光，這等於秦始皇焚書坑儒政策。龍泉拆塔事件後，這是共產黨破壞文物作風的沿襲。他還對我講過：肅反中出了許多亂子，到處逼死人命，在溫州我的一個朋友被逼自殺了！」

鑽屁股蛭郭沫若，無孔不入，連宋雲彬也不放過。他發言的最大效應是刺激別人的嘔吐神經：「革命的破壞在在所難免的。經歷一次像土地改革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古書文物哪能沒有一點損失！中國地方大，文物多，保護起來，很有困難。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牆，在中國幾乎到處都有，往往一個小市鎮也有城寨。除了必須保存，可以保存者外，我看有很多城牆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動不得的思想，是一種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雲彬把龍泉拆塔事件誇大起來，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產黨破壞了，這樣看問題是不合邏輯的。」（人民日報，9 月 30 日）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歷史和邏輯是一致的。文革中文物遭到浩劫是歷史事實，但卻不合郭氏「邏輯」。反倒郭的談話合乎了毛澤東夫子自道的邏輯：「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毛澤東選集》四卷本第 677 頁）

第六，呼喚法治

如果在一個政黨內，在一種情況下你通過陷害別人就能撈到甜頭，在另一種情況下就輪到另外的人通過陷害你來撈甜頭了。例如賀龍，據說是他殺掉王實味的；而他維護的這個說殺就可以隨便殺——用周恩來說毛澤東的話：「把殺人當兒戲」——的吃人制度和吃人毛王，卻讓他死得那樣悲慘，殘無人道。劉少奇也然。毛澤東的「總管」葉子龍，由於宣揚毛的桃色新聞，讓劉知道了。劉說：「這是污蔑我們黨，把他拘捕，槍斃」。（66）難道毛不是淫棍嗎？再說，劉個人有權一句話就槍斃林嗎？這就涉及到法治的問題。1958 年，毛在總結反右經驗時說，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制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的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90%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 138 頁）劉也說：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做辦事的參考。（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5 頁）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劉少奇主席殘酷迫害，只至慘死，「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恐怕是，對法律連「做辦事的參考」也沒參考。

從人類的歷史和我個人的經歷中，屢試不爽的是：歷史的戲劇性在於「請君入甕」。許多人在制「甕」，燒「甕」，滿以為只供別人入哩！海外就有這麼個人，他胡充八當，顛倒是非，想通過誣陷正直的李志綏先生，把《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誣陷為毒草，來作政治投機生意，想讓中共視他為香「花」；但他沒有想想：你有甚麼資格否定那本《回憶錄》？你想了沒有：最有發言權的張玉鳳為甚麼沉默不言呢？你還是好好照照歷史的鏡子吧：甕正在燒得火紅！料你也比不過劉少奇的功高望重，吳晗的真才實學和對中共忠心及貢獻大吧！只憑你拍拍馬屁，扯扯謊，撩撩炮，為醜惡的毛澤東做的那些男盜女娼、雞鳴狗盜的醜事遮遮醜，就想投機取巧撈到稻草嗎？你恐怕到入甕時都不配學吳晗的醒悟：悔不當初！你也許可以醒悟過來這一點：「原來這個『甕』就是我想當香花的焚屍爐！」

一個真理，對好人壞人都是一視同仁的，「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拉。本登這只「甕」，本是美國燒紅它對付蘇聯的，現在讓美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還在受著付出更大代價的威脅。這就是「客觀規律」又叫做「必然規律」的道理。任何人，好人和壞人，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須考慮進去這一點。

左派們，作為黨天下的既得利益者，把呼喚法治的右派打翻在地，當年是何等地興高采烈！當風水輪流轉到他們入甕時，血色恐怖又是何等慘烈！喲！法制這個東西原是如此地必要！原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成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打倒對象。大難未死，文革後他對劉少奇被毛整得慘死一事感慨系之，說：「社會主義沒有法制不行啊！」說完眼淚奪眶而出。但連劉少奇在內，都是贊成「人治」的呀！「治」別人時是無所謂的，你陸平是因江隆基在北京大學當黨委書記只劃了 6.5% 的右派，中央嫌他反右不力，讓你取而代之，你是寧左勿右，草菅人命，劃了 700 極右派，800 中右，合計佔到 15%，喝著老年學者、少年學子的鮮血染紅頭頂的。過去的事權且既往不咎，都算拉倒，念你總算認識到：「沒有法制不行啊！」這和「悔不當初」是個等價命題。

眾所周知，毛死後鄧小平，彭真在法制建設上做了許多亡羊補牢的工作。但當人們歌頌「英明」，「開明」的時候，卻忘記了當年右派們為建議他們曲突徙薪而付出了「身敗名裂」。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何等沉痛的代價！

民革中常委譚惕吾（林希翎至今還口口聲聲讚佩她是個真正愛國的老太太）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 6 月 5 日的發言，從法治的觀點，比較系統地提出四個問題：第一個是共產黨領導國家的方式問題。現在政府有一套機構，黨內又有一套機構，這是雙軌制度。原說黨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實際上已超過這個範圍，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政府部門卻沒有權。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髮指示，是由於國務院單獨髮指示不管用。既然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為甚麼自己專政的機構不用，而要削弱其職權，另在政權之外來搞一套黨的系統呢？第二個問題是黨的政策應如何體現。黨應該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會製成法律，再由國家管理機關根據法律製成各種法令，通過法律，法令的實施，體現黨的政策。不應在法律，法令之外，再發內部指示，以指示代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第三個是黨遵守憲法和國家制度問題。黨制定政策，應在憲法範圍之內。中共中央應檢查在制定的政策中是否和憲法中有牴觸的！如上海將私營房產商和私營經租公司及屬於資本主義經營性質的房屋納入社會主義改造範圍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憲法的。但是在工作中把個別的作為生產資料的房屋和作為生活資料的私人住宅納入公私合營是和憲法第十一條的規定不符合的。關於國家制度問題，司法，律師，檢察是對執行國家制度起槓桿作用的，這三者在一黨委領導之下是不好的。黨可以派黨員到司法，檢察等機關去擔任負責工作，但這些部門不應該由一黨委領導。第四個問題

是怎樣使共產黨接受全國人民的監督。政府受人民代表大會監督，但是共產黨不受甚麼監督；應該建立制度使人民監督共產黨。

當年共產黨把這些意見當成是惡毒進攻，現在再也無話可說，不！倒是要把這些話從自己口中重複一遍，拿來炫耀自己開明，自己與時俱進！

另一位中常委劉斐早在5月30日就談到黨政不分和法制建設問題。黨和政是兩個性質不同的系統，黨是領導國家事業的核心，但是，黨的領導要通過國家機器去實現，黨不應該代政。黨政不分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建國不久，法制尚不完備，某些高級幹部和許多中下級幹部法制觀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風。黨中央對這方面的情況重視不夠，也不無影響。要改變這種情況，除進行思想整風之外，還必須加強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種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劃清黨政關係。黨員應以身作則，尊重國家的職權，不然，整風雖能收一時之效，卻缺乏經常的法制保證。

這些話說得何其正確！讓現在的年輕人人看了，一定認為是「鄧小平語錄」，哪裏能想到這就是「罪該萬死的右派，猖狂進攻的謬論」！這裡說明三個問題：一是資產階級右派是促進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先進份子；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是倒退派、反動派；反右派運動對知識份子的血腥鎮壓，是一場絞殺真理的運動，是阻擋歷史前進、開歷史倒車的反革命運動。二是鄧小平原是反右急先鋒，現在又成了右派的不孝子、不賢孫。在他大量剽竊右派的聲聲含血、字字含淚的各種觀點後，反咬一口說：「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你只用看看他關於體制改革的講話，看看有幾句話不是57年右派曾說過的？三是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個甚麼世道？一位沒有劃為右派的明哲保身老教授教訓我：「你認為是真理，在心裏相信就可以啦，何必說出口呢？有一張大字報是反對蘇聯佔領中國大片領土和抗戰結束進入東北大肆姦淫擄掠的。我何嘗不知道？但我就是不簽名，結果簽名的30位師生都劃了右派！我為甚麼不簽名？堅持真理是要付出代價的呀！要批你！要鬥你！要你入監！要用火燒死你！即便我有勇氣付出這樣的代價，我的妻子，我的兒女，我的兄弟姐妹，我的老爹老娘也決不答應！中國啊，人心世道！不光你一人，還要株連一大堆啊，何止十族！」所以，在我對「犬儒主義」反對之餘，也常想：是不是應該首先考慮消滅（除了消滅，斷無它途）那個讓人們只要堅持說出哪怕是一句只是政治常識性的真話，就必須得堅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的社會呢？這個社會除了毛澤東思想的光焰無際外，任何別的思想光焰，恐怕只能從專政機關的判決書及其證詞中挖掘！

人民日報，7月19日專門發社論《黨不能發號施令嗎？》批駁黃紹竑5月16日所作黨政關係的發言。他實在是很尊重中共的，他說他所以提黨政關係，絕不涉及黨的領導權問題，而是領導方法問題。黨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號施令，各地方或機關黨委五人小組在肅反運動中直接處理案件，黨政共同發佈決定，這樣對於動員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是有妨礙的。

這次會上他還談到法制問題：「我們的立法是落後於客觀形勢的需要的。刑法，民法，違警法，公務員懲戒法都尚未制定公佈，經濟方面的法規更不完備，五年計劃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條例還沒有制定。公務員懲戒法和各機關的組織條例辦事規則是與整風最有密切關係的法規，必須早日制定。」最後談了兩個具體問題，一是受勞動教養的據說有兩萬人，大多數是機關幹部，知識份子，他們既夠不上刑事犯罪，已經教養了一年多，應該定出一個整個的解決辦法，不宜拖下去。另一是有些國民黨人對革命出過一些力，但因歷史的關係被懷疑，判了重罪，希望徹底檢查，無辜的平反，歷史上有罪的應酌情處理。」

1949年4月25日，由毛澤東，朱德簽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茲特宣佈約法八章，願與我全體人民共同遵守之。」其中第五章宣告：「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責成上述人員各安職守，服從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負責保護各機關資財，檔案等，聽候接收處理。這些人員中，凡有一技之長而無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跡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別錄用。」（見《毛澤東選集》四卷本P. 1347）這個約法就是法律。

黃紹竑說的國民黨人是對革命出過力的，都判了重罪，一般的情況之慘就可想而知了。鎮反中，一汽車，一汽車拉出去槍斃的，大多屬於約法中所謂三「不加」的，據說是一共槍殺了500萬反革命分子；而判刑，管制的更是不計其數。這些是明牌。55年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所謂歷史反革命分子，即便無任何「罪惡」，只要是達到某一任職（僅憑記憶，好像是軍隊連級、黨是區分部書記、政是保長、憲兵。。。。。）便是。肅反運動中凡是符合這樣標準的，皆屬正確；另有斗錯的，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中，通過官方資料推算，錯斗率大致是超過94%。你就可見，肅反成績不是毛澤東說的「九個指頭」；他說的生瘡的、爛掉的即所犯錯誤，倒是佔九個多指頭，成績只佔半個多指頭。毛澤東憑藉著身後的幾百萬「解放軍」和幾百萬「公安局」，就可以大放厥詞，他在上海幹部會議上洋洋得意地說：「我們有許多話他們不聽。所謂不聽，是甚麼人不聽呢？是許多中間人士不聽，特別是右派不聽。中間人士將信將疑。右派根本不聽，許多話我們都給他們講了的，但他們不聽，另外搞一套。比如我們主張『團結——批評——團結』，他們就不聽。我們說肅反成績是主要的，他們又不聽……。」（《毛澤東選集》五卷，446頁）誰聽這些屁話呢？中間派和右派都不聽，唯有左派聽。當然，許多左派也是耳聽心不信的。左派之所以是左派，必須具備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徹底昧良心。如果你在哪一點上不昧良心，那麼，你在那一點上就不是左派，就有可能栽跟頭。請對證歷史，看是否全是這樣？

12月12日，人民日報公佈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的右派言論：「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們是司法不是司政策。」他打著「法律科學」的幌子販賣舊法觀點，片面強調「有利被告」，「無罪推定」，「自由心證」等主張，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份子減輕或開脫罪責。他們在審理案件時，對於有罪的人首先要求從「無罪」方面來考慮，對於有嚴重罪行的人首先要求從「減輕情節」方面來考慮，對於犯有死罪的人首先要求從「可以不死」方面來考慮。該報12月24日又揭露他說過：「黨對法院工作的領導是通過制度法律來實現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黨的意志，審判員服從了法律，就等於服從了黨的領導。因此，審判員只需服從法律，再不必有甚麼黨的領導了。黨具體過問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就是違法。」

復旦大學法律系教授楊兆龍在5月9日《新聞日報》發表文章《我國重要法典何以遲遲還不頒布？》，指出：社會主義的建設，並不是單純的物質建設，非物質建設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的法治和社會主義的民主。其中第三節寫道：「我們過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實在跟不上實際的要求。例如，平常與人民的基本權利的保障及一般社會關係的調整最有密切關係的刑法典，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等至今還沒有頒布。甚麼是合法的，甚麼是違法的，甚麼不是犯罪，甚麼是犯罪，以及應如何處罰等等，在好多場合，一般人固然無從知道，就是偵查，檢查，審判人員也沒有一明確的標準足資遵循。這就使得我國法律制度的建設，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中，變成了最薄弱的一環。上述這些法律的不及時頒布使大家不能於事前在這方面得到應有的教育。因此就發生一些無根據的控告和不應有的錯捕，錯押，錯判的情況。無論在刑事或民事方面都難免使壞人感到無所顧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因而引起不必

要的矛盾。在過去的七、八年中既沒有及時地頒布過一部完整的法典，又沒有設法彌補這個漏洞（如由主管部門頒布一些有系統的條例規程等，使許多事情長期沒有法規可以遵循，因而造成某些混亂現象，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嚴重的事態。這種情況，如果繼續存在下去，很可能成為製造不安與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

他認為，領導上錯誤的指導思想是造成立法進度遲緩的原因。例如，一位高級幹部曾說過，誰主張立法，尤其主張及早系統地立法，就是「歸法」或「六法」觀點，甚至於就是立場有問題。又有人認為，「只要懂得『政策』，有了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就可以解決法律問題。」又有人認為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難免限制政府機關應付事情的靈活性。楊教授認為這種無明確的法律限制的辦事的「靈活性」有時足以破壞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治，因而影響人民對政府的信仰。

人民日報 6 月 26 日載，老記者、九三學社北京分社宣傳部長顧執中的言論：「憲法自 1954 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第 89 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全被破壞了。第 87 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在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的做。」「大家都把憲法當做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現在從劉委員長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

人民日報 6 月 29 日的社論《再論立場問題》，是專為顧執中的兩句話而寫的：「廣大群眾對於右派份子的態度是堅決的，立場是明確的。他們看了本報在本月八日以來的一系列反擊右派份子的社論，覺得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興，因為這些社論支持了革命的正氣，打擊了反社會主義的斜氣。但是有一部份人的論調卻完全不同。他們看到報紙上的讀者來信、工人座談和反擊右派份子的社論，馬上大驚小怪起來，說甚麼報紙的態度變了呀，恐嚇信值不得小題大作呀，恐嚇信和讀者來信還不知是真是假呀葛佩琦只是態度偏激、儲安平無非是想出語驚人呀，就是反社會主義也不該一棍子打死呀，如此等等。在這類論調中，顧執中先生的兩句話特別有意思：『群眾有些左，〈人民日報〉又有些右。』這兩句話所以特別有意思，因為其中所說的『群眾』，所說的『左』和『右』意思都同一般人的瞭解截然相反。在這裡真可以說是沒有共同的語言了。」「在顧執中之流看來，甚麼是『群眾』呢？那就是一小撮反群眾的右派份子，還有就是一時分不清是非而跟了右派份子走的少數人；至於起來批判右派份子的人民群眾，那是被取消了稱為『群眾』的資格的。至於甚麼是『左』，甚麼是『右』呢？在顧執中之流看來，儲安平、葛佩琦等人的言論就是『左』，而批駁這些言論就是『右。』或者叫做『氣量不大』。顧執中接著說的一段話可以作為註腳，有些人『雖然知道大鳴大放不應越出擁護共產黨和建設社會主義這個軌道，但在講話時，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軌道的地方。』……那麼，顧執中所說的『控制不住』的『感情』，難道不是指著反社會主義的感情嗎？然而他說這就是『左』！」

是非顛倒，錯作對時對也錯。像其他右的言論一樣，這些法律觀點受到蠻橫無理的糟踏。6 月 26 日，周恩來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在頒布憲法前後，已經制定了許多重要的法律」——用「事實」批駁了「有些人所說『完全無法可循』」。

10 月 4 日人民日報載，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理事會副會長吳德峰在中國科學院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建國以來，我們國家先後頒布了數千件的法規，這些法規，曾經有效地指導和保障了我國各項工作的勝利開展。而右派份子硬不承認這個事實，叫囂甚麼『無法可依』，『有

法難依』，那又是甚麼原因呢？原來我們的法律是保護人民，鎮壓反革命分子的，而那些自命為『黃文正』（黃紹竑）和『譚青天』（譚惕吾）所要的卻是壓迫人民，保護反革命的法律，自然，這就難怪他們說甚麼『無法可依』，『有法難依』了。我們應該正告右派份子，你們要求的那種法律在人民的國家裏，是永遠不會有的。」「值得嚴重注意的是，有些右派份子竊據了專政機關的工作崗位，他們不僅到處散播甚麼『無罪推定論』，『審判有利於被告論』以及繁瑣的『證據論』等荒謬的有害的觀點，而且還公然以這些論點作為審理案件的『理論』根據，利用職權，以各種藉口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種刑事犯罪份子開脫罪責，輕縱罪犯（這種事例在不少地區均已發現）。這種情況不僅說明法學界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性，而且還說明這種鬥爭的更直接、現實的重要意義。」

10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政法戰線上還有嚴重的鬥爭》：「右派份子為了抗拒我們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還提出了所謂『司法獨立』，『審判獨立』等口號，企圖把司法系統同人民民主專政對立起來。他們說，如果不讓司法獨立就是違反憲法。其實，我們現行的司法審判等制度是完全符合憲法的；倒是右派份子要在我國搬用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所謂『三權分立』的做法，這才是真正違反憲法。右派份子自認為只有他們懂得法律，他們自稱『專家』，並且公然說，『現在誰夠條件就由誰來干』。事實證明，他們除了死守住反人民的歸法觀點以外，對於人民的法律根本無知。」

終篇：右派言論篇（三）

幾十年前反右，共產黨無理取鬧；到如今，不打自招得比右派「污蔑」的還惡毒：官方像說順口溜似地說：「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同時又把「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定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裡。誰能說清楚，這到底玩的是甚麼鬼名堂？過去把陰謀說成是「陽謀」，這個騙術已成為歷史的笑柄；現在，陽的一套：明文上攔了人民日報社論和一些極左份子的耳光，規定「獨立」云云；而陰的一套：相對於作為法律太上皇的各級中共政法委來說，不是完全獨立，也不是部份獨立，而是絕對不獨立。搞陰謀的必然性在於，右派雖然打倒了，但黨主與民主的矛盾非但沒有消滅，而且日益尖銳。而中共既要堅持黨天下（四個堅持的核心），又要冒充「三個代表」；除了乞靈於毛的陰謀之魂，絕對沒有第二個法門。總之是，中共做壞事必用陰謀手段；反之亦然，用陰謀手段所做之事，全是壞事。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以妄加莫須有的「邪教」罪名，到迫害修煉者；從逮捕入勞改營，勞教所到進洗腦班洗腦；從活著受虐待，侮辱，慘害，到死後焚屍滅跡；整個過程貫穿著陰險毒辣，陰謀詭計，使國人受害的受害，受騙的受騙。其中，偽造的所謂「法輪功天安門自焚事件」，其惡質天理不容！其手段乃希特勒國會縱火案大陰謀之翻版！在這一點上，跟毛澤東無視法律，肆行人治所搞的歷次政治運動是一脈相承的。

南方日報報導6月5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舉行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以《羅翼群說：人民生活已「接近餓死的邊緣」》（如果不是把羅先生打成右派，而是採納他的意見，就可能避免把「接近餓死的邊緣」發展到成為餓死4千600萬人的悲慘現實！——紫丹）為標題，摘登了羅的發言。他說，由於過去黨員執行政策，偏向西天取經中的「大膽懷疑，殘酷鬥爭」來硬套，而太忽視中國原有的社會道德，政治哲學，歷史習慣等優良部份，因而不免將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當做敵我問題來對待。在「三反」，「五反」，「肅反」期間，被斗的人因受不了當時的痛苦，明非事實，而被迫承認者有之；有些自稱為積極份子的人，違背良心，歪曲事實，或出頭作證，或非刑拷打，不惜犧牲他人的名譽，地位或生命，企圖取得黨的信任，為爭取入黨入團的捷徑的亦有之。因此，在過去各種社會改革動動中，確不免發生多少偏差案件。至於他說的「接近餓死的邊緣」，是建議政府學古人省刑罰薄稅斂。現在政府對於徵糧及各

種稅收是否過重，徵購農產品價格是否有偏低，國營商品利潤是否過高，這些都是人民生活切身的問題。幾年來究竟有沒有餓死人？可以說沒有餓死人，也可以說有餓死人。算不算接近餓死的邊緣呢？是值得檢查研究的事情。如果中共聽羅輩建言，停止「急躁冒進」，從「邊緣」後退，自能少餓死或不餓死人。反右的結果是大躍進，排山搗海地向死亡進軍！喪心病狂的老毛啊！踏著四千六百多萬餓死的屍體，妄想登上「世界革命導師」的寶座！現在中共中央對大躍進的檔案，剛剛

解密，請參看官方公佈的死人情況：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九年全國十七個省級地區，有五百二十二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萬八千多人。

一九六〇年，全國二十八個省級地區，有一千一百五十五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萬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國各地區有一千三百二十七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萬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全國各地區有七百五十一萬八千多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萬八千多人。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長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長率為負百分之二點四；一九六〇年為負百分之四點七；一九六一年為負百分之五點二；一九六二年為負百分之三點八。

全國十二個縣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間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過一百萬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肅省、貴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個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點五。（摘選自2005年11月爭鳴雜誌）

總計死亡人數為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這裡只有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統計數字包括全國各地區；一九五九年少統計十二個省級地區，按當年的省級地區死人的平均數是三十萬七千人算，本年少統計八百九十萬四千人，故本年度總計當為一千四百十二萬四千人；同理，一九六〇年度當為一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人。這樣算下來，全國總計的準確數目該是四千六百八十七萬五千人。

河南省民盟副主委杜孟模揭發主委王毅齋，一說到肅反中的缺點就憤憤地說：「罪惡滔天」。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十分不滿，謾罵：「黨團員帶頭賣餘糧，現在沒啥吃，餓死這些孬孫，活該！」又有人揭發他說過：「統購統銷後農民都吃不飽，人人面帶菜色，說夠吃都是瞎話！」謝瑞階揭發王曾說：「我在杞縣認識的熟人都鎮壓完了。」還曾說：「肅反中你們師範學院打人最嚴重，把沉東浦快打成肉醬了，還有一些人，都整得很厲害。。。。。」還鼓動張仲魯說：「沉東浦在開封師範學院工作，每次動動都是重點，肅反時打得直不起腰，現在還彎著腰走。」還說：「打人打病了，治好再打。。。。。」還說：「匈牙利人民很勇敢，有傳統的民主習慣。唉！中國人就不行，中國的民主黨派也算怪，只會死心踏地跟著共產黨走。」（河南日報7，26）

耿伯釗當時是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與閻錫山同學），耿是辛亥老人，參加過武昌首義，在地方上很有威望，當時已經七十四歲。1957年6月1日和3日下午，他和當時新華社記者曲一凡有兩次談話，前後共六小時，這次談話後被曲一凡整理出來，全文發表在《內部參考》上。他在談話中特別批評了黨政不分問題。他說：「長時期內，以黨代政的現象普遍而嚴重。領導黨有責任對國家大事適時提出正確的政策，和檢查政策的貫徹執行情況，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發號施令，發號施令是行政部門的事。我們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署名發佈某一指示和文件，於是上行下效，就出現了省委與省人委、地委與專署、縣委與縣人委等一系列的黨政聯名發號司令的事情。實際上，這樣做法必然助長黨政不分，其結果則是以黨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釗還特別提出了要「加強法制工作」。他認為，開國八年，國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遠遠跟不上形勢發展和人民需要的迫切要求。他說：「憲法有了，但憲法不能代替具體的法律和法規，法律不是幾條精神、原則能代替的。現在，除了婚姻法，幾乎沒有別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舊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東西來代替。……必須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樹立了守法的觀念，就不會盲動而犯法。」耿伯釗還在他的談話中提出要不反對「大黨主義」，他認為，儲安平向毛主席周總理提意見，提得很好，是給新聞界增了光。他認為，共產黨英明偉大，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個共產黨員，個個以領導者自居，以戰勝者自居，盛氣凌人，忽視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謝泳《1957年中國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

有人揭露林希翎，看到石家莊法院判錯一個農民，人民大學肅反運動中斗錯了個別人，她馬上就得出了我國肅反擴大化的結論。甚至捏造了所謂無辜殺了72萬的聳人聽聞的數字。（《教學與研究》1957年第7期）

7月23日人民日報載，對外貿易部行情研究所歐美研究室主任嚴文傑向黨中央提交了長篇意見書，「不僅一般地反對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領導，而且對黨的領導和組織形式提出了荒謬的主張。他把黨的領導局限於『應是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針政策問題』。『同時黨政各有一套系統，同級政法，監察，團體，企業又聽同級黨的；造成重複』，也就形成了『以黨代政或黨政不分』。。。。。。」

「嚴文傑對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大肆誣蔑。他說：『親身經歷過這些運動的人，想起來就感到心驚肉跳，毛骨悚然。』『一到此時，真是人人自危，社會大恐怖。傷人不謂不深。』『不管甚麼人，只要領導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鬥爭場面，比坐牢難受多了。』『想想看，在反霸斗地主的時候，一個受害的農民起來斗的時候，那些如瘋似狂的氣勢，當以後有一個變化的時候，那些受過傷的人會怎樣對付我們！』『我覺得，反會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著去反革命。』『不管成績怎樣，這種運動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規定：除非監察院同意，並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機關，團體不得開鬥爭會。』他還公然提出要對領導肅反鬥爭的同志進行報復，甚麼『冤死人者死』，『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現了他仇視革命的情緒。」

這裡令人想起，當鄧小平宣稱今後不再搞政治運動，知識份子齊聲歌功頌德：「小平同志真英明啊真英明！」的時候，卻忘光了早在20多年前右派付出了血淚的代價，發出了瀝血的呼喚：「不管成績怎樣，這種運動不能再搞了！」而當時，鄧大人正在豪飲著知識份子的冒著泡沫的鮮血陞官晉級哩！

嚴文傑也是共產黨員。這篇報導揭露了他反對《人民日報》反右派的宣傳。「《人民日報》比人家粗暴得多，厲害百倍。」對《人民日報》的標題：《人民沒有委託葛佩奇說這樣的話》，他發問：這是否經過公民投票了？我看葛佩奇也代表社會上的一部份人。葛佩奇說要殺共產黨人並沒有說現在就殺呀！如果共產黨真不好，為甚麼不允許別人殺你呢？當他看到黑板報宣佈李泰華是右派份子，即以中共黨員的名義向黑板報提出強硬抗議，質問這是誰的主意，為甚麼。當他因此受到攻擊的時候，還說，「對不同意的事抗議一下也不可以，我要問成甚麼世界。」

「成甚麼世界？」成共產世界，成黨天下。在這個世界中，「知識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陶孟和在6月8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召開的座談會上用「浩劫」二字來說明知識份子的歷史遭遇。自然的，他會受到圍剿。不過，圍剿他的各路英雄們，在九年後也嚐到了「浩劫」的滋味，相當多的人用生命給「浩劫」作了腳注。

李志綏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說：「這次是由鄧小平負責反右派運動。。。。。。我許久之後才知道鄧在推行反右派運動時，風聲鶴唳，人人膽顫心驚。」（頁195）他有機會得到中共高層的反映。「直到三年後，也就是一九六〇年，當時中國的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告訴我，反右運動中，有五十萬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部份都是被誣陷。最令人不安的是，許多工作單位被指定要找出若干配額的右派份子。。。。。。造成冤獄遍佈，誣陷氾濫。」（頁204）

這裡說明，中共內部，從上到下，並非人人在事事上都是喪盡天良之輩。那麼，誰才是呢？這就有必要建立一個科學的政治範疇——「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反動派」——來定性、定量了。劉賓雁在《誰是反動派》一文中說：「經過五十年曆史進程，是非是更加明顯了。錯誤的不是胡風，而是毛澤東。正是毛澤東的那套完全違反文藝本性的思想和政策，把後來三十幾年中國的文藝變成一片沙漠。同時，排除了胡風以後，他就把《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裡的反人性、反人道、反知識份子和反對批判精神的思想推而廣之，把1949年那場革命變成了反革命。所以，用毛澤東的邏輯來重新來一次定性的話，反革命就不是胡風，而是毛澤東了。」可見我說「毛澤東是反革命」和「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反動派」，不是沒經過深思熟慮和實踐檢驗，信手拈來的了。因為劉先生是被視為中國的良心的，而且他是不反共的老共產黨人。他一再跟我說過：「我是不反共的，我只是想要共產黨好。」

他這篇文章要談的是兩個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1955年5月，毛澤東親自動手，揪出來一個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胡風是魯迅最信任的弟子，文學理論家兼詩人。20年代在日本留學期間就加入了日共，始終沒放棄馬克思主義。魯迅去世後20年，他繼承魯迅的傳統，大力培養新人，同時以他的文學理論，批判五四以後中國文學界的歪風邪氣，為中國文學的正常發展，做出很大貢獻。他始終是中共的朋友，並不知道他的文學理論走上和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裡所宣揚的理論相反的方向。同時，他又得罪了當時文學界的一些權威人物。但是，即使是胡風長期以來的對手，也沒有認為他是敵人。毛澤東為甚麼要對胡風狠下毒手，在短短一個月裡把他的問題的性質從文藝思想上的『反黨』連升兩級而變為政治上的反革命，至今還是一個謎。

「二，緊接著打擊『胡風反革命集團』，毛澤東又發動了一次肅清反革命運動。經過五十年代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和其他相關的運動，反革命已經基本肅清了，這是大家的共識。但是毛仍然堅持己見，結果是運動規模很大，而絕大部份都打錯了。

「不僅這兩次運動是無中生有，後患無窮，它們還違反了一年前剛剛通過的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給胡風定性，就完全是毛澤東以胡風和他的朋友們之間的信件裡的文字得出的結論。而

按照憲法，私人信件屬於個人的隱私，應受到保護。憲法裡規定人民享有思想和言論自由，而胡風和他的朋友和弟子們假如說有錯誤，那也屬於言論和思想範圍，並無反革命行動。根本沒經過審判就定罪，也是違法的。胡風是關了十年以後才判決的，『集團』裡的別人，有的是二十年後才判決。在批鬥胡風和肅反運動中，完全照搬了延安時期所搞的『搶救運動』那套做法，隨意監禁和刑求逼供，這當然也是違反了憲法規定必須保護的人權。所以，憲法從此名存實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也就變成無法無天的歷史了。」

這兩個問題也是 57 年鳴放得很激烈的話題。下面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劉奇弟（譚天榮的同班）貼的一張大字報，並附了一副對聯：「鐵窗鎖賢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號，」他這位青年，為這張大字報被判 15 年徒刑，被殘酷拷打而逼瘋、而致死。

偉哉右派份子劉奇弟大學生：為胡風招幡

胡風絕不是反革命

——

反胡風運動已過三年了，胡風及其「集團」被當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鎮壓，今天舊案重翻，我要為胡風說話，更精確地說，我要為真理說話。胡風絕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

作為一個公民，我來過問法律，這是正常。我的行動有憲法支持。

胡風是怎麼一個人？

凡是正視事實的人都會清楚，在解放前胡風是一位進步的作家，是民主戰士。他辛勤地追隨著魯迅；在那萬惡的社會裏，他向人們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為青年所愛戴，尊敬。正因為這樣，正憑著這點，在解放後他才被選為人民代表。解放後他更不懈惰，帶頭高齡跑這跑那去鄉下參加土地改革；在朝鮮抗美援朝，勤勤懇懇體驗生活，從事創作。他們（胡風分子）寫的作品有血有肉，最為讀者所喜愛。這類人不是為人民服務，是為甚麼？世上還會找到這樣一種邏輯，把他們說成反革命。

看！這種控告和判決到底有沒有理？

關於對於控告胡風的內容，不外就是那三次反胡風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們再來看一看，它到底有沒有理由？回答是：「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的書。反把閒人聊天、侯寶林說相聲的邏輯和推理搬進了法庭。像這樣的辦法，只要他說過話寫過東西，都可以按這種斷章取義牽強附會的辦法，用說相聲的邏輯推演成反革命。

請問，這能當作控告嗎？

因此，自勉為要作個正義的維護真理的人的我不能不大聲疾呼！

胡風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

同學們，你們認為怎樣？讓我們徹底搞清楚吧，假如你們也認為胡風被冤枉，那麼讓我們一道來要求釋放胡風吧！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勝造七級浮屠，而更是為了支持正義，維護真理。

偉哉胡風分子呂熒先生：唯一敢公開為胡風申辯的呂熒一位當過 20 年右派的老師不無感慨地對我說，「在中國，自上世紀 50 年代開始直至 80 年代初，在政治高壓之下，知識份子可

謂集體大變節，丟失了自我。……舒蕪變節，馮友蘭投機，梁漱溟委曲求全，熊十力賣論求生，楊樹達、吳宓都不同程度地感冒，沈從文 60 年代也不甘寂寞，寫了有愧於其文格和人格的詩……」聞敏的《呂熒——惟一敢為胡風申辯的人》一文讓我感到震驚，在那個知識份子自相踐踏、一敗塗地的年代，呂熒的存在，為這個苦難的民族挽回了一點點尊嚴。呂熒這個名字將和陳寅恪、顧准、張中曉等人的名字一起刻在歷史的紀念碑上。呂熒是一面鏡子，在胡風被欽定為「反革命」、遭千夫所指的 1955 年，呂熒的作為照出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的嘴臉。即便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在場者接受採訪時的不同回答，同樣在不經意間露出了各自的靈魂。許覺民、塗光群、李希凡、藍翎等眾多在場者的回憶都提到了張光年，當呂熒發言：「胡風不是反革命，他的問題是理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話未說完，「張光年很兇的，高呼口號：『不許為胡風反革命分子辯護！』」對此，張光年儘管不無輕描淡寫（「我突然站起來，向正在發言的呂熒同志提出質疑。」），但也承認「整個兒是個人迷信，執行上面的決策。……呂熒同志我不熟，很對不起他……」。舒蕪則是另外一種態度，他稱呂熒站出來「不過是個小插曲。蠻有戲劇性的。」顯然帶有「看戲」的心態。在場的文人無不認為呂熒是個「書獃子」，「離現實太遠」。在那些聰明人看來，隨波逐流、見風使舵乃至落井下石才是識時務者，呂熒只是個「笨拙的」異類，是個不合時宜者，是個遠離現實的「書獃子」，也正因為如此，他成為惟一為胡風辯護的人。「胡風不是反革命，他的問題是理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1955 年的中國，只有他公開說出了這句話。這不是甚麼學問，不是甚麼創作，但這句話的份量遠大於呂熒作為學者、美學家、翻譯家的全部作品，僅這句話就足以載入史冊，激動後人。那是人格的力量，在歷史的天平上，一頭是呂熒一個人，他讓另一頭其他的文人失去了重量。我由此懂得歷史往往不是「聰明人」書寫的，中國不幸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聰明人」太多了，「書獃子」太少了，一個只有「聰明人」的民族是無望的，一個不會反省的民族是無藥可救的。令人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曾親聆呂熒發言一幕的知識份子們，仍鮮有人為自己當年的附和、沉默或助紂為虐感到羞愧、可恥，反而言語之間不無幸災樂禍。呂熒的出現彷彿閃電撕破了無情的夜空，照出了一個可恥的時代、各色文人的面目。（作者：傅國湧）（[http 對外貿易://w 對外經貿 ww.dajiyuan.com](http://www.dajiyuan.com)）

人民日報，7 月 31 日載，對外貿易部法律顧問室董士濂說，為胡風辯護的呂熒「顯示了中國人的骨氣」。在報上刊登胡風「反革命罪行材料」，是人民日報社「犯了誹謗罪」

對於胡風事件，馮元春也提出了自己的懷疑。她認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風的根據是：1、反黨。2、上書二十萬言。3、組織反革命集團。馮元春說：「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甚麼胡風上書二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馮元春還指出，毛澤東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馮元春針對當時中國社會現實指出：「共產黨這個剝削集團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她認為，那些平時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他們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上是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對於當時共產黨的特權，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論」，以及對黨外人士的打擊，馮元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別是在當時的環境下，她能看出歷史的真象，這對於人們認識當時社會具啟蒙作用。她講了一件事。她說：「我校湯教授，為人忠誠，是個忠於客觀事實的科學家，就因為他愛提意見，在肅反中就認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會上進行鬥爭，說他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湯教授確是一個忠於事實的人，他曾經對我說，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於我國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這些足於說明美國生產力高。而剝削集團的宣傳機器卻歪曲事實宣傳說美國有多少工人失業，經濟危機又多麼嚴重。而湯教授忠於事實，卻受到迫害。」馮元春還對當時的外交政策一邊倒提出了意

見，她說：「我們黨和毛主席沒有一點民族氣節。」⁴ 馮元春後來的情況我不瞭解，希望能有知情人瞭解一下她的情況。1957年，中國最有骨氣的幾個學生「右派」如林昭、林希翎和馮元春都是女性，這很讓我們為中國女性的思想力量感到驕傲。（謝泳《一九五七年中國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

1957年6月，成都鐵路管理局職員李昌明以「民主先生」和「自由女士」發表了《為胡風鳴不平》的長篇演講。

他的這個演講，從常識理性出發，以現代法律精神為基本標準，遂成為胡風案辯護。在當年為胡風案鳴不平的文章中，就我個人所見到的，以這篇最有水平，比林希翎的文章更具現代法律精神。李昌明從五個方面為胡風辯護。

第一，他舉出了大量的事實，說明胡風沒有反革命身份。

第二，說胡風參加過「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三七年作國民黨中宣部三廳廳長及大部份起義人員將同罹此罪。

第三，與陳焯之關係僅為一般社會關係。不是反革命組織及工作關係。李昌明說：「眾所周知，周總理與蔣介石集團中多人往還，宋氏三齡見解各殊，均未認作反革命關係，何獨胡風別有看待。」

第四，胡風集團只能是一些偏見的學派，五四運動前後的創造社、新月派、語絲派，互相攻擊，極盡詆毀、污罵能事，郭沫若攻擊魯迅所用辭彙其惡意不在胡風之下，魯迅與梁實秋論戰作用語詞亦尖銳之極，可見文人相輕，歷史皆然，不能對胡風有所偏頗。第五，從法律觀點看，胡風集團的行為並不構成對國家有形的損害。李昌明說：「我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上無一條對胡風集團適用，全世界任何一國民法、刑法（包括蘇聯在內）均未載有以文藝形式對文藝問題上的意見或攻擊足以構成的叛國罪或危害國家安全罪。美國的斯密斯法

（Law of Smith）對國內進步人士與共產黨員的迫害均未在學術領域或文藝範圍內引用，也未有這種事實。」（同上）

我所以在「反胡風」上傾注筆墨，是因為：一，毛反胡風的意義、性質、手法和不得人心，完全等同於反右派；二，相當多的知識份子是由於對反胡風及其延伸——肅反運動的強烈不滿而被劃為右派的。1955年「肅反」和1957年「鳴放」期間，對於剛剛發生的胡風事件，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強烈反彈的勢頭。僅據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編輯的《高等學校右派言論選編》和復旦大學校刊編輯的《毒草集》和《明辨集》中，因「胡風問題」憤憤不平而被打成「右派份子」者有：（燕南，<http://www.yannan.cn>）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新聞系學生潘俊民、朱維民、韓洪棣，計劃系學生韓楓，財政系學生陳祖武，歷史系學生張藝文、蔣濟良、張可治、劉平、楊汝栩、朱福榮、羅旭暢，計劃系講師朱澄平，歷史系講師章起，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佟駿，新聞系譯員徐京安，檔案系助教馬馨，出版社編輯曹達夫，該校職員濮仲文等人。該書還收錄了清華大學 s. c，北京鋼鐵學院章萼航、徐滌如、賈恩光、盧一安，四川大學龔鰲、潘英懷、鄭尚可、馮元春，北京礦業學院洪念祖，山東大學楊學孝，同濟大學張雅微，北京大學崔德甫等人。（萬同林：《殉道者——胡風及其同仁們》，第302頁）

請參看中共中央最近解密的關於反胡風和肅反的檔案：

（反胡風—肅反運動檔案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毛澤東批覆中共中央宣傳部提出的《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報告》，指出要以「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重要鬥爭來對待」。

同年五月十三日、二十四日、六月十日，《人民日報》分三批刊登了《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毛澤東寫了序言和二十七條按語，在按語中斷言：胡風等人是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勢力派別，一個地下獨立王國。

同年六月十八日，毛澤東作出指示：「要旗幟鮮明，從政治上、組織上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展開運動」。

同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定胡風為「反革命」、「反革命集團」及「展開運動」，出現了嚴重分歧。經五次表決，在十三名政治局委員中，七名同意、四名反對、二名棄權，獲得通過。七名同意者為：毛澤東、朱德、董必武、康生、林彪、林伯渠、張聞天；四名反對者為：周恩來、陳雲、彭真、彭德懷；二名棄權者為：劉少奇、鄧小平。

宋慶齡、李濟深、沉鈞儒、黃炎培等黨外民主人士致信中共中央、毛澤東，反對接連展開社會政治運動，不利於國家團結、振興、建設、統一。

同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

七月十五日，毛澤東再作指示：要堅決肅清反革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強化無產階級專政」。陳雲在會上認為：「不應當對敵情估計過於嚴重，使政策界限不清，社會人心很緊張不安」。毛澤東在會上問陳云：「甚麼不清，誰緊張？誰不安？你代表了甚麼階級利益？」會上劉少奇提議進行表決。毛澤東說：「要表決，召開黨中央全會；否則，請老蔣返回南京表決。不要搞那種假民主！」

肅反運動到一九五六年底結束，運動中逮捕了二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人，判死刑二萬一千七百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五萬三千二百三十人。

註：本文提到的「非正常死亡」是指被迫自殺，在鬥爭會上或刑訊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監獄、勞改中折磨致死。（轉自《爭鳴》2005年12月號）

第七，反對崇蘇媚蘇的「一邊倒」

人民日報，6月20日載，章伯鈞說：「蘇聯一定要變，中國也不能讓許多小斯大林統治下去。」

《右派份子彭文應的反動言論摘要》中有：「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數學家，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付鐘孫在本校刊物《師大教學》上發表了題為《中共失策之一》的文章，說：「。。。。。。對知識份子的失策，也許這是中共近幾年來最大的失策之一。」

「每一個政治運動起來，雖然這個運動名目不叫鬥爭，不管它叫學習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肅反也好，每一運動起來，知識份子就心驚膽跳。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那一個興朝盛世是這樣糟蹋知識份子的。我也不曉得這些知識份子究竟造了甚麼孽而致會遭這麼大的禍殃。地主之所以為地主，資本家之所以為資本家，必然是有剝削行為，有罪過。我們能夠說知識份子必然有罪嗎？我們來看看中共是怎樣來對待知識份子的。所有的報章雜誌上所寫的，報告會，討論會上所說的，只要一提到知識份子，必然戴上帽子『舊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很少單獨提知識份子而不戴帽子的。」

「知識份子所感受的待遇與中共所標榜的知識份子政策幾乎完全相反。這能怪知識份子得福不知感嗎？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這能把責任完全委於下級嗎？下級的普遍偏差與上級的領導無關嗎？中共可以檢查一下，這幾年來四海之內有那一個地方知識份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識份子對中共離心離德而中共能夠達到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目的。現在的知識份子與中共既無冤又無仇為甚麼不利用？知識份子願為中共效勞，因為為中共效勞也就是為祖國效勞，為人民效勞。。。。。。自然中共會說，我現在是用了。。。。。。但打著用，罵著用，叫知識份子成天用眼淚洗臉，這是何苦來？難道這也是一種政策嗎？

「就知識份子說，養著他而不聽從他的意見，就是所謂『豕交獸畜』的待遇，是知識份子所不甘受的。知識份子的氣節是從古以來所鼓勵的。共產黨在歷次運動中聲色俱厲地說：『要把舊知識份子臭架子打掉』，對士氣毫不顧惜。認為這是很大的隱憂，無形的損失。」

經過中共對知識份子政治上打，騙，經濟上贖買，傅先生所說的「隱憂」已成「顯憂」，「無形的損失」已現形得令人觸目驚心。君不見，「士可殺而不可辱」，「不自由勿寧死」，分別代之以「既可殺又可辱」，「能活著寧跪著」！君不聽，被強姦後的知識份子在叫喚：「現在是歷史上 XXX 最好的時期！」這裡的「XXX」，代表人權，民主，自由。。。。。。總之是「樣樣都最好，真使人陶醉！」

我素來是很尊敬老前輩傅鐘蓀教授的。在我劃右派的前一個月，他所主編的《數學通報》雜誌上，還發表了我一篇論文。當時共產黨對他，出於統戰的需要，在表面上還是很尊重的。他在文章中所表達的對共產黨對知識份子人格侮辱之義憤，我認為是屬於「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不平之鳴。而知識份子們在自身難保的逆境中，仍念念不忘憂國，憂民，憂國格，憂個人人格。夫人格者人權也；在不同學科上又有各自的表述：哲學上是指主體，人之為人的資格；教育學，心理學上指個性；倫理學上是指道德品質；法學上是指一個人法定的權利和義務。。。。。。共產黨在「人格」的所有意義上，都對知識份子進行了全面的糟蹋。傅先生所指出的不堪忍受的如上種種，共產黨卻以更加倍的惡劣還給他，如他說的戴在知識份子頭上的帽子，是「舊」，「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現在加給他老人家的是「資產階級右派份子」這頂定性為反動派的帽子。

這位傅先生就著國格寫道：「毛主席號召學習蘇聯之後，請來許多蘇聯專家，中國知識份子不論老少都虛懷若谷，參加學習。這在中國知識份子說來就算是很難得的了。因為知識份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幾年來，高等學校請求聘請蘇聯專家時，高教部都責成學校要有計劃，有準備，其中一條，要準備好繼承人。為了學得快，有的學校就指定教授作培養對象，作繼承衣鉢的人，以便蘇聯專家回國之後，還能傳授蘇聯專家學業。對這辦法我曾提出過異議。我認為，我們也是一個國家，既然稱這個人為教授，那培養他的人勢必要比教授高，。即使這個中國教授非常謙恭，有雅量，蘇聯專家也許不好意思吧！再說在國際上往來，也要替中國教授留體面，也就是替國家留體面。」

說實在話，當時在「一邊倒」的國策下，還講甚麼人格，國格！中國在蘇聯面前完全是奴顏婢膝，一副洋奴相，漢奸相。說蘇聯一句不好，就是反蘇，反共，反人民。一位中學教師對實行五級記分法（所謂蘇聯先進經驗）想不通，說：「還是百分制好。」就這就打成了右派。實際上，用也可，不用也可，記分制和政治是絕對的兩碼事。據說，五級記分法是從沙俄時代遺留下來的。一點也不沾「蘇維埃」的邊，中共竟奴性十足，趨之若鶩，不分青紅皂白。共產黨罵蔣介石是洋奴，賣國賊，美帝的走狗，是絕對地無恥造謠；說給毛澤東，倒是符合事實的。中國的任何一個朝代對待外國，都沒有像共產黨對待蘇聯那樣，一切以蘇聯的是非、利害為轉移；用蘇聯今天的模子，來鑄造自己的明天；劃右派的六條標準中，只要有對蘇聯

不利的言行，就得宣佈為自己國家的敵人——右派份子；只要對外國洋人馬恩馱嘶學說稍有懷疑，就要定罪；有當走狗、當洋奴，當得如此下作的嗎？

昆明航空工業學校兩名學生許其武、童劬卿寫大字報：「今日新中國向蘇聯一邊倒」，「飛機以及各種武器皆是自蘇聯買來的，專家顧問也是蘇聯人……我們覺得一個國家的重要事件，操在外國人手裡，總是不好的，遲早要出問題的。不問同主義不同主義，人種土地是不同的。不管蘇聯是如何的好，他總是外國人，絕不是中國人……共產黨昏迷沉醉，死投於蘇聯懷抱中，必有亡國滅種之一日。」（轉引自《陽謀》第143頁）

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在黑板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人的呼聲》的文章，文章說：「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國人民應該站起來了。應該由中國人來管理自己的國家！遺憾得很，現在哪一個地方沒有蘇聯專家和顧問！那些所謂中國幹部們……把蘇聯專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國專家看作飯桶！蘇聯專家什麼都好，即使放一個屁都是香的。中國專家被排斥得透不過氣來，……發表與蘇聯專家相反的意見，就要大禍臨頭，一連串『反蘇』、『反共』、『反動』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來……在中國境內，中國人沒有說話餘地，這是甚麼樣的社會？」文章還喊出了「精簡全國蘇聯專家」的口號，呼籲「需要者留下，整腳貨叫他們回去！」（同上）

著名人權活動家、原北京地質大學學生吳弘達在他的回憶錄《昨夜雨驟風狂》中說：

1957年一月，我在一次班黨支部組織的討論會上說：「從國際主義的立場講，蘇聯紅軍支持匈牙利政府鎮壓反革命是有理由的。但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一個政府派軍隊到別的國家去，這是否符合國際法？」這幾句話應不算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向黨惡毒進攻的「右派言行」，因為當時還沒有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治運動。

同年三、四月，中共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治運動，鼓勵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要求大家給黨提意見。不說還不行，不說表明對黨的號召不響應，政治立場有問題，就是不許不說話。這點與國民黨統治大有不同，國民黨是不許說話，若奉行「莫談國事」就太平無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後來毛澤東說的「陽謀」，目的是「引蛇出洞」。

……

團支部書記馬景信找了我好幾次，要我去整風座談會發言，我真是沒有興趣，最後，還是在周圍十分踴躍給黨提意見的氣氛中去了。我在整風座談會說了這麼幾句話：「在我們班裡，逢到開會，支部書記就以『同志們，同學們』開場，這意思，你們黨團員是同志，我們非黨非團的就是同學了，這好似我們一般同學是二等公民了。」我又加上：「毛主席說，凡是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人都是同志。我們上街買東西，上公共汽車買票都互稱同志，怎麼到你（指支書）這裡我們就不算同志了？」我的班上有七個黨員，十六個共青團員，剩下七個包括我是「白板」。要知道「同志」在當時是多麼高貴的一個稱號！七位「白板」同學自然有壓抑的感覺。

1957年十月，學校黨委宣佈我是一個「反革命右派份子」。主要罪行有二條：第一條，惡毒攻擊我國政府的國際主義外交政策，聲稱蘇聯出兵匈牙利鎮壓反革命是違反國際法；第二條，惡毒挑撥黨群關係，聲稱中國共產黨把人分為兩等，挑動群眾對黨不滿。因為我的階級出身是資產階級，所以順理成章地被劃為「資產階級反革命右派份子」。（頁43）

農工民主黨中央副主席黃琪翔抨擊蘇聯的政治制度：「蘇聯制度，無論黨內黨外，皆無民主，絕對是黨、階級和領袖獨裁。我們到蘇聯去考察，所得的事實是如此。它那種政治制度，完全是百分之百愚弄蘇聯人民的……。人民窮困，物質缺乏，物價高昂，生活不易。社會主義不過是宣傳而已，其實行不通……人民失瞭望而不信仰，故到處設了集中營的黑牢，凡一人反社會主義，全家以及親友可以連罪。這種社會古今中外也沒有聽聞過。中國共產黨以蘇聯為領導，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也弄到黨內外缺乏民主，缺乏自由，動輒鎮壓和肅反……這都是蘇聯式的政治制度，向蘇聯看齊學來的。實在太危險了。」（《陽謀》，頁 146）

光明日報，5 月 19 日載，華中工學院副院長劉乾才批評高教部：「……曾這樣強調：『百分之百學習蘇聯』、『不折不扣學習蘇聯』……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一概加以否定……鬧了不少笑話。譬如有些東西蘇聯沒有的，而資本主義國家卻有的，我們就閉著眼睛加以批判，結果現在蘇聯也有了，我們就只好解嘲一番。」

前面本文曾述及蘇聯以承認「滿洲國」換取日本承認外蒙古「獨立」。為此，救國會的領導人發出致斯大林的抗議信。毛澤東去蘇聯給斯大林祝賀七十大壽的時候，以救國會宣告「自動」結束，作為取悅主子，欣然同意主子破壞中國領土完整的見面禮。在大鳴大放中，很多人提出蘇聯損害中國利益的問題，例如，抗戰勝利後，連我都參加過的反對蘇聯在東北掠奪財物，強姦婦女的大遊行，其中光是搬走的機器，價值就有數十億美元。誰提就是反蘇，就符合了毛定的劃右派六條標準中的一條。

人民日報，7 月 14 日載，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71 次會議上，常務委員龍雲發表了這樣幾點意見：1，抗美援朝戰爭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2，第一，二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後來他們有的賴了債，有的美國不要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年以內還清，時間過短還要付息。建議延期二三十年歸還，藉以緩和國內緊張。中國為社會主義而戰，結果如此。3，蘇聯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4，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援助。

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批評龍雲「企圖抹殺蘇聯對我國真誠援助的巨大意義，這顯然是在有意挑撥中蘇友誼，破壞國際團結，從而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在大會的小組討論中對龍雲進行了批判，其中的大話，空話權且置之不理，單就他對蘇聯運走我國的機器，來看這類物件們的賣國嘴臉。他認為蘇軍當時這樣做是必要的，當時國民黨正在進攻東北，蘇聯運走的機器多是軍火工廠裝備，龍雲是不是主張把這些軍火廠留給國民黨政權製造槍炮來屠殺人民呢？

我們撇開個第一個問題：如果假定蘇軍單是有選擇地運走軍火工廠設備而不是運走所有工業設備，那麼，是否就是應該的和必要的？我們倒要問：當時蘇軍運走甚麼和沒運走甚麼，是否中共授權你當場進行了清點？否則你怎麼會知道得如此清楚？夏衍在他的《懶尋歸夢錄》第 559 頁寫道：「蘇軍運走了所有日偽留下來的工業設備，則是連塔斯社也不能否認的。」夏衍面對群眾反蘇大遊行，說：「這一次蘇聯對盟友的掠奪行徑，卻給了國民黨以一個反蘇，反共的機會。說實在話，即使在當時，我們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當娘都不否認自己養漢的醜事時，其中一個共黨黨員還沒有被賣國主義搞得鬼迷心竅，還知羞恥，「心情也是很矛盾的」。梅益卻拍著胸脯作偽證：我保證娘進行的是正當的性行為！這裡，我要批駁右派對中共人事政策的指責，我要為中共辯護：中共是知人善任，讓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難道你能找出一個人比梅益更適任廣播事業局局長的職責嗎？另一個是關於「新民會」-----

不，現在已換了新招牌，叫做「中蘇友好協會」，它的干實事的總會秘書長的任命，也是打著燈籠才能找到的幹練之才。錢俊瑞秘書長直斥龍云「放肆地挑撥中蘇關係」：「龍雲先生，你參加多少次的人大會議，人大常務會議，政協會議，最高國務會議，以及各種各樣的會議和座談會，你難道連蘇聯對我們的貸款是幫助我國的建設，利率很低，甚至沒有利息，這一點還不知道麼？。。。。。。而且，你難道不知道，解放以來，蘇聯政府給我們的工業設備，不論在數量上和技術上不知要超過那些（白拿走的）舊有的裝備多少倍麼？」

這裡我們先不辯白是否「超過」；而是首先弄清「給」是否像「白拿」一樣「白給」，即媒體上大吹大擂的所謂「無償援助」呢？

秘書長為蘇聯大唱讚歌，甚麼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呀，甚麼沒有壓迫，剝削，窮困呀，甚麼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呀，甚麼平等對待各個國家，民族並扶助弱小民族和被壓迫者呀！並歷數對我國長期的，全面的，無私的援助。我們的秘書長不勝感激涕零之至：「蘇聯政府和人民長時期來對我國革命和建設這樣真誠無私的援助，真像天一般大，難道右派份子果真是一手遮天麼？」（參見人民日報，7月16日）

大約是在1964年2月底，這時我已被解除了勞動教養，交農村監督勞動，這天晚上，有線廣播喇叭裡發出「中共中央」，是的，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信」：「我們不能不指出：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不是單方面的，更不是無償的，並且主要是通過貿易的形式進行的。。。。。。還應該提到，我們從蘇聯進口的東西，比起國際市場價格來說，是貴得多的。。。。。。至於蘇聯對中國貸款，必須指出，其中的最大部份，是我國用來從蘇聯購進軍事物資的。這些軍事物資的大部份，都已使用和消耗於抗美援朝戰爭之中……長期以來，我們每年都在為蘇聯的這些貸款償付本息，它佔去我國對蘇聯出口的一個相當的份額。這就是說，連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向中國提供的軍事物資，也不是無償援助。」這封信雖表達的是龍雲的意見，但肯定不是龍雲起的稿，因為他早已「輕於鴻毛」了。是否錢俊瑞起的稿？不得而知。不過，中共中央應向人民實事求是地交代一句：「本黨過去關於中蘇友好的一切宣傳，完全是忍痛撒的彌天大謊，讓它就像狗屁一樣一風吹掉吧！至於錢俊瑞，撒中蘇友好之謊，可移作它用，繼續發揮撒謊的一技之長。」

罪在大巫。毛把「一邊倒」定為重要國策，誰敢不跟著起舞？現在毛跟蘇共鬧翻了，暴露了自己過去賣國，媚蘇的醜惡罪行，也暴露了反咬右派是「一手遮天」，實屬於豬狗不如的破鞋罵別人：「蕩婦」。要知道直到網路時代的今天，中共仍在垂死掙扎著要堅持「一手遮天」。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海外竟有人把毛的反蘇（實際是反赫魯曉夫要改革的『蘇』，死心踏地僵持擁護斯大林主義的「蘇」）視作民族主義英雄。其實這頂桂冠是理應贈予右派份子龍雲們的。

歷史事件的本質是，蘇共君臨中共，蘇聯壓迫，掠奪，敲榨中國主要是斯大林時代，斯大林不僅是殘暴統治本國的罪行犯，而且是侵略中國的罪魁禍首。如果在蘇聯清算斯大林令人髮指的罪行時，毛澤東有動於衷，起而反對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社會帝國主義，歷史將功過分明地給毛記上一筆：「毛澤東曾愛過一次國。」可惜毛澤東在斯大林生前，吹捧有加，即便斯的「決策」對毛大大不利，毛也只能陽奉陰違，把氣出在「中國同志」身上。斯死後，毛還專門為文《最偉大的友誼》（很容易使人聯想起他另一篇文章的題目《「友誼」，還是侵略？》）來紀念這位「當代最偉大的天才」，吹捧斯大林「一直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人物。我們圍繞著他，不斷地向他請教，不斷地從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並且表態，堅決支持以斯大林制定的接班人馬林科夫為首的蘇共中央。說明他不是要反蘇的侵略，而是認侵略為「最偉大的友誼」，認侵略頭子為「最偉大的天才」；「我們圍繞著他，不斷地向他請教，不斷地從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學斯大林向人民開刀的血腥統治。他

極力反對的是蘇聯丟了斯大林這個殺人魔王的「刀子」，是赫魯曉夫清算「個人迷信及其後果」和要進行的改革。他反赫魯曉夫對共產暴政，專制獨裁要動一根毫毛，即搞修正主義。這和他在國內搞文化大革命反中國的赫魯曉夫是一個動機，一個本質。這能說他是民族主義英雄嗎？只能說他是最極權的死硬派，要逆歷史潮流，抱著斯大林的殭屍扛住抵擋民主的閘門。毛處處都是：兩「壞」相權取其「最」！根本說不上是甚麼英雄、狗熊！難道你見過民族英雄在異族主子的屍體面前，如喪考妣，大表忠心，又給屍體厚施脂粉，進行如此肉麻地吹捧頌揚的嗎？後來與蘇修（修！）鬧翻時，中共中央揭露的蘇聯的種種侵略罪惡，主要都是斯大林干的。而毛澤東的民族英雄主義恰恰表現在死心蹋地維護、捍衛斯大林主義。

。

第八，改造資產階級的問題

人民日報，6月2日載有被毛澤東後來稱為「右派份子老祖宗」的章乃器的言論，摘要如下：

現在公私合營企業情形嚴重，生產水平不如前，工作效率比過去還差，這是是非不明，輕才重黨的許多不合理的人事制度造下來的惡果。官僚主義，其害處比資本主義還要危險。（博訊 boxun.com 版權所有）

何以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的工作效率反不如現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呢？理由很簡單，資本家除了要圖利外，還有一種企業心。為了圖利，為了搞好企業，他們自然要用人才。像我們現在某些企業暴露出來的偏差，在現代的資本主義企業中是很難存在的。因此對於資本主義生產上和經營上的經驗和知識應該接受下來。（博訊 boxun.com 版權所有）

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是兩個不同的階級；但資本家和工人都是人，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工人可以發展為資本家，資本家也可以作工人。何況，中共對民營工商業的改造已近八年，公私合營後他們的生產資料已全部交出。空無所有，還說他們是資產階級，還要進行改造，要他們「脫胎換骨」，這是不公平的。（博訊 boxun.com 版權所有）

工商業者現在已經沒有剝削，定息也不是剝削，資產階級帶了生產資料進社會主義，比赤手空拳喊口號，貼標語的人還光榮。，，，，，要給工商平等的人格，不是給幾頂大帽子，不是「壓服」而是「說服」的方法來幫助他們改造。博訊 boxun.com 版權

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的收入本報特約新華社 31 日訊在今天繼續舉行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章乃器談了話。他首先談到這次座談會開得很好，因大家都說了真話，把問題擺了出來，這樣就有利於解決。接著他說工商改造輔導工作的出發點應該是：從消滅民族資產階級過程中間，千方百計地想辦法提高工商業者的政治覺悟，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以作到妥善地消滅資產階級，只有這樣才對社會主義有利。他認為只要明是非、除三害，就能發揮私方的積極性。他說，對工商業者的改造，不能採取形式主義，有些人自認為立場很穩，口號喊得很響亮，給工商業者「扣帽子」，甚至用打擊嚇唬的辦法，壓服他們，結果，使工商業者縮手縮腳，不敢做工作，還有的不敢接近工商業者，生怕玷污了自己。這都是形而上學，沒有真正從工人階級利益考慮問題，因為這樣就談不到團結改造工商業者了。接著他就如何發揮和提高私方積極性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這只有六個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為宗派主義者是不願明是非的，他靠顛倒是非來弄權，只講親屬、裙帶關係，只顧聽恭維、奉承。主觀主義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脫離了客觀實際，完全憑主觀想像處理問題。官僚主義者不敢明是非，他們心裏雖有是非，但怕講出來會影響自己的地位丟掉紗帽。他們只知唯唯諾諾，唯命是從，或做群眾尾巴。這三者是互相統一的。他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他認為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

更危險的敵人。因資本主義在中國不可能復辟，但官僚主義時時刻刻會在人們思想中復辟。如果社會主義企業加上官僚主義，那它的效率就將比資本主義企業低。我並不是留戀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也有好有壞，我們應該吸取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東西。他說，為甚麼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經營得反而不如過去的現代化私營企業呢？這是因為資本家為了圖利，善於選用人才，並且對人才的培養、提拔，還要儘量表示公平，不這樣，他就很難和別人競爭。而有些社會主義企業卻不能做到這點。他說，只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過提拔安排，才能真正發揮工商業者的積極性。光「重德輕才、以資代德」就會造成是非不明，調動不起來積極因素。他說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黨與非黨，則工作永遠做不好。他說，關於公私合營企業裡幾種關係問題，應該明確以公私共事關係為主，階級關係是殘餘，因階級已基本上消滅。在工作關係中，不應該分公方、私方，黨與非黨；要按職責和分工辦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黨與非黨，則工作永遠做不好，只有在思想改造的學習中，可以提醒工商業者還有階級關係殘餘的存在，但也不能幹篇一律，要因人而異。如果一個私方很進步，和公方、職工的關係搞得很好，就不能強調階級關係。另外，不能把階級關係當成一種壓力，去改造工商業者，只有通過說服教育，才能達到改造的目的。他認為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應說是不勞而獲的收入。接著他談到定息的性質。他說，有些人認為定息的性質是剝削，我認為很值得研究。因為照剝削字面講，被剝削者應該是很痛苦的，但我們又說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當前的矛盾，並不具有對抗性，這就說不通了。我認為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應說成是不勞而獲的收入，這樣，工商業者才能心平氣和。他還說，2000 元的槓子，也有重新考慮研究的必要，因為這個數字太小了，很難劃分 2000 元以上的都是資產階級；2000 元以下的都是小資產階級。他還談到群眾觀點問題。他說，不關心群眾疾苦的人，儘管每天都和群眾在一起，也不會瞭解群眾的情況，這是假的群眾路線。他對大家說，對資產階級要恨，但對資產階級分子要愛護，要抱著與人為善，熱愛群眾的精神去團結改造工商業者。他認為：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但這兩個階級的分子沒有本質的區別。他還說，目前我國所有階級的特性已基本消滅。最後，他談到工商業者兩面性的問題。他說，關於這個問題，已專門寫了文章，即將發表出來。他認為，必須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經過「五反」和全行業合營高潮，工商業者交出了生產資料，如仍教條主義地強調兩面性，這對工商業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響。他說，哪個階級都有兩面性，工人階級也有，只不過積極、消極兩面的比重大小不同，這是一個先進和落後的問題。他說，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即一是剝削階級，一是不剝削和反剝削的階級。但這兩個階級的分子不能說有本質的區別。資產階級的剝削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只能消滅，不能改造；而資產階級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剝削不是與生俱來的。他認為目前我國所有階級的特性已基本消滅，大家正在向人類的共同本性過渡。『在工商界批判章乃器，是反右派的重頭戲。當時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是我的第一要務，看「右派言論」是我的關注中心。對那些批判章先生的左派的狂吠，總是從人格上引起我對言者的鄙夷，唯有章先生說自己是「心安理得」；大快我心，深得我心！「到處宣揚右派份子章乃器『心安理得』。」便成為後來劃我右派的言行根據之一。在鬥爭我的八個月中，我從未像某些人那樣，磕頭如搗蒜，繳槍投降求饒命，也沒有對任何人揭發任何一句話以求立功。相反，我倒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給他們拍過桌子。有一次，在教室鬥爭我時，聽到一個學生在教室外高喊：「面不改色」。我的這些表現很可能與章先生那股浩然正氣的熏陶有關係。而其沉重的代價是：「情節特別嚴重，態度特別惡劣，開除團籍，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支部書記宣佈時還特別加了一句說明：「這是對右派份子的第一號處分！」

至今我仍不認為批章先生的話有一句不是胡說八道，包括後來毛澤東說的「右派中間那些不願意改變的，大概章乃器算一個。你要他變無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就不干，他說他早已變好了，是『紅色資產階級』，自報公議嘛，你自報可以，大家還要公議。我們說，你還不行，

你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489）毛澤東自食其言，已成惡習。如果說你忘了，章先生是在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一屆中央常委會 14 次會議上，又公開講過的：「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曾指著我說：『我很同意你的紅色資產階級的說法，難道我們還允許白色資產階級存在嗎？』多見不怪，對毛自無必要提出質問：「你為甚麼說話老不算數呢？」整個的批判會上，全是毛式的無理取鬧。

李康年重申贖買 20 年的主張

我是上海工商業者公私合營鴻興織造廠董事長，中國鐘錶廠總經理，萃眾織造廠經理李康年，就是最近報上標題所謂「定息 20 年」或者「贖買 20 年」的建議者。「三個建議」

我提出了三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我主張請政府發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 22 億元，收回資本家所擁有的股票或合夥議據，使資本家與企業脫離關係。存單每年到期四次，每季到期 2750 萬元，除 1956、1957 兩年已發 2.2 億元外，對資本家只發 19.8 億元，多餘 2.2 億元，作為對資方代理人、董監事與需要照顧的資產階級分子，給予一次酬勞或慰籍金，如再有餘額，即撥交全國工商聯，作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前項工作，擬請指令交通銀行辦理，有不願得此項贖買存單者，得聽其自便，交通銀行得代為暫時保存，或按贖買存單應得人之意旨，代為捐獻，或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

贖買存單應得人既已放棄贖買存單，即是放棄剝削之表現，應得人於取得捐獻收據，或繳納國庫之憑證後，即可將此收據或憑證，作為放棄剝削之憑證，而向工會爭取入會，爭取勞保待遇，經工會審查核准，給與工會會員證後，資產階級帽子，即已摘去了。如上述建議不能採取，則請研究第二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請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辟信託部，代民族資產階級保管股票，出席股東會，董事會，代收股息紅利定息，代辦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捐獻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按如上所述，摘去資產階級帽子。上述建議如再不能採用，則請研究第三個建議。

第三個建議請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加代領定息業務，同時亦得代管股票，及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轉贈捐獻，或繳納國庫。按以上所述摘去資產階級的帽子。

此外如資方家屬的勞動就業，應責成勞動部門及專業公司妥為安排，在贖買存單發行基本上完成後，國內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為國營私方人員職務，即蛻變而為公家職位，公私關係既已基本消滅，此時資產階級分子手中，只多了一些贖買存單，其性質與國家公債大同小異，期限且較公債為長，大多數人已經必須自食其力了，與勞動人民距離更近了階級基本消滅了剝削基本消滅了，贖買政策基本完成了，工商業企業改造基本完成了，資本主義生產資料，已完全成為全民所有了。

自從我的建議書提出後，所受到的，多半是無理的謾罵，而得不到真理的幫助與批評。這一次到京以後，讀了千家駒同志的發言，他是中央經濟理論權威，也是我們工商界行政管理領導，他談到了李康年主張定息 20 年就是消極性的表現，定息 20 年除了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以外，同時還包括一個對贖買政策認識錯誤的問題。對這，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見與他商榷。

我的答覆是：我沒有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我今年 60 歲了，難道我一定能活到 80 歲麼，孩子們多已大學畢業做醫生了，他們也不會要的，況且我的定息每月不過二三百元，目前都

已買公債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難，何必要計較這些呢，千家駒同志認為我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未免武斷。

「我建議的根據是《人民日報》的社論」

至於我建議贖買存單年期分 20 年，贖買金額應為人民幣 22 億元，定息兩字應該更正，我是有根據而不是捏造的。當全行業合營前夕，1955 年 11 月 22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的社論。這篇文章，我認為是黨和國家對贖買政策的方針，亦是黨和國家對工商業者昭示了贖買政策的信條。

第一段「我國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的變革，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這說明大約需要 15 年之期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第五段第一節「對於我國工人階級說來，最適當的正是向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實行贖買，並且不是一下子贖買，而是在十幾年的時間裏，逐漸贖買。」「分給資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紅利，資本家所得，看來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國統計，一年就有幾億人民幣，積十幾年之久，就有人民幣幾十億之多，用來作為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的代價，是完全足夠的了」，這說明國家將幾十億人民幣，來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

第五段第二節「贖買是對物的，即贖買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除這以外，還有一個對人的問題，即對資本家進行教育改造，適當地安排他們的工作等等的問題」。這說明贖買是專對生產資料的，至於對資本家教育改造安排乃是另一回事。這是對人的和平改造。

從此可以見得黨和政府，在事先是有準備，即是需要 15 年之期，用幾十億人民幣，來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的。黨和政府採取這個和平改造的方針，是從 1949 年立國之初就確定了的，這個道路是和平的，倘然客觀需要，再拖一個尾巴，也是未嘗不可的。如果 15 年再拖一個尾巴，豈不是 20 年嗎？我的建議與黨和政府原定計劃步驟相對照，恐怕不是相距太遠吧，恐怕不是無的放矢？（人民日報 6 月 6 日）『第九，破除對馬列教條的迷信

右派對各個方面所提的意見，現在綜合起來看看，就是一部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建國方略，並且具有歷史證實的正確性和超前的高瞻遠矚。所有的反擊右派的批判文章，有的屬於昧良心的胡說八道，有的是糊塗得不可救藥。

上面所談，側重於政治法律，下面我們再就學術思想，新聞出版，文學藝術，人口社會，科學教育，財政經濟等方面，進行舉隅。

章伯鈞說：「生活上有二個東西，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精神的。僅僅叫他穿西服，住高樓，吃西餐，而不叫他獨立思考，這就好比西郊公園裡的獅子和老虎，吃的雖好，可沒有自由。」（7 月 4 日，人民日報）這正好可用來批判今日中共之人權即生存權理論的荒謬性。何況連所謂的「生存權」，起碼也有四千六百多萬被剝奪了去；苟活下來的，也僅僅算是「生存」，在「二個東西」上，卻稱不起是「生活」。

吳景超教授說：「這些人遇到一個理論問題或實際問題，不是去蒐集，分析事實，從事物的客觀聯繫中去尋求答案，而是去查經據典，看看馬，恩，列，斯對這些問題是怎樣說的。例如，說民族問題的，並不去認真地研究中國有哪些少數民族，分佈在甚麼地方，有些甚麼特點，而只會背誦斯大林所講的四個基本特徵。。。。。。教條主義對於馬，恩，列，斯所沒有說過的話就不敢說，離了馬，恩，列，斯就甚麼文章也寫不出來。而且還迷信馬，恩，列，斯以為他們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可以施諸四海而皆准。」（6 月 6 日，北京日報）

早在 1954 年 3 月，他便在《新建設》上發表《中國人口問題新論》，尖銳地指出：「中國人口的龐大，是中國大多數人民貧窮的主要原因。」「中國的財富本是有限的，現在都要供給這許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窮困衰弱的路上去。」1957 年第三期《新建設》上有他對中國經濟發展很深刻，很超前的見解。「如何在最短期內，消滅國民經濟中的技術落後現象，使所有勞動者在高度技術基礎上生產，都能夠創造出很高的勞動生產率，則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一個大家滿意的方案。我們對於每一個勞動者所配備的生產資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產還是可以照舊進行的，但是這種生產，就不是在高度技術基礎上進行，而可能是在落後技術基礎上進行，那是不符合於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要求的。」

吳先生是著名的社會學家，但，「1952 年院系調整之後，這些社會科學系都一概取消了。過去搞社會學的人大部份都改業了。」他呼籲恢復社會學，也算是大毒草而成右派罪行之一。據他的學生劉佳有的回憶，他被安排講《計劃經濟學》。人所共知，計劃經濟乃蘇聯一黨專政，個人獨裁下以主觀意願取代客觀規律的產物，現在居然命一向以研究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社會的市場經濟的大教授去開講這門課程，不但強人所難，而且還有著穿小鞋的味道。劉佳有，課堂筆記三百多頁猶存身邊，記錄著吳老師的話：「計劃經濟，既包括工農業，更要考慮教育事業，尤其人口問題，不容忽視，控制生育，應列入國民經濟計劃。」這一提法被視為與潘光旦優生學一脈相通，鼓吹馬爾薩斯人口論，跟毛主席『人多好辦事』的偉論唱反調。最具諷刺意味是人民大學一位批吳最力的青年教師，後來搖身一變，撫拾吳先生的余唾，在講計劃生育的重要性，到處吹法螺，做報告，成為國內數一數二的人口統計專家，收入可觀，是改革開放後的學閥大富。

其次，吳老師提到現代化需要原始積累時說，二戰後殖民主義時代已成過去，人權高漲，靠掠奪落後地區，戰爭索賠和榨取工農都已行不通了。中國可走的道路，除了自力更生之外，亦可考慮國際間的公平貿易，發展全球通商和合理互利的條件下適當引進外資外技。這個觀點被當做新殖民主義和賣國論，是替帝國主義鳴鑼開道而大受撻伐。

其三，現代化首先要解決的是通訊，能源和交通運輸。交通運輸方面，不宜過分強調鐵路，水運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較鐵路不遑多讓，忽視水運是錯誤的。尤其中國，除北京外，有哪一個大城市不是靠江河湖海發展起來的？即使如鐵路四通八達的美國，十大工業城市仍然是水運交通的樞紐。可見鐵路並不能取代水運，亦證明到處攔河築壩，與江湖爭田不足取。這個論點十餘年後才由美國經濟學家福格爾（R. Fogel）發現並整理出一套理論而獲得 199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金，名重士林。作為這方面的先知，中國學者吳景超被劃為『反動學術權威』予以打倒。對照現在中國社會實況，他有哪一點說錯了？究竟誰反動？誰先進？歷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也給了現在還活著的學人以莫大啟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多麼崎嶇坎坷啊！」（世界日報，上下古今，2003 年 11 月 25，26 日）

這裡又提出了「誰反動？誰先進？」的問題。作者自問自答說：「歷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共產黨反動，右派先進。」

終篇：右派言論篇（四）

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說，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產生教條主義。人民日報，5 月 25 日，發表了他的言論摘要，現在我發現了謝泳先生在《1957 年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中載有徐先生言論的較詳細的內容，讀後認為，是對馬克思主義最精闢透徹的剖析。。

他在一次教授座談會上說：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種比較固定的學說作為指導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條主義。為甚麼說馬克思主義決不能拿來作為中國和人類的指導思想呢？徐璋本認為，這要從整個人類歷史和宗教信仰來看。

徐璋本說：

第一：馬克思著重提出經濟上沒有人剝削人的、沒有階級的共產社會，在部份的理想上是正確的，但完全以唯物經濟基礎來闡明這個社會理想便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離開人性的「危險性」，這就是馬克思的學說和主義同他所提出來的高度理想口號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馬克思根據「唯物的」、「生產工具和經濟制度的」、「社會階級鬥爭的」立場宣佈說，這種哲學、社會制度和方法，便可以達到大同共產社會的理想，人類地上的天堂，顯然是包含著嚴重矛盾性的一種學說。從人生自然哲學的一體性來看，馬克思忽略了「人」的關係而把人看做經濟制度的產物，這種倒因為果的學說不能做為「人生哲學」的指導思想。另外，強調「階級鬥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爭進化論」同樣是脫胎於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這至多隻能用之於被壓迫民族抵抗外來侵略過程，比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正是出於這樣的理論自覺，徐璋本認為，共產黨人掀起「階級鬥爭」、「思想鬥爭」的法寶，以為非此不足以鞏固「政權」，樹立「威信」，實行經濟建設，一切以馬克思學說聖典規範，嚴格奉行教條主義公式，結果使人民由感激愛戴變為畏懼沉默；由萬分積極和全民振作的奮發自新的景象一變而為奉行政府指令聽天由命的消極心理。而由於漠視人民情感，政權剛剛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對，對人民講威信，這又是馬克思的錯誤哲學和教條公式。到處發生「擾民」，摧殘人民的積極心，鼓勵消極自私心理，而事後補救辦法又是根據中國傳統的美德，勇於認錯改錯，將「人」與「人」的關係加以考慮，也就是不自覺地承認了馬克思唯物和經濟生產決定人生的錯誤！徐璋本認為，難道救國救世必須迷信式地奉行馬克思忽略人類特徵的知識寶庫和兩種矛盾的片斷哲理，然後再以中國的傳統美德來補救嗎？這並不是真正辯證法的矛盾統一必經過程，而是由於迷信馬克思教條公式的「人為矛盾」！徐璋本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須要有更大勇氣來認清：「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並不等於馬克思學說和主義。如果拿馬克思學說和主義來作人類的指導思想，至多隻能在政教統一的專政下，使人民不想，決不可能啟發創造性的思想活躍，更談不上甚麼百家爭鳴。

第三：徐璋本認為，馬克思治學態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國學術界的嚴謹詳盡有條理的優良傳統，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國普魯士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這種宗教色采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應用在他的忘卻人類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動政治哲學」上，就產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講目的、不講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學觀。在一個被壓迫被剝削的國家民族，在長期受各種各樣的侵略，在心疲抑鬱之餘，將這個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政治哲學灌輸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憤怒的心情來作不畏犧牲不怕困難的解放獨立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士掌握了這個「行動政治哲學」，並巧妙地付諸實行，使中國在短時間內站起來。這不得不感激馬克思所開的這付特效藥。不過馬克思並不是萬能無所不包的聖藥，這付猛烈的特效藥在環境尚未成熟和特效已經成功之後，用以煽動人類仇恨心理是萬萬不可的。

第四：徐璋本認為，東方印度和中國特有的對人生本能的深刻體會，和毫無宗教迷信和教條主義的「大同人道主義精神」、「人天一體觀」大徹大悟，這個人生自然哲學思想是包括有關經濟生產的唯物論的部份的。「不生不滅」「無所不在無所在」是真正徹底的辯證唯物論的「人天一體觀」。而「無我無他」、「同生同滅」才是對人生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徹底解脫，才是實現大同共產社會理想所必具備的條件，而不需要煽動仇恨心理來推動人們的行動和積極心，這是一種最高的境界。同時他還認為馬克思所謂「階級矛盾現象」的來源並不是「自然物質能」和伴隨著的生產工具和經濟制度，而是基於人類與生俱來的兩種生物本能——自私利己與互助利他。

根據以上的理論，徐璋本認為，能真正作中國人民和人類的「指導哲學思想」的。合乎人情的，只有中國的大同人道精神和「愛和怒」的平易人倫哲學思想，以及基督教義中以愛和怒為基礎的宗教信仰。而其最高造詣是釋迦牟尼所宣示的超人的大解脫：「無我無他」「同生同滅」「同不生同不滅」「無所不在無所在」完美辯證的「人天一體觀」。徐璋本認為，這些看法，是他幾十年來學術研究的結果，不可能全是對的，他希望大家展開討論。

徐璋本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可以說達到了非常深刻的地步，也是解釋馬克思主義為甚麼能與中國社會相結合，以及為甚麼二十世紀初，共產主義得以在全球盛行的原因，這樣的認識，今天對於我們深刻瞭解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歷史都非常具有啟發意義。可惜像徐璋本這樣的思想，多年來被歷史塵封，以至於人們根本就不知道，在 1957 年，許多民間知識份子在理論認識上達到的高度。在 1957 年，多數有價值而深入的思考，是由那些自然科學的教授和學生完成的，特別是物理系和生物系的教授與學生。

《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一文發表於《經濟研究》（1957.5）上，作者是陳振漢，徐毓梅，羅志如（三位都是北大經濟系教授），谷春帆（郵電部副部長），巫寶三（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寧嘉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幹部學校副校長）等六人。文章的內容涉及面廣泛，分析深刻，很中肯綮，但文章太長，就不正面引述了。反正它的主要論點可以從批判它的文章中得以窺見，這樣，既可免去重複引證，又可觀賞馬戲團小丑滑稽，荒唐的表演。

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批判說：「陳振漢秉承章羅聯盟的意旨，首先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工作大肆攻擊，說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工作，其中包括計劃工作，財政工作，金融工作等等，都是『盲目的』，根本沒有遵循甚麼客觀經濟規律，以致偏差頗大，錯誤很多，損失不小。其所以如此，據陳振漢說，一方面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成為『過了時』的『敝屣』，不能指導當前的經濟工作，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國家經濟部門的負責人員不懂得經濟學常識，是一些教條主義者，官僚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這個局面豈不是糟糕透頂嗎？那末怎麼辦才好呢？陳振漢代表資產階級右派回答：這好辦得很！他的辦法的第一條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然早已過時，『是敝屣就應摒棄』，乾脆把它扔掉，改用資產階級的經濟學，特別是現代壟斷資本的辯護人凱恩斯的經濟學說，把它作為國家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好了。辦法的第二條是：現在的國家的經濟工作的指導人員，既然不能擔負領導工作的重任，那末乾脆請他們下台，讓這批資產階級右派的『經濟學家』的人上台就好了。經濟方面的工作應該如此這般，經濟科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方面，也應該如此這般。陳振漢的『意見書』數易其稿，洋洋數千言，其主要內容，事實上就是這樣。」（見人民日報 9 月 19 日）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楊培新說：「陳振漢說馬列主義沒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案』是毫無事實根據的。《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以及中國共產黨關於對工業，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都說明馬列主義經濟學在這方面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論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準備條件向共產主義過渡，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恩格斯在 1877 年在《反杜林論》中提出的理論，已預見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80 年來，這個規律已為實踐所證明。陳振漢把馬克思主義嘲笑為『和尚唸經』，這只能證明陳振漢的反動立場。馬克思主義指導了九億人口的國家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些國家的經濟建設的速度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偉大的勝利，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生氣勃勃的行動的指南。」

北大教授樊弘揭露陳振漢以主張「競爭平衡論」來宣揚資本主義的優越性，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通過競爭可以使生產中偏差得到平衡，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建設卻會產生嚴重的偏差，並且因為社會主義必然產生官僚主義，所以這種偏差不可能消除。

經濟研究所嚴中平揭發說，陳振漢在十多年前就主張：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和外國工廠增加的結果並不阻礙而且幫助民族資本的積累。說是因為外國資本輸入或外國人在中國辦工廠的結果，與民族資本一樣，是增加本國人民的生產能力，也就是增加他們的所得。這是陳振漢由來已久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29號）

民盟中常委，上海市委沉志遠說：「在學術界，由於教條主義的長時期以來的統治，使我們的學術思想，自由的思想，幾乎遭到窒息而死的命運，因此解放八年來，我們的學術界顯得非常的沉寂。我們的學術界是沒有生命，沒有生氣的。由於黨政領導管得太多太死，妨礙了群眾積極性的發揮。我們今天各部門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勵群眾的積極性。在某種程度上倒反把可能調動的積極因素變為消極因素了。」（文匯報，7月26日）

劉思慕以「剝掉沉志遠的畫皮」為題，系統揭批他的右派言行：「沉志遠以全盤抹煞新中國的偉大成就來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他把光明燦爛的新中國塗成漆黑一團，把學術思想界說成死氣沉沉……要黨對『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單位的具體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個別環節全面地大檢查。』因為他認為滋長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重大原因』是『屬於制度性質』，他強調要把『滋長這三種歪風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大刀闊斧地改革一下』。在政治制度方面。。。。。。在經濟制度方面，沉志遠露骨地反對計劃管理，集中管理。他責罵我們的黨政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龐大，太沉重。他一方面嘲諷這種制度把我們黨和政府壓得『滿頭大汗，寸步難行』，另一方面說甚麼連『草紙，牛奶都要管到』，『一切都要國營，一切要管起來，包下來，把人們的積極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他用極其惡毒的語句污蔑，醜化整個黨。他把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說成是一個結黨營私的宗派集團，把黨員以至各級領導幹部說成是嚴重脫離群眾的特權領導階級，把人事部門說成是『鬼鬼崇崇，關起門來包辦政治』的特殊人物。」

剛從日本回國的經濟學家吳半農說，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某些經濟現狀，與馬列主義的經典分析嚴重脫節了，比如經濟危機在西方世界已經20多年沒有發生，這個問題怎麼看？（轉引自《禪機1957》頁171）

第十，要求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

上面，劉思慕揭批的那些，是沉志遠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以《黨和政府不應管得太多太死》為題作的發言。他說這樣就出現了一系列反常的現象：好些演員長期沒戲演了，好些教員整年沒有書教了，好些名醫常年不看病了，好些著作無法出版，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學術工作者無法從事研究工作了。在我們這個文化落後，知識份子異常缺少的國家而出現這樣一些現象，這豈不是糟得很嗎？他對學校黨委制的作用，認為是形成了以黨代政，非黨校長無權，校務委員會形同虛設，在系裡是系秘書領導系主任的反常現象。為了改正過去的高等學校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他以為可以考慮學校黨委制的改變問題。他還談到出版的專業化制度，即把某一種性質，某一門學科的書歸一個出版社出版，以為這是壟斷，是一家獨鳴，就是排斥矛盾，掩蓋矛盾，取消競賽，保護懶漢，獎勵不上進，阻礙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它會使思想僵化，企業衙門化，出版事業的生命枯萎下去。為了消除這種弊病，他說：「今後出版事業應向社會開放，允許志同道合的人開辦像同人出版社，同人雜誌社，書刊出版發行合作社之類的機構，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針措施，負起監督檢查之責，其他事情是少管為好，何況你事實上要管也管不了那麼多呢。」（解放日報，5月17日）

5月18日，人民日報以《老報人批評現在報紙的缺點》為題報導了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的發言。陳銘德說：「報紙是人民的精神食糧，新聞工作者是廚師。廚師要是光注意營養價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正像色，香，味和營養不矛盾一樣。」他建議：一，增辦非黨報紙，能不能倡辦同仁報？二，北京應有晚報。

張友鸞說，舊社會有一句話：「記者不坐牢，不是好記者，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現在呢？他變為可以這樣說：「記者不討厭，不是好記者，報館不鬧禍，不是好報館。」

蕭離說：新聞常被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壟斷，他們想競賽也無從競賽。

《大公報》社長王芸生說，現在的報紙是報喜不報憂，隱惡揚善。新聞工作者勞動生產率低。

新華通訊社的鄒震說，新聞工作的鳴放問題，就是徹底實現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問題。過去，這三大自由，被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給限制在極狹窄的範圍裡去。我們的自由被「三害」給剝奪了。我們要向三個主義索還被它蹂躪了的新聞自由。我覺得今天應該喊出「民主辦社」和「民主辦報」的口號來，使中國出現更多的非黨的報紙和通訊社，出現更多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或民營的報紙和通訊社。

中國新聞社的鄭白濤說，我們中國新聞界的單調，枯燥，是這些教條主義者造成的。一個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官僚式的社長總編輯，比一個檢查官更妨礙新聞工作的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莫如儉說，我國目前報紙的性質和作用是根据列寧1901年定義：「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舞者，而且還是集體的組織者。」。。。。。。而目前我國報紙受那個定義教條的束縛，報紙只限於指導性和思想性。因之不能滿足他們（廣大讀者），產生矛盾。

《人民航運報》記者趙琪，把當時佔多數的報紙即共產黨的黨報稱為「領導機關所有制的報紙」，認為它的特點是：一，公文指示多，二，教訓口吻多，三，首長言行多，四，有些話不便於講，五，有些話不敢講，六，有些話不准講。他認為「人民群眾所有制的報紙」新聞多，服務週到，新聞人物活動多，甚麼話都可以講。單純代表機關意見而不為讀者服務的機關報，它的生命已經危險了。

《中國青年報》總編輯張黎群不贊成社會主義報紙指導工作的說法，認為現在的報紙是佈告牌，留聲機。

這些右派言論在6月24日舉行的第二次新聞工作座談會上受到批判。中國新聞社孫殿偉批判鄭白濤說，鄭在社內就有許多反動的謬論，他同意章伯鈞的言論，主張中國要實行兩院制，主張辦反對派的報紙。在章伯鈞，章乃器，儲安平等人的反黨活動被揭露後，他仍然替他們辯護，說「黨天下」的說法是對的，定息不是剝削，而是和銀行裡存款的利息一樣。他認為目前對右派份子的駁斥是官僚主義，教條主義的作法。同志批評他，他說這是共產黨愚民政策的成功，並把這些人稱作打手。（人民日報6，26）

北大新聞系方漢奇批判顧執中所說的：憲法有的被徹底破壞，有的有名無實，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上都沒有得到保證。（按說這是無可反駁的事實，但直至如今，無恥的投機政客們竟然仍能彈舌如簧——紫丹。下面是6月26日《人民日報》所載顧執中先生的原話全文，請讀者與今天的情況作一對照。）

憲法有的被徹底破壞，有的有名無實

顧執中憲法所規定的條文，有些是有名無實，有些被破壞而沒有受到制止。例如憲法第 85 條規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實際許多現象卻不是這樣。第 89 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准不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文完全被破壞了。第 87 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例如有些批評人民日報的文章，至今仍沒有被登出。報社只登風平浪靜的東西，揭露人民內部矛盾稍微聯繫到某些人物、部長等便不予發表動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地做。第 94 條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但高教部和教育部卻在叫請大家原諒，說因為學校少，生育沒有節制，人太多了，不能人人入學，這樣憲法也被破壞了。憲法自 1954 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也很少有人執行憲法中所規定的統戰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把憲法當作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想當年，在討論憲法草案的時候，大家都願為保護憲法而鬥爭，現在從劉委員長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中宣部的宗派主義情緒很濃厚，解放後對老新聞工作人員很少照顧或者沒有照顧。解放後仍允許續辦的一些報紙如文匯、新民等報也沒有得到政府的照顧，讓非黨的報紙自生自滅。黨報與非黨報、黨報記者與非黨報記者的待遇都不同，非黨報記者採訪時受到輕視，許多的機關還不讓他們去採訪。解放前有許多通訊社，現在名義上有兩家——中國新聞社和新華社，實際國內新聞只有新華社一家，包辦了全國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飽撐不下。我建議：一、民主黨派宣傳方面的負責者應該參加中宣部的宣傳會議頓如「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不是句假話，即使不參加宣傳方面的領導工作，也應該讓我們知道會議情況。二、新華社應像塔斯社、路透社等那樣，成為國際性的通訊社，國內則開放讓民主黨派、團體、地方辦通訊社。參加了許多座談會，感覺有兩種偏差：群眾有些左，人民日報又有些右。在過去運動中受到整的，雖然知道大「鳴」大「放」不應越出擁護共產黨和建設社會主義這個軌道，但在講話時，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軌道的地方。民主黨派成員講話很苦，稍微講得厲害點，報紙上便批評，和風細雨一點，又會挨罵，所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難做到恰如其分。儲安平의 發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詞不當，有刺激性，建議九三學社領導加以討論，以免引起混亂。

安崗批判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王中模糊了報紙的戰鬥方向，說報紙同讀者是「五分錢」的關係，只是在商品基礎上才能發生作用，並且說不注意報紙商品性的黨報是「一片教條主義」，「寡婦臉」，「官報」。右派份子彭文應認為，斯大林的錯誤發生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要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只打蒼蠅蚊子。

可讚可歎！彭文英同章、羅、儲、陳作為「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的人證，而被定為中央級的五名終身右派！

自從毛澤東把這種生動活潑的自由辦報思想的鳴放，惡狠狠地定為「黑雲壓城城欲摧」，直到江核心，直到胡溫新政，中國的新聞自由被國際公認為最糟而跟北朝鮮一起敬陪末座。

出版界的意見，曾彥修具有代表性。他認為蘇聯的出版機構，組織制度是落後的，而我們把自己的傳統完全革掉了，一切照抄蘇聯。「解放後基本上停止了學術著作，而讓蘇聯的小冊子氾濫於市場。」對於隨便砍掉專門刊物，他認為：「把出版局砍掉中國不會亡，把這些學報砍掉，中國沒有科學，卻要亡的。」「解放後幾年來，光出了一些教條主義的小冊子，連環畫，沒有真正的出過一些有份量的東西。」「難道我們單靠一些教條主義的小冊子就能立國嗎？」「過去搞七，八年，結果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譯書，反特小說。著作出不了，而對外國人的胡說八道的小冊子卻浪費了不少紙張。」「出版工作去搞些沒有味道的事，也是

不行的，如為了規定《毛選》在全國同一天發行的組織工作花了不少力氣，實在是無聊。」「事情是人辦的，對領導，對同志，對組織處於執政地位受到的腐蝕以及廣大群眾已經「怨聲載道」，他認為「八年來相當大的一部份黨員沾染了骯髒的腐朽的東西。。。。。。因為他已得到某些東西了，官方身份，統治者一分子，生活職業有保障，有東西可保守了，。。。。。人社存在黨員享受特權現象。」

人民日報，7月18日載，首都出版界反右派鬥爭會上有人質問他：為甚麼要硬說解放以來沒有出版甚麼有份量的學術著作，難道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算不得有份量的學術著作嗎？有人分析說：曾彥修主張辦「同人出版社」，就是不要黨的領導，要恢復資本主義的所謂出版自由。

文化部副部長陳克寒，在10月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出版工作必須實行計劃化》，說：「出版界的右派份子曾彥修，藍鈺，彭子崗等人，都竭力反對出版事業實行社會主義的計劃化。他們認為：計劃化『把個人的積極性限死了』，『選題計劃根本不必要』。藍鈺故意把解放以後的出版工作描繪成『矛盾百出』，『笑話百出』，並且把它歸咎於出版事業的計劃化。他們特別攻擊紙張的計劃供應制度，提出所謂『自由買賣』，『自由出版』的荒謬主張。。。。。。其目的，是要否定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使出版工作處於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無政府狀態，以便傾銷資產階級的私貨，為資本主義復辟開闢道路。」

第十一，發出「救救科學家」的呼籲

可以看出，阻礙各項事業發展的基本關鍵在於，政治上獨裁壓制民主，或專業上外行領導內行。特別是，表現在科教文藝方面。毛澤東這個災星，在這裡創造了兩個重災區，他說：「大學裡，一個中文系，一個歷史，唯心論最多。」（《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44頁）唯物論大史學家翦伯讚著文《右派在歷史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活動》，批判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雷海宗：「雷海宗用一本《雅典憲法》作武器，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進攻。他發表了荒謬絕倫的馬克思主義停滯論，過時論和不合國情論等等陳腔濫調。他誣蔑地把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說成一錢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則把他心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社會科學』捧上了天。他說：『整個社會主義的社會科學太薄弱，太貧乏。』『蘇聯歷史科學水平之低是驚人的，蘇聯學者的著作，在資本主義學術界看來連評論的資格也夠不上，可以說不是科學作品。』甚至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寫歷史的書很少，僅有幾本也是趕任務的書。』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則『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學派，那些代表性的著作。』又說：『最近六十年來，世界（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科學仍在不斷的有新的發展，不斷地增加新的材料，對舊材料不斷地有新的認識新的解釋。但這些對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界來說是等於不存在的。我們今天仍滿足於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的認識條件和資料條件下對問題所說的個別的語句』。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真是極盡誣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謬論，主要的是說馬克思主義過了時，實際上過了時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的所謂科學方法。慢說資產階級已經臨於沒落的時代，就是在這個階級的青年時代，資產階級的所謂科學方法，也是像馬克思所說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馱馬，面臨本質與現象，結果與原因，就一籌莫展了。』而雷海宗卻說這匹『笨重的馱馬』到了垂死的時候反而出現了一日千里的奇蹟，豈不是神話。」

他還批判榮孟源「主張復古主義，企圖用主要是封建主義的歷史學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說孟在《建議編撰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資料》一文中「沒有一個字提到馬克思主義。」這個邏輯被戚本禹繼承下來，給中國的赫魯曉夫扣上「背判無產階級專政」的帽子，理由是「《論修養》只字不提無產階級專政。」這裡的論據也是「只字不提」。這時候，大歷史學家，言必稱馬列的翦伯讚將面臨滅頂之災。如果說楊家將楊敬業是一頭碰死在李陵碑上，嘲

諷雷海宗「把他心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社會科學』捧上了天」的翦伯讚卻一頭碰死在「他心愛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所謂『毛澤東思想』」的豐碑上。他如此飽學，只是沒有學到：「歷史的戲劇性在於請君入甕。」章怡和的文章《歷史學家翦伯讚之死》，這樣寫道：「翦伯讚卻已有輕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澤東說要給他出路，事實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來都是假的，虛的，空的！絕望之心，生出決絕之念。」

「第二天，人們發現翦伯讚夫婦服用過量『速可眠』，離開了人世。他（她）倆平臥於床。二人穿著新衣服，合蓋一條新棉被。在翦伯讚所著中山裝的左右口袋裡，各裝一張字條。一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張則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戚本禹接見一個叫「反到底」的造反團時，裝大蠟地說：「你們知道甚麼叫『反到底』嗎？反到自己身上才算是反到底。」他這個史痞的下場，當然只是為此命題「歷史的戲劇性在於請君入甕」，添一實例而已。這時候還不知此後甕之將入的翦先生還在燒甕，使勁地批判另一位右派歷史學家：「向達在很多會議上的發言中對科學院的黨的領導大肆攻擊。他說科學院的領導是外行領導內行。一些行政領導的黨員幹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業務』。他說科學院的黨的領導『有如張宗昌帶兵』，把共產黨比作北洋軍閥。向達說：『現在史學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範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的。』又說：『這幾年史學界的人意氣消沉。』他閉著眼睛問：『歷史界解放後這樣不行，黨裡負責的人要不要負責？』請問向達：你從哪裏看出現在的史學界是『奄奄一息』，『意氣消沉』？又從哪裡看出是和範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對於黨的領導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翦伯讚的批判並不限於學術領域之內。「他誣蔑『中國知識份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說解放後知識份子『一般地是一言不發的，或者只能希望他們發的一套假言』。大家請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後所說的都是『假言』，沒有一句『真話』。大家都知道歷史學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實性，一個言不由衷的專說假話的人，怎麼能給學生以正確的歷史知識。我們希望他把心裏的真話說出來。雷海宗在文章中還談到不要黨『發號施令』，並威脅地說，不然，知識份子就要說假話，或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地消極怠工了。」（人民日報，10月4日）

致公黨中央副秘書長嚴希純說，有的在科學機關作領導工作的黨員，自己不懂科學，又不虛心學習，尤其不好的是不懂還要裝懂。有些黨員還把領導科學技術機關看成帶軍隊一樣，把科學家，教授，工程師，一律當成自己的下級，不尊重他們的意見，也不給以應有的禮貌。他還說，科學技術工作在研究過程中是允許失敗的，但現在卻一遇失敗就要追查科技人員的責任，甚至懷疑有政治問題加以逮捕。這樣專家們如何敢於負責呢？（人民日報5，16）

《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是民盟中央推派曾昭掄，千家駒，華羅庚，童第周，錢偉長五人成立「臨時研究組」，廣泛徵求和收集了各地盟內科學家的意見而提出的一份較全面，系統的報告。內容包括五個方面。郭沫若以《駁斥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為題進行了批判，隨後根據運動的深入發展又作過補充發言。

第一，「爭取十二年內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必須『保護科學家』，就是採取具體措施保證科學家，特別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學家有充分條件從事科學工作，扭轉目前科學家脫離科學的偏向，首先要協助他們妥善地解決時間，助手，設備，經費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問題，使他們真正能夠坐下來，好好安心工作。」

郭沫若批判說：「這個意見書中提出了所謂『保護科學家』的口號。這顯然是企圖造成一種印象：我國科學家受到一種威脅，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護』。事實上有人說過這樣的話：『解放以來，中國知識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他們這樣不顧事實危言聳聽的目的，不外是想離間科學家同黨和政府的關係，引誘他們走上錯誤的道路。』

第二，「目前科學院，高等學校和業務部門之間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本位主義，大家都想保存本單位的幹部，不願外調，甚至怕談合作，怕這樣會拉走了人，影響了自己。有些單位對於少量的必要的人員調動，也張大其詞，互相埋怨，因此，在單位與單位之間逐漸形成了一堵牆」。

第三，「要發展社會科學，首先要改變對待舊社會科學的態度。有人認為資產階級社會裏沒有社會科學可言，因為那些過去被稱為『社會科學』的東西都是不科學的，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只有批判，談不到接受，對舊社會科學不是改造，而是取消，這些做法我們認為是不妥當的。對待舊社會科學應當是改造而不取消，因此應當恢復的應即採取適當步驟予以恢復，應當重視的就應當重視起來。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當成客觀規律。我們認為應該鼓勵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見，政府部門應主動地將有關資料儘量供給有關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並幫助他們創造研究工作的條件。」

郭沫若批判說：「在我看來，今後為了發展社會科學，首要的任務就在於繼續擴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的隊伍，提高馬克思主義的水平，而不是甚麼發展資產階級社會科學。那種『恢復』資產階級科學的主張，實際上是開倒車，反對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社會科學。如果按著這個主張去做，其結果是削弱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而使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重新氾濫。」

郭後來又補充批判說：「他們在這裡，一方面污蔑共產黨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等等都是盲目的，而不是依據客觀規律的，另一方面又污蔑共產黨和政府不准『學者們』從事科學研究，只准他們作些政策方面的『宣傳解釋工作』。事實是這樣嗎？暫且不說許許多多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是把宣傳解釋黨和政府的政策，作為自己光榮的職責的，現在我只問問右派先生們：黨和政府究竟在甚麼時候禁止過『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對客觀經濟規律進行研究呢？」

第四，「科學研究工作應該有領導的進行。我們希望科學規劃委員會的工作進一步加強，並建議有條件的省、市也設立相應的機構，以加強領導。至於學術領導和科學研究的『火車頭』，我們認為應在實際工作逐漸形成，不要主觀地先行規定誰是領導，誰是『火車頭』。」又說：「科學研究工作除少數必須集中外，應儘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學家在那裏，研究工作就放在那裏。」

郭沫若批判說，「反對有計劃有重點地發展科學工作，反對對科學工作的統一領導，其結果就是要使我國不能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來發展科學事業，就是要使我國科學工作長期停留在落後的狀態。」

第五，「過去在升學，升級，選拔研究生，留學生時，有片面地強調政治條件的偏向。我們認為今後應當業務與政治並重。人民內部在培養機會上應一視同仁。對於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都應當平等地看待。」

郭沫若批判說：「企圖以資產階級虛偽的『平等』觀，在青年中進行挑撥和煽動，指望造成一部份青年對黨和政府不滿。」他認為，「如果要『一視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說工農學生吧，大家知道舊中國在反動統治之下，工農子女被剝奪了受教育，特別是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現在，反動統治已經被推翻了，對於這個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狀況，難道我們不應該盡最大力量加以改變嗎？」

這位郭大院長把這份「意見書」批得體無完膚，然後扣上了如題目所示的大帽子：「意見書是一個徹頭徹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工作綱領。」-----「黨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學研究

工作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意見書中對於這點一字不提。」他說：「這不是一個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鈞等右派份子企圖奪取國家領導權，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領導權的陰謀的一部份。」（以上「意見書」引文見光明日報 6 月 9 日；郭的「批判」見人民日報 7，6 和 9，19）

跟常識水平的是非開玩笑，瞪著倆眼說瞎話。用共產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郭沫若的馬屁也拍得太過火，太傷天害理。1980 年 5 月 8 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中說：「在批判『章羅同盟』時，曾經把民盟中央的《對於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說成是『章羅同盟』的反動綱領，事實上，這份意見書不是章、羅二人提出的，而是民盟中央分別由曾昭掄和黃藥眠負責的兩個小組起草的。在這次複查中，我們和有關部門及民盟中央都認為，這兩份意見書的基本內容是可取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不是『章羅同盟』的綱領。」這當然不是專門針對著郭沫若一個人的胡說八道而發的，但卻揭露了郭沫若寡廉鮮恥、喪盡天良的奴才嘴臉。以他的接觸和瞭解，絕不可能把毛捏造的『章羅同盟』（明白的事實，是章羅連有「同盟」的可能性都沒有）信以為真；無需他那樣的通古博今，就該會認識到《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完全是個合理化建議。不管怎麼說，他竟能顛倒是非，曲意逢迎，振振有詞，逐條把它們批得體無完膚，確實證明「四大不要臉之首」對於他是當之無愧。而「首上之首」毛澤東才是無恥之尤，製造「章羅同盟，古今奇冤」的罪魁禍首。作出這樣連自己也明知是純屬捏造，並且相信別人也同樣明知他老毛在捏造，他還要在兩個「明知」的情況下，涎著臉皮在在光天化日之下捏造；而郭沫若卻是在四個「明知」的情況下，硬說：「公雞會下蛋」。別說這兩個人還號稱是「大人物」，即便是小癩三，也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小癩三。

第十二，反對奴化教育，取消黨委制，實行教授治校

現在再來看看由黃藥眠，費孝通，吳景超，褚聖麟，侯在乾，李西山，陶大鏞，陸近仁組成的工作組並由黃藥眠執筆寫成的《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

「目前高等學校中存在有好多問題，問題之所以產生，我們認為主要是由於：一，有許多黨員同志對黨中央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份子的政策認識不足；二，有許多黨員同志沒有掌握到學術機關的特點，錯誤地把它和一般的政權機關等同起來；三，有許多黨員同志的民主作風不夠，高等學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和群眾商量，甚至有些人錯誤地認為一切由黨員包辦，才算是實現黨的領導；四，有些黨員同志沒有充分認識到知識技術力量在近代國家建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五，有些黨員同志對於目前要辦好高等學校，究竟應該依靠誰，沒有明確的認識。

「除了這些有關思想認識的原因以外，學校的領導機構也的確存在一些問題。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學校是用校務委員會來執行領導的。後來學習蘇聯，採取一長負責制（實際上也並沒有執行過）。黨『八大』以後又改為黨委負責制。最近人們對於黨委負責製表示了不少意見。但究竟甚麼是學校黨委負責制，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黨中央對這方面的具體規定。比方黨委負責制和普通機關裡的『黨組』有甚麼分別，它和校長，校務委員會之間的關係如何？我們也很難說出一個輪廓。既然對於這個制度，我們還沒有研究，因此我們也就很難對它表示意見。不過就目前的領導機構的情況看，的確已經顯露出好些毛病。如嚴重的以黨代政和黨政不分的現象，如校務會議多流於形式，如非黨幹部有職無權，如群眾意見很難通過一個組織系統反映上去，發揮監督作用，如系秘書實際上領導系主任，如在教師中占相當大的比重的民主黨派，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定的地位等等」。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胡錫奎批判說：「在這個以『建議』作為幌子的徹頭徹尾的反動綱領的第一部份裡，右派對黨，對黨員進行了惡毒的攻擊，把在高等學校裡工作的黨員刻劃為『不懂政策』，『不學無術』而又『專斷獨行』的『獨夫』。把黨委制描寫為產生『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東西。右派份子捏造了這些莫須有的罪狀，正是為了給從各個大學裡趕走共產黨員，消滅黨委制的這個陰謀提供論據。綱領的第二部份，窮兇極惡地干涉了黨的內政，擅自規定限制黨在各大學的活動範圍的清規戒律，甚至限制共產黨開會與說話的自由，這種限制有些類似國民黨反動派的《防止異黨活動辦法》。綱領的第三部份，第四部份，第五部份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地製造了種種委員會，其目的是通過他們的活動，使共產黨的領導權化整為零，全部消滅。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圖設立以教授，副教授佔絕對優勢的校務委員會，作為高等學校的最高領導機關，表面上是要擴大民主，而實際上他們的校務委員會是不要校長參加的，他們規定『黨的校長或副校長對於校務委員會的決定持不同意見時，他可以有否決權，但如果這個決議第二次被通過時，則決議仍必須執行。』這就是資產階級右派否定黨委制之以校務委員會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實行篡奪領導權的明目張膽的陰謀計劃。這個陰謀計劃是要保證右派可以在高等學校中橫行霸道，為所欲為，把高等學校變成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據地。」（人民日報 7，30）

在教育問題上，右派的主要觀點是，在領導體制上反對黨委制，黨員特權，力爭「民主辦校」，「教授治校」。在課程設置上，主張恢復社會學（如吳景超等被批為「實質是要擴大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進一步奪取思想陣地向馬列主義進攻。」）。當然，同時也反對一切照搬蘇聯，對蘇聯所表現出的前所未有的洋奴思想，以及反對罷黜百家，獨尊馬列。在教育思想上，主要表現在錢偉長所提出的培養目標上。他認為，高等工業學校把培養目標設定為工程師是不現實的。如果培養目標是工程師，那就必須把有關的各項知識全部傳授給學生，可是事實上是辦不到的。他說，必須把培養學生具有獨立工作能力和把全部知識傳授給學生二者嚴格區別開來。高等學校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把全知識傳授給學生，但是高等學校必須給學生打下一定的理論知識基礎，訓練學生在一定範圍獲取新知識的能力，為將來成為一個工程師作好準備工作。錢偉長認為，當前高等教育的特點是繁瑣。課程門數花樣繁多，又是基礎課，又是專業課，又是專門化課。學生一學期要學十多門課，每週學習時數在 30 小時以上，一天到晚在教室裡換班子，上了這堂課，又是那堂課，以致走馬看花，學得不深不透，更談不上工作能力的培養了。他說，西德的高等學校每週只上 17 小時，美國有的工業大學每週連上課帶實驗在內只有 20 小時，它們也同樣培養出了相當水平的人才。他還說，中國學校的專門化設置是採用蘇聯的，可是蘇聯的工業水平要比中國大 20 倍，運用人才的靈活性也比中國大 20 倍，按中國目前的工業水平來看，分工還不可能過細，對於人才的需求還不可能算得十分精確。因此，專業不宜分得過專過細，以免產生「學用不一致」的傾向。（光明日報 1，7）

人民日報，7 月 4 日載，在清華大學批判錢偉長的會上，張子高教授發言，說 1 月 7 日《光明日報》發表錢偉長關於教學計劃，培養目標的談話，實質上在總的方面否定了學習蘇聯的方針和教學改革的成績，在教學環節方面是否定了學習，畢業設計，忽略了專業課和專業設置的意義。他離開社會主義教育制度，即有計劃有目標地培養高級技術幹部，而企圖轉回到資本主義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章名濤教授說，錢偉長說現在五年制的學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學生。這就是說過去的英美制的教育制度比現在學習蘇聯的教育制度要好得多。難道說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適應社會主義國家的麼？

對錢偉長的所有批判，幾乎都是有意，無意地在說廢話。比如，說他的主張是這個，是那個，一則有很多「不是」錢的主張，是硬加在他頭上再予批判的；二則，「是」，為甚麼就不對？其實，他是在一黨專制下，旗幟鮮明地提出教育要發展學生的主體性，特別是他在《中國青

年》雜誌（1956，15）上發表的文章《過嚴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更是一篇反對黨的奴化主義，倡導個性解放的民主教育宣言書。「幾千年來封建社會殘留下來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封建社會對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現在我們雖然已經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溫文典雅』的字眼，但是這些字眼的某些內容卻在『服從』，『虛心聽取群眾意見』等另外一套字眼內借屍還魂了，有許多對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是藉助於『服從祖國需要』這樣的光輝的字眼裡混了進來，新名詞混進了舊內容，確實迷惑了不少青年。」（何止青年？由革命名詞包裝起來的最腐朽的封建主義糟粕，不是也讓壯年，老年，其中不乏飽學之士，奉若神明嗎？——紫丹，下同）

「約束和管教太多，終究是和發揮青年積極性和創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人之所以成為人，以及在甚麼程度上成為人，是由他的主體性的性質，及其發揮的程度所決定，所表現的。主體性就是一個人自我實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共產黨的教育就是要千方百計扼殺人的主體性的奴化教育、愚民教育。）

「我也曾見過活潑的青年漸漸地變成沉默寡言，青年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為怕被檢查『小圈子』而漸漸疏遠了，正當的生活愛好和業餘特長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顧慮，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費。這樣動輒得咎的生活，顯然只會傷害他們的銳氣，是無益於青年的教育的。」

「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主要的原則性問題上友愛地進行是有好處的，如果是為了『批評』而『批評』，沒有『對像』找『對像』，則就會產生消極的作用。在目前，這樣代表著友好和關心的字眼，像『幫助』和『批評』，都變成了『管教』的代名詞，實在指出了我們的封建殘餘是根深蒂固的。」（因為你錢偉長是國際知名的自然科學家，共產黨需要你，暫時還算尊重你，所以你還有人格尊嚴，還能說出有人格尊嚴的人才能說出的話。一年之後你給劃了右派，再來嚐「幫助」和「批評」的滋味，就知道遠甚於「管教」了。）

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何東昌說：「錢偉長在校內已成為右派的首領了，一切消極因素，都和他混在一起去了！」（人民日報 7 月 21 日）與你同為清華副校長的張維說，錢偉長等人炮製的「這個綱領是章伯鈞的政治沒計院中科學的部份。他策劃著用這個綱領首先在文教和科學部門打開缺口。這是他們這個集團在長期內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活動！」之前還說：「依我看，錢偉長他們的意圖就是：（1）醜化黨，藉以收買人心，達到對科學的領導權，（2）煽動挑撥，（3）抓人事權，（4）反對科學院的領導。」（光明日報，7，6）你們「三錢」之一的錢學森說你已經墮落成為「最惡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吳晗說你是在政治上向黨「敲詐勒索」！（人民日報 7，6）梁思成稱你「索興撒賴」，「無賴到了極點！」（〈爭鳴〉10 月號）

「在學生升學的問題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過多地限制了學生的志願。有一位愛好農業而有一定基礎農業生物知識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動員』到師範學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在某某省的師範學院去了，才算是『服從了祖國的需要』。」

「大學畢業後，學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數。如有意見就給你扣上大帽子。我們強調了服從需要，很少照顧到個人的志願和專業的培養，使青年在這些問題上受到了不應有的過多的限制。積極為這些問題提出意見的青年，總是被認為落後分子。」

「總之，對青年的清規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緊太厲害了，我們反掉了自由主義，而讓封建主義的殘餘從後門鑽了進來。清規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眾的積極性，就是封建社會教育思想的殘餘。」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教育中也有優良的部份，如學思並重，舉一反三的啟髮式，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主體精神。。。。。。可惜，中共這時的教育繼承了其中重教

輕學，重知輕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貶損自由，壓抑個性等糟粕部份，並使之與列寧的「從外面灌輸」的教育思想相雜交。這便是錢偉長以現代教育的眼光所審視的這個赤色殖民地的教育怪胎。在教師中重視政治，思想改造，輕視業務提高，即反右之後才叫出名堂的，所謂批白專道路，而在業務中，更是輕教研和科研。費孝通在《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中寫道，周總理號召「向科學進軍」，有的學校只是刮起一陣風，「吹皺了一池春水」。當教師的科研和教學發生衝突後，學校領導「不去分析怎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更少自覺到這正是缺乏具體領導的結果，反而大叫教學與科研有矛盾，教師名利心重，輕教重研。。。。。。我想，強調知識份子搞科研是為名利雙收，是個人打算是不好的，因為和事實不符。」

「中國民俗學之父」鐘敬文先生導致被劃右派的在 5 月 16 日校部領導幹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把「三害」斥之為：《「三條老虎」橫衝直撞給教育事業帶來損失》

「黨外人士應有職有權，不要以秘書、助教干涉我」

黨委制是需要的，但是黨的神經系統（組織系統）如何搞須要研究。黨對黨外人士既然政治上與業務上是信任的，就應有職有權，讓年青黨員領導黨外人士是不妥當的。我在很早就靠近黨，我的覺悟與水平都不比新黨員差，不要以秘書、助教來干涉我，讓預備黨員來領導我就不服。「過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高級知識分子中是教育、統戰與宣傳部門的工作」

我始終認為我校黨群關係不好，高等學校黨委對高等學校的特殊性沒抓住，在高級知識份子中屬公安部門的問題不多，是教育、統戰、與宣傳部門的工作，過去好像認為黨外人士不可靠，這道牆防範得太厲害，鬥爭一個人容易，要挽回就難，感情不容易恢復，過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有朋友問我：「究竟師大黨群關係怎麼樣」？我說以我為例是很好，但這在學小房竟是特殊的。外面對我校統戰工作印象不好，對我們的黨群關係有一定的看法。校內有些負責同志缺乏自我批評的勇氣，我曾幾次進言。如評薪工作，黃藥眠、蕭璋不瞭解情況，李筠雖好但不懂業務，黨委除了兩個老頭都是年青的，情況不瞭解，決定級別不準確，何副校長告我有四人不滿。實際不如此，我現在半官半民，我瞭解情況，告訴何副校長能改就改，不能改就應吸取經驗教訓。

「我身邊的老虎推倒了莊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頭」

毛主席在八大開幕詞中指出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我聽了非常高興，老虎一捉就捉對了，這三條老虎橫衝直撞給教育事業帶來損失。

知識份子不會造反，學校裡不只是公安工作，而問題是宣傳、教育、統戰部門的工作，要團結、教育。我校工作做的不好，在我身邊的老虎推倒了莊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頭，捉住了老虎真是很高興。

「實際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

我校三個主義都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籠罩一切，教條主義充滿教研組，現在有些教師談虎色變，這些人不是反革命，要依靠這些人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教育事業，這樣的壓力怎能發揮他們作用。這一年來情況好些，但基本情況未改。如教育系教條主義的統治從領導起解除了一些（董渭川插言說不見得是解除了一些），基本未變。主人翁的感覺是從主人翁的地位而來，實際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沒有甚麼用處，虛偽的東西沒有價值。

「牛皮浸水拖不動，不會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會解決問題了」

學校的三條老虎，首先是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在教研組中的統治最囂張，據馬特反映：邏輯學寧可請人大年青人來給政治教育專業教課，而讓馬特去教外系本科學生。官僚主義在高等學校為害最小，我與方銘說黨委應利用八大文件好好學習，使三條老虎收斂一下。黨團員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非常突出，如政治經濟學和哲學教研組有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應從黨員先檢查，根據中央精神在群眾面前檢查自己。後來黨委佈置學習八大文件時說要體會精神，不要聯繫實際，這說明黨委不正視工作上的缺點與錯誤，黨委常對錯誤做解釋，這樣工作方法不好。我近半年在學校不愛講話了，牛皮浸水拖不動，不會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會解決問題了。

「黨政負責人發現錯誤應拍胸承認，怨有頭，債有主」

校黨委在貫徹與高校有關的政策不夠及時，瑣碎小事做得週到，有時很細緻，這是思想作風與工作作風問題。做事不敢負責這是不好的，黨政負責人對自己要做的事考慮要細緻，與群眾商量後再做，如發現錯誤應拍胸承認，「怨有頭，債有主」，封建社會的正派人也有這種道德。黨委一般同志對問題愛解釋，如我向張斧提出百家爭鳴政策在我校的貫徹問題，張說：「我們沒牴觸。」但實際我校漠然無聲，這是否牴觸？中央政策不執行就是牴觸，不願承認錯誤，這是對中央政策的態度，黨組織不貫徹政策應負甚麼責任？可能黨委意見不一致，戰鬥性不夠，疲踏。

「黨委整風應行動起來，不要人家『將軍』、中央鞭策才搞」

整風道理已不用再說，應行動起來，做為黨組織這樣疲踏不應該，要人家「將軍」才搞，我向張剛說這樣疲踏不行，學校有些同志誠誠懇懇為黨工作，但有缺點：
1 群眾路線走的不夠；2 未變外行為內行；3 政治敏感不夠。

黨中央非常有決心，通過整風運動來調整人民內部矛盾，我校黨委等中央鞭策才動，應用種種辦法如大會、小會、個別談，打開道路，爭取主動，體現中央政策，

聽取群眾意見，黨委個別同志決心不大，老一套想過關。黨委是否下最大決心貫徹中央指示精神還值得注意。

「政治上沒問題，業務好的排出去這是自私自利」

我校三大主義是存在的，如人員錄用、留助教問題上，中文系去年留 20 幾個助教，只有一個非黨團員，有的業務很差。分配出去的有些是業務很好的，沒有反動的，但因為這些不是黨、團員，這些人很有意見，留下的助教也認為不公平，這是完全的嚴重的官僚主義。我們做的是人民的事業，不是黨的家務事，政治上沒問題，業務好的排出去這是自私自利，是不合理，我很氣憤，團員也不平，黨委應查清這件事。

黨委要下最大決心來改變作風，群眾是我們的，如一意孤行則會脫離群眾。（《師大教學》146 期）

中小學的情況可以從《解放日報》（5 月 10 日見報）邀請的 22 位中、小學教師座談會中看出一二：

上海第一師範學校王浩川說：我們的校長（也是黨支部書記）站在雲端上，只顧作經驗介紹，而不抓學校內部的教學工作。在「評優」工作中也缺乏民主氣氛。群眾認為一位蒙領導百般偏愛，事事出風頭在先，吃苦頭在後的教師，不應該享受優秀教師的榮譽，校長不但不考慮這些意見，還批評大家文人相輕，還在區裡介紹本校「評優」經驗，說得頭頭是道哩！很多教師對工資改革預先定好級別，討論時草草收場不滿意。在評級中，全校黨員除一人外，都是評的最高級，而工作質量與教齡都超過他們的非黨員教師卻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困難的人得不到照顧，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幹部，卻可以搬進新屋。校長搬進了新屋不算，還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裝修費，據說這是有關組織同意的。

上海建築工程學校林炳彰說：大家對領導偏聽偏信，造成了「牆」，很有意見。一個教師說，我有話不願在小組會上講，情願在大會上講，怕匯報的人走了樣。一位教師說：一個黨員的假話勝過十個群眾的真話。（這決不是個別現象，黨員和積極份子就是專門吃這碗反的——紫丹）

第三師範學校過唯一說：我們這裡有這樣一個黨員，一開口就是「我是吃過苦的。」他對待群眾的態度是怎樣呢？有一次他同教研室同志吵起來，那同志哭了，我就跑進去同那同志談了幾句。當晚這位黨員就找我去談話說：「你在外面講我壞話。」接著就兩手插腰，眼睛一瞪。他生病了，有位教師說：「還是他生病的好，可以不發生甚麼事情，我情願替他代課。」他和群眾關係的壞，可見一斑。（反右之後，同事之間連這類的真話——共產黨叫做是「落後話」或「反動話」，都別想聽不到了。能聽到的，連夫妻之間都清一色是共產黨如何、如何地好！）

控江中學趙寶禮說：我是畢業班班主任。初三有 12 門功課，有些教材又重又深。每門課又抓得很緊，差不多每天有測驗。這學期還要考全年的課程。學生的擔子已經很重了，跟隨畢業來的是升學，自學，勞動等問題，於是又得進行思想教育等工作。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團要管，管得學生更忙了，一聽大報告就是半天，大會之後又是小組討論。有些團員和

幹部還要先開幹部會，弄得學生功課學不好，缺了課又無時間補，身體也累垮了。我們班上就有兩個學生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症。醫生讓他們休息，有一個還死不肯休息。做班主任的對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救救孩子吧。」。。。。。。他還提到了校舍問題。他說，我們榆林有些小學的校舍條件實在太差了，白天開電燈上課，60 個人擠在一間陰暗的小教室裡，鼻子都碰得著黑板。應該照顧孩子們的健康。

這些意見是教育者的反映，受教育者也反映出了問題。

5 月 19 日，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沉澤宜和張元勳用大字報的形式發表了他們的詩《是時候了》，在首都高校迅速傳頌開來：「青年人放開嗓子唱，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一齊都寫在紙上，不要背地裏不平，背地裏憤慨，背地裏憂傷，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來，看一看天光，批評和指責，急雨般落在頭上，新生的草木從不怕太陽照耀，我的詩是一只火炬，燒燬人間的藩籬，它的光芒無法遮爛，因為它的火光來自『五四』，昨天我還不敢彈響沉重的琴弦，我只能用軟和的調子唱和風和花瓣，今天我要唱起心裏的歌，作為一支巨鞭，鞭笞死陽光下的一切黑暗，是時候了，向著我的今天，我發言，為甚麼有人說集體沒有溫暖，為甚麼有無數牆壁在我們中間，為甚麼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談，為甚麼。。。。。。為甚麼。。。。。。我含著憤怒的淚向我輩呼喚，歌唱真理的兄弟們，快將火炬舉起，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三天之內就貼出了幾百張大字報，提出了團委會無權向學生發號召，反對必修政治課，取消黨委負責制，徹底開放一切禁書，言論集會結社絕對自由，黨委不能以教育者自居，開闢自由論壇，對肅反被斗錯的人要道歉——即以最後一點：肅反斗錯的人，為例：西語系顧文選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55 年由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開始，在全國搞肅反運動，他在公安局裡親眼看到了大量無辜的人受牽連而遭迫害。他看不慣，替人說話，結果也被打成反革命並受到嚴刑拷打。他說：1949 年他 15 歲，他在杭州「參加了革命」，入了團。1955 年 6 月中旬開始肅反，「當時我對肅反並不在意，因為我沒有問題，在國外也沒有甚麼親友，我的親友中也沒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肅反無論如何也肅不到我頭上來，頂多我和大家一起學習。可是想不到當天下午，我們機關裡的領導人就佈置人鬥爭我了。他們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誣蔑打擊領導，拉攏小集團，文藝思想反動。」連續鬥他幾天，他仍不認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鬥爭他的同事的毆打，打得非常厲害。他回手保護自己，結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銬把他反銬，又用麻繩把他捆綁起來。這些人報告了「五人小組」之一的副局長後，就把顧文選送到杭州市監獄。在那裏把他上了腳鐐手銬關起來，關了四個月。他認為逮捕他是違法的。理由之一是沒有逮捕證，以後也未補發，逮捕後 36 小時內一直沒有提審，完全破壞了逮捕條例。他還說，監獄內伙食很差，蚊子很多，獄規很苛刻。他給出了種種細節，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時間，地點，還一一告訴了監獄裡吃的東西。他說他說的都是事實，不會有一分造假，可以調查。他在大鳴大放中申訴了肅反中自己的冤情，相信毛主席的「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鬼話，結果，回答他的是，又劃為右派，又一次打入監獄，屢經曲折，於文革中被槍斃。（70）在這一點上與筆者的經歷有一部份類似。筆者在前面已點到在肅反中所受迫害，到反右時被劃為右派的理由之一是：「他說，肅反中的積極份子很陰險。」所以，我在勞改中要從垂死中掙扎過來，就是為了能到後來給控訴中共的罪惡多留下一個活口。這就成了我後半生的人生意義。我和別人所經歷的事實表明，共產黨為了證明他錯打你第一巴掌是正確的，如果你不服，他必然用更重的第二巴掌來捍衛第一巴掌的成果。但我硬是如有人所說：「不服教師挨死打」。當我的「錯劃」右派得到「改正」後，有一次領導跟我談思想問題，說「別的右派得到改正後，都表示感謝黨給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要再努力為黨工作幾年。沒有人像你一樣耿耿於懷，憤憤不平，像是黨欠你幾百大錢！」我說：「鄧小平，胡耀邦都說過，『要講兩句話。』『我感謝黨給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這是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呢？」我看到他目光逼人。

「第二句話是：『我的第一次政治生命哪裏去了？』」

「你這個人，右派本性未變。」

上海戲劇學院學生文徹赫恩的劃右派及其整個一生的遭遇，是上述論點和事例的再版。他是清朝皇帝的後裔，上中學時就跟隨共產黨鬧學潮。他是這樣反思自己一生的：「我覺得國民黨腐敗，人民起來反對它。共產黨是代表人民的，所以有希望。特別是共產黨提出的口號我最為贊成，共產黨的最高目標是解放全人類！我想我為共產黨坐過牢，是對革命有貢獻的有功之臣，共產黨一定不會虧待我的。」「我有幾次去台灣的機會都自動放棄了，堅決留在北京，等待解放，迎接共產黨的到來。（後來他又參加解放軍，賣命為共產黨打天下。）誰知，這竟成了我終身遺憾的大錯。」（《苦難的歷程》頁 29。下面的敘述，都是根據他的這本回憶錄。我在這裡附帶向台灣的知識份子，特別是從大陸去的知識份子提出奉勸：要借鑒文徹赫恩的慘痛教訓。我在前一篇即《教訓篇》曾談到「輕信」和「投機」。如果說他的教訓是「輕信」的話，那麼像現在一些媚共之流的作為，便是十足的「投機」了。至於後果麼，請記取：「前面有車，後面有轍」。）文徹赫恩的遭遇是這樣的：

首先，在反胡風運動中，他被無中生有地栽贓個小集團「105 樂團」。

「某天中午吃飯時，廣播開始，首先播放東方紅歌曲，然後，廣播人——我班同學曹宇文說：『請大家注意，今天有重要廣播，請大家不要離開飯廳，聽完廣播再走。』接下來是正文：『我院表三（表演系三年級）文徹赫恩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在我院的代表人，他是暗藏的潛伏的反革命分子。他們一夥在學校散佈反動言論，煽風點火，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社會主義，反黨反人民。他們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行累累……』最後一句話：『文徹赫恩是皇帝子孫，快快坦白！』……每個人都盯著我看。」（頁 37。）

「軟硬兼施，逼、供、信、誘供，甚麼手法都用盡了」。鬥他「小集團」，他始終沒有承認，但後來劃他右派時仍算一條；鬥他的「反動言論」，後來也又都算作右派言論：

第一個問題：攻擊蘇聯和蘇聯紅軍的問題。我的原話是：「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蘇聯紅軍趁機侵入東北，拉東北的機器、物質和糧食。比如鞍山鋼鐵公司，本來有九個高爐，被蘇聯拉走七個。蘇聯紅軍不但搶老百姓的財物和酒，並且強姦中國婦女。當時東北的大姑娘都剃了光頭，白天不能出門，怕碰上紅軍，甚至有的蘇聯紅軍女兵還強姦中國男子。」我承認講過，但不是造謠誣蔑，是事實，不信可以問問東北的父老鄉親。而且文人郭沫若 1949 年 4 月在南下工作團一次為我們作報告時也解釋過這個問題，地點在北京朝陽大學，是清華大學的學生提出的，說：「領導叫我們一面倒，倒向蘇聯，那為甚麼蘇聯紅軍強姦中國婦女。拉我們工廠的機器和物質呢？」郭沫若回答：「是有此事，但那不是蘇聯紅軍干的，是被紅軍俘虜的白匪兵干的。機器是拉走了不少，但那些機器有毛病壞了，是蘇聯老大哥拉回去幫我們修理的。」而事實上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但是，郭沫若若這樣回答，他就知道甚麼叫做「羞恥」了。

第二個問題：關於一邊倒的問題。「我對蘇聯有看法，從歷史上看，在沙皇時代，俄國人對東北三省就有野心，佔領旅順港和中東鐵路不走。雖然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我們也應該提高警惕。」至於蘇聯專家援華，我也有想法：「蘇聯專家在我院教學的列斯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唯一沒有去世的學生，我看也沒有甚麼特別的高招。列普斯卡婭和古裡涅夫並不比中國人高明多少，可他們的待遇超過我們的老師幾十倍！我認為太不公平了，是不是我們有崇俄媚俄的思想……」

第三個問題:關於污蔑黨團員和醜化黨團幹部問題……(頁 42。)

(被打成胡風分子或集團的人,很多給鬥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文徹赫恩是單身一人,他也吃盡了苦頭。但於 1957 年春,總算平反了。

一個普遍的現象是,肅反中被誣陷的人,即便平了反,躲過了初一,在反右中也難於躲過十五。)

其次,共產黨整風,號召對黨提意見,「後來竟規定每人必須寫 20 張大字報。我心裏琢磨著:共產黨覺悟了,改過了,講民主自由了。他們過去一貫強姦民意,一言堂,獨斷獨行,剝奪了群眾的言論自由和一切個人權利。這回來爭取群眾意見,看來態度倒是虛心誠懇。許多同學都叫我提意見:『你受過那麼多委屈,也該出出氣了。提!有毛主席撐腰。』我回答:『以前有些意見早就提過了,而且都寫在檢查裡了,我沒有新的意見。』其實我剛被鬥完沒多久,才平穩下來,哪還敢再提意見?還是少說話為妙。隨便他們怎麼動員,我就是一言不發。大字報的紙都擺在我的書桌上了,我就是一字不寫!

「不久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在教學大樓排練廳開反右動員大會,由黨委書記蘇坤作反右報告。會上點了许多人的名字,都是在鳴放時提意見和寫大字報的人。我心裏想,當時你們去徵求意見時,稱讚這些人是好同志,是愛黨愛社會主義的,怎麼今天一翻臉就甚麼都不認帳了?共產黨說翻臉就翻臉,給這些人扣上階級敵人的帽子,說他們有意向黨進攻,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反革命右派份子。沒想到最後還是把我點出來了:『別看有的人大鳴大放時一言不發,一張大字報也不寫。那也不行,他內心是仇恨共產黨的。在肅反的時候,我們已經把他揪出來了,……這種人不但是右派而且是極右派的反革命分子,是雙料的反革命右派份子!』(頁 54-55。)

最後,他勞改了,詳情請看《苦難的歷程》。這裡僅再提一提他的第三件冤案:他勞改期滿後,結婚過日子,勞改隊的管教員強姦了他妻子,「反而被他們誣陷說是夫妻倆合夥預謀拉幹部下水。」為逼他承認,白天要命地加重他的勞動量,晚上還要開會鬥爭他,作「噴氣式」,打得遍體鱗傷,打掉牙齒,打昏過去,「一共鬥了我八個月,240 天,一天沒拉。他們像餓狼似地失去人性,每天晚上把我的臉打得變形,遍體鱗傷,全身無處不痛。」(頁 119。)

在北大學生的鳴放中,物理系的譚天榮是被毛澤東稱為「英雄」的人物。5 月 20 日,他貼出題為〈一株毒草〉的大字報:「我是從物理學本身發現辯證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現在哲學已經江河日下,一切科學在形而上的統治下面已經面臨毀滅,一些著名的學者,例如周培源,錢學森,華羅庚,郭沫若,艾思奇等,在哲學科學常識方面存在多麼可怕的空虛和混亂啊。緊接著,我意識到,全世界面臨一次空前的變革,反對殖民主義和反對教條主義的兩支大軍在不同領域內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學生運動不過是一次世界規模的民主運動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視著中國,中國注視著青年學生,青年學生注視著我們北京大學,所以我們沒有權利放鬆自己的戰鬥。」這篇署名為「一個強壯而又懷有惡意的小伙子」的大字報,說馬克思主義從 1895 年起就開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說《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說《人民日報》是「封鎖真理的長城」,說三好學生是白癡。(人民日報 6 月 28 日,7 月 4 日又載)在那些日子裡,北京大學每天晚上都有數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辯論會,辯論的題目有「要不要必修政治課」,「新社會人與人的關係」,「胡風是不是反革命」等等。還開了一些控訴會,有兩個在肅反中被錯鬥的學生(顧文選和周鐸)的控訴,據費孝通在六月六日六教授會議上說:『現在各大學的學生都起來了,情緒激烈。從這暴露出來的問題看,情況是十分嚴重的。聽說北大有兩個學生控訴在肅反中被錯鬥,有人聽了流

淚。這種事情在我們知識份子看來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後還有這些事，簡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心中產生了一種新的感情，我對學生所揭發的這些事實是同情的。學生搞起來，事情很容易擴大。當然要收也容易。300 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就完了。又說，今天的問題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黨人士有職無權，黨團員掌握大權，作威作福。我看不是個人的作風問題，而是制度所造成的。我已聲明不參加共產黨以表示態度。」（人民日報 7 月 4 日）

王書瑤寫的《從史達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大字報，實際上就是抨擊「黨天下」，他說：「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被麻痺、被愚昧，就有更加百倍的危險。因為如果這個集團犯有嚴重錯誤或變質，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史達林錯誤的原因是甚麼呢？——無論是蘇聯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都未能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覆。因為他們都不免有統治者的共同弱點，他們害怕說出問題的原因，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史達林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對這個問題，年輕的王書瑤比年邁的鄧小平看得更正確更徹底更早 20 多年！如果共產黨不反右，你鄧小平就可以避免兩次被打倒，也不會餓死 4000 多萬中國人，也不用經歷一次空前大浩劫，也不用英明領袖華主席的「一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當年你口出爛言：「較量了，他們失敗了。」你勝利了嗎？毛勝利了嗎？黨勝利了嗎？如今你又說「必要的」，還要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20 年！真是俗話不俗：「虎走千里總吃肉，狗走千里總吃屎。」）

楊路說，「對民主的看法——你們把民主當作手段，愛怎麼使用就怎麼使用。而我卻認為民主是神聖的權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個人在不妨礙別人的前提下愛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愛說甚麼就說甚麼。你們是只知道有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而不承認還有一般意義上的民主原則。」

正是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定稿中，把民主規定為手段的。雖然他原來是說「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翻雲覆雨，乃是毛澤東的家常便飯。

王存心說：「在我們國家裏選舉流於形式，人格沒有保障。『三害』到處都是。當然不是社會主義所固有的，為了我們社會主義更好，不少有認識的青年人投身於『五．一九』這樣的運動中。他們要求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不滿足於用思想改造的方式來除『三害』，主張在理論上作一些必要的修正，制度上作一些徹底的改良。（略談『五．一九』）」

王國鄉的一份大字報：《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把民主與法制的關係說得簡明扼要而中肯綮：在 20 多年後鄧小平才也這樣說，可當年他卻是把如下言論都當成了反動的右派言論的：「民主，不能是空頭支票，必須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國尚未頒布刑法、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領導者的恩賜，這怎麼會沒有『三個主義』？」

「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擴大民主，保障人權和人格獨立——這就是我們的鬥爭的目的。」

學生鳴放的刊物《廣場》的發刊詞，這樣寫道：「人與人的關係要重新調整，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和否定，對於現代的一些論點與觀點要重新進行估定計、評價和探索——。總之，這裡整風運動為主流的大變革是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改造運動，或思想意識的大革命，對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認識。

「大鳴大放成為這次運動的精神實質。毫無顧慮地發言，為真理而作好爭論，以及為證明一些新生的主張、觀點、天才的創造，都將如雨後春筍般地誕生！」

終篇：右派言論篇（五）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在北大的辯論會上發表了演說（連在本校，共發表了五次）。她說，原本對斯大林看法是通過看電影、書報，是很崇敬的，看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簡直是毛骨悚然，怎麼肅反能對自己的戰友濫殺 500 多人呢？怎麼社會主義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呢？，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們必須接受教訓。對斯大林的評價，不能歸到個人崇拜，要從制度本身去找。斯大林事件所以能產生在俄國，要按歷史條件看，蘇聯沒有典型資本主義基礎，這和中國有共同之處，在一些封建主義制度上建立社會主義。這些錯誤大部份受封建主義之害，如「三害」就是這樣。又說「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上層建築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適合公有制經濟基礎，如等級制度，人事制度與保密擴大化。說到胡風，她說，胡風向黨中央提的意見書，郭沫若說是「反社會主義綱領」，實際上那些意見是對的，現在這些鳴放都是從胡風處抄來的，如反對宗派主義，反對庸俗社會學皆是。她認為，只憑人民日報公佈的三批材料，說胡風是反革命證據蒼白無力。她的演講，不時為師生的陣陣掌聲所打斷。

6 月 30 日，人民日報所發表的新華社長篇通訊《毒草識別記-----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駁倒了林希翎的謬論和謊言》中說：「她說：『胡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致。』」

當時我在中學教書，一位比我稍大點的王姓青年教師，告訴我人民大學斗林希翎的會場情況：「林希翎提出要跟他們辯論，他們哪裏是她的對手？不光是知識、才華、口才不是對手，她指出的違法亂紀、『三害』事件都是經過調查的，無可置疑的事實。下面一再往上遞條子：『林希翎：支持你！』他們辯論無詞，場面尷尬，光憑嗓門高，亂起鬨：『打倒林希翎！』」王老師眉飛色舞，我認為他有正義感，不料，到反右時他上前就揭發我說過：「劉書記是菜包。」我校劉書記的確是個不懂教育的菜包子，但王當時卻接著說得更兇：「甚麼菜包？是熊包！」他說給我的所謂「右派言論」多了。當他一直揭發我。氣得我不行時，我冷靜地想：「你要虧心你虧心，我不來這一套。共產黨要的正是知識份子都來這一套，他好漁翁得利。」所以我對他是來而不往，讓他倒是僥倖踩過了這一劫。

還來說林希翎的演講，她說「基本一致」，「從胡風處抄來的」也好，說「證據蒼白無力」也好，說明文藝界，甚至各界知識份子都當真把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作美好的遠景。毛澤東看準了這點，就把雙百方針當作給知識份子的誘餌拋了出來，又怕你不去吞食，特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明：「胡風的文章還是可以寫的，他住班房是因為他搞秘密團體。」大家都想：「我又不搞秘密團體。」雖然心存怕釣魚的顧慮，但經不起毛的「猴不上竿只敲鑼」，終於連餌帶鉤一併吞進魚腹。之後，你再「腹誹」，說「毛澤東你不仁！」也只是徒喚奈何了。與此異曲同工的是，大學之間的串聯很叫校長感到頭痛，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作報告，要求同學不要與外校聯繫。林希翎反駁說：我校學生未患流感，為何要隔離？主席講，學生鬧事要鬧個痛快，而現在還沒有鬧事就這樣封鎖。根據筆者的記憶，當時傳達毛主席的講話大意是這樣說的：共產黨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學生要鬧事，就要讓他鬧夠，問題暴露了，領導的問題由領導負責解決，暫時沒條件解決的，要解釋清楚，學生的問題，要說服教育。對鬧事的頭頭，不要開除。。。。。。我當時直覺到，毛主席的胸懷，氣量，多麼仁慈，廣闊！誰知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單用指出處理湖北漢陽縣一中學生因為畢業後大部份不能升學，發生了 800 多學生罷課遊行的事例，足可說明。8 月 5 日新華社報導：湖北省漢陽縣最近在蔡甸鎮舉行了群眾大會，揭發和控拆了反革命分子（學校師生）王建國，楊松濤，鐘毓文，胡斌，余心平等利用漢陽第一中學學生的升學要求，煽動和組織近千名學生舉行罷課遊行的暴亂事件。9 月 6 日在蔡甸鎮舉

行了有一萬群眾參加的宣判大會，當場處決了王建國，鐘毓文，楊煥堯三人。楊松濤等四人被判處了有期徒刑。

第十三，文藝界矛頭指向《講話》

毛澤東用陰謀和公安手段，背信棄義，濫殺無辜。我說的「無辜」，是中共自己都承認的。如上述「小匈牙利事件」，他們為此事作出決定，正式平了反。但死者已矣，只能感謝黨的平反之恩於地下了。從教育思想講，這是推行他「階級鬥爭為主課」的，把受教育者培養成階級鬥爭工具的奴化主義教育思想。他要消滅的是要民主、自由、人權的和尊重主體性的教育思想。他以同樣的思想來對待文學藝術。這在反胡風及其之後的反右派鬥爭中得到了惡性地展開。胡風文藝思想的核心是「主觀戰鬥精神」，是一種很強烈的主體精神。毛澤東說他有「可殺之罪」，只是認為「殺了不利」，才刀下留人。他到底何罪當斬？「胡風分子」詩人綠原在《胡風與我》一文中這樣概述他與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互別苗頭：反對將文藝當作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標第一」，反對文藝脫離歷史真實，不同意「以歌頌光明為主」，反對把作家藝術家當作宣傳政策的工具，傳聲筒，主張以群眾喜聞樂見作為審美標準。（《新文學史料》1989。3）

右派在大鳴大放中對文藝方面所發表的意見，是和胡風一脈相承的，大多是或明或暗地，有意識或潛意識地把矛頭對準《講話》，認為它是扼殺文藝生機的利刃。例如，反對公式化，概念化，教條主義是具有普遍性的意見。甚麼公式化，概念化？就是〈講話〉提出的工農兵方向（用瞞與騙唆使工農兵去賣命），服從一定時期所規定的任務的文藝工作一元論定位（即作「齒輪和螺絲釘」），政治標準第一的文藝批評（甚至瘋狂到，有時是「政治標準唯一」），杜絕「人性論」（否認人類統一的人性，只承認「階級性」），對共產黨只能歌頌光明（對資產階級才能刻劃黑暗。不歌頌共產黨的功德，就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要文藝工作者進行思想改造；甚麼教條主義？就是把《講話》拜作圖騰。所謂右派文藝觀點，基本上是反〈講話〉的觀點。這表現在文藝思想理論，創作實踐和組織工作三方面。

讓我們從電影的鑼鼓敲起。中國的大鳴大放是在 1957 年的春末夏初，鐘惦棐的文章《電影的鑼鼓》卻是在 1956 年 12 月 15 日發表於《文匯報》（《文藝報》同時發表）。所以，也可以說它是鳴放的開台鑼鼓。鑼鼓是這樣敲起的：《文匯報》為了貫徹雙百方針，準備就著電影沒人看，70%以上收不回成本（有的連廣告費都收不回）的問題展開討論，記者姚芳藻採訪了鐘惦棐。他立即表示：「電影問題非常多，完全值得討論。。。。。。電影題材狹窄，故事雷同，內容概念公式化，看了開頭就知道了結局，誰愛看呢？」在展開討論中，《文匯報》發表了近 50 篇文章。導演陳鯉庭提出：「導演應該是影片生產的中心環節。」實際上，導演也只是按著〈講話〉照本宣科的演員，真正的導演是黨委書記（毛是總導演是用不著說的）。導演孫瑜要求尊重觀眾，尊重導演，尊重藝術。他說：「今天的觀眾在走進戲院的時候是以主人翁的姿態走進去的。他們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沒有思想性和藝術性的作品，我們不能不尊重他們。他們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號。」導演吳永剛在文章中指出：「政論不能代替藝術。人們花了時間和金錢，但是得到的不是藝術的欣賞，卻是像在聽一個報告，讀一篇政論，這樣的電影怎麼能使廣大的觀眾接受呢？」經過兩個多月的討論，鐘惦棐，作為中宣部文藝處負責電影的幹部，被《文匯報》約請寫一篇總結性的文章，這便產生了不同凡響的《電影的鑼鼓》：

「電影的鑼鼓先從上海方面敲起來，是有道理的。這裡是我國電影的發祥之地和我國著名電影藝術家的彙集之處。經過七年的歲月足以辨明，電影——這一群眾性最廣泛的藝術，究竟怎樣才是。按照過去的經驗，無疑應該丟掉一些東西，但亦需要保留一些東西，而其中最主要的是電影與群眾的聯繫，丟掉這個，便丟掉了一切。。。。。。」

「上海《文匯報》在 11 月份發表的 24 篇文章，就問題的性質看，可分為兩類：一是屬於電影的組織領導的，即以行政的方式領導創作，以機關的方式領導生產；一是屬於電影的思想領導的，這便是中國電影的傳統問題，題材偏狹問題，與所謂『導演中心』等問題。

「……我們有許多領導人對列寧所說的：『電影是教育群眾最強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藝術中，電影對於我們是最重要的。』理解得很不正確。因為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現了像〈祝福〉電影中魯四老爺教阿牛描紅的情景。關心過多也就往往變成干涉過多。

「……目前有許多有經驗的電影藝術家不能充分發揮出創作上的潛力，而只能唯唯聽命於行政負責人員的指揮，尚未進入創作，已經畏首畏尾，如何談得到電影藝術的創造？沒有創造，如何談得到電影事業的繁榮！

「藝術創作必須保證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須充分尊重藝術家的風格，而不是『磨平』它。所謂『導演中心』乃是指為了克服當前導演在攝製組工作時感覺婆婆過多而且過嚴，某些藝術描寫的細節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祥林嫂手中的魚掉不掉？何時掉？這完全是創作人員，首先是導演自己的事。如果這樣的事都須由行政決定，要導演幹甚麼？。。。。。」

這番鑼鼓聲聒噪火了毛澤東，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出批判：「共產黨裡也有右派有左派，中宣部有個幹部叫鐘惦棐，他用假名字寫了兩篇文章，把過去說了個一塌湖塗，否定一切，這篇文章引起批評了，引起爭論了，但是台灣很欣賞這篇文章。」

「成績是主要的」這是一個鐵定的公式，誰也不能違反。56 年鐘惦棐違反這一點，受到毛的批判；57 年誰違反這一點誰當右派。從毛澤東，劉少奇直到鄉村基層幹部，從上到下，眾口一詞：「成績是主要的」。毛澤東時常扳著手指說教，成績與缺點相比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即便餓死幾千萬人，成績仍然是基本的。彭黃張周們違反這一點，他們就株連了 300 多萬幹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農民用幹部開會作報告的腔調，耍貧嘴道：「成績是雞巴（基本）上的！蛋（但）有缺點，是屎染（必然）的嘛！」我真是不理解，當時面對的是包括他們親人在內的餓殍遍野，村裡餓死的人都沒有人去埋了，面對如此悲慘世界竟還能發出這種黑色幽默！難道這就是阿 Q 們發洩憤恨的方式？

在全國正式反右派幾個月之前，鐘惦棐已被欽定為右派了。《文匯報》8 月 4 日發表了後來成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的徐景賢的文章《否定成績改變方向篡奪領導——揭露〈電影的鑼鼓〉一文的右派論點》：

「和所有的右派論調一樣，《電影的鑼鼓》首先從根本上否定電影的成績。。。。。。總之，鐘惦棐之故意把工農兵方向和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串在一起，決不是為了幫助我們克服缺點，而正是為了把工農兵方向連根拔掉。。。。。。」

在右派的文藝理論方面最為有系統，有份量的，要數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這篇文章的思維方法是上前就與《講話》唱對台戲的。因為它是從審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所規定的「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這一點出發的。可是，在《講話》中毛是這樣說的：「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我們按照教科書，找到甚麼是文學，甚麼是藝術的定義，然後按照它們來規定今天文藝運動的方針，來評判今天所發生的各種見解和爭論，這種方法是不正確的。」而我則認為，別的甚麼事如果可以「不是從定義出發」的話，那麼，「我們討論問題」則是絕對地應當從定義出發的，這是一條邏輯規則。即以毛上述的話為例，是他先從「實際」，「定義」，「文學」，「藝術」的定義出發之後，才說出「不是從定義出發」的。否則，說者和聽者就都將陷於五里霧中——「應當從 x 出發，不是從 y

出發」，如果你不首先對 X、Y 加以定義的話（當然，「心照」就甯「宣」了），那麼，你所云者何？一句話說絕，理論思維必須從定義出發。但，如果定義是錯誤的，則應首先把錯誤糾正過來，這還是從定義出發。因為正確的定義就內涵著「合乎實際」這一規定。不緊扣從正確定義出發的討論，必將引起混亂；雙方對同一概念作出不同定義的討論，一定會是「褲襠裡放屁——到兩叉裡」，雞同鴨講，無共同語言；違背正確定義的討論，一定是胡說八道。民諺說得好：「先明後不爭」。這一句話可理解為，先明確定義，在討論問題時就不會引起無謂的歧義的紛爭了。像毛這樣的違反邏輯常識的錯誤，不但沒人敢指出，而且還必須當作圖騰來崇拜；這使我想起，鄧小平為吳晗碑亭書寫的「吳晗亭」中的「晗」字，多寫了一點，把口上的「今」字寫成了「令」字。我在報上看到時，脫口而出：「怎麼旁邊的人就不隨時指出這個筆誤？」「誰敢？」沒有人敢，於是這個錯字，便像征著鄧小平的威風而百世流芳了。有興趣者可前去看一下，是否今天「威風」依舊？

秦文說：首先，如果認為「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裡沒有「社會主義精神」，因而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必須要另外去「結合」，那麼，所謂「社會主義精神」到底是甚麼呢？它一定不是存在於生活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之中，而只是作家腦子裡的一種抽象的概念式的東西，是必須硬加到作品裡去的某種抽象的觀念。這就無異於是說，客觀真實並不絕對地值得重視，更重要的是作家腦子裡某種固定的抽象的「社會主義精神」和願望，必要時必須讓血肉生動的客觀真實去服從這種抽象的固定的主觀上的東西，其結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學作品脫離客觀真實，甚至成為某種政治概念的傳聲筒。

其次，這所謂「社會主義精神」既是作家主觀上的一種觀念，那麼，它必定是作家的世界觀的一部份。。。。。。作家的思想-----世界觀，是探索，認識，反映客觀真實時，伴隨著形象思維，起其能動性的作用，因此，這種作用是有機地表現在藝術的真實性裡面，是無須乎在藝術描寫的真實性之外再去加進或「結合」進一些甚麼東西去的。

在我們中國還跟另外一些庸俗的思想結合起來了，因而更加對文學事業形成了種種教條主義的束縛。這些庸俗思想，就是對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釋，而且主要表現在對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的理解上。

首先，必須考慮到，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和為人民服務應該是一個長遠性的總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淺地只顧眼前的政治宣傳的任務，只滿足於一些在當時能夠起一定宣傳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須考慮到如何充分發揮文學藝術的特點，不要簡單地把文學藝術當做某種概念的傳聲筒，而應該考慮到它首先必須是藝術的，真實的，然後它才是文學藝術，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學這一武器的作用。即便是一篇雜文，一段鼓書，一篇特寫，也不能忘了它的文藝性。此外，還必須考慮到各種文學形式的性能，必須考慮到各個作家本身的條件，不應該對每個作家和每一種文學形式作同樣的要求，必須要儘可能發揮-----而不是妨害各個作家獨特的創造性，必須少用行政命令的形式對文學創作進行干涉。

說「政治標準第一」，是因為，自古以來沒有無傾向性的文學，是因為人民所需要的是那種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的文學。但是，並不能由此得出結論，以是否配合了每一個臨時性的政治任務為文學作品的最重要的標準，也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是藝術標準並不重要。政治和藝術標準必須統一。（我認為，只有在政治理論與政治行為中，才是「政治標準第一」，如果你要求劉少奇在「八大」上作的《政治報告》有藝術性，是可以的，但你如果硬堅持必須「藝術標準第一」，那麼，你就是混蛋。如果你要求文學藝術作品，比如齊白石畫蝦，不是「藝術標準第一」而是「政治標準第一」。而且對違反者嚴懲不怠，我說，這就遠甚於混蛋了！）

正因為我們在這些問題上有一些糊塗觀念，於是，就發生了多種多樣的，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混亂思想，例如：不應該寫過去的題材呀，過多地從是否配合了任務來估計作品的社會意義呀，出題目作文章並限時交卷呀，必須像工作總結似的反映政策執行的過程呀，以各種工作方法為作品的主旨和基本內容而忘記了人物形象呀，不應該寫知識份子呀，不應該以資本家或地主富農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呀，作家最激動和最熟悉的「過去的題材」不要寫而硬要去寫那些不激動不熟悉的东西呀，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的呀，離開了形象及其意義去找主題思想呀，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領導創作呀，政治加技術（藝術）呀。。。。。。還有：你說描寫新英雄人物才是「社會主義精神」呀，而他又說人道主義精神才是『社會主義精神』呀。。。。。。

姚文元為批秦兆陽，雲裡霧裡寫了三萬多字，不見真貨色，唯有帽與棍。甚麼「修正主義思潮」，甚麼「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甚麼「沒有政治立場的『寫真實』的虛幻性」等等帽子。同樣，他對江蘇省一些青年作者陳椿年，高曉聲，葉至誠，方之，陸文夫，梅汝璈，曾華想組織一個《探求者》文學月刊社所草擬的「章程」和「啟事」，也是批之為「反動」，「夢想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他說：「《探求者》們的反社會主義綱領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們是國內外修正主義思潮無保留的狂熱的擁護者。。。。。。他們在理論上是秦兆陽的弟子，他們手裡揮舞的也不過是從秦兆陽的修正主義那裏搬來的破刀爛槍而已。然而當這種修正主義思想被他們剪貼起來湊成一套主張時，就成為非常完整的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綱領。」（71）

探求者文學月刊社啟事和章程中說：我們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藝術傾向，我們把編輯和作者混在一起，稿件的主要來源就依靠同人，我們將在雜誌上鮮明地表現出我們自己的藝術風貌。目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剛建立不久，如果說建成社會主義的道路還在探索，需要不斷地積累經驗，吸取教訓，那麼，在建成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為複雜，更需要多方面進行探討。舊時代遺留下來的思想意識中間，有壞的，也有好的，必須加以辨別。近幾年來，把一切舊東西看成壞的，把一切新東西看成好的，這種教條主義的觀點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危害。教條主義把浩瀚統一的社會生活歸結成支離破碎的教條，僵化了人們的正常生活。

再者，我們過去在長期的階級鬥爭中，由於當時的需要，把政治態度作為衡量人的品質的主要標準，往往忽略了社會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設。在階級鬥爭基本結束，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在人民內部的今天，我們看到了人們道德面貌上存在著各種缺陷，也看到了階級鬥爭給人們留下了許多陰影，妨礙了人們之間正常關係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鑒於以上種種，我們將勉力運用文學這一戰鬥武器，打破教條束縛，大膽干預生活，嚴肅探討人生，促進社會主義。文學創作有過漫長的歷史，積累了多種多樣的創作方法。我們不承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最好的創作方法，更不承認這是唯一的方法。

刊物不發表空洞的理論文章，不發表粉飾現實的作品。大膽干預生活，對當前的文藝現狀發表自己的見解。不崇拜權威，也不故意反對權威，不趕浪頭，不作謾罵式的批評，從封面到編排應有自己獨特的風格。本刊系一花獨放，一家獨鳴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發表。（72）

有一些作家點明叫響地要「修正」和「發展」毛《講話》的精神，少的如劉紹棠，認為其中「策略性理論」不應守舊地，片面地，機械地執行；老的如姚雪垠，認為《講話》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歷史條件在不斷變化，許多真理也要跟著發展。」《長江文藝》1957年10期上有篇文章這樣揭露和批判姚雪垠：

他歪曲地說「今天除了提到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外，也提到為知識份子服務。這就是發展。企圖偷天換日地以「為知識份子服務」來代替「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他誣蔑執行毛主席的方針是『原地踏步走，背去年的皇歷』。姚雪垠攻擊毛主席提出的文藝批評的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正確原則為「不僅是簡單的，而且是死的」，一個「總原則」而已，說「如果有人企圖拿著一個總原則認為是找到了萬能的鑰匙，隨便使用，他難免不跌進教條主義的泥坑。」從這一根本的反動前提出發，他把黨對文學事業的政治，思想的領導，誣蔑為教條主義的統治。說甚麼教條主義「上有領導，下有群眾，形成了一種巨大的，沉重的社會力量。」認為教條主義已成為「一種時代空氣，或者像流行性的感冒，散佈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環境中」。因此，「作家在進行創作時，不能不縮手縮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於是姚雪垠以反對教條主義為幌子，進而提出了資產階級「百無禁忌」的文學自由的主張代替黨的文藝方針。

黃藥眠在政治上被批為「章羅聯盟的參謀長」，但他畢竟是個文藝理論家。他在《文藝報》1957年第6，9號上分別發表了兩篇文章講了自己的意見。一篇是《由「百花齊放」所想到的》：

有些人處理問題時，硬要把黨的事業的文學部份，和黨的事業的其他部份刻板式地等同起來，來一個機械同均化，而無視文學的特性。還有人處理問題硬要來一個標準化，要以少數人的文學趣味服從多數人的文學趣味，或甚至相反。這樣就抹殺了在為工農兵服務的總方針下個人愛好的廣大原野。甚至有些人神經過敏，一談到個人的藝術愛好，就說你是個人主義，一談到幻想，就說你是唯心主義或違背現實主義，一談到應講求形式，就說你是形式主義。文學固然要反映出現實的本質，反映出社會生活中人的本質。但不應忘記，文學要通過生活本身的形式來反映現實的，因此對於「本質」也不能瞭解得過於死板。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同時又是多種關係交錯著的，因此，它是豐富的，多彩的。文學的描寫就是要具體反映出人的各個側面，和人和人之間的交錯著的關係，寫出細節，而描寫的方法可以不同，描寫的風格和情調也可以多種多樣。因此，文學裡面所表現的東西，是通過生活現象來表現本質，但它不限於本質，某些方面它可以比本質多些，同時某些方面又可能比本質少些。有些人忘記了文學是要通過生活現象本身來反映現實的，所以就要求文學要按著決議案來創作，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要根據他是不是表現了本質去檢查。這樣一來，作品自然就失去生活的豐富性，而人物也就失去了個性。文學不是生動的，動人的宣傳，而成為簡單的說教。有人說，文藝是生活的反映，生活裡面本身就有著美，作家的任務就是對生活中的這些美加以集中概括，使它比生活更高，更有典型意義。但我們應認識到，人們的主要任務在於改造世界。在實踐中，人們認識了世界，也產生了自己的態度，有時還帶著強烈的情緒色彩。有些人忘記了這些，認為作家的任務只是在檢集生活現象並加以組織。甚至有人還把作品中所描寫的故事，人物去一一加以核對。認為生活裡有的，就是現實主義的，沒有的，就違背了現實主義的原則。照這樣的看法，創作就不可能有，文學只能是資料的蒐集和堆積，想像就不可能有，文學只能是已有事實的記載，同樣，作家不是在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體驗生活，而只能是消極地感受生活，客觀世界給我們刺激一下，而我們也就認識它一下。。。。。。

另一篇是《解除文藝批評的百般顧慮》：

當前文藝界的主要矛盾，在於我們的文藝創作和廣大讀者的要求不相適應。我們印出來的作品，中學生讀起來，大體上說還認為可以，但大學生就覺得不夠味，不滿足了。他們的興趣是讀外國小說。近年來，存在著一種不好的風氣，那就是對於名作家的作品，照例是捧。如趙樹理的《三里灣》就是這樣。這種風氣也影響了讀者。一般說大學生本不十分喜歡中國現代作品，但你問他，他還是說好。為甚麼呢？因為《文藝報》說好。批評家與作家的關係不

諧調。批評文章有時並沒有體會出作品的味道，就來分析它的優點和缺點，有時則沒有把握住分寸，太重，因而引起了作家的輕視和不滿，這是一個方面。另外，如果作家不服氣，寫了個反批評，但刊物又往往以「不宜討論」為由拒絕刊載。挨了批評不能反擊，這也是造成了雙方關係惡化的原因。在領導思想方面，對世界觀與創作的關係有簡單化的理論。我們的創作質量不高，和簡單化的理論也不無關係。世界觀指導創作，這是無可懷疑的，但世界觀對創作的直接指導作用，只限於作者看事物的立場觀點和基本的態度方面。至於作家對人物的心理狀態，情緒等等的體驗，世界觀就不能直接指導。解決這個問題，要靠積累生活知識，有豐富的生活體驗。根據我們很多同志的理論，彷彿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有了，就可以解決創作問題。強調思想改造，這是對的，必要的。但思想改造是長期的事情，我們不能等到作家思想改造好了才能讓他們創作，而且思想改造也決不止是讀幾本理論書。這幾年來作家們總是讀了些書了，但為甚麼有些人還是寫不出作品來？如果說，思想進步了，他就可以寫出作品，那為甚麼這七、八年來，作家的思想進步了，而還是寫不出作品呢？我認為世界觀對創作的影響有一部份是間接的曲折的，可是過去我們恰恰忽略了這一點。領導把理論與創作之間的關係看得過於簡單化，因此領導的方式就必定會是生硬的，反過來又影響了創作的發展。。。。。。

作家常常埋怨批評家給創作制定了不少清規戒律，但文藝批評所受的清規戒律何嘗就少呢？幾年來我寫的文章很少，但就這一點點經驗來說，也不難體會到寫批評文章之難！不能粗暴，不能諷刺，不能說俏皮話，要照顧到權威，要照顧到大作家，要照顧到新生力量，要照顧到領導首長，要照顧到老先生，要照顧到統戰，要考慮將來政策轉變時為自己留退步。腦子裡這樣許多「照顧」，許多「考慮」，於是自己的主意越來越少。文章力求委婉，力求面面俱到，力求不致引起別人的反駁。許多重複了不知千百次的，為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則，也不妨假定讀者有「百讀不厭」的精神再來一次重複。肯定之後，必須來一個「但是」，否定之後必須來一個解釋。文字上力求多加一些「在一定條件下」，「在某種程度內」等等。。。。。。

以前我寫文章，好不好是另一個問題，但寫起來，心情有舒暢之感，現在我寫文章，往往是為了完成任務，時間又催得緊，以至有些文章，連自己也不滿意。

《人民日報》8月14日登了一篇《打碎黃藥眠的賣藥葫蘆》，其中說：這裡所謂「以前」者，解放前之謂也。沒有共產黨領導的那年頭，對他真是「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不要說「百般顧慮」，那真是一點顧慮也沒有，自由得很。他所謂的「影響了創作的發展」的根源，一找，就找到了「領導思想」。

北師大中文系文藝理論組編寫，登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57年第2期上的《黃藥眠的文藝思想是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全文2萬多字，詳述了他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作家的思想改造，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等方面「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這些也是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反對。

戲劇家吳祖光可以說是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他的性格，他才不管你「言者有罪，聞者不戒」哩！5月31日，他在文聯第二次整風座談會上說：

文藝界的「鳴」「放」之後，陳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亂」，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實上早已亂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為了平亂。我活到40歲了，從沒有看到像這幾年這樣亂過。遇見的人都是怨氣沖天，不論意見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論是黨員或非黨員，領導或被領導，都是怨氣沖天，這說明了「亂」。黨中央提出整風是為了平亂，使今後能走上合理髮展的道路。過去從來沒有像這樣「是非不分」，「職責不清」，年青的

領導年老的，外行領導內行，無能領導有能，最有群眾基礎的黨脫離了群眾。這不是亂，甚麼才是亂？

解放後有一個現象，那就是組織的力量非常龐大，依靠組織，服從組織分配，已成為人民生活起碼的道德標準。組織和個人是對立的，組織力量龐大，個人力量就減少。過去作家藝術家都是個人奮鬥出來的，依靠組織的很少。馬思聰之成為馬思聰是他個人苦學苦練的結果。現在一切「依靠組織」，結果，變成了「依賴組織」。個人努力就成了個人英雄主義。

作家，演員，長期不演不寫，不作工作，在舊社會這樣便會餓死，今天的組織制度卻允許照樣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做了工作的會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聽說一個文工團的團長寫了一個劇本，其中寫了一個反麵人物，結果受了批評，把立的功也給撤銷了。鼓勵不勞而食，鼓勵懶惰，這就是組織制度的惡果。解放後我沒有看到甚麼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領導捧一捧就可以成為傑作，這也是組織制度。

組織力量把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排擠完了。我們的戲改幹部很有能耐，能把幾萬個戲變成幾十個戲。行政領導看戲，稍有不悅，藝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聲照應，四海風從。這是因為黨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愛戴。但是聲望應起好的作用，現在卻起了壞的作用。過去搞藝術的有競爭，不競爭就不能生存。你這樣作，我偏不這樣作，各有獨特之處。現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處處如此。北京是《白蛇傳》，《十五貫》，於是全國都是《白蛇傳》，《十五貫》。

我感覺黨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會有影響，因之作為中央的文藝領導就更要慎重，小心。當然，不可能有永遠正確的人，有些作家藝術家兼任行政領導，他們自己也口口聲聲說不願作，但是作官還是有癮，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眾看法等都不一樣，所以有些作家，他們打心裏還是願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藝術家原是朋友，但現在卻成了上下級了。

組織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電影工作搞得這麼壞，我相信電影局的每一個導演，演員都可以站出來，對任何片子不負責任，因為一切都是領導決定的。甚至每一個藝術處理，劇本修改。。。。。。也都是按領導意圖作出來的。一個劇本修改十幾遍，最後反不如初稿，這是常事。

吳祖光說過文藝工作又對肅反提了意見：「肅反是搞重了，面搞寬了，北大，戲曲學校。。。。。。都很嚴重。肅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對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肅反中卻狠狠地斗了他。這是不公平的。如電影局，在肅反時，有位同志被鬥，她的愛人因之便和別人離了婚，後來證明她是被鬥錯了，結果卻拆散了人家的夫妻。」

吳祖光還發表文章〈談戲劇工作的領導問題〉：

我們誰都會談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可是他在培養文學藝術人材這方面表現了甚麼呢？對於解放以來，工，農，兵的每一條戰線上都是人材輩出，蓬勃前進，而文藝戰線上獨獨新人寥落的具體現象我們又該如何具體解釋呢？

解放以後的新社會產生了新的生活習慣，這種新的生活習慣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覺到這種制度可以叫做組織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國人民的力量組織起來的結果，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是就文學藝術的角度看，我以為組織力量的空前龐大使個人力量相對減少了。

從黨中央提出黨內整風以來，在這短短的時期內，僅從報紙雜誌上看到的一些被壓制，被埋沒的人材的事實就足以使人觸目驚心。我們今天的生活制度由於組織一切包干的結果，竟使

不勞而食成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而恰巧有許多辛勤勞動出來的作品反而受到無情棍棒亂敲亂打，於是索性不寫不做反而落得平安無事。可惜的是藝術家們和剝削階級不同，他們對於不勞而食並不認為是幸福，而認為是恥辱與痛苦。

「服從組織分配」在革命鬥爭當中，在軍事行動當中，我想它應當是屬於鐵的紀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們文藝園地裡施行組織分配的辦法就使人很難理解了。無論如何，寫作，演唱總是屬於個人的行動，一個口齒不清的人總不能由於集體力量，大家幫忙而能使他變得伶牙利齒起來，但是在我們的工作當中，由於萬能的組織分配的結果，卻是甚麼顛倒因果，亂點鴛鴦的事情都做得出來。我想在文藝工作的安排上，「組織分配」決不能絕對化。如果「組織分配」只佔五分（而且是經過深思熟慮，公平合理的分配），自願也佔五分的話，事情便會變得好一些的。所謂「組織」亦就是指的領導。領導的權限無限擴展的結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為是。從主觀主義開始，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必然接踵而來。從文藝工作說來，誰都懂得「為人民服務」的道理，但是今天無數的藝術團體的領導，偏偏就從不估計人民群眾的需要，認為群眾渾噩無知。對群眾需要的東西，用無數清規戒律斬盡殺絕，把群眾不喜愛的東西塞給群眾作為對群眾進行教育。

我們的傳統戲曲藝術有著悠久的歷史，我們的優秀的表演藝術家們代代相傳，每一個都身懷絕技。作為新文藝工作者得到與民間藝人合作的機會正應該好好地抓住機會向他們學習一下，但是絕大多數的同志們卻是頭指氣使，發號施令，還沒有摸到傳統藝術的規律，便神氣活現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國的傳統戲曲節目之豐富是盡人皆知的，但是這些年來把擁有幾萬出戲的古典戲曲生生擠兌得只剩下寥寥幾出戲在舞台上苟延殘喘，這種大殺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驚佩。「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真是這些戲改幹部的活活寫照。

對於文藝工作者的「領導」又有甚麼必要呢？誰能告訴我，過去是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和莫裡哀的？

他劃為右派份子是不可挪移的，對他的這些無可反駁的金玉良言進行批判，自然儘是些由衷的和不由衷的胡說八道，不值一提。倒是他的妻子新鳳霞不為「領導」的威脅利誘所屈服，把愛情堅持下來，被傳為一段佳話。這是他、她，兒輩和家庭的驕傲，這是右派份子、知識份子的驕傲，這是美好人性的僅存碩果！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化部劉副部長逼她離婚，她堅持不離，一心要等吳祖光回來。

「你能等多久？」

「王寶川等薛平貴等了 18 年，我能等 28 年！」

吳祖光「改正」後，仍是在公開場合仗義執言。1988 年 4 月 5 日在全國政協小組會上，吳祖光以《要信任知識份子》為題作了發言：

新中國成立以後，進入 50 年代，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逐漸發生了變化。對《紅樓夢研究》，對《武訓傳》，對「胡風」的批判一步步轉入政治問題的範疇。到 1957 年的反右鬥爭，以號召向黨提意見為名而向數十萬響應號召提出各種意見的知識份子進行了殘酷的政治迫害，罪名提到反革命的高度，迫使千家萬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八個字可不是空洞的詞句啊！對於所有右派，都是血淚深仇），成為歷史上罕見的人間悲劇，儘管在幾十年後大部得到「平反」和「改正」，但巨大的創傷卻是永遠難以彌補的。而發生在 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卻又是從迫害知識份子開始，十年浩劫，幾乎使國家民族瀕於毀滅。。。。。。再三再四殘酷踐踏中國知識份子的尊嚴以至生命，真是使人痛心，使人傷心。。。。。。

中國的歷史可以說明，知識份子是我建設國家的主要力量。秦始皇焚書坑儒，不過二世而亡。漢高祖也知道「馬上得天下」卻不能「馬上治天下」。宋太祖治天下也得依靠半部《論語》。到了近代，推翻滿清政府的國民黨人孫中山先生和他的大批戰友，壯烈犧牲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絕大部份都是知識份子。再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哪一個不是知識份子？古今中外一切的生活現實都得出仇視知識份子的結論。

「寫戲的不滿，演戲的火更大。在不得不服從指揮棒轉了數年之後，中國京劇一團團長李萬春終於有了說話的機會：『中國戲劇本來就是人情法理、善惡因果的社會反映，是好的教育，是寓教育於社會人生的，也是促使改變不善的人心。凡一詞一句，經過了文學家審慎的堅定，一排一演，經過了許多藝術家設計指導。如此而成為劇，流傳數百年……這是它的價值，也是中國戲劇的歷史光榮。』『中國劇的重點反映「忠奸功罪」四個字，當然離不開帝王將相、富貴貧賤。也有呼帝王萬歲，那是表徵實情事實，何謂封建以及資產階級？要以這是「封建餘毒」，那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皆是封建餘毒。』」（轉引自《陽謀》頁173）

不管話說得直接了當還是委婉曲折，你仔細看吧，筆鋒都是指向黨天下，指向毛澤東思想，指向〈講話〉。在文藝創作中，也出現了一批離經叛道的「寫真實」，「干預生活」，揭露陰暗面，反對「三害」的右派作品。著名的有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姚文元批判道：「他用自己反黨的眼光把陳立棟醜化了，他恨陳立棟執行黨的指示，所以他把陳立棟醜化成一個沒有任何優點的人。作者在竭力假造出這樣的一個公式：執行黨的指示=官僚主義=獨斷獨行=教條主義和黨八股。同其他右派一樣，他在這裡攻擊的不是官僚主義，而是黨的領導。作者把黃佳英當作英雄的先進人物來表現的，在黃佳英身上寄托了他反對『官僚主義』的全部理想。然而黃佳英是怎麼樣一個人呢？那是一個被美化了的『反現狀』的個人主義者。但儘管作者想把她寫成娜斯嘉型的人，在劉賓雁的筆下，在階級鬥爭十分尖銳的中國，黃佳英卻不是娜斯嘉，而是反黨的個人主義者。」「整個報社的氣氛十分暗淡。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如同一塊大石一樣壓在每一個人的頭上。總編輯陳立棟。。。。。。是一個壓制任何合理的政見的獨斷獨行的專制主義者。。。。。。作者帶著深刻的嘲諷描繪這一切。」（73）

南有姚文元，北有李希凡。李希凡在《從〈本報內部消息〉開始的一股創作上的逆流》中說：「絕不能低估《本報內部消息》在一部份青年中的影響，尤其是在有著濃厚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青年中間，黃佳英起了極大的煽動作用。在反右鬥爭中，很多青年右派份子，正是披著黃佳英的外衣出現在群眾的面前。。。。。。難道林希翎之流不正是劉賓雁的黃佳英的模特兒嗎？。。。。。。早在劉賓雁的第一篇特寫《在橋樑工地上》裡，就已經流露了陰暗的反黨思想，如把老幹部寫成不學無術，思想僵化，不能領導複雜的現代化工業的人，誣蔑我國建設進度緩慢，並武斷地說我們建設中的缺點不是由於缺乏建設經驗等複雜的原因造成的，根源好像全在領導上的保守無能等。不過，這篇特寫的缺點究竟還非常隱蔽，劉賓雁在當時也不敢露骨地大膽地宣傳他的反動思想。只有在他的〈在橋樑工地上〉發表，並受到《文藝報》，《人民日報》等大肆吹捧以後，劉賓雁才敢寫《本報內部消息》這樣露骨的反動作品。自從這篇作品又受到某些報刊的讚揚以後，所謂『揭露生活的陰暗面』，和歌頌黃佳英之流的『青年勇士』的作品，就大量出現了。《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裡的林震，實際上是黃佳英的男性翻版。」（《中國青年報》9，17）

李希凡批判王蒙抨擊北京某中共區委機關官僚主義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認為「這種官僚主義滿天飛的。。。。。。黨的區委會，在離開中央較遠的地區。。。。。。還有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這是不能相信的。」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有些同志批評王蒙說他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寫得不真實，中央附近不該有官

僚主義。我認為這個觀點不對，我們要反過來問：為甚麼中央附近不會產生官僚主義呢？中央內部也產生壞人嘛！」（李文見《文匯報》，2，9，毛談話於2，16。）狗比主人狂吠的調門高，純屬正常現象。

青年詩人流沙河寫了一篇散文詩〈草木篇〉，遭受到圍剿。批判者對詩中寫了「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的籐是罵共產黨員和積極份子，說是對「人類歷史上最民主最先進制度的污蔑」。（原詩是：他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爬，爬……終於把花掛在樹梢，丁香纏死了，砍作柴燒了。他倒在地上，喘著氣，窺視著另一株樹……）說詩中的梅花把自己給了冬天的白雪，被批為「變天思想」，盼望國民黨捲土重來。（原詩：在姐姐妹妹裡，她的愛情來得最遲。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誘蝴蝶的時候，她卻把自己悄悄地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輕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別的花不配被白雪撫愛一樣。在姐姐妹妹裡，他笑得最晚，笑得最美麗。）「有的文章說〈草木篇〉是極少數不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分子感到一個階級滅亡，充滿了沒落的情緒，要唧唧唔唔地為舊社會的滅亡唱輓歌！」本省文聯一位領導說：「我一看見〈草木篇〉就想起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對這種反動腐朽的東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嘗不可！」（《文匯報》5月16日）根據我的記憶，好像傳達的毛講話是說，作者與共產黨有殺父之仇，一有機會就〈草木篇〉。《草木篇》中的其他篇章是：

《白楊》：她，一柄綠光閃閃的長劍，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藍天。也許，一場暴風會把它連根拔去。但，縱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誰彎一彎！

《仙人掌》：她不想用鮮花向主人獻媚，遍身佩上刺刀。主人把它逐出花園，也不給水喝。在野地裡。在沙漠中，她活著，繁殖著兒女……

《毒菌》：在陽光照不到的河畔，他出現了。白天，用美麗的綠衣，黑夜，用暗綠的磷火。誘惑人類。然而，連三歲的孩子也不去採它。因為，媽媽說過，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對《草木篇》也有另一種評價。6月4日，在四川文聯舉行的座談會上，張默生教授提出「詩無達詁」。何劍董教授說道：「我認為，《草木篇》反映了一部份知識份子在歷史運動，尤其是在肅反運動以後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的情緒。《草木篇》所反映的那種現實是存在的。尤其在肅反運動以後，一部份知識份子，是懷著一定的痛苦，失望，甚至恐怖的情緒的。」但這些人們，也大都劃了右派。

開封師院（即解放前的和現在的河南大學）的「蘇聯文學」教授李白鳳，在《人民文學》（7月號）上發表「寫給詩人們的公開信」中說：「我感覺到詩歌的創作被限制在如此狹窄的領域裡，詩人們替自己限定了寫作範圍，就在這樣的小天地裡迴旋著。你們，從你們中間最優秀的詩人裡選定不那麼太多的詩歌的寫作方法，把它看成衡量一切詩歌的尺度，有時甚至很少考慮到文學史上曾經不斷出現的一些現象——風格的多樣化，像希臘神話故事裡的柏魯克拉士那樣，把一切詩歌都放到自己的床上，加以『拉長』或『截短』。」他還引用馬克思的話，反對壓抑寫作的創造性和獨特的個人風格：「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著甚麼事物，卻只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誰能說這樣的見解不切中肯綮呢？但他卻因此劃了極右派。我和他在一個農場勞動教養，受盡迫害折磨、勞困飢餓。一次，我們去貼標語：「高舉三面紅旗奮勇前進！」「大躍進萬歲！」……他端著半碗糲糊跟在後面，當要用糲糊粘的時候，發現他快把糲糊喝光了。我們急中生智，又給碗裡續了些水，把標語「胡弄」在牆上。隨後被風刮掉，雖然心裏害怕，但又奈之何呢？可見，即便是像他這樣的大詩人，文人學士，在久餓之下，肚裡也就沒有詩意，甚至連人格尊嚴的資料也沒有了。1962年解除勞動教養歸家，

要說無業也有業，死前的職業是拉板車。可他在農場時，有時還要向我們數說他當年的「威風」：「柳亞子、臧克家拍著我的肩膀，『白鳳、白鳳』的；無話不談。」

雜文以其鋒利深刻，最適宜於反映事物的時代變化，人物的知情意行，而且可收短平快的效果，所以許多報刊都發表了廣受歡迎的雜文，而且有的設了專欄，如《中國青年報》的「辣椒」，《河南日報》的「蒺藜草」等。在鳴放中的雜文，論質論量，首推徐懋庸。他有很高的馬列水平，我們在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時，都學習他的文章《矛盾論在思想改造中的應用》。在他的雜文中，被用得得心應手，文筆流暢，意蘊深長，以馬列之矛，攻馬列之盾，揭出人人心中有之之社會弊端，讀後令人驚，令人喜，令人思。他出手很快，短期內即寫有上百篇。姚文元就其中兩篇，《不要怕不民主》和《苦悶》進行批判：

徐懋庸之流高喊「不怕黑暗」，「揭露黑暗面」的人，卻把我們社會說成似乎沒有「民主」，要「享受民主」，就要向「官僚主義者」爭取。徐懋庸的腦子裡，其實是裝滿了資產階級民主，他所要「享受」的，是一種不要集中的絕對民主。「我們就不能等到他們自己放手」，這「我們」和「他們」，就表示在根本立場上他是把自己同各級領導幹部（他們當然可能有某些缺點）處於對立地位，同黨的領導處於對立地位，既然「他們」不肯「自動放手」，那就只有「鬥爭」了。於是，當社會上右派猖狂進攻，「言論一放，意見紛紛」之時，徐懋庸也就挺身出來作右派的喉舌，他大呼「這是好現象」，「現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會的苦悶」，「苦悶多極了」。怎麼擺脫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整個「社會的苦悶」呢？就是要在社會主義思想之外「生出更好的思想來」。這「更好的思想」是甚麼？。。。。。。我們在某些「揭露陰暗面」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不就是徐懋庸所推銷的反對領導，反對民主集中制的「更好的思想」嗎？（74）

徐仲年在鳴放中發表了雜文《烏「晝」啼》。反響很大，不光文筆好，切反映了知識份子當時所焦心的一種真實存在。摘抄如下，以供今人觀賞。

烏「晝」啼

烏鳳和鳴葉元龍教授在上海市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鳳鳴」與「烏鳴」的問題。「鳳鳴」指的是「報喜」，「烏鳴」指的是「報憂」。葉先生勸共產黨黨員：鳳鳴要聽，烏鳴也要聽；尤其不要因為不喜歡烏鴉叫，當烏鳴的時候，就一槍開去。因為一槍開去，烏鴉固然沒法再鳴，可是連鳳凰也嚇得不敢開腔了！我不知道從何年何月起，烏鴉變成了「不吉利」的動物。我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用過考證功夫，因此作不出結論。不過可以肯定：1 烏鴉是益鳥，——向人「報喜」的喜鵲反而是害鳥；2 古人以為烏鴉是能「報喜」的（可查：「樂府古題要解」中關於「烏夜啼」的解釋）。一般人以為鳳凰是很美麗的鳥，其實不然！它是：「鱗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頤雞喙，五色備舉」（「說文」），實在沒有甚麼好看！何況還有假鳳凰，為數相當的多！因此對於鳳凰和烏鴉的估價，應當辯證地看。能夠烏鳳和鳴，那是最好的好事！我摹仿「烏夜啼」，作「烏晝啼」。是否提防獵人的槍？不在考慮之內！毛毛雨下個不停和風細雨……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因此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用不著大張旗鼓，只須和風細雨就夠了。在原則上，這是對的。然也要看具體情況，不該以不變應萬變！毛毛雨下個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爛，棉不結鈴。田初濕時是軟的，容水過度就會變硬。「清明時節雨紛紛」，尚且要：「路上行人慾斷魂」；不幸而淫雨一半載，老百姓就得餓死不少！和風細雨自有他的妙處，但迅雷烈風也有掃蕩陰靈之功！某些時候，錯誤嚴重，態度頑強：那就用得著迅雷烈風了；在這種情況下，和風細雨不足以息民憤！尤其不希望對自己和風細雨，對人迅雷烈風；對黨外人士要求自我的批評，

對黨內人士則要求批評別人！我聽了許多代表所反映的內容，有些事真令人髮指！小民主解決小偏差，大錯誤就得用大民主來糾正，正如對症下藥，有些病該用霸藥來治。小論帶坑臭有那麼一種說法：舊知識份子在舊社會裏生活得久了，難免有股「帶坑臭」！話是對的。但是有一點，我不太明白：據我所知道，共產黨黨員不是從太上老君的八卦爐裡煉出來，確確實實也是從舊社會中來的。那麼，在他們的身上，難道就沒有一絲一毫的臭氣麼？有人說：他們早就參加了革命，不論是「地下」或「地上」，因此他們身上的臭氣早已拍掉了：這就叫做「發展觀點」！我回答道：承教了！發展觀點是唯物史的基本原則據我所瞭解，所謂：「發展」有「縱」的發展（時間上的發展）和「橫」的發展（空間上的發展）：二者缺一就不行的。「帶坑臭」這項帽子只往舊知識份子的頭上戴，而且幾乎在任何運動中，對於知識份子的「評定」都是斷章取義，不問發展，不問聯繫，——要不然只追究「壞的」聯繫，——這樣就造成了：我發展，你不發展的嚴重偏差！於是高牆聳立起來了，嗚呼！（原載《文匯報》1957年6月18日，略有刪節）

由於此文遭受到張春橋潑婦罵街式的批判，遂使此文更形轟動，以至毛澤東也曾給予「垂青」（見《毛澤東選集》第五集頁446）。張春橋寫道：「烏鴉」徐仲年，曾對「烏鴉」做過一番高深的考證。考證的結果，認為「可以肯定」：「烏鴉」是「益鳥」，而且能「報喜」。。。。。。為了「學習怎樣研究分析」，我倒要給徐仲年的考證，試作一點粗淺不堪的註釋。注曰：「烏鴉」徐仲年，系政治動物，在台灣「四大家族」的屋簷下，華爾街老闆們的園裡。。。。。。均有「益鳥」之譽，「烏『晝』啼」者，向主子們「報喜」也。。。。。。「烏鴉」又是「食腐肉」為生的動物。根據我們的常識，哪裏發生戰爭或饑荒，哪裏就有「烏鴉」盛集，斜飛怪叫，以搶食死屍的腐肉為樂。因此，在「烏鴉」身上，「臭氣」沖天，令人掩鼻。也許就是這個緣故，在勞動人民的心目中，「烏鴉」便成為「不吉利」的「害鳥」。（徐仲年身為「烏鴉」，居然說「不知道從何年何月起，烏鴉變成了『不吉利』的動物」，足見「烏鴉」還是一種善於撒謊的動物。）證之徐仲年，他把共產黨比作「牛鬼蛇神」，比作「閻王殿上戴著『一見生財』的帽子的活寶」，深仇大恨，不共戴天，切齒之聲，發自內心。而徐仲年畢竟是個「知識份子」，不像葛佩琦「少將」那樣的「武藝高強」，動輒喊「殺共產黨人」。但是，這又恰好顯出了「烏鴉」的本性，他既要不勞而「食」，只好和葛佩琦「少將」來一個分工：你去殺人，我來啃死屍。論殺人，葛佩琦當然不如蔣介石。那麼，甚麼是「烏鴉」的「發展」「觀點」？也就「昭然若揭」的了。「烏鴉」就是這樣無恥，這樣狠毒的動物。社會主義時代，勞動人民的天下，決不許「烏鴉」猖狂！徐仲年如果甘心永遠做「烏鴉」，那末，「烏鴉」的命運就是這樣：自取滅亡！

人民日報，9月4日載，《丁玲的夥伴李又然的老友江峰的手足吳祖光的知心艾青長期奔走於反動集團之間》。我這裡單單是介紹報「揭露」的，艾青是「吳祖光的知心」：

艾青和吳祖光在一起是「無話不說」的。在吳祖光面前，他誣蔑黨內陰森恐怖，說「黨內沒有民主」，「黨內沒有溫暖」，並說：「你不是黨員還好點」，「黨是無情的，專整人。」他向吳祖光表示：後悔入黨，入了黨不自由。還說：「入黨有啥好處，入了黨還不是被人家指著鼻子罵。」……。艾青甚至在黨的會議上，也散佈「黨內做人難」，「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等荒謬言論。

人民日報，9月24日載，徐遲的文章《艾青能不能為社會主義歌唱？》。批判艾青及其詩作《黃鳥》等：

這些年來，艾青的情緒是非常陰暗的。由於犯過錯誤受到黨的處分，他認為自己是處在逆境之中了。但是，和丁玲一樣，他也經常把外國出版的他的翻譯詩集和關於他的詩論文集捧來捧去給人看，並以之作為處於逆境中的安慰以及對黨驕傲的資本。

《黃鳥》一詩是作於 1953 年，發表於去年 8 月 26 日《北京日報》，內容是：喜鵲怒了，向黃鳥挑戰似的衝去……黃鳥飛走了……喜鵲佔領了樹枝……小麻雀跳到他身邊，流露諂媚的神氣。喜鵲對小麻雀說，「她長得怪模怪樣，歌聲裡有妖氣，我們雖然吱吱喳喳，說起話來卻有條有理」。小麻雀說：「對，對，對」……很久很久沒有聲音……微風……黃鳥又在歌唱了。

這是首諷刺寓言詩。無論如何是在諷刺甚麼人的。艾青顯然自比為黃鳥，那麼喜鵲和小麻雀呢？倒要問問他指的是誰？

《養花人的夢》講一個人只養月季花，養了幾百種。夜裡他夢見牡丹、睡蓮、牽牛、石榴、白蘭等花來訴苦，石榴說：「冷淡裡面就含有輕蔑」，仙人掌說：「只愛溫順的人，本身是軟弱的；而我們卻具有倔強的靈魂。」最後所有的花都說：「能被理解就是幸福。」

月季花說，其實她們也很寂寞。[大陸直連看禁書禁聞禁文禁網禁片禁歌禁曲](#)

養花的人從夢中醒來了，感慨起來，不滿於自己的偏愛，說「我自己也越來越覺得世界太狹窄了」。這句話實際上就是說詩人覺得他很不自由。這是艾青的「草木篇」。其惡毒不亞於劉沙河的。

《蟬的歌》寫一只八哥，聽蟬早晨就「知了知了」唱早晨的歌，中午還「知了知了」唱熱的讚美詩；傍晚唱夕陽，夜晚唱月亮也是同一的「知了知了」的歌，八哥說：「我一聽你的歌，就厭煩極了，原因就是它沒有變化；沒有變化，再好的歌也會叫人厭煩的。你的不肯休息，已使我害怕，明天我要搬家了。」

這篇寓言裡，艾青對我們的詩歌的估價，和右派份子李白鳳的「狹隘的領域」等說法豈不一樣？而「明天要搬家」則又和流沙河相似，不知艾青要搬到甚麼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去！艾青忽然也愛上了寓言這形式。這和馮雪峰的寓言，和臭名遠揚的流沙河的草木篇等，是形式內容上，思想感情上都十分一致的。

「艾青是一位詩人，去年七八月裡他忽然寫起寓言了。寓言這種文藝形式，在過去反動統治的時代裡，作家受著壓迫不能暢所欲言地直接表現個人的思想，往往取這種借物寓意，指桑罵槐的表現形式，去諷刺打擊反動的壞東西，但艾青的諷刺對象卻是正面的新事物。」這是臧克家著文《艾青的近作表現了些甚麼？》，對艾青的大批判。《養花人的夢》，「這篇寓言等於一篇宣言，鮮明地表現了艾青對『百花齊放』方針的惡意諷嘲。艾青首先諷刺了那位院子裡『種了幾百棵月季花』的養花人，說他的『院子裡呈現出了一種單調的熱鬧』。於是，在艾青的筆下，出現了『自尊』的牡丹，『冷淡裡就含有輕蔑』的石榴，『能體會性格美』的白蘭，『帶來了信念』的迎春，說著『只愛溫順的人，本身就是軟弱的，而我們卻具有倔強的靈魂』的仙人掌。。。。。。他的思想，他的情緒，表現了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主導力量的不滿，對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藝工農兵方向的抵觸。他覺得月季花雖然『專寵』，但『實在寂寞』。艾青對我們的新社會制度（月季花就是它的象徵）是不滿意的。他覺得它『太單調了』，『太窄狹了』。對於各種各樣的花他付以最大的熱情。他讚美她們的『輕蔑』，『性格的美』，『倔強的靈魂』。。。。。。而為她們不『被理解』而憤憤不平。艾青不是站在黨的立場，社會主義的立場，對於一切非工人階級思想的東西去進行鬥爭，說服，反倒以極度熱情去鼓吹資產階級思想化身的東西向社會主義制度進攻。艾青近兩年來，由於政治熱情的衰退，由於遠遠的脫離群眾，由於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情感的濃重，他對於新社會的事物，不但不感興趣，有時發生抵觸情感。最近被揭露的他的反黨言行，就是他寫這類反社會主義作品的根源。」（《文藝學習》1957 年第 10 期）

這個詩人藏克家，在大鳴大放時期，在人民日報（5月3日）上發表了一篇雜文《六親不認》。望題而知其要寫「新社會」的人情炎涼。他在後來寫的反悔之作《從交心談起》中說：「這篇文章寫作的目的，是想提出同志之間情感交流，心和心交通的問題。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許多人同情它，享受它。事後證明，這些人的思想情感都存在著問題。我當時只感覺到它的階級觀點不大對頭，決沒想到，在右派向黨進攻的時候，它被利用為射擊的子彈，起了嚴重的破敗作用，給黨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同志之間的情感交流，過去的確存在著一些問題，提出來商討是可以的。我的重大錯誤，是在把『友誼』的不能建立的原因說成『多半是由於氣候的關係』，把知識份子的不敢『熱情率真』的傾心，說成是由於幾年來的『一些運動』的關係。這顯然是歪曲了，誣蔑了政治運動的重大意義和它的成果。」我讀了那篇文章，特別是其中提到：許多朋友之間的促膝談心，都進入了檔案，成為肅反的材料。這在當時，於我心有感焉，至今思及，仍會出一身冷汗。這是中共，國家向人民施行的政治上，心理上的恐怖主義。大多數人是不得已而生活在恐怖之中的，藏克家則認為生活在恐怖之中是應該的，正常的，正確的，因為，「不講統一意志只談個人心情舒暢，不講批判清掃，只講甚麼話都講，這樣講友情，是純粹個人主義的，不但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講話，在這情況下交談出來的話是會不利於社會主義集體的。」根據藏克家這種認識，你若是他的好友，在私下與他交談中，如果被他發現你的話是「落後的」，他用毛主席的「六條標準」或鄧小平的「四項堅持」衡量之後，會不會打小報告，裝入你的檔案，在運動中整你或讓公安局抓你的「現行」？說實在話，與現在相比，那時候這個情況可是嚴重地存在的，甚至這個問題存在於夫妻之間。所以他寫的《六親不認》反映了客觀的真實和主觀的良心，而《從交心談起》卻是曲意奉承的昧良心之談。何謂「統一意志」？領袖意志也。如果他不是昧著良心，怎能在文革之後，毛的罪惡已經非常昭彰，大白於天下時還要興風作浪掀起一陣陣擁毛熱？擁毛個甚麼勁兒？是擁他鎮壓了幾百萬「反革命」，「右派」，餓死了幾千萬老百姓，迫害絕大多數「老幹部——走資派」？還是他禍國殃民把中華民族推入瀕臨崩潰的邊緣？藏克家擁毛熱是不遺餘力的，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當然不能指望他對艾青態度公平了，連良心都昧了還講甚麼「公平」？如果誰不知道「洗腦」或「思想改造」是甚麼玩藝兒，臧克家這個模特兒告訴你：就是泯滅良心，泯滅得越多改造得越好，喪盡天良就改造徹底了。但任何人都不能喪盡天良，所以便有「活到老，改造到老，臨死還有三分沒有改造好」的說法。

多數隻能做到昧良心，昧良心還是有良心的，只是昧著而已。這裡，為中國民主運動提出一個重大的「啟昧」課題。民運的一個迷思是認為只要把毛，共令人髮指的罪惡讓世人皆知，把民主，自由，人權的理念讓國人皆知，然後由曠世英雄登高一呼，群起響應，揭竿而起，風起雲湧，一桿到底，大功告成。事實並沒有這麼羅漫蒂克，相反，已具備上述要素的留學生卻仍粉飾罪惡，歌功頌德，甚至有民運人士回國助其建造防火牆，以助紂為虐，為虎作倀。探其因果，實乃昧良心所致。相對而言，宗教雖也受中共打壓，但仍能屢壓不衰，其原因就在於它在搞靈魂工程。我說的「啟昧」就是促其良心發現，也是靈魂工程。這一點，是民運要在自己原有軌道上再吸收宗教（如法輪功的「真善忍」）的成功經驗之處。反右派運動，唯「心」而論，便是一次昧良心運動，所以在運動中能稱得起左派而不昧良心者，未之有也。對被劃為毒草的從維熙的小說《並不愉快的故事》，老舍在《北京文藝》上著文時竟說：「從維熙寫《並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動農民造反。」（75）可見，連老舍也必須作昧心之談。

北京日報記者、從維熙的夫人張滬，16歲參加革命，因提意見：「五一勞動節搞大規模慶祝，實屬勞民傷財」，和在辦公室寫陶行知式打油詩：「大老倌坐小汽車，小老倌坐大汽車，沒車坐的吃灰。」成為夫妻右派，受到嚴酷懲處。（詳見《走向混沌》）

被批判的名篇還有：鄧友梅的《在懸崖上》；張賢亮的《大風歌》；被姚文元批為「明顯地看到這種修正主義思潮影響」的「具體作品」宗璞的《紅豆》，李國之的《改選》等；徐遲的相聲《開會迷》；公劉，邵燕祥的詩；丁聰，廖冰兄，李濱聲，沉同衡，王復羊等的漫畫……

在鳴放中還出現了巨量的漫畫，諷刺小品，詩歌（還包括古雅的填詞，下裡巴人的打油詩，快板），見報的有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的《花叢小語》，自稱是小說，反映的問題是北京新修的馬路質量太壞，到處翻漿。文章說：「盡說美帝政治腐敗，那裏要真有這樣事，納稅人民就要起來叫喊，局長總工程師當不成，市長下度競選就有困難！我國的人民總是最好說話的。你想！沿途到處翻漿，損失有多麼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總是人民！」這篇「小說」的開頭，他填了一首《賀新郎百花齊放頌》：

「綠盡枝頭薛。怎當他春寒料峭，雨聲淒切？記得梅花開獨早，珠蕾卻曾迸裂！盼處士杳無消息。桃李臨風連影擺，怯輕寒羞把嫩芽茁。靜悄悄，微言絕。忽來司命護花節。乘回風撥開霾氣，宇清如沕。人間烏煙瘴氣事，一霎熏銷燼滅。翻激濺芬香洋溢。好鳥百花叢裡翠，這當兒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在文藝界，聲望顯赫的右派要數丁玲和馮雪峰。很多回憶反右的文章，都把這歸結為是由於周揚與他們的宗派鬥爭，並且揭示出許多寶貴的第一手材料。說明這是確鑿可信的。但是，許多人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現在又有新的出土文物：

周揚是按名單抓右派

一九五七年，文藝界的許多著名人士被打成「右派份子」，每隔兩三天便有轟動效應。當時主其事者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第一副部長、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周揚。後來文藝界對周揚自然是怨氣聲聲、怒氣沖沖。「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共產黨的老幹部中，陸定一和周揚是大徹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揚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大聲呼喊，為平反冤、假、錯案也出力甚多，但當年的「右派份子」對他在一九五七年的所作所為仍不能原諒。七十年代的「右派」如丁玲等人後來變成了「左派」，而八十年代的周揚在反自由化運動中卻變成了「右派」，前者對後者依然耿耿於懷。

周揚是代人受過。

我曾聽到周揚透露文藝界反右派的一個重要情節，公諸於眾，以存史實。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周揚是我所在的第三組的召集人。那時他已有七十好幾了，而且因患肺癌動過大手術，主持會議，帶頭髮言，卻未嘗懈怠。有一天，他沒有來。次日，問以故。他說參加（馮）雪峰的追悼會去了。他一進靈堂就痛哭流涕，見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對故人」。

我們小組有人直率地問：「那麼當年你怎麼下得了手呢？」

周揚這才說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匯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不知內情，誰能聽得懂？

周揚是有自我批評精神的，他說：「在中宣部，陸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沒有主席的這個名單，恐怕也好不了多少。」

以前只知道按「指標」抓右派，居然還有按「名單」抓右派！

有人問：「這個名單是哪裏來的？」周揚說不知道。

有幾位自作聰明的同志說：「一定是江青那個壞女人提供的。」

我說：「不一定。江青不過是看家狗一條！」後來審判江青時，果然她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叫我咬誰就咬誰。」

我相信周揚的為人，但所說的這件事沒有證據。我私下對周揚說：「這叫死無對證。」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會懷疑他推卸責任。

他說：「你去看看一九五八年一月份的《文藝報》。」

我有印象，說：「好像專門登了幾位作家在延安時代寫的作品。」

「那就是為了為了翻老賬。你再仔細看看『編者按語』，是不是主席的話？」

我把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的《文藝報》第二期找了出來，「編者按語」的題目叫做《再批判》。確實，那口氣非毛莫屬，印證了周揚所說的情節。

後來我又從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內部發行）第七冊找到了這個「編者按語」，那就是鐵證了。註解中說：「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文藝報》準備在第二期出一個特輯。《文藝報》擬的按語，毛澤東不甚滿意，改寫和加寫了許多段落。」

《再批判》的全文如下（[……]中的文字就是毛澤東改寫和加寫的段落）：

「[再批判甚麼呢？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艾青的《瞭解作家，尊重作家》，還有別的幾篇。上舉各篇都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主持這個副刊的，是丁玲、陳企霞。]丁玲的小說《在醫院中時》，是在一九四一年發表在延安的文藝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題為《在醫院中》，在重慶的《文藝陣地》上重新發表。

「王實味、丁玲、蕭軍的文章，當時曾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做反共宣傳的材料，在白區大量印發。蕭軍、羅烽等人，當時和丁玲、陳企霞勾結在一起，從事反黨活動。丁玲、陳企霞等人在此後的若干年中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活動，成為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

「[丁玲、陳企霞、羅烽、艾青是黨員。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她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她當了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羅烽、艾青在敵人監獄裡也有過自首行為。

「[這些文章是反黨反人民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戰爭處於艱苦的時期，國民黨又起勁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發表以後，立即引起普遍的義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藝界，針對這些反黨言論展開了嚴正的批判。十五年前的那一場鬥爭，當時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記憶猶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藝界展開了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鬥爭和批判。許多同志在文章和發言裡，重新提起了他們十五年前發表出來的。一批毒草。

「[一九五七年，《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其他文章沒有重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許多人想重讀這一批『奇文』。我們把這些東西蒐集起來全部重讀一遍，果然有些奇處。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鼻子靈的一眼就能識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騙。外國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許想要瞭解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們重新全部發表了這一批文章。』」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這兩句陶淵明的《移居》詩，從此就有了新的含義。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賞」，經批判家們「疑義相與析」，必定是「毒草」，對作者則發出「打倒」的信號。故流行的成語詞典都要特別註明：「現常用於貶義」。隱逸世外的陶淵明，決沒有想到他的詩句會成為毛澤東進行階級鬥爭的武器。請繼續看「編者按語」：

「[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開通起來，天真爛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許多世事。]

「為了幫助讀者理解這些文章對於我們有些甚麼教育作用，毒草何以變成肥料，我們發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張光年、馬鐵丁、嚴文井、馮至同志的六篇文章，而把每一個批判對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後面。當然，這個批判還是不夠的。我們希望文藝界利用這個材料，在各地的文藝刊物上發表深刻的批判文章，給讀者以更多的幫助。」

馬鐵丁是郭小川。上述六位批判別人的人，後來也遭到批判，有的被打倒甚至受迫害至死。

丁玲、陳企霞早在反右之前已被打成「反黨集團」，「再批判」之後又加上「右派份子」帽子。（郭羅基《動向》2003年11月號）

上面就是我說的「其二」，下面我再來把「其一」說一下：

簡單說來，可以說是一言而盡。周揚作為丁玲的頂頭上司對她進行宗派鬥爭，無中生有，栽贓陷害，把她和陳企霞打成「丁陳反黨集團」。

複雜起來，又可以說是一言難盡。他把馮雪峰也拉進「丁陳反黨集團」來，把時間追述到30年代。詳情可參看參與處理此事的當事人、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的回憶錄《我參與丁、陳「反黨小集團」案處理經過》（〈炎黃春秋〉1993年3月號）和《不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以及機關黨委副書記兼作協機關黨總支書記黎辛的回憶錄《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一期）從他們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共產黨內部勾心鬥角的鬥爭是多麼殘酷無情！是多麼喪良昧心！是多麼漆黑一團！甚麼狗屁「左」呀，「右」呀的！看看李之璉是怎麼說的？——「對揭發的問題無限上綱是『左』；無中生有的，顛倒是非的，就不只是『左』了。因為處理每個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這個主持人如果經常說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無定見，或以個人好惡來認定是非，或感情衝動……他就不可能處理人的是非曲直。」周揚具體主持處理「丁陳」案件是如此；毛澤東總體主持處理一切案件也莫不如此。把剛到延安的丁玲誇成一朵花的是毛澤東，有詩《臨江仙》為證：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今日又把丁玲親手打成右派的，還是這個毛澤東：「去年下半年，文藝界展開了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鬥爭和批判……。重新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廣大人民的教員。」

要說丁玲「右」，可大大地冤枉了她，直到「改正」後，她還聲稱《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是對毛的獻媚，而且自作多情地慶幸毛沒對她落井下石，其實毛對她是「推井下石」。不過，《三八節有感》倒可以說是她思想上民主底色的最後閃現。

同樣，馮雪峰也是周揚搞宗派主義的受害者，不過，變受害者為「害人者」，這種顛倒是非乃是共產黨內政治運作的常規。共產黨總是把事情搞得與事實適得其反；請看，宗派主義受害者馮雪峰迫不得已所作的檢討：「我對於周揚同志等，在 1933 年的時候，已經形成宗派主義的成見。1933 年底我離開了上海，1936 年 4 月底回上海時聽了胡風、周文等人的一面之詞，立刻又加深了我的宗派主義的看法。因此，我沒有事先同周揚同志等商量，而倒是聽了胡風的意見，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這首先是違背了黨的組織原則的做法，是撇開了黨的做法，是我的反黨行為。1936 年 7 月至 9 月之間，我的宗派主義、狂妄自大、我個人就是黨的那種最惡劣的態度和作風，發展到極端的地步。我竟至於懷疑周揚同志等，要調開周揚同志和停止黨團活動，都沒有成功，我就從外面對周揚同志等加以打擊，也就是對上海黨組織加以打擊，這就是魯迅先生的《答徐懋庸的信》和我以呂克玉筆名寫的那篇文章。這是我給同志以宗派主義的打擊和違背黨組織原則的反黨行為登峰造極的表現。」（9 月 4 日在作協黨組擴大會第 25 次會議上的檢討）他這個老布爾甚維克本可以不必自己誣蔑自己，而讓周恩來、張聞天等當時作此決策的領導人出面作證，自會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但他卻捨此途而取給自己身上潑污水的「下策」，足見他已看穿了黨和領導人，以及黨的任何「組織原則」，而對之不抱任何希望了。他不是一般的說假話，而是整個顛倒了「是」和「非」。這樣做只是為了苟且偷生。如果誰責備他這樣做法「可羞恥」，還不如說，一個參加過共產黨打腫臉充胖子的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的高級知識份子的下場實在是「可悲可歎」。至於「兩個口號」之爭，一方是魯迅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另一方是周揚、夏衍等提出的「國防文學」，這已廣為人知，無需我再來贅述。

正如所有「運動」，都是一場競賽。共產黨的所有運動，上前就是比賽「誰在昧良心上表現得更無恥」？四大不要臉之首的郭沫若在會上批判道：「20 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藝戰線，鬧出兩個文藝口號之爭，完全是馮雪峰在作怪，今天被揭發了，而他卻把責任全推到魯迅身上去了。」（人民日報，9 月 28 日）魯迅之妻（準確說是妾）猛地站起，對馮雪峰怒氣沖沖地說：「馮雪峰，看你把魯迅搞成甚麼樣子了？！騙子！你是一個大騙子！」（黎辛《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第 78 頁）。對這樣一個當年深受魯迅本人信任，如今年高德劭，令世人敬重的文學家，她竟能潑婦罵街似的用如此污言穢語大張撻伐，實在是令人無法設想！無奈，她這是一貫的，她曾前此也利慾熏心地對遭受文字獄大禍的胡風，也是昧於事實，落井下石：「魯迅愛人民，胡風反黨反人民。劃清界限，胡風絕無絲毫似魯迅。胡風只不過是魯迅的叛徒。」（《文藝報》1956 年 2 月號）如果她作為愛徒和愛妾，真的就是魯迅的傳人，也就是說，魯迅跟她是一路貨，那麼，我們對人們廣為存在的下述疑問：「先生若在世，當在反右運動中作何表現？」倒可以察知一二了。

在對丁玲的批判中，瑪拉沁夫在出賣靈魂方面，決不在許廣平面前示弱。在所有對丁玲的栽贓陷害中之一，是說她曾提倡過「一本書主義」：「一個人只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他不倒，有一本書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事實並非如此，她是這樣對青年作家說的：「作為一個作家，首先是要寫出書來，有作品；一本書也寫不出來，還算甚麼作家呢？」前後兩種說法，意思迥然相反。瑪拉沁夫是清楚明白這一點的，但他卻要以她的學生的身份，來作「公雞能下蛋」的「親眼見」的見證人。他在《文藝報》第 22 期發表文章《清除靈魂裡的垃圾》，賣師求榮道：「據說，前年批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時，她不服氣，申辯自己沒說過『一本書主義』這五個字，其實問題不在於是否說過這五個字，而在於丁玲是否有這種思想。記得丁玲在 1954 年左右，突然到處強調作家最主要的是寫出來作品來，寫出好作品來。初聽起來，或從字面上看來，這句話本來沒有甚麼錯誤，但是一次、再次老是聽她講這句話時，就使人感覺到這句話還摻雜著旁的一些情緒。（我也是老師出身，要是碰上你這號惡意地從雞蛋裡挑骨頭的學生，老師還怎樣開口？還怎樣打發日子？——紫丹）……她給

我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在她發表作品以前，請也頻參加甚麼聚會時，請柬上總是寫『也頻先生及其夫人』，她說，一看見這幾個字就生氣，她說不當別人的附屬物，因而拒絕出席。後來當她發表了作品，轟動了文壇，出了名時，那些過去瞧不起她的人，都開始向她巴結了，新聞記者們也蜂擁而來，要求拜見，可她以拒絕會見來給以報復。有一天，忽聽有人扣她家門，她開門一看，原來又是那些記者，於是她只說一句『我對你們說過，我不接見你們』，便『啪』的把門一關，把他們頂了回去。在舊社會，拒絕那些庸俗無聊的新聞記者的訪問，並不是甚麼值得指責的事。在這裡我引了她這段話，是說在 30 年後的今天，丁玲對前去拜訪她的青年作者們，津津有味地大談這些話，不能說是『不過隨便談談而已』。這話裡顯然包含著這樣意思：當你一旦寫出好作品來，身價即刻提高百倍，腰板也就硬了。將這話再與最近報刊上揭發的丁玲所說的『一個人只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不倒你』以及她對許廣平先生所說：『你現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甚麼呢？寫東西才是自己的。』等等言論聯繫起來，就不是一般的『家常話』了。」從這裡可以體察到極權社會的師生關係是多麼令人毛骨悚然！同時也透露出，許廣平也沒放過在丁玲身上爭取立功的大好機會。人呀人！「壞」的甜頭，勾引人在「施壞」中互相廝殺、你死我活。這對男女，一個在施壞中爬到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另一個更高：全國人大常委、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文聯副主席都當上了。經我加上這一結尾，文章才算言之有物，放矢有的：《清除靈魂裡的垃圾》

但是，你壞他壞，千壞萬壞，任誰也比不過總壞根毛澤東更壞。他以一貫的潑皮無賴、蠻橫惡霸、鐵石心腸、窮兇極惡的刀筆，宣判了馮雪峰的死刑。馮雪峰任《文藝報》主編時，據說「壓制」了「小人物」李希凡、藍翎批判「權威作家」俞平伯對《紅樓夢》研究的文章，毛澤東借題發揮，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其他有關人員寫了一封信，說：「這是 30 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 30 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毛澤東選集，五卷，頁 134）袁水拍聞風而動，1954 年 10 月 28 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質問〈文藝報〉編者》：「〈文藝報〉在這裡跟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名人有密切聯繫，跟馬克思主義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卻疏遠得很，這難道不是顯然的嗎？」（據《1957 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說，這句話是毛澤東在審稿時加上去的；以下毛批馮的話，也是引自本書，頁 363：）

馮雪峰挨了批評，就在 1954 年 11 月 4 日人民日報發表《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從毛澤東對這篇檢討作的一些批語可以看出他對馮的意見有多麼大了。例如，馮在檢討中說：「我犯了這個錯誤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長期地統治著的事實，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沒有認識這個事實和它的嚴重性。」這裡「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顯然是從毛澤東的原信中引來的。毛批道：「限於古典文學嗎？應說從來就很注意很有認識，嗅覺很靈。」毛的原信中有這樣一句：「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馮即據以檢討說：「我對於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失去了敏銳的感覺，把自己麻痺起來，事實上做了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的俘虜」，毛批道：「一點沒有失去，敏感得很。」馮檢討說：「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資產階級泥潭裡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馮的檢討裡說他自己「不自覺地在心底裡存在著輕視新生力量的意識」，毛批：「應說自覺的。不是潛在的，而是用各種方法向馬克思主義作堅決鬥爭。」

經殺人毛王這樣不講情理地一「批」，馮在政治上還有活路嗎？毛真是個狠心賊，鐵石心腸。說起「鐵石心腸」，平常人就根本想像不出毛鐵石心腸得一點也不近人情。當毛岸英在朝鮮被美機炸死的時候，他對兒媳封鎖消息二年半。這期間，兒媳逢上週末或節假日，往往要到他這裡來。他和她幽默風趣地談著「岸英，岸英」的，甚至拿「岸英」開玩笑、斗樂子，好像岸英還活在人間。為父的一絲也流露不出愛子已死的氣息，為妻的一毫也覺察不出丈夫已命歸黃泉，兩人談笑風生，摟抱撫摸，其樂融融。尤有甚者，他們的作派曾為江青撞見，後者便像倒了醋瓶似的罵出最難聽的話，並採取防範措施，通過侍衛長，吊銷了兒媳的中南海特別出入證，使公爹與兒媳的過從，中斷一時。像毛澤東這種人，對自己的妻兒都能這樣禽獸般地無恥，鐵石般地冷酷，那就別怪他對親密戰友劉少奇、林彪那般絕情了；更別提對一般老戰友、老幹部了；當然馮雪峰這樣的「革命」知識份子就更不在話下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特別是資產階級右派，自然是都有「可殺之罪」。只是「殺了不利」才讓他們作為賤民，得以苟延殘喘，苟且偷生，或者生不如死，或者饑餒、勞累、折磨而死。當然，如「殺了有利」，則格殺勿論。

二，右派言論初評

關於右派言論已經寫了這麼多，但仍只是如前所說「掛一漏萬」。在世界共運史上，從來也沒有人像右派們那樣，翻箱倒櫃，把毛澤東、共產黨的醜惡和罪惡作如此廣泛、系統、深刻的揭露。當然不是說，從此以後共產黨的謊言再無市場了，相反，有些中共用以騙人的謊言，至今仍有許多人聚集於其旗下，就像蒼蠅聚集在中國農村露天廁所起鬩那樣，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不停。

以殺氣騰騰而聞名的右派，1938年加入中共的老布爾甚維克葛佩琦先生，早已說得斬釘截鐵，一清二楚：「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以上言論登在5月31日的人民日報上，6月5日第二次報導他「繼續發表反共言論」：「。。。。。。群眾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複一遍，群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道路，總有那麼一天。」後面這段話不是和陳雲等發出的「亡黨亡國」的警告一樣嗎？只是右派有言在先就是了。我所以列出如上的右派言論，就是要證明，現在很多人的「英明見解」，右派早已有言在先，右派曾進言克服的弊端，從健全法制到取消黨天下，每個字都不止值右派的一顆人頭。今天的人們只有接力下去，從57大鳴大放，到59廬山風雨、到60年代燕山夜話、到76四五運動、到79民主牆、到86自由化、到89六四、到20世紀末以來海外民運、國內維權、法輪功修煉者維護真善忍、直到現在追求共和的黃花崗精神光照大陸。試看目前形勢：風吹樹、風滿樓、前仆後繼，風起雲湧；指日可待：揭竿而起、立竿見影、鏗而不捨，一桿到底！我們將以完成共和大業告慰孫中山、儲安平、王炳章之夙願；同時也庶幾乎不負林昭、劉奇弟、馮元春之青春血、少年頭。

第一，誰敢太崇頭上動土？唯我資產階級右派

知識份子作為人民的代言人，在政治，經濟，法律，外交，學術思想，科學，技術，教育，人口，社會，新聞，出版，文學，藝術等等方面，不僅大破共產黨的倒行逆施，而且在正確診斷的基礎上提供了許多療救的治國良言。

「難道『殺共產黨人』一類的話也是良言嗎？」正如當時另一個右派所作的辯解：「葛佩琦說『殺共產黨人』，他並沒有真殺，也不是說今天就殺，而是說如果繼續腐敗下去，總有一天會發展到這一步。」我們今天來看，多少省部級（還有更高職位的國家領導人），司局級，縣處級。。。。。。越往下自然是數量越大的貪腐幹部被殺！難道這些被殺的幹部不是「共產黨人」而是「國民黨人」嗎？當年葛佩琦只是發一通憤激之言，可萬萬估計不到真的會殺這麼多的共產黨人！更估計不到：「民以為少也。」群眾說：「全部槍斃，可能有冤狂的，隔一個槍斃一個，就會有漏網的。」這班兒替死鬼向毛澤東訴苦道：「你老人家當年要是聽了右派的話，怎麼能發展到如今無官不貪，形成制度性，結構性腐敗呢？你看殺的這些共產黨人官位多高，數量多大呀！幸虧你的傳人，江核心採取『該保就保』的政策，否則。。。。。」說他們是替死鬼，決不是想像出的比喻，而真的是替死鬼。他們既是被「黨天下」害死的，又是作為「黨天下」的替罪羊而死的。有一天，黨天下因多行不義，惡貫滿盈，終將會由歷史法庭審判，驗明正身，給它的頭上打個「X」號而立即執行的。右派的每篇言論都是遞上去的狀紙，其中對罪魁禍首毛澤東本人的指控，也為毛生前歷次運動所僅見。——誰敢太崇頭上動土？唯我資產階級右派。

儲安平反對「黨天下」的意見，在題目上就點著「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名字，是直接提給「老和尚」的。

曾彥修先生在鳴放會上直接斥責：「出版工作去搞些沒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為了規定《毛選》在全國同一天發行的組織工作花了不少力氣，實在是無聊。」

王尊一先生鳴放的題目是《「三害」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有理有據地提出質問：「那麼我們根除『三害』是不是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掘一下呢？」而且在6月12日的《陝西日報》上更載有他的大聲疾呼：「我要向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呼籲：1，開放政權，建立一個真正的人民民主國家；真正給人民以思想言論的自由，解放人類個性；3，把民主的尺度放寬些，給人民以真實的民主生活；4，我要求毛主席，我要求你走下你的寶座，深入農村，看看農民的生活情況。」

在獄中，林昭給人民日報的信中寫道：「長期以來，當然是為了更有利於維護你們的極權統治與愚民政策，也是出於嚴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雙重影響下的深刻奴性，你們把毛澤東當作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竭盡一切努力在黨內外將他加以神化，運用了一切美好辭藻的總匯和正確概念的集合，把他裝扮成獨一無二的偶像，扶植人們對他的個人迷信。」

肯定是：對著毛「有人說，這是陰謀。」否則，毛何需詭辯：「我們說，這是陽謀。」呢？九三學社副秘書長李毅說，北京也還有許多人顧慮重重。歸根結底，都是怕打擊報復。他們說：鳴，放三部曲，一放，一收，三整。「誘故深入，聚而殲之。」他希望，領導上應從政治上，組織上作出進一步的保障，希望毛主席撐腰，公開講講不准打擊報復。（人民日報5月21日）他當然不知道毛澤東已決定要打擊報復，但這在客觀上是將了毛的軍，戳穿了他的陰謀花招，主觀上也提醒人們要防患於未然。上面提到的王毅齋在會上的發言，曾說過：「毛主席的威信是否太高了？」

林希翎說：「在胡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中，張中曉對毛主席的延安座談會的報告做了批判，是否惹主席大怒了，冒犯了。」人民大學歷史系講師許征帆批判林希翎道：「她又一口咬定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之所以被逮捕，是因為他們竟敢於批判《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句話就是把我們敬愛的領袖，勾畫為胸襟狹窄，意氣用事，無法無天的『小人』。」

這還不夠狠毒嗎？對毛主席進行這種人身攻擊，我們是絕不能容忍的。」（〈教學研究〉1957年第7期）問題是，這些所謂「人身攻擊」，是否恰好符合事實呢？

對毛一手製造的胡風冤案，張百生說：「胡風及胡風集團是反革命分子嗎？根據前些時候公諸於世的材料看來，說他們是反革命分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偶語者棄世』的做法，仁人志士誰還敢開口！這樣只能堵塞言路，助長『三大主義』，葬送革命。胡風問題已過了兩年，為甚麼還不公開審判？我們要求黨中央如果打對了就立即公開審判，如果打錯了就馬上開釋，並恢復其名譽。」

馮元春當時是四川大學生物系四年級女學生，她與當時的學生辯論過一個題目：《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者、共產黨是三大主義武裝的最巧妙最殘酷的剝削集團》。馮元春主要提出了幾個有意義的問題。第一是高饒事件。她認為，根據已發表的材料觀察，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馮元春說：「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嗎？這不是出於個人崇拜，還會是甚麼？」馮元春的觀點是，高饒沒有反人民，他也沒有和暴力集團聯繫，而毛主席卻以暴力逮捕他，這是違反憲法的。報上公佈高饒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婦女，但為甚麼被侮辱的婦女卻沒有提出控訴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錯誤，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對於胡風事件，馮元春也提出了自己的懷疑。她認為，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風的根據是：1、反黨。2、上書二十萬言。3、組織反革命集團。馮元春說：「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甚麼胡風上書二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馮元春還指出，毛澤東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馮元春針對當時中國社會現實指出：「共產黨這個剝削集團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她認為，那些平時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他們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上是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對於當時共產黨的特權，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論」，以及對黨外人士的打擊，馮元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別是在當時的環境下，她能看出歷史的真象，這對於人們認識當時社會具啟蒙作用。她講了一件事。她說：「我校湯教授，為人忠誠，是個忠於客觀事實的自然科学家，就因為他愛提意見，在肅反中就認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會上進行鬥爭，說他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湯教授確是一個忠於事實的人，他曾經對我說，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於我國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這些足於說明美國生產力高。而剝削集團的宣傳機器卻歪曲事實宣傳說美國有多少工人失業，經濟危機又多麼嚴重。而湯教授忠於事實，卻受到迫害。」馮元春還對當時的外交政策一邊倒提出了意見，她說：「我們黨和毛主席沒有一點民族氣節。」

戴煌之所以劃右派，是由於反對對毛澤東的神化以及反對毛澤東要犧牲一半中國人進行世界革命的荒謬而反動的政治野心；這在前面已有詳細的論述。

陳銘樞對鄧小平左手捂，右手蓋的毛的品質，進行了揭批：「凡是舊創造者，執國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絕無偏見，明察秋毫，謹慎將事，精誠坦白，亦不裝假，豁達大度，為國家而不為名利。並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國華盛頓然。偉大的毛主席不是如華盛頓然，而是與德國的俾斯麥，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政治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難寧，察而不周，自然為黨見與感情所沸動，喜功好大，難以制止。。。。。。好好的一個優良的國家，純樸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鬥爭，三反五反，弄到中國八年來混亂不清，天天忙於鎮反肅反，已不成為國家政治。」「光榮的、偉大的毛主席，還沒有搞清楚歷史文化和本國的地位、民性的風格，硬去尊夷，鬧了一些甚麼總路線的新名詞，無產階級專政的甚麼經驗……這些多餘的新名詞，在愚民的蘇聯用得著，在文化高度的中國不會有人重視。」（76）屈武曾以《駁

斥陳銘樞給毛主席的信》為題發言道：「右派份子政治野心家陳銘樞，在今年5月28日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陳銘樞的這封信雖然不過三千來字，卻構成了一個十分完備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和行動綱領。他攻擊毛主席『好大喜功』，在個人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難寧，察而難周』，『輕信幹部的虛偽匯報與教條主義的分析方法，未經鄭重細緻的研究，即作過激的決定。』在察人聽言，決策定計方面缺乏『睿斷』，在政策措施上是『畸輕畸重，失緩失急』。陳銘樞說：『我深感於黨的領導諸同志，一般都缺乏個人師友的關係。。。。對人的精神生活，總不免於失之單調。。。。』陳銘樞在信裡向毛主席說：您所常接觸的黨外人士『仍多趨附之輩，耿耿不苟者實屬寥寥』至於能犯顏敢諫者，我尚未見其人。』他說：『建國後，黨化敵為友，對來自舊社會中某些人士的使用多從效用出發，少能兼及其品格與能力的遴選，不次拔擢，纍纍若若，闖茸滿目，修潔潛光，至於貪天功者有之，不虞之譽者有之，爭名獵位，祿畫充斥。我感到你有時尚不免為喜怒所乘。在一個浪潮下，輕易挫傷高級幹部的自尊心和他們固有的地位，同樣有時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際，俟隙混淆黑白，投其所好。俾斯麥曾對威廉第一說過：『對相隨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馬勳勞，縱有不肯，不忍也不能去之，繼起所說，新硎初試，必能割此癰疽』。」李濟深說：『陳銘樞是張牙舞爪，喪心病狂的右派野心家。他幾乎逢人就咬，醜詆擁護共產黨的民主人士，醜詆黨員，團員，甚至詆譭毛主席這樣不好那樣不好。。。。。（均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整風辦公室印，《揭露批判右派份子陳銘樞反動言行大會發言匯輯》，1957，12）吳茂蓀揭發陳銘樞用「好大喜功，喜怒無常，偏聽偏言，鄙夷舊的」四句話批評毛。『陳銘樞污蔑毛主席『好大喜功』，並要毛主席『更加深入體察，以求究竟』。他認為毛主席『過分鄙夷舊的』，『對古典文學尚有不尊重之處』。（內容重複者略。見人民日報，7，15）與陳銘樞相比，章伯鈞，羅隆的評價，就更一針見血了。『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流氓。』『毛主席這個人很厲害狡猾，比歷代統治人物都兇。』

章乃器曾說過：「不要神化任何個人。大家都是人，沒有哪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在鬥爭他的大會上，他還非常含蓄地指責毛澤東言而無信、自食其言。你可以查一查當年的《人民日報》，他反駁別人的批判時，往往引用「有人說」。雖然大家全都心知肚明，但還是有自作聰明的左派出來戳穿這層窗戶紙：「我知道，你說的『有人』是指『毛主席』！」毛說話不算話的不要臉的嘴臉昭然若揭。本來這個傻孩子不挑明，他娘偷養漢的事已經是明鋪夜蓋，一點也不偷了，但經傻孩子一說，還是平添了些許黑色的幽默，白色的尷尬。

清華大學一個署名「一個清華人」的，題為《我控拆，我抗議》的大字報，其中寫道：「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能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的這方面，是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這樣，從1949年以後殺了70多萬人民！（還不算一些自殺的呢）殺吧！把中國人殺絕吧！胡風哪一條子構成反革命分子的罪狀呢？還不是你將『莫須有』的罪名加在善良人們的身上！。。。。他要殺你時，還不用自己動手，還可以動員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臉不認你，親手殺你死！這是理性的社會乎？這就是毛澤東式的階級鬥爭啊！這就是我們時代的精神面貌啊！獨裁者，你們已經是殘暴成性了。在延安12點鐘一聲炮響，你殺了多少所謂可疑分子呢？這就是你們的所謂『純潔內部』，『三查』和『整風』啊！所謂甚麼聖地延安，王實味不過在《野百合花》中說了一聲大灶，中灶，小灶而挨整了。下落呢？不知道。抗大的學生他們在前線拚命，而你們在延安呢？花天酒地。甚麼窯洞生活，甚麼棗園清苦，抗大學生看到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事實後，在一個晚上打死了20多條豬吃掉了。而你們利用了『純潔內部』，活埋了多少人，這不是事實嗎？你們自己也發現這樣做會有根本的動盪時，你們的沒有人性的理論出來了：委屈是應該的，為了黨的利益委屈以至犧牲是光榮的。。。。有多少人死在自己人手裡，他們遭活埋了，他們遭自己

所依靠的和所相信的人活埋了。這就是『同志』的涵義呀！」（轉引自〈陽謀〉第 185—186 頁）矛頭直指毛澤東的批評，遠遠不止這些。

終篇：右派言論篇（六）

第二，認識反右，是認識歷次運動的鑰匙

現在已經是甚麼時代了？21 世紀了。可是中國仍在實行著最落後，最腐敗，人權記錄非常糟的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要想改變這個制度，須首先從變革共產黨的性質著手，讓黨內民主派佔上風；要變革共產黨，就要對共產黨有個透徹的瞭解；要瞭解共產黨，絕對首要的是先認透毛澤東，毛澤東是甚麼？毛澤東就是「運動」，「運動」就是毛澤東本質的展開式。你只要認透各個運動的性質，就認透了毛澤東。所以，認識運動和認識毛澤東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是一個彼此推動、相互深化的過程。例如，通過毛大殺 AB 團，認識到他「以殺人為兒戲」的陰險毒辣、兇殘的本性；在許良英（另大有人在）未認識到毛此一本性之前，對毛髮動反右，「使人感到昨天還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變了臉，不道德，連起碼的民主也沒有，太粗暴了」。（人民日報，7。29）

在所有運動中，最具典型性的是反右運動。反右運動中所揭出的問題，橫的方面涉及各個角落，各行各業，各門各類，縱的方面追蹤了現存問題的來龍去脈，從空間上包東西南北中，老（解放區）少（少數民族地區）邊（邊遠地區）山（山區）窮（未脫貧地區），從時間上包括從上世紀初一聲炮響到處理「小匈牙利事件」的數聲槍響，歷次運動的是是非非，而且，不僅針砭時弊，找到病源，同時還提出療救的設想。因而可以說，研究這個運動，就為瞭解中共，瞭解毛澤東，瞭解其他運動找到了一把鑰匙。例如，對於所謂「史無前例」，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你如果是不瞭解反右運動，那麼，你就只能看個「熱鬧」，你就不能看出「史無前例」不自當日始：反右派對 100 多萬知識份子下毒手，其數量、其殘酷、其反人類文明，不也是在世界史上「史無前例」嗎？同時你也看不出其中的「穴道」；更無從對共產黨的種種罪惡都一言以蔽之：全做到了「史無前例」，而達到這樣一種全面性的認識，以及其所以如此的本質性的認識。右派言論（不限於我的列舉）反映出對中共，對毛的認識與揭露的全面性，深刻性，不僅為中共歷次運動所無法企及，而且也為世界共運史中所絕無僅有。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教授把歷史和現實聯繫了起來，從她這裡我們就可以領略到，追憶和研究反右派運動所具有的現實意義。她就著她的右派同學林昭說：林昭的「冤」不僅僅屬於她個人，而屬於一切不甘為奴的人們；她所控訴的是殘酷地絞殺人性的現代奴隸制。

林昭是我的同代人，又是我的同鄉人。在上世紀 40 年代末那個改朝換代的日子裡，我們先後從同一所學校裡走出。我們都曾歡呼過新政權的建立，我們都曾對未來充滿著很多很多幻想。在以後的年月裡，殘酷的現實粉碎了林昭的幻想，她從短暫的狂熱中覺醒了。而我，卻繼續渾渾噩噩地做著用美麗謊言編織起來的「天國夢」，而且一夢就是三十年。

林昭是她那個時代的先知先覺者，也是共產中國最早的殉道者。林昭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屬於異端。他們殺害了林昭的肉體，還要封殺她的思想。

迫害林昭，以至整個的反右運動，共產黨所用手法，步驟，過程，邏輯及其思想內容，在在顯示出他已把看家的本領，吃奶的氣力，理虧耍賴的撒潑，蠻橫耍霸的狠毒，糟踏天理國法人情，破壞遊戲規則。。。。。。無所不用其極。在這裡，展示出毛澤東是一切歷史糟粕之集大成者。從此，有人是懾於無情鬥爭，殘酷打擊，有人奉逢拍馬，邀功請賞，都學會了昧著良心說假話。如果說反右之前，毛指鹿為馬還有很多人以為然，甚至有人拍案而起敢於大聲疾呼「不是！」而在反右之後，毛指王八蛋為馬也無人敢說半個「不」字，甚至動物學家會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來論證：馬有無角之馬，也有有角之馬，其角之長堪與鹿比者，往往令人誤以為鹿也。其實我可以用我的專業知識作證：實在是馬。這就是接踵而來的大躍進運

動，為甚麼會鬧出違反常識的畝產萬斤、土法煉鋼的大笑話？你有甚麼辦法？人家世界級大科學家錢學森以科學的數據確證可以畝產幾萬斤嘛！大躍進中，大干促大變，日夜連軸轉，寧掉十斤肉，也不落人後。誰要喊累叫苦就要掃他的暮氣。所謂「掃暮氣」，就是「辯論」他，就是「拔白旗」。如果你還不懂，你就拋開詞句去看現場，你會看到毛主席「群眾路線」的生動畫面：一個人站在中間，周圍的人對他推搡，擤鼻涕、吐唾沫，拳打腳踢，然後讓他頭頂一塊重石，跪在那裏認罪反省。這時我正在勞教，一個勞教人員告訴我，他縣的縣長體恤民力，被公安局長批為「白旗」，縣長被拳打腳踢而致傷殘。可氣憤的是，報紙上醫學家為大躍進寫的鼓氣文章，說人身上都有備用器官，比如說腎，人有兩個，但一個就夠了，即便用壞一個，人照活不誤。所以說人體蘊藏有巨量的「大躍進潛力」！

剛才，我說過，「無人敢說半個不字」。彭德懷不是說「不」了嗎？可彭是在肯定大躍進的前提下說「不」的，所以就不夠半個「不」字。就這，都不見容於毛，可見毛霸氣到何種程度！問題是，所有人，甚至柯慶施之流也知道彭是正確的，更別說劉少奇，周恩來。。。。。。了，為甚麼竟能作出決議定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呢？這只能說明共產黨是一個昧良心集團。昧良心使得在中國假戰勝真，錯戰勝對，野蠻戰勝文明，瘋狂戰勝良知……而且暢行無阻，無往而不順利。至於在文革中，彭的遭遇，老幹部的遭遇，地富反壞右，一切牛鬼蛇神的遭遇，都是慘不忍睹，有的場景不亞於「南京大屠殺」，在打砸搶抓抄下過日子，真的連亡國奴都不如。人怎麼能變成如此殘無人道？這就要聯繫到毛髮動的歷次運動，哪一次是人道的呢？特別是反右運動，《反擊右派不能溫情主義》，你作社論我轉載，全國反對溫情主義，黨內，黨外一視同仁。大詩人郭沫若在《人民日報》發表詩，反溫情：「右派猖狂蠢動時，溫情那許一絲絲！已將率土成公物，竟有麼魔倒大旗。毒草必須成糞壤，爭鳴方好詠新詩。勿忘二十年前事，起舞中宵共振衣。」把右派比作二十年前入侵中國的日本鬼子，當然都是死有餘辜。呼籲肅清溫情主義，在全國惡浪翻滾。9月16日《人民日報》載，史良在民盟全國整風工作會議上作報告，說：「現在基層還有不少右派份子沒有被揪出來。有些人說，別的地方有右派，我們單位中間不會有右派，用不著進行鬥爭。這種想法是十分有害的，也有一些人害怕打擊右派的面太廣，時間拖得太久，主張草率收兵。」她大聲疾呼：「必須認識，對右派份子姑惜寬容，對鬥爭採取旁觀或保留態度，就是右傾思想的表現。我們必須克服右傾思想，克服一切溫情主義，積極勇敢地投到戰鬥中去。」由於組成為反右運動一部份的反溫情主義，掃除了人們的溫情，郭沫若的兩個兒子在文革中遭慘害而慘死；人們，不管對誰下毒手都變得毫無心理障礙。郭沫若本人，一天到晚嚇得屁滾尿流，大概這個時候，他才能體會到，如果一個社會，「溫情那許一絲絲！」該是多麼恐怖！只要對反右派的問題弄通，觸類旁通，一通百通，鄧小平的反自由化，鎮壓「六四」，江澤民、胡錦濤的鎮壓異議人士，迫害法輪功，從目的的卑鄙性到手段的卑鄙性便成為一目瞭然的了。

在中國，儲安平、羅隆基最先指出「黨主」、「黨天下」；章伯鈞第一個看出毛是歷史上最大的流氓：徐璋本頭一個如此深刻地批判馬列主義；林昭第一個把共產黨政權定性為「極權」，「奴隸社會」，林希翎定性社會主義為封建主義；劉士弟、馮元春等右派發出為胡風翻案的最強音；劉賓雁、秦兆陽、劉沙河、王蒙等首破公式化概念化的堅冰，從文藝理論和創作實踐上反映陰暗面、干預生活；右派份子楊兆龍提出要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的建言，是振興中華民族的必由之路，是關係中國之命運的最佳選擇。它反映了中國法學家的學術良知，代表了當代中國法學界的最高水平（引自《讀〈滬上法治夢〉隨想》）；

……這當然不是說，右派的高度是不可超越的，但是必須說，研究反右派這一課是不可逾越的。逾越了，對於研究中國問題，對於推動中國的民主事業，便相似於小學生跳過加法學乘法。

北大教授錢理群著文《不容抹殺的思想遺產》，稱：「如果說『五四』新文化勝利了，從而開啟了中國思想文化，以至整個民族現代化的歷史新紀元；那麼，1957年的這一次悲壯的

努力，卻是以所有參加者的『一網打盡』而宣告失敗（這是為甚麼？想，大家想！我們不難看出其中主要差別是，一個發生在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時期，一個發生在毛澤東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或者說，一個在解放前，一個在解放後。這裡就凸現出「解放」的反動性與殘忍性。無怪香港人民拒絕解放，一定要「祖國」跟他定條約，保證資本主義制度 50 年不變，即，保證 50 年不「解放」，他才回歸祖國；也難怪台灣人民寧肯選擇他決非情願的「台獨」陳水扁當總統了。但是，我要說給台灣同胞：「獨」善其身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絕對唯一正確的道路是：兩岸攜起手來，推翻共產主義專制制度，重建三民主義民主制度，先民主，後統一。古人說過：「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紫丹注，下同），但他們的思想與精神卻事實上在 80 年代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與改革運動中得到延伸，儘管後者未必自覺意識與承認這一點。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當年提的問題與任務（主要是反「黨天下」），仍然是今天的改革者需要繼續解決與完成的，他們當年的思考今天依然保持著新鮮的生命活力，他們思考的成果，以及思考過程中可能有的不是與失誤，對於後來者，都是極其實貴的啟示，遺忘、不承認、漠視。拒絕這份浸透著鮮血的思想遺產，不僅愚蠢，而且有罪。——其實，那些《廣場》的犧牲者在光榮地倒下的那一刻就曾預言過『明天將屬於我們』的（譚天榮：《給沉澤宜》），他們毫不懷疑：「『五一九』和『五四』一樣，將明顯地留在我們弟弟妹妹腦海裡，永遠鼓舞著後來的年輕人」（譚天榮《救救心靈》——現在更應該「救救心靈」了！）。他們直接呼喚：『歷史學家們，重視這樣偉大深刻的社會思想變革吧！』（姚仁傑《黨啊！我們批評你，是真正的愛你！信任你！》）坦白地說，讀著這些帶血的期待的呼叫。我的心情沉重羞愧難言。因為我們真的長時間地（甚至直到今天——原注）把這些先驅者，犧牲者遺忘了！我們的歷史學家（也包括我自己——原注）失職、失責了！1957 年這段歷史的書寫，如此地蒼白、稀薄，如此地充滿迷誤，致使『後來的年輕人』（這正是先驅者所寄予希望的——原作者）無從瞭解也無法理解，這是我們每一個有良知的過來人、學者的恥辱啊！欠帳總是要償還的，為正在進行的『中國人與社會的改造』提供思想資源。——現在『是時候了！』（牛漢鄧九平主編：《思憶論叢——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

的確，現在「是時候了！」我即刻想到的，是 1957 年青年右派、學生領袖人物譚天榮提出的：「救救心靈！」共產黨、毛澤東倒行逆施，勞民傷財，惡性破壞生存環境，大量浪費物質資源，土躍進、洋躍進再加上毛為爭當世界霸主而支援亞非拉拋金如土，讓國人勒緊褲腰以至餓死，對於這種罄竹難書的罪惡，我們假定（只能假定）能「饒！」；對於共產黨毛澤東通過土改、剿匪反霸、抗美援朝、鎮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風、肅反、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反右傾、狂舉三面紅旗、四清、文化大革命等運動受迫害的數以億計，害死的數以千萬計。我們仍假定（假定就不是真的）能「饒！」但對於共產黨毛澤東把人心糟蹋得卑鄙無恥，虛偽狡詐，冷酷殘忍，同類相食，另一方面，只要能苟全性命，就可以昧著良心出賣父母親友；士可殺又可辱，人人拼比著自辱；有奶就是娘，見奶不認娘，為了奶抓住鼻子不顧腮；毛指著「鹿」，全國齊聲喊叫：「馬！」鄧理論又導致世風日下，笑貧不笑娼，官是貪官、吏是污吏、商是奸商、民是刁民；總之是要全國人人無恥、人人昧良心、人人變小人，才能讓共產黨的「千秋大業」穩定壓倒一切！而讓我民族以最惡劣的民族出現於世界之上，這才是應當千刀萬剮、罪不容誅的！而這話是在「殺人都可饒恕」的假定下，發出的傷心帶血的無奈。

「是時候了！」我們要從說出現實各個方面和歷次運動的罪惡真相做起，還原歷史；從「救救心靈」做起，喚起民眾。這就是消滅共產主義災難的實際步驟。我是林昭、譚天榮、沉宜澤的同齡人、同命人，被共產黨投進勞動教養和農村監督勞動共 22 年，在我一息尚存，定要決絕地實行錢理群教授倡導的——「我們應該有勇氣正視歷史的血腥氣，有膽識衝破權勢與習慣製造的種種障礙，以科學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收集原始材料，認真整理、研究先驅者的思想遺產，總結歷史經驗，建立起『1957 年學』，作為現在政治史、思想文化史、

知識份子心靈史……的重要組成部份。」為此工程添磚加瓦，直到最後一口氣，便是我死能瞑目的此生所求：上對得起林昭、儲安平們，中對得起我們這一代活人，下對得起後人。否則，我將死不瞑目。我活了這把年紀，深知「天下無易事」。更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憑費工夫。」所以我自然會知道，建立「1957年學」決不會一蹴而就，只有寄希望於「眾人拾柴火焰高」、「眾志成城」：有經歷的獻經歷，有資料的獻資料，有史識的獻史識，有使命感的獻一份心和力……總之是不要使青史入灰，更不要讓御用學者喝著右派的血滋養出紅潑潑的笑容以諂媚當今！

第三，認識反右，是民主運動的必修課

許良英教授在《我有責任讓世人瞭解王丹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一文中說：「他第一次找我是在1988年秋天。他當時只有19歲。已在北京大學政治系讀了一年，剛轉到歷史系，打算寫一部反右運動史，知道我：1957年因公開反對反右而被劃為『極右份子』；1986年11月與方勵之、劉賓雁三人聯合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因遭當局禁止未開成，隨後方、劉被開除黨籍），想同我討論如何寫反右運動史問題。我告訴他，反右運動很複雜，你年紀太輕，一時難以全面瞭解，等你歷史系畢業後再考慮也不遲。他接受了我的意見，並開始留意收集資料。」（王丹文集：《我們在寫歷史》第215頁）

王丹是個有心人，在《獄中回憶錄》中說：「在北大歷史系讀書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對中國共產黨1957年發動的『反右派運動』這段歷史發生了興趣並著手進行研究。我仔細閱讀了當年的《人民日報》和一些大批判小冊子，並採訪了一些當年的『右派』分子，比如方勵之先生的夫人李叔嫻老師和中國科學院的許良英教授，進而準備將這一段歷史作為我的專業主攻方向，廣泛蒐集資料，寫出一本全面反映『反右』運動全貌的著作來。這個工作同許多其他工作一樣，極為可惜地被『六四』的槍聲打斷了。

「現在在監獄裡，我有了充裕的時間結合有關資料，認真思考這個問題。我從家裏要來了一套《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參考資料選輯》，一共四本，是中國人民大學黨委下屬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辦公室編印，1957年12月出版發行的。裡面收錄了大量『反右』運動中的有關文件和批判文章，尤其珍貴的是，還有一本專門輯錄了所謂『右派份子』的言論及文章，比如章伯鈞關於所謂『政治設計院』的發言，儲安平關於『黨天下』的發言，吳祖光關於『黨不要插手文藝工作』的講話，中南財經學院教授楊時展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等。這些都是具有史料價值的資料，從中不難看出『反右』運動的概貌。為了加深印象，這厚厚四大本書共兩千五百頁的內容我都一字不差地出聲朗讀了一遍。這是我自己發明的學習方法。我發現出聲念一遍，其印象深刻的效果要遠遠大於默讀。從書中我看到，不少當時的『右派言論』與前幾年的所謂『自由化人士』提出的意見大同小異，有的甚至連措詞都一致，比如對新聞自由和創作自由的呼籲。這表明，三十年過去了，但是中共在政治民主方面仍舊徘徊不前，而人民卻為此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代價。從書中寫下的1957年的歷史，聯想到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的現實，看到歷史已進入20世紀，而我們仍然要為追求和捍衛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尊嚴與權利而付出代價，我不能不為中華民族的多災多難感到悲哀。1957年的歷史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歷史研究的禁區。但是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它的真實原貌寫出來，告訴人民災難是怎樣降臨到我們頭上的，告訴人民所有的苦難我們都不應淡忘。一個遺忘歷史的民族注定要被歷史拋棄。（第63—65頁）」

而今我謂王丹先生：

1，，從政治血緣上講，你接的是右派的第二棒。我是按鄧小平劃「代」的方法劃「棒」的。右派的第一棒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林昭，反對的是共產黨的第一代，毛澤東時代的極權暴政；第二棒是從「七九民主牆」魏京生等，中經資產階級自由化人士劉賓雁方勵之王

若望、馬建等，到「八九民運」你、劉曉波、胡平等，反對的是共產黨的第二代鄧小平、下接第三代江澤民的屠殺鎮壓、專制獨裁、貪污腐敗；與此同時，海外有王炳章等的「中國之春」運動。如果說，第一棒是由於「引蛇出洞」的話，那麼，右派的第二棒、第三棒任不寐、王怡、劉狄（不銹鋼老鼠）、練法輪功者等，則是由於官逼民反，捨逆來順受而主動出擊。共產黨的第三代江澤民是「逼」蛇出洞的。全世界公審江澤民以及「九評共產黨」引起全球性的反響，使共產黨嚐到了官逼民反的苦頭。有人認為，法輪功不是搞政治的，不好與 1957 年的右派生拉硬扯在一起。但我認為，從思想實質著眼，《九評共產黨》（其中滲透著《誰是新中國》的研究成果）與右派的鳴放言論有絕對的血緣關係，是一脈相承的。《九評》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如剛剛指出的，吸收了《誰是新中國》的很多研究成果；而《誰是新中國》又滲透了廣大大陸史學界歷史反思的勞績。這部書在海外和大陸的深遠影響，已使中共中央宣傳部夜不安枕，遂組織了一個叫「田雨」的御用寫作班子，無理光憑詭詐，蜀犬對日狂吠；其規格質量要求，就是農民對肥田的狗屎的要求：只求其臭，越臭越好。

這部巨著，正如我的評論所說：「最根本的是，從內容上講，《誰是新中國》是以翔實的史實、無可反駁的邏輯、精確無誤的語言、實事求是的態度、標示出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倡導的共和革命所創建的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專制復辟所帶來的舊中國』，從而使自己的立論立於不敗之地，從而也把中共永遠釘死在『開倒車的反對共和革命的專制復辟』之歷史恥辱柱上。」僅此重要的一點，就說明它的水平，超越了 1957 年的右派言論，展現了新的高度和深度。

當然，「棒」對「代」也不是那樣嚴絲合縫的，是錯綜的，王若望一枝筆橫掃三代獨裁。共產黨的第四代胡錦濤心狠手辣，不分青紅皂白地以黨性消滅人性，先不說他咬牙切齒地，不分「棒」地反西化，分化，自由化，即使對他的老上級趙紫陽，只因趙身上尚存的那份人性，就要使他受到終生軟禁，也只有在他死後，他女兒才得以說：「他終於自由了！」並且，第四代還要以「犯有嚴重錯誤」的定性讓趙帶進棺材裡。用歷史眼光看，「犯有嚴重錯誤」倒是趙紫陽的一份殊榮。另外，最近逝世的劉賓雁是 40 年代的老共產黨員，也該算是「團派人物」，死前以 80 高齡、身患絕症之軀，撫摸著胡錦濤的頭頂，向他請求落葉歸根，竟遭他裝聾作啞，冷酷拒絕！

至於右派的第三棒的接棒人，任不寐、王怡、不銹鋼老鼠、練法輪功者等，已初試鋒芒，勢不可擋，喜看如雨後春筍，萌發勃勃生機。第三棒的鬥爭內容，將較多地重複第一棒，這是由於，共產黨的第四代要更多地向第一代返祖，他從金正日身上發現了第一代的基因，所以號召要向金正日學「正宗」，學「提純」！許多人認不清第四代的真面目，說甚麼「胡溫新政」。「胡錦濤新思維」，寄予幻想。須知，新乃是與舊相比，與舊不同之處；豈不知這裡之所謂「新」，與「舊」不同處之處，正在於比「舊」還要舊。說怪，也不怪，胡錦濤先天不足：他在接觸共產黨之前，沒趕上蒙受西方自由主義和國內三民主義之熏陶；後天失調：他又未能如王丹、胡平等曾下工夫攻讀西方人文學說和 1957 年右派言論那樣，補上這一課，相反，他全盤接受的是非常濃重的極左毒素。滿肚子狼奶。他的經歷和學歷，決定了他視野的封閉性，除了目不轉睛盯著毛澤東思想，對這個東西情有獨鍾外，對其他是鮮知而又不樂知的。正因為如此，他才能「慧眼」識「英雄」，發出高論：「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朝鮮經濟雖然遇到暫時困難，（好輕鬆的「暫時困難」！中國為此餓死 1/20，朝鮮卻餓死 1/8！——紫丹）但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這就是他對你希望他搞「新政」的回答。難道世界上還有比胡錦濤「要學習」的，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榜樣——金正日的「政」，更「舊」的「政」，更反動、更流氓的「政」嗎？正如本篇起始所指出的，毛澤東曾撒下許多美麗的政治謊言，雖然純粹是偽善，但他們那一代人，

畢竟還知道甚麼是「真善」。而這些「真善」，胡錦濤根本就沒有接觸過，所以他才只認金正日！

中國的情況，直至今日，只用將王丹的話：「30年過去了，但是中共在政治民主方面仍舊徘徊不前，而人民卻為此而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代價。從書中寫下的1957年的歷史，聯想到我們親身經歷的1989年的現實，看到歷史已進入20世紀，而我們仍然要為追求和捍衛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尊嚴與權利而付出代價。我不能不為中華民族的多災多難感到悲哀。」中的「30年」改為「將近50年」，「20世紀」改為「21世紀」就行了。胡錦濤在刻舟求劍，舊地重遊，原地踏腳！

2，王丹在提到「右派」的時候，。從字裡行間可以嗅出他對右派的敬意，由於在共產黨的詞典裡，右派就是反動派。浸泡在共產文化裡的人自然會覺得右派這個詞太貶義了，因而他提到右派時是決不吝惜引號的。其實大可不必。讓我來說明一下對這個詞的民間理解。

低標準的時期，我正在勞動教養，又饑又累地抬著大筐在田間勞動，一個老農民（那時叫公社社員）喊著「賣紅薯咯！」偷偷摸摸地走來。我去買，他瞪我好久，問：「像你這樣文氣的一個人，怎麼進到這裡面了？」「我是右派。」他不說二或三，拿起兩塊紅薯就跟我手裡塞，邊說著「不要錢」。面對著我的驚異，他解釋道：「友派全是為了我們老百姓講話，是我們的朋友，比作蟲鳥，友派就是益蟲益鳥，左派就是害蟲害鳥。」。看來，據老百姓的理解，右派就是友派，右派就是人民的益友。所以我當右派，從來是自以為榮的，即便文革時掛著黑牌，我也覺得黑牌上「右派份子」四個字在閃閃發光。現在立志和獻身於民主事業的人們要學王丹從右派言論中汲取精神營養，接過這個民運的傳家寶。這可是不可或缺的一課啊！王丹誓言要把反右運動的全貌寫出來。我認為，這是一個有為青年的雄心壯志，它體現了孫中山先生說的「要立志做大事……」

「六四」之後，全國通緝王丹，媒體作踐王丹，我不知王丹是個甚麼樣的學生，後來有一次問及北大丁校長。原話記不住了，大意是，他要像媒體上說得那樣，北大學生會跟隨他嗎？他會有號召力嗎？我聽了之後，甚感欣慰。於今又甚為感慨，當年在學界「臭名昭著」的王丹，現在在國內已是無聲無臭；據章怡和說，現在民盟中央機關的人竟然有不知道章伯鈞是誰的；實在堪憂。共產黨在縱橫兩面封鎖信息，做得真叫絕。所以，為了不使青史入灰，不使每一代的鬥爭都從零做起，這是和共產黨作鬥爭並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方面和重要保證。

3，不說全國，也不說北京，單說北大就有許許多多的優秀大學生，為甚麼偏偏湧現出王丹作為學運的領袖呢？除了別的原因，如上所述，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樣，王丹便找到了學運，學運也找到了王丹。如果都能掌握右派對共產黨的認識，特別是掌握右派精神，那麼，民主運動定將展現新的局面。甚麼是右派精神？就是林昭精神，就是認識的真切，信仰的執著，靈魂的美好聖潔和生我所慾也，所慾有甚於生者，捨生而取義者也。她是和秋瑾一樣，與日月同輝，是我們的民族女英雄，是我民族精神的當代最高典範！我在書裡會對她的精神大加發揚的。我將把林昭與毛澤東作為中國人的兩個極端，說明中國人最好能夠好到甚麼樣，最壞能夠壞到啥程度？我這部書《還原1957》，上卷《這是陰謀》，下卷《較量正未有窮期》；可以說是一篇《中國右派宣言》。我決不會去理睬甚麼「主旋律」，也不會讓鄧小平對右派的定性捆住手腳，相反地我會，讓鄧小平的鬼話早點兒去見鬼吧！因為要是讓鄧為反右派定性，那就等於把秦香蓮的案子交陳世美處理，更正確地說，是把一件殺人的案子交給犯案的劊子手處理！相反，在下卷裡，反右劊子手鄧小平將同首犯、主謀毛澤東一起，坐在歷史法庭的被告席，接受審判。

我認為，右派的大鳴大放是世界共運史上空前絕後的壯舉。右派指著執政黨中共的鼻子進行批判，對中共執政以來各次運動所犯血腥罪行，和現行政策的各個方面，一一給予徹底揭露，控訴和清算；內容上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法制，外交，社會，人口，文學，藝術，科學，

教育，新聞，出版，廣播，體育，，宗教，醫療，衛生，學術，思想，總之是有關世界，國家，民族，政黨，自然，人文，工農商學兵的諸多方面的理論與實踐，應有盡有，無所不包；組織上，包括從中央毛澤東周恩來直到最基層的黨支部，黨小組的每個黨員，老和尚大和尚小和尚，可以說是一網打盡，無一由特權造成的為非作歹的惡行，能逃過人民的批判。

而這個「廣度」又是具有「高度」和「深度」的。

把一切的批判，一切的罪惡之源，歸結為「黨天下」。這是鳴放中的一件歷史偉績。半個世紀眼看就要過去了，「反對黨天下」仍是擺在全中國人民面前的一項嚴重的歷史使命！我所說的「接棒」，就是接的這個棒，一棒一棒地把「黨天下」送進歷史博物館。

就像王丹做的那樣，你也去「仔細閱讀」一下當時的右派言論，大概你也會為它的深度所折服。它不僅就著血淋淋的現象，進行道德譴責，也不是只指出問題，揭出弊端，而且是與世界民主潮流相接軌，條分縷析，闡明原理，按著政治學評政治，按著經濟學評經濟，按著法學評法制，按著教育學評教育，按著社會學評社會……可以說，他們代表了當時中國的最高水平，指出了糾正錯誤，擺正航向，擺脫災難的正確道路。怎奈他們面對外行領導內行的倒行逆施，充其量也只是發發憤慨而已矣！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他們是遇見了兵匪，而這個兵匪的名字，又同於趙樹理小說《三里灣》人物中的一個外號，叫做「常有理」，這樣一來，謬論戰勝了真理，野蠻戰勝了文明，老粗（愚昧）戰勝了老細（科學），專制戰勝了民主，……逐致史無前例的浩劫降臨中華大地。

如前已述，當然我並不認為右派的高度是不可逾越的，王炳章提出的「重建中華民國」就使「反對黨天下」目標明確，由破壞達到重建；同樣，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就使認識更進一步深化，深化了對歷史真相的認識，指明了重建的政治綱領；而實踐更為理論開創了道路，這就是國內的先知先覺們已經起而行動，在大陸重建中國國民黨！從邏輯上講，共產黨對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是否定了共和，復辟了專制；重建中華民國對共產黨也是否定，否定了專制，光復了共和。有人可能從「量」上指出中華民國 100 條缺點，但從「質」上講，不過是在「已被定性為民主這個質」上談論程度（即「多」與「少」）的問題；而共產極權制度，如果它的辯護士能夠編造出 100 條優點，也不能睜著眼睛把「民主」的「無」（大家，包括辯護士在內，都身受過這個「無」的滋味）說成「有」。讓我們的認識和實踐相輔相成，昂首併進，在重建共和，重建中國國民黨，重建大中華民國的道路上大踏步前進，一步一個腳印地得寸進尺吧！

第四，打倒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反動派

毛澤東陰魂一日不散，黨天下就一日不會完蛋。我們意識到的歷史使命，唯一的是打倒黨天下。只有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反動派才是民主的死敵，黨天下的拚死維護者。右派的本質，就是與黨天下不共戴天。而打倒黨天下，就要從驅散毛澤東的陰魂做起。

毛慣用的策略是「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和「分化瓦解，各個擊破」。體現在反右運動中，前者就是「引蛇出洞」，後者就是在各個單位搞左，中，右排隊，揪出占總人數 5-10% 的右派份子。在右派中還要分極右派，一般右派，中右，對於極右是置之死地而後快。這個事實，對於我們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毛澤東思想（包括策略思想）作為軟件已輸入進每個共產黨人（特別是幹部）的腦中，他們在與你打交道中就必然會施展出來，你如不設防，則必受其害。例如毛髮動文化大革命時提出「兩個 95%」：群眾和幹部中 95% 是好人，5% 是壞人。劉少奇是 5% 中之最壞者，是第一號走資派。但劉少奇在文革初期，卻將毛之故技重演。1966 年 6 月 11 日，劉少奇，鄧小平在文化革命匯報會上指示李雪峰，吳德，打右派學生「不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13 日，劉少奇批轉中南局和西北局《關於文化革命的情況和意見》，指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份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

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鬥爭和戴帽。」這和九年前毛反右派的自稱「陽謀」，一模一樣。劉少奇與毛朝夕相處還不能免於中他的陰謀，料不到毛會對他「請君入甕」。在毛一面是由於招數高，在劉一面是由於有利己害人之心。試想，如果不是黃鳥逮住螳螂，那麼螳螂將會用陰謀詭計，心狠手辣地捕捉蟬。毛的「誘敵深入」，用甚麼「誘」呢？曰：利誘。毛的「各個擊破」是甚麼意思呢？就是逐個擊破，就是5%，5%地擊破，你切勿認為只擊破他，不擊破你。例如舒蕪出賣了胡風，想得到利益，但到了反右派時仍被劃了右派，打成敵人。吳晗反右時想從出賣知識份子，出賣民盟盟友中得到利益，結果，在文革中賠上了自己的一條命。應了那句諺語：「你想他的利，他想你的本。」當你與中共打交道時，應把這句話貼到你的座右。吳晗等不可勝數的人，不是坑了老本兒嗎？這就是我說的兩方面意義中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全國各個單位按左，中，右排隊，結果就弄清了陣線，營壘分明。這是一項寶貴的資源，若非毛澤東作，我們是沒有能力作到這一點的。這樣，他知道了，我們也知道了：誰是左派？誰是右派？誰是中間派？同時，通過反右派，使我們學會了，掌握了用「派」的觀點去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看中共時，不能囫圇吞棗，一定要按他們的表現，把毛賊及其一小撮從整個共產黨中提取出來。所謂「黨的政策」其實是黨內占支配地位的「極左派的政策」。例如，他們對孫中山民主革命採取「掛羊頭，賣狗肉」政策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的復辟派，陳獨秀就持有異議。在抗日衛國戰爭時期，堅持「讓日本多佔地」政策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賣國派的主張，彭德懷反對過，王明更主張真心擁護民族統一戰線。勝利後，搶城市，奪地盤，在全國興風作浪而又以「和談」為煙幕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內戰派，劉少奇提出的是「和平，民主新階段」。奪得全國政權後，實行激進政策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冒進派，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周恩來提出反冒進，鄧子恢實行「堅決收縮」，大批解散合作社。反右派鬥爭是以毛澤東，鄧小平為首的極左派搞的，據李志綏的回憶錄中說，陳毅對反右派就持否定態度。更別提黨內也存在有大量的右派了。歷來如此，於反右派中看得尤為清楚：共產黨看黨外人士，有的為敵，有的為友，可在黨內看不同派別則一律視之為敵。例如，一位普通的老共產黨員王若望被劃了右派，只因他堅守著良心，就成為了「專制獨裁」派不可調和的敵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都對他進行了嚴酷的迫害，直到驅逐出國，客死異國他鄉。他從未從民主陣地上後退一步，成為民主運動中最堅定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毛澤東為首的自稱「無產階級司令部」，實際已成為孤家寡人，一小撮的專制獨裁極權派，他在共產黨內也是極端脫離群眾，與大多黨員，幹部為敵的，跟隨他的，幾乎屈指可數。他何以能以寡敵眾呢？就是長期以來灌輸毛澤東思想，造成了對他的個人迷信，捆綁住了人們的心靈，手足。也就是王若望先生指出的：「人人心裏有一個小毛澤東。」文革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代表改革派，他遇到了文革派與保守派的反對，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則代表保守派，遇到改革派的抵制。鄧自己說：「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78）」為甚麼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因為四項基本原則是脫胎於毛反右定的「六條標準」，其靈魂是「黨天下」。這和他後來反對自由化是一脈相承的。他受到胡耀邦的抵制。他說：「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去年九月召開的黨的六中全會上，有的同志主張在《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要寫反對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實際上就持這種觀點。」（78）至於他搞「六四」屠城則更暴露了他毛派原有本質的猙獰面目，眾所周知，他受到趙紫陽的抵制。他有罪惡，也有功勞，大概可作倒三七的評價。至於他的接班人江澤民，則純粹是一個頑固的「黨天下」派。他拉幫結派排除異己，他鎮壓民運人士從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同人等）到全國，他承認與俄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割讓祖國領土，他從自己做起，扶持太子黨，他包庇貪官污吏，他迫害法

輪功，犯群體滅絕罪。。。。。。對他評價倒較簡單：功無寸分，罪莫大焉。這些分析說明，不管是文革前，還是文革後至今，所謂「共產黨的政策」全屬派的政策，並且，一條基本紅線貫串下來的，是毛澤東思想，所以實際上都是毛派戰勝了別的派。但名堂甚多，相對於改革派，則名曰：保守派；相對於要求實行多黨制的，則名曰：頑固的「黨天下」派；相對於反個人迷信，則名曰：斯大林主義派；相對於走資派，則名曰：無產階級司令部或文革派；相對於保皇派，則名曰：文革派；相對於右派，則名曰：左派；相對於穩健派，則名曰：冒進派（後美其名曰：躍進派）；相對於民主革命派，則名曰：專制復辟派。而這些鬼名堂有一個共通的性質，則是後者對前者的「反動」。故名曰：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反動派，則名至實歸。名正而後言順。很多人不明真象，說民主運動「反華」或說「逢中必反」，其實，不但不「反華」，不「逢中必反」，而且也不圖吞棗地「反共」或「逢共必反」。他毫不含糊地說明，他是旗幟鮮明地反對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反動派，集中於一點就是反對黨天下。對中共黨內的改革派，民主派，自由主義者。。。。。。則要引以為朋友的，甚至要引以為良師的，如王若望、李慎之、李銳、蔣彥永等。劉賓雁也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呀！他就說，「毛澤東是反革命」，是「中共黨內的反動派」，並且我在美國之音中文網上看到：「劉賓雁說，毛澤東思想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沒有這種反人道、反人性，中國的革命也不可能勝利。」這裡，他還深刻地揭示了「中國的革命」取勝的本質原因，即：「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勝利。」驚悉劉賓雁逝世，謹向他——這位中國的良心致哀、致敬！

我們相信，中國人民的大多數，共產黨人的大多數，從貪污腐敗，特權橫行，糟踏法制，鎮壓民眾，剝奪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宗教信仰的自由等等中，都看到了「黨天下」為患之烈，是萬惡之源。取消「黨天下」的歷史條件已經爛熟，踢開國家現代化道路上的絆腳石——「黨天下」，是我們的歷史使命。讓我們從批毛開始，徹底驅散毛的陰魂，連根拔除，並用烈火焚燬這棵毒木——黨天下，這便是完成我們的使命所要進行的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的工作。我們既不能放鬆使命感，又不能熱鍋上爬螞蟻。須知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故需既要從長計議，又要只爭朝夕！

打倒黨天下，當然是打倒這個黑暗、腐朽的反動制度，但堅持這個制度的是中共反動派。所以就一定要打倒中共反動派。誰是中共反動派呢？你總不能說只有毛澤東一人。因而要有個標準，就像毛澤東反右派定了六條標準，我們就用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為標準：凡是個人相信四項基本原則的，算是信仰自由：凡是自己頑固堅持而又強迫別人堅持，並加害於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人，劣跡斑斑，則為中共反動派。（「如果是非黨幹部呢？」「必為黨外布爾甚維克，往往比黨內的還惡劣，」）

我們的口號是：「打倒黨天下！重建新中國。」

三，認透毛、共本質的方法論之三

第一，窮舉法

在前兩篇中我用的是逆推法、引證法、內外法、總分法，本篇仍然會繼續採用，就像本篇將採用的窮舉法和點睛法，前兩篇已經採用了一樣。說哪一篇採用哪一個方法，只是就著「主要」二字說的。是由論題的性質所決定的。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寫道：「攻其一點或幾點，儘量誇大，不及其餘。這是一種脫離實際情況的形而上學的方法，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用的就是這種方法。」「一個人有十個指頭，要使幹部學會區別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上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

僅從我掛一漏萬，所舉出的右派言論，就涵蓋了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古今中外、士農工商，……這難道還是「攻其一點或幾點」嗎？應該說是面面俱到，幾無漏網。歷史證明，

正確方面和真實方面是屬於右派一方的；歷史同樣證明，共產黨方面，如登在人民日報上赫然在目的右派言論的標題，所指出的那樣：「羅隆基說：共產黨處處是錯。」所以，實事求是的「指頭論」，正如前面以批駁毛說的「肅反成績是主要的」為例，以數學的精確性，算出爛掉 9.4 個指頭，沒爛的是 0.6 個指頭。就算如此，這個 6% 的所謂「正確」率，也是相對於中共中央肅反十人領導小組所定肅反政策說的，而這個殘暴不仁的政策是正確的嗎？何況這個十人小組又是個非法存在呢？

遠的不說，單說共產黨篡權後，在大是大非方面，有沒有人敢對人民，對歷史負責地說：「我擔保毛澤東做的某一件事情裡沒有包藏禍心和罪惡行徑？」是土改？是鎮反？是剿匪反霸？是批判《武訓傳》？是抗美援朝？是三反五反？是批判紅樓夢研究？是反高饒？是統購統銷？是逼農民買餘糧？是農業合作化？是反胡風？是肅反？是反鄧子恢小腳女人？是反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是擁護斯大林主義？是反周恩來反冒進？是反右派？是屠殺西藏、新疆人民？是大躍進？是人民公社？是土法煉鋼？是反右傾？是餓死四千六百多萬條人命？是反三自一包？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批《早春二月》、《北國江南》、《李慧娘》……？是批楊獻珍的「合二而一」？是批三家村？是批《海瑞罷官》？是文化大革命？（這本身就又是一個母題……）是在援外項目中揮金如土？對所有這些下結論，有請中國的良心、共產黨的忠誠（雖是「第二種」）的黨員劉賓雁先生來下：「仔細回顧一下的話，1949 年以後毛澤東各個方面的決策幾乎全是錯的，包括外交政策——沒幹一件好事。」（《誰是反革命？》）

二世鄧小平三世江澤民四世胡錦濤，各有個的帳，都是罪惡纍纍，罄竹難書，舉不勝舉，難於窮舉。所謂「窮舉法」也者，意在問問題務求全面，立論堅挺，無懈可擊者也。你毛澤東不是擅長於詭辯嗎？窮舉法就是專門解除哪怕像毛似的，無理辯三分者的全副武裝，給予殲滅性打擊的。也就是常人說的「關起門打狗」。窮舉法就是「關起門」；狗便再也無法逃遁。

第二，點睛法

我非常重視別人的點睛之筆，有選擇地引而用之，說出我心中有之而筆下無之之意。例如我在扉頁上引用李洪林先生的話，說明我寫此書的想法，便是。也有時候，有些點睛之筆份量較重，由有份量的人，例如劉賓雁說出，較易令人信服，因為一則他是著名右派記者，消息靈通人士，二則他是中國的良心，寧屢受迫害也絕對不說假話的人。如果由我說出，上前讀者會想：「這個人是老幾；螞蟻打呵欠——口氣這麼大？」另由別人說出，就是大象打哈欠了。還有一種情形，尤其是對反面的材料，只用別人畫的龍，我來由表及裡，作出點睛，揭示本質，讓其原形畢露。

窮舉法和點睛法結合起來，就可以避免瞎子摸象，而達到摸著全像，得到真像（truth），即通過真相，得到真理；也即共產黨當作謊言總包裝的帶引號的「實事求是」，卻被我們不帶引號地實事求是地做到了。

總之，大量引用正反兩方面的言論，重在點睛。點睛的要旨在於還原歷史。具體到本書，則是：《還原一九五七》。

小結：經得住驗證的方法論

第一，附錄：「解密的反右派運動檔案」；一併我的評注如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十四日晚，毛澤東提出臨時發言，他在會上說：「東歐一些國家不斷在政治上混亂，基本問題是領導層沒有階級鬥爭觀念，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引以為戒。（注 1）．．．．．我敢說，我們黨內也有階級鬥爭。（注 2）」

注 1：凡是我在中間插注，都用括號括住。

既然有「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怎樣）引以為戒」（呢？））。當然是有反必肅，是「搞掉」。然而「肅反」與「反右派」又是甚麼關係呢？薄一波說：「反右開始後，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肅反』，『新式肅反』，是『清黨清團的好機會，也包括各民主黨派』。」（《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 622）原來毛澤東至少在 1956 年 11 月 14 日晚，已經把預備請來幫助黨整風的人，當成了「新老反革命」而予以「搞掉」，無怪乎，他上前就用「引蛇出洞」和「誘敵深入」等，這些對敵鬥爭的毒招，來對付他們了。現在大家都清楚了：原來毛千方百計發動大鳴大放，只是「肅反」的前奏；曲調優美，只是為了取得「肅反」效果！

我在前面所引證的王若水說的，毛澤東在 1956 年下半年就著匈牙利事件得出與劉少奇大異其趣的結論，就埋藏下 1957 年的「殺機」；「殺機」是 1956 年埋下的！這一點，薄一波在具體方面應該知道的更清楚，他為甚麼至今仍不說實話，反而在他的回憶錄的「從整風到反右派的轉變」一節中，掩蓋真相，重複過去濫透了的謊言呢？——

在整風初期，我們黨為了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誠心誠意（？）地歡迎黨外人士幫助我們整風，虛心聽取他們的各種批評和意見。但是，不料（？）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殺氣騰騰（薄是鄧的「殺氣騰騰」派），向黨向社會主義發動了猖狂進攻（又攀附毛的「猖狂進攻說」，但薄對他們黨內的歷史學界一再申明的「那時候根本不存在猖狂進攻」，卻頑固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欺騙和煽動一部份人，掀起了一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例如，他們把共產黨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擊為「黨天下」，說甚麼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都要安排一個黨員作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請問：不是這樣嗎？還是就應該這樣？）。他們公然反對共產黨執政，鼓吹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輪流執政」（又叫「輪流坐莊」——原注），說甚麼「一黨執政有害處」。「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來輪流執政，由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就好得多」（不是這樣嗎？還是就應該一黨專政？）……。他們全盤否定我們黨進行的歷次政治運動（當你寫這幾行時，你們黨自己已經全盤否定了幾個運動？部份否定了幾個運動？你在運動中害過人嗎？受過害嗎？），說甚麼「過去幾個大運動，都是共產黨整人」（不是這樣嗎？還是就應該這樣？），「肅反是對人類道德的進攻，對人類心靈的摧殘」（不是這樣嗎？還是就應該這樣？肅反整不到你頭上，你當然沒受過那個洋罪。文革中把你打成叛徒，可能對你的心靈予以莫大的慰藉吧？你們黨鄭重其事地下結論：「徹底否定」「我們黨進行的歷次政治運動」之一的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與「全盤否定」，孰輕孰重？你是不是還留戀那些可愛的政治運動？既然政治運動這麼大得人心黨心，你們黨為甚麼要宣佈不再搞政治運動？當然我知道這是偽善，是欺騙，但是，「偽善」畢竟是「真惡」向「真善」的投降，雖然是詐降。作為被打過右派的人，當然更知道：詐降的目的是「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他們把矛頭直指黨中央、毛主席，說甚麼「三害」「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你說應向哪裏挖？還是不挖？），「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這可是老和尚自己在天安門城樓上，為引蛇出洞說的話呀！你說說，說這話該當何罪？你這個候補政治局委員豈是要揭發你們的黨主席是男盜女娼不成？）；……等等，等等。總之，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公開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並認為時機到了。這種情況，是我們黨在決定開始整風時所沒有預料到的。（你是個雙料的不說實話者！一是你們黨主席預料的，比這嚴重得多；二是你說的這全是誣陷栽贓，你所指的這些「言論」，在你們決定反右時根本尚未出現。不信，你去查當時的白紙。）……當各種座談會和社會上陸續出現一些激烈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時，引

起毛主席的極大警覺。5月15日，他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頁611__612）

呀呀呀！真是胡說八道。別人胡說八道還可說，怎麼你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也胡說八道？前面我已指出過100遍，現在再101遍地指出：如上言論，不論正確與否，激烈與否，殺氣騰騰與否，都發表在5月15日之後！你們振振有詞，決定要反擊的是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而鐵的事實是，你們認為的「猖狂的進攻」，這時候全然無有，需待以時日才會出現，作出「預支」式的反擊，這不是太滑天下之大稽了嗎？這種荒唐，是由於政治局候補委員太想為自己的黨主席的預設陰謀遮醜，而昧著良心嫁禍於人，才造成「這種和尚這種寺」的。其實，按著這個「解密的檔案」的話實說：「毛澤東藉『鳴放』引蛇出洞」。這樣一來，就一切都順理成章，絲毫不費周折，省得現在政治局候補委員為了替主席擦屁股，弄巧成拙，弄成了西瓜皮擦屁股——膩擺不清。

注2：「我敢說，我們黨內也有階級鬥爭。」這句話在此後的5月15日的應驗是：「我黨有大批的知識份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份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份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

在6月8日的應驗是：「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份（這部份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__原注），利益極大。」

最後應驗在文革中就是：「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劉少奇在會上補充發言，說：「毛澤東同志的講話是他個人的意見，中央政治局沒討論過，會議要備案。」（注3）

注3：我的理解是，這都是毛澤東的個人動作。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會議進行了三天。毛澤東提出：「革命時期大規模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鬥爭要幾經反覆，還要持續五十年、一百年。你們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團上，也有不信的。」（注4）

注4：應該將毛澤東篡改原稿的過程和陰險的、醜惡的用心，一併公之於眾。例如，當年我聽到的傳達稿上有：「官大也救不了你！斯大林官大不大？活著不受批判，死後也要受批判。」你聽這話多麼誠懇！你能說毛主席整風的決心不大嗎？所以，人們就回前仆後繼，紛紛上當。這裡的經驗教訓是，聽毛澤東的話，也有個科學方法的問題，這就是，對他說的一切話，首要之點是審查其「真」與「假」的問題。在真假未辨之前，切勿輕信。其次才是審查他說的「對」與「錯」的問題。再次才是好不好的問題。這個次序萬萬不可顛倒。如上所說，毛說得不僅不錯，而且對得很！好得很！大得人心。可惜！可惜！是騙人的！在構成全部毛澤東思想裡，這類「對得很！好得很！大得人心。可惜！可惜！是騙人的」話，不可車載斗量，諸如：實事求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毛澤東藉「鳴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注5）

注5：猴不上竿直敲鑼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澤東和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談話。毛澤東說：「我贊成放，放得盡些，才能讓各階級都出來表現。不放，怎樣來辯論？放半年，不夠，放一年。左派要有準備。」（注6）

注 6:首先要注意兩點:一是「放」的目的是「讓各階級都出來表現」,並無只字提出:為了幫助黨整風。二是,左派的對立面是右派。毛教「左派要有」甚麼樣「準備」呢?矛頭指向甚麼派呢?當面是毛號召鳴放,幫助黨整風;背後卻是他交代:「左派要有準備」。現在檔案已經解密,難道還有人堅持還要硬說,或還要相信毛是誠心誠意要整風,這種鬼話嗎?其次是,你要特別注意這個日期:1957年4月11日晚。剛剛昨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管是明君、昏君、仁君、暴君,即便如希特勒、斯大林輩,也不曾設陰謀,定詭計去誘惑他治下的臣民去數以百萬計地丟掉進陷阱呀!這裡,我們正好用得著宣讀一項最高指示:「我們的四個偉大,外加最最最最,教導我們說:『又何其毒也!』」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注7)

注 7:人說,共產極權的統治是靠暴力和謊言,一點不錯。這個《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和毛澤東動員鳴放的種種言論,提供了謊言的絕好樣板。甚麼「……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云云;甚麼「……幫助黨整風自願參加,自由退出……」云云;甚麼甚麼云云……統統成了狗屁。毛澤東的臉皮需要有多厚,才能厚顏無恥到撒這麼大的彌天大謊而還能夠臉不紅、氣不喘、心不慌地說:「這是陽謀。」無怪乎我在農村監督勞動的生產隊,有個農婦說:「毛澤東,臉皮厚,機關鎗打不透。」豈但是說,老貧農隊長拉車往地裡送糞,高聲叫喊著罵:「老毛啊!我日你娘。」兩個青年社員為隊裡抬磚,邊走邊說笑:「給老毛去造磚墓。」這事發生在1962年,罵聲不絕於耳。我從前在知識份子隊伍裡,從未聽到過有人罵,更別說罵這麼痛快。

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甚麼要整風?》的社論。毛澤東作了指示:「不要搞那麼多條條框框來束縛,要放。怕放,無非怕引火燒身。」(注8)

注 8:「火」在「坑」裡,怎麼會「燒」著你們的「身」?整風這個火坑,只是要讓那些幫助整風者往裡跳的。出殯,完全是為了埋葬送殯者。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國各地召開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類會議,向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提出了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四十五條意見、建議。(注9)

注 9:我大致估計,平均每個支部絕對分不到一條意見。實在是: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一放,各階級就原形畢露」

毛澤東在《情況匯總》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注10)

注 10:你姓毛的,如果怕提意見,就別求爺爺告奶奶,請人家提意見不就得了!這是不用下禁令,輕而易舉就能作到的嘛!

再說,這倒是個甚麼樣的「一放」呢,竟使姓毛的要「重返井岡山」?雖然這是他慣用的虛張聲勢、危言聳聽的詭詐故伎,但表明他要與右派作一場定性為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卻是早在事先就下了決心和作了安排的。而這時候,右派的重要言論還都未出台呢!你去查查當時的報紙,雖經毛澤東千呼萬喚,可至今根本沒有一條鳴放是要共產黨下台的。同時,毛澤東不是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嗎?這哪裏有「戒」、「改」、「勉」的一絲一毫的氣息呢?這比起你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來,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甭提別的迫害了,單說脫褲子割尾巴,自辱人辱,挖思想根源、社會根源、歷史根源,鬧得人祖宗三代神鬼不寧,逼得人活不成,死不成,死活都得咎!姓「知」的又該「重返」甚麼「山」呢?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局勢，意見分歧，但同意「要正確引導，要再觀察一個時期」。（注 11）

注 11:這裡透露出，直至 5 月 14 日的氛圍，仍不很緊張。否則，大家怎麼還會都同意「要正確引導，要再觀察一個時期」呢？

毛澤東寫《事情正在起變化》

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閱，建議發至黨內十七級以上幹部參閱。

十七名政治局委員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羅榮桓、陳毅、李富春、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李先念；政治局候補委員為：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薄一波。

陳雲、李富春、劉伯承、張聞天四人閱後，沒有在毛澤東文章上批注意見或「已閱」。

毛澤東文章，在黨內分二個階段下達：第一個階段，發至十級以上幹部；第二個階段，再發至十七級以上幹部。

毛澤東的《事情正在起變化》內指：「我黨有大批的知識份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份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份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社會上的中間派是大量的，他們大約占全體黨外知識份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約佔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約佔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注 12）

注 12:這裡充分暴露毛澤東急不可待地要實現自己的陰謀。這篇文章純屬克里空。至少有兩位黨內歷史學家對毛持否定態度，一位是近代史研究所長黎澍，他說：「直到反右派開始時，也並沒有甚麼資產階級猖狂進攻需要『打退』。」另一位是中共黨史專家許全興教授在他的專著《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說：「從整個報導看，很難得出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結論。毛澤東根據甚麼材料講『猖狂進攻』就不得而知了。」（頁 90）這簡直成了寓言故事中狼吃小羊了，甚麼理也無需多講，吃的理由就是我要吃：「不是你就是你爸爸，反正都一樣！」

中央髮指示「反擊右派份子進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該指示稱：「這是建國以來，一場大戰，戰鬥是無煙、無光的，在黨的心臟展開。他們大多已在不同領導崗位，有一定追隨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澤東決定在青島召開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會議討論了關於反右鬥爭的部署。會議期間的八月三日，毛澤東寫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勢》一文，作為黨內文件印發。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說：「匈牙利事件會不會在中國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納吉式人物有可能在會場內。」

這時，會場內有三十五張紙條遞上主席台。大會主席周恩來當場宣讀了這些紙條。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見，並要求毛澤東能公開誰是納吉式人物；也有反對毛澤東這種無的放矢的觀點。

黨外人士對毛搞反右的異見 [大陸直連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員長宋慶齡致信毛澤東主席，對全國範圍在黨內、民主黨派內、知識學術界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十分憂慮、十分詫異、十分驚奇，要求對沒有行動「反黨」的右派、右傾人士，作不同意見的爭論處理。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員長李濟深、沉鈞儒、黃炎培、陳叔通，分別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信中都對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濟深在信中寫道：在政治上出爾反爾、營造鬥爭氣氛、製造對立階層，會造成深遠創傷。

三百多萬人被劃「右派份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佈：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定性為右派集團二萬二千零七十一個，右傾集團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三個，反黨集團四千一百二十七個；定為右派份子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列為中右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黨員右派份子二十七萬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份子三萬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學生右派份子二萬零七百四十五人。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注 13）

注 13:關於右派的人數，我們沒法確定，但據我親知，就有五個同學、同事當了 20 多年右派，到時一查檔案，原來不是右派：一個是朱秀洲老師，他到老家河北省農村接受監督勞動；一個是馮和璧老師，他由中學下放到小學；一個是華瑞甫同學，還有一個是朱庭秀，兩人都是勞動教養；第五個倒真是右派，但他的右派身份卻不被承認，所以也就沒被統計進去。情況是這樣的：他叫閻竟鑫，在蘭州大學中文系劃的右派，畢業後分配到農村中學教書，他偷跑回城市老家自謀出路。到「改正」時，農村中學不管給他落實政策，城市沒有他的檔案。連他的右派身份都成了問題。我來美國前，他已癱瘓，家人和朋友還在為他跑「落實政策」呢。類似的情況，我聽到和在報刊上看到的就更多了。我還知道有一些右派根本就不是知識份子，是文盲，其中有一個窮光蛋讓你哭笑不得。我不瞭解他的身世，每到月頭他就到街道辦事處去領救濟。所有右派都是「資產階級右派」。他自稱是「無產階級右派。」街道給他發救濟時教育他要牢記黨的恩情。他說：「我咋會忘哩？每到月頭就會想起的。」還有一個是我在高中上學時校長的警衛員，自幼是撿腿隊長、兒童團長，長大是革命隊伍裡的紅小鬼，是個大字不識幾個的文盲。後來調進百貨公司，大小算個幹部。當我們一塊勞動教養時，他說他劃右派的結論中有一條是「借了 500 元外債。」他說他根本就沒有，「連一元也沒有，我就沒有借債。」解除教養後，一直上訪，要求平反，所有回答都是：「不予受理。」又去找已居高官的革命老上司。得到的安慰是：「這是老人家定的案，誰也不敢翻。你只有等等，看看將來的政策。」後來他得了癌症，等不及便去世了。他進城後娶的美貌的妻子，早已離婚。他孤身一人，死後便一切銷聲匿跡，煙飛塵滅，真到落實政策時，他已是陰間一鬼。僅僅是我一個人就接觸到這麼多不在「55 萬多右派」，這個統計數內；全國該有多少呢？可知 55 萬多，那個數是絕對靠不住的。但 55 萬多，作為被 1979 年前後，落實政策到身的右派數目，可能是正確的，因為這是從下面報上來的。它沒有必要像大躍進期間上報鋼鐵、糧食產量那樣浮誇，也沒有必要像上報死人數目那樣隱瞞的。『第二，綜述：

解密檔案，甚麼曝光，甚麼繼續隱瞞，全由共產黨決定。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設想：解密的檔案理應屬實，完全不必造假；因為他們需要隱瞞的東西，儘管隱瞞掉就是了。果如是，我們就可以再打一個比方：人們算數學題，算的結果錯不錯？就需要將得數與標準答案對一對。人們對反右派起因的推演，得數有大有小，有正有負；誰對誰錯呢？可以說，解密檔案就應該算是標準答案。照此辦理，一對照：「變卦說」中所有的「出軌說」，「猖狂進攻說」，「整黨內敵手說」，「整風失控說」，「延安模式說」（演算的思路，有部份對的），「黨內壓力說」，「毛澤東誠心誠意整風說」，「錯估說或上當說」，「殺氣騰騰說」，……統統站不住腳，全錯了；而「預謀說」中的「陽謀說」，也錯了；只有「預謀說」中的「陰謀說」，與標準答案相對照，從列的算式，到演算的步驟，到運算結果得出的最後得數，與解密檔案完完全全如出一轍。

「這是為甚麼？」本來理應由毛澤東本人來回答他為向全國人民發出反右派的動員令，而寫的人民日報社論（題目）所提出的這個倒打一耙的問題。但他已經死有餘辜，只好由活人來作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了。經蒙受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殘酷迫害而慘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他說得好：「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

1，只有在科學的方法論指導之下，才能對自然和社會作出正確的觀察。科學的態度是建立科學的方法論的前提。前提雖不是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科學的態度就是老實的態度。毛澤東沒有這個前提，他以為天下人盡皆可欺，所以就編造出「陽謀說」。自以為得計，卻給天下人以笑柄。從此，當人們要說毛耍「陽謀」的時候，並不屑於批判，僅是嗤之以鼻。無論海內外，每提及「陽某」，臉上總是出現鄙夷不屑的神情，視之為耍流氓，耍無賴，社會渣滓者輩才有的行為。

對待毛澤東說的話，首要之點是辨真假。如對他說的「猖狂進攻說」，前已指明，他的許多黨內有識之士都揭穿是假的，難道你還要信以為真嗎？

問題是，正如胡平先生所說：「發現謊言是謊言，並不太困難，然而，謊言被揭穿，不等於真相就自動浮現。因為共產黨編造的謊言太多，一層一層又一層，有時候你剝開了一層謊言，以為自己已經發見了真相，殊不知你見到的還是謊言，是深一層的謊言。『四人幫』垮臺後，中共當局提出『撥亂反正』，不少人著書為文，揭露毛時代的若干虛假歷史，但是它們所提供的真相其實很多仍然不是真實，而只是另一套謊言。」（為何清漣女士主編的《20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寫的述評《往事不堪回首》）我喜歡胡先生講的道理，他總是講得入情入理，入木三分。我寫這本書要盡我所能地把謊言多剝幾層，讓它盡其可能地接近真相大白。由此可見，我們認識到「猖狂進攻說」是謊言，並不等於就得到了真相。而但凡這個真相一旦大白，就會使你對毛澤東的陰險奸詐、殘酷兇狠大驚失色，不寒而慄，毛骨悚然！劉賓雁的文章《毛澤東一手定乾坤》，揭示出的正好就是這種真相：

東歐的政治變革，最早從南斯拉夫開始，那是由執政黨及其領袖鐵托發起的。一九五六年波蘭黨的領袖哥穆爾卡主動糾正前人的錯誤都未出大亂子。只有匈牙利，死硬的領導人拉科西堅決不改，這才釀成大亂。

然而毛澤東卻不願引出這樣的結論，他對鎮壓比對改革更有興趣。赫魯曉夫一度派蘇軍進駐布達佩斯，但下不了鎮壓的決心，又撤出來。毛澤東派周恩來到莫斯科坐鎮，力主武裝鎮壓，蘇聯才第二次出兵的。中共對匈牙利人民欠下的這筆血債，也長期隱瞞下來了。

毛澤東從未認真承認過錯誤。他甚至還反對別人認錯。一九五七年初，他還告誡過省委書記們絕不能像胡志明那樣為越南土改中的錯誤下「罪己詔」。他堅持認定，問題出在群眾一邊。一九五七年春夏，他還在說社會上各種矛盾的激化，不過是「意見分歧」；一部份人不相信社會主義；廣大群眾對於新制度「感到還不大習慣」。這時工人罷工已進入高峰，至少有七個省的農民起來「鬧事」，要求退出合作社或分社，要求供應糧食等，而毛澤東仍然認為是「思想問題」，共產黨的政策沒有問題！

匈牙利事件為所有國家執政的共產黨提供了一個改正錯誤，放棄斯大林主義的機會。東歐各國在蘇聯控制下不能自主，以致只能是小改或不改，中國有條件獨自行動，中共「八大」已顯現這種意圖，然而毛澤東卻不干。他要利用匈牙利事件去實現他自己的意圖。那就是把改革浪潮和群眾的反抗壓下去。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中，這樣寫道：「……現在我們主動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利益極大。」

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海永大紗廠工人發動罷工，手段還相當激烈：把廠方人員扣留起來作為人質，不解決問題不放人。劉少奇決定「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派人采寫和報導。我

就是帶著這個使命去上海的。這次采寫的稿件若能報導出來，就能使全國人民和中共全黨看到那場罷工全然是中共的錯誤造成：工人被當做工具，無力保護自身起碼的權利；地位比公私合營前資本家時代還不如。基層黨組織已變質，黨員享有種種特權，已成為剝奪工人因而同工人相對立的量因而，有反資本家傳統的這些工人們把矛頭轉向從前領導自己鬥爭的共產黨組織。這種惡變，是在一九五五至五七年不到兩年之中完成的。

毛澤東的態度卻相反。其實中國的問題早已清清楚楚擺在那裏，並不需要「鳴放」，你去動手改正就是了。比如肅反擴大化，已是共識，你去平反就是了。蘇聯平反了百萬件錯案，非但未亂，反倒更穩定了。農業合作化的「冒進」問題黨內高層也已定論，只是毛澤東一人反對，因而「八大」上只能吞吞吐吐：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進。南斯拉夫和波蘭都解散了合作社，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不必解散，把大社改為小社，或回到低級社有何不可？……面對社會的動盪，中共在一九五七年有兩個選擇，不是改，就是壓。毛澤東既不肯改，就只能壓了。但是怎麼個壓法呢？動用武力去分別鎮壓各地農民、工人和學生？那只能激發全國動亂。這時，毛澤東獨出心裁，發現了世界政治史上前無古人的辦法：撈到一個政治理由，從政治上採取兵不血刃卻能一舉壓服全國的措施。這就需要一個敵對力量提供打擊的藉口，然而可惜正如「中國大逆轉」作者所做的分析，當時中國知識份子有協助中共改正錯誤之心，卻無推翻中共政權而代之以的任何打算。沒有，難道不能製造嗎？這就是「鳴放」運動的奧秘所在。五七年四月，毛澤東在杭州告訴省委書記們：讓他們放！攻得過火，就讓牛鬼蛇神出來鬧一鬧。（後來又說：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同時暗示：現在是黨外情緒高，過些時，黨內情緒也會高起來，先低後高。如果黨內外一起講，戲就唱起來了，這樣就可以把許多人推上政治舞台。

在那個舞台上，毛澤東要導演的，就是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份子猖狂進攻」的戲，戲一開台，發動一場鋪天蓋地的運動制服一切人的機會就到了。（《北京之春》第48期）

同理可證，鄧小平說右派份子「殺氣騰騰」，也是謊言，並且也不止於謊言，而是也有更深層次的真相。更深層次的真相是甚麼呢？就是：「自己一身百毛尾（YI），反說別人是妖精」。1957年反右派前，我聽過一次傳達鄧小平的報告，給我造成一種他處事毒短的印象。例如他叫囂：「你要民主，我要專政！」聽過此話，有兩人一問一答：「為甚麼他個子那麼短？」「都長了心，心墜著，他長不高。」

反右派中，他搞得風聲鶴唳，即便對黨內，特別是對老黨員，也強調要毫不留情，杜絕溫情，一樣是殺氣騰騰。9月1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表了《要嚴肅對待黨內的右派份子》的社論。多少與毛鄧併肩戰鬥一、二十年的「老同志」給他搞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反右派後，他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活靈活現出他的一副躊躇滿志、睨睨國家，蠻橫無理、殺起騰騰的霸道嘴臉。

文革後，他除了營造一時的「復出」氣氛外，從未放鬆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逐至他的殺氣騰騰造成天安門廣場學生們和市民們的熱血騰騰。

如果說，毛澤東終生以「陽謀」造孽，而被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鄧小平則是以「殺氣騰騰」而惡貫滿盈，遺臭萬年。

毛澤東、鄧小平是反右派陰謀的策劃者，主持執行者，罪魁禍首，他們撒謊騙人是必然的。問題是他們的血腥罪惡不是以「撒謊騙人」終，而是以「撒謊騙人」始。這是一個明擺著的道理，否則，他騙人幹甚麼？行騙只是為整個舞台大戲揭開序幕；整個主體，全部真相，腥風血雨的重頭戲就在後面。

2，幫兇們，如彭真、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郭沫若、薄一波、史良、胡喬木、何香凝、胡愈之……直至小丑盧郁文，他們為了一杯羹，也只能爭先恐後出賣靈魂，拚命撒謊，如胡喬木傷天害理、喪盡良心和良知，在人民日報上撒了多少彌天大謊啊！又如薄一波明知故犯，

大家已經識破的謊，他在 90 年代寫的回憶錄裡還照撒不誤。今天解密檔案出爐，使我重新考慮李維漢說的不知道毛要反右派，要引蛇出洞；這該是假裝糊塗，難得糊塗。總之是想把大家自始至終蒙在鼓裡，一則在運動中助紂為虐，大喝知識份子的鮮血；二則，千萬要保住主子的畫皮，要讓陰謀家、殺人犯永遠充當溫柔賢淑的美女，讓「她」殺人不眨眼的姿態，表演得「楚楚可愛」。

3，大多數蒙在鼓裡的人，包括學者，因為無法得知真情實況，只好是人云亦云，特別是官雲民也雲。雖然他們也進入了誤區，但決然不同於上述一類人，那樣居心叵測。這就是我在《變卦說》中所指出的，諸如李志綏先生等的一類說法。就像我說李先生是「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那樣，多是屬於思想方法的問題。我再舉一個新的諸如此類的例子：《禪機：1957 苦難的祭壇》對由整風到反右的「急轉彎」作了某些探索：

「按照毛澤東 1955 年以來的思維邏輯和行為展現，即使在以上被李維漢認為『正確、很好的』鳴放裡，有讓他聽了如和風吹拂芊芊春草一樣感到撫慰的意見，如『一切搬用洋教條』之類；但也不乏有讓他老人家聽了似夏日蟬雨般刺耳的言論，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評判，『是保守思想對社會主義建設造成的損失大，還是盲目冒進造成的損失大』一類明明答案已經放好在口袋裡的設問……

「倘若注意起這兩點，就大大有助於我們理解日後毛澤東為甚麼會來個一百八十度的急轉彎。」（頁 164）這實際是響應的李維漢的「出軌說」。但，值得深思的是，發此言論的張奚若和陳叔通並沒有劃右派。而對居心要劃右派的人卻要千呼萬喚，以誠感人；「誠」也感不動的人，毛就親自點名，追查歷史舊帳，硬劃右派，如馮雪峰等是也。

「從某種意義上，毛澤東的悲劇在於：

「建國後他的重大舉措，不時閃耀著某種理性探求的光芒，並給中國的和諧與發展打上金色的希望，從而顯示了在這塊要搬動一塊石頭也時常不那麼容易的國土上，他依然是一位精氣神兒十足的改革者；

「可結果，他的新思維總好像有魔鬼附體一樣，泛動起來的卻是這塊土地最愚昧、最黑暗的東西，他本人也被這些東西，塑造為阻擋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最大一位保守者。

「而且，建國後他的每一回重大舉措，無不自視代表了人民的最高利益，它絕非甚麼個人或是小集團的陰謀，而是能坦蕩地展示於天下的秋日碧空，因而一時間這塊土地上也總山呼水唱，風集影從；

「可結果常常蹂躪了人民的利益，或是讓人民在戰勝貧困的旗幟下去進一步發展貧困，或是使人民在革命的名義下去互相廝殺。當整個民族的元氣大傷之時，人民再以一種冷漠的眼光去打量紫禁城裡那個頗為孤單的身影，便會多多少少地感覺出他身上散發出的宮廷政治的氣息……

「毛澤東建國後在創造甚麼的同時，又幾乎總在破壞著甚麼。」

「動機與效果的背離；

「理想與實踐的分裂；

「理性與感性的抵牾；

「是晚年毛澤東這出悲劇的蒼涼而又無奈的基調。

「在 1957 年，毛澤東已經走進了這出悲劇。因此，我不認為早在 1956 年，反右運動已寫在了他案頭上的台歷上，即他殫精極慮發動的大鳴大放和整風運動，為的是搞一場『聚而殲之』的陰謀，或者稱之謂『陽謀』。」（頁 275）這裡說的「因此」，到底是：「因甚麼？」實在令人難得不糊塗。有一點明顯的，毛澤東的「實踐」、「效果」是：

「泛動起來的卻是這塊土地最愚昧、最黑暗的東西，他本人也被這些東西，塑造為阻擋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最大一位保守者。」

「可結果常常蹂躪了人民的利益，或是讓人民在戰勝貧困的旗幟下去進一步發展貧困，或是使人民在革命的名義下去互相廝殺……整個民族的元氣大傷」

既然承認了毛澤東的所有重大舉措，無一例外都是禍國殃民，難道還非得給他硬安個「理性探求的光芒」，好的「動機」和「理想」，而且還不倫不類地以此來論證他反右不是「陰謀」或「陽謀」不成嗎？

「他（毛）親自送上灘頭陣地的先頭部隊，在進入陣地後卻向他開了火。儘管眾多的知識份子隨後有了被一個『陽謀』愚弄了的感覺，殊不知在這之前，毛澤東多半就有了一個遭知識份子欺騙了的感覺……」（頁 282）這和李志綏的「上當說」何其相似乃爾！

「毛澤東卻竭力要走出這個一踩下去泥巴便翻作浪的困境，而且竭力要不以弄髒自己『英明』的鞋子為代價：5 月 15 日以後，經毛澤東起草，或是經他看過再發出的猶如雪片般應接不暇的黨內文件，似乎無不向全黨表明，從雙百方針的提出，到號召黨外人士給黨提意見，這都是為著『引蛇出洞』最後予以『聚而殲之』的戰略假象運動。」（頁 288）這和凌鋒的論述又是如出一轍。

「他（毛）的震怒，以及他對彭德懷幾近悍婦罵街似的羞辱，顯然與他被「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一詞組刺痛有關。

「1957 年由整風一轉而為反右，1959 年廬山會議由糾正大躍進以來左的錯誤而一變為反右傾，從中我們是否能發現毛澤東心中存有這樣一個有意思的悲怨：在羅隆基這樣喝過洋墨水、學貫中西的大知識份子面前，他惱於被說成是『無產階級的小知識份子』；在彭德懷這樣大老粗出身、且戎馬一生戰功赫赫的人面前，他又恥於被看做是『小資產階級』。」（頁 286）李慎之先生和本文《引蛇出洞小考》一節，對上述二者已分別作過辨正。至於把二者相提並論，則難免穿鑿附會之嫌。我們探討一事物發生的原因，就要分析它發生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首先是必要條件。因為必要條件是這樣一種條件，有了它事物未必發生，但是如果沒有它，則事物斷然不會發生。試想，如果羅隆基沒有說「無產階級的小知識份子」，彭德懷沒有說「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那麼，1957 年的反右派運動，1959 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就斷然不會發生嗎？不一定。所以，這些條件正如農民的諺語所說：「大年五更拾到一只兔子——有你沒你都要過年。」

請看下面下面《禪機》自己的論述，你就會發現它就會全部推翻了自己上面的所有論斷。

「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份子也像劉光華一樣，相信在毛澤東開的這家『整風』酒店裡，門口掛的是羊頭，香氣撲鼻時端出來賣的，也絕對是貨真價實的羊肉。」（頁 181）這就說明毛澤東不是真心誠意整風，也不是陽謀，而是貨真價實的陰謀。掛羊頭賣羊肉是「真心誠意」；掛狗頭賣狗肉是「陽謀」；掛羊頭賣狗肉就是「貨真價實的陰謀」。只要看出整風是一場陰謀，就擊中了要害。否則就是不得要領，就是王顧左右而言他。

這裡提到的劉光華，是《文匯報》駐京記者，於 5 月 27 日在該報發表了一篇通訊《北京大學「民主牆」》，結尾寫道：

「就在這個激盪的時候，我看到了同學們是多麼地有條不紊，遵守著次序。他們照樣地用心聽講，在實驗室中專心一意地工作，在運動場上打球。圖書館中仍是座無虛席。年輕的孩子們，儘管他們唇槍舌劍，爭辯得面紅耳赤，但沒有人不尊重對方所出的大字報和發言的權利。他們自己要講話，但也讓別人講話。

「我不禁想：我們黨有這樣生龍活虎的年輕人，甚麼困難也是能克服的。」劉光華被劃了右派。題外附帶一句，母親劉王立明也劃了右派。

「所謂反對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便成了鏡框裡一幅美麗的風景畫，一個掰開來不見肉餡的包子，一位年過半百的遺孀關於少女時代懷春的夢。

「試想想，當貓在玩捉弄老鼠的把戲的時候，貓怎麼可能騰出爪子來清點自己身上的虱子和跳蚤呢？」（頁 259）事實擺得好，道理講得對。

毛怎會真心誠意整風呢？

「波匈事件大大強化了毛澤東心目中的兩個必要性：一個是黨牢牢掌握槍桿子的必要性，另一個是改造知識份子的必要性。匈牙利那震驚世界的十三天的教訓正在於：成分複雜的軍隊，與思想複雜的知識份子聯起手來，置工農政權於血泊之地。」

「在中國要出問題，便出在知識份子身上！

「多半毛澤東再在某個領域、某個方面去進行批判、鬥爭，在嚴峻的階級鬥爭形勢面前已經顯得杯水車薪了，工農政權必須正面地、全面地與知識份子做一次大規模的較量，這既可以徹底卸去這顆『定時炸彈』上來日爆炸的引信；又能將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視線，從由於合作化運動造成的農村各方面緊張關係上，轉移到新的興奮熱點上來。」（頁 271）還有工人罷工，學生鬧事以及波匈事件所暴露出的諸多制度弊端，如劉賓雁所說，毛不思改革，只企圖引蛇出洞，通過打「蛇」，通過殺雞給猴看，把矛盾鎮壓下去。

說明毛根本不可能要整風，只能是反右，因為他有了「明確的結論」：「是修正主義而不是教條主義，將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深受其害。」（頁 282）當時用政治語言表述的形勢為：「右傾機會主義，或說修正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如果改用哲學術語，那就是當時毛主席的哲學語錄：「抓住主要矛盾，一切問題便會迎刃而解。」

綜觀《禪機》：當他談「樹木」的時候，總是成竹在胸，頭頭是道；一進入「森林」，便亂了方寸，把不准調。這主要是因為對反右運動的陰謀策劃者毛澤東缺乏本質的瞭解。

4，《禪機》一開始就誤解了毛澤東：

「延安進行『搶救失足者運動』時，作為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並不『左』，事實上正是他，鑒於運動日益明顯的偏向與惡果，主張黨中央作了《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在決定中他批判了『逼、供、信』的錯誤行為，提出了審幹工作中包括『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九條方針，他併發出一系列關於甄別工作的指示，有力地推動了這一工作；也正是毛澤東，就這一運動所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在全黨面前承擔責任作出檢查，而主要肇事者康生卻從未在何時何地作過任何檢查……」（頁 16）是呀！毛為甚麼對康生那麼寬大為懷，而對其他任何人，如「富田事件」中的人，如彭德懷、劉少奇、林彪……要斬盡殺絕呢？問題是康生完全是遵旨辦事，他再壞也只是助紂為虐。毛澤東才是暴虐無道的殷紂王。據《新發現的毛澤東》和《毛澤東執政春秋》兩書揭露，還有其它如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韋君宜《思痛錄》，特別是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的大量揭露，說明康生（實際上還有劉少奇、彭真、高崗、任弼時等）所做的一切，達到毛的目的後，毛才假惺惺地在局部範圍內避重就輕地承認了錯誤，以騙取人心。這正好說明他是要陰謀的能手，是善於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魔鬼。

同時，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也承認：「1943 年 4 月 3 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要求在整頓黨的作風的同時，對全黨幹部進行一次認真的組織審查。《決定》對敵情作了過分的估計。7 月 15 日，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動員報告，掀起了所謂『搶救運動』，大搞『逼、供、信』的過火鬥爭，在十餘天中造成大批冤假錯案。」當然，像胡繩這樣的官方學者，他的責任，就是專門矇騙讀者。當讀到他把罪責一古腦兒推給了「副主任」康生的時候，令我想起一個與此相反相成的笑話：有一個賽跑運動員，向別人誇讚運動場上跑「第二名」的那個運動員，跑得如何如何的快，簡直就是飛毛腿！聽的人滿頭霧水，不由得問：

「那你光說第二名，難道第二名會比第一名還跑的快？」「不好意思！第一名是我。」「那你可真夠謙虛的了。」看來，胡繩是在替毛澤東謙虛。

《黨史筆記》用大量事實證明：毛澤東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毛自任總學委主任，直接抓整風審干。臭名昭著的搶救運動就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發動的，1942年4月7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整風學習和檢查工作中要審查幹部，發現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6月19日在政治局指示「現在的學習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王實味托派。我們要發現壞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發現壞人，即托派、日特、國特等三種壞人」；還說過「要查清革命和反革命兩條心」、「要注意反特」。毛澤東在1943年8月8日《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說：一個2500人的黨校已挖出250個特務，而且估計不止此數，「恐怕是250到350的數目，還舉了行政學院的例子說，「除了一個人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楊奎松：《延安整風的台前幕後》）。

王實味案是毛直接抓的第一個案子，毛是第一個誣陷「王實味是暗藏的國民黨的探子」，毛還說「王實味是托派，又是特務」。毛澤東此前此後，一貫是用製造冤假錯案的狠毒手段來消滅自己的對手，難道這還沒有堆積如山的例證嗎？

可惜《禪機》最終歸結為：「動機與效果的背離；理想與實踐的分裂；理性與感性的抵牾；是晚年毛澤東這出悲劇的蒼涼而又無奈的基調。」

應該說，毛澤東的一生是一場大鬧而特鬧的大鬧劇。連中共四川省委張宣傳部長（須知，宣傳部長這個職業是專門賣狼奶的），都沒有用「動機與效果的背離」等等，來為毛遮羞，而是看穿毛搞「文革」是為了「擴增自己的私權」，並且「非鬧個底朝天不能達到目的」。甚至，連一個農婦都知道：「毛主席要當世界領袖」。其實，本書作者何嚐不知？他曾引用了周揚投毛所好的一段事實：

1955年年初，周揚在出席第二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回國後向文藝界作報告時說了這樣一段話：在蘇聯訪問期間，他們說斯大林去世後，世界革命的領袖就是毛澤東了。蘇聯現在也遇到了許多問題，斯大林不在了，只有毛澤東才能像斯大林一樣解決好這些問題。所以他們希望把毛澤東請到莫斯科來住。周揚說他向毛澤東匯報時轉達了蘇聯人民的願望。毛主席笑了笑對周揚說：「我不是神仙啊。」

作者還是看出來了，說：「毛澤東不想搬去莫斯科住，但這不妨礙他企及登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奧林匹斯山。」（頁88）我敢說，誰也無法否認這個路人皆知的事實。我還敢說，任何人在解釋毛澤東的重大舉措時，若撇開這個路人皆知的事實，不管你是虧心還是迷信，沒有不自入絕境的。

相反，只要你把准了這點，多麼複雜、難纏的問題，都可順理成章，按圖索驥，例如：文革鬧得底朝天，大躍進餓死人四千多萬，人民公社猛刮共產風，土法上馬人人發瘋，彭大將軍竇娥冤，反修維護斯大林，反帝支援亞非拉……有人說，毛澤東成了個大瘋子，也有人說這都發軔於反右派；可反右派又發軔於甚麼呢？。。。。。

前面提到的毛澤東的三對因素，人們可以用肉眼看到的，是：實踐、效果、感性；看不到的是：理想、動機、理性；結果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根據實踐檢驗真理的原理，用逆推法、窮舉法、總分法、內外法。。。。。。即可得到「其二」，並可加以確證。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做到，已經弄清了他人生行為的這個主要精神動力就是：「一大」；「二公」；「三斗」。

他的動機是一個「大」字，就是終生追求「我要大」，大了還要大，越大越不嫌大：延安整風後實現了「朕即黨」，不行，還要大；全國篡權後又實現了「朕即國家」，但毛慾壑難填，還要大，如普希金《金魚的故事》所講的那樣，人心不足蛇吞象……

他的理想是一個「公」字，就是實現全民所有制，也即國有制。因為「朕即國家」，所以即為「朕有制」，連農民手中的幾個雞蛋，也要由朕管起來。但朕念念不忘搞世界革命的最終理想是要實現天下為「公」，即實現「全球所有制」。那時實現了「朕即球」，我就可以去見馬克思了。

他的理性是一個「斗」字，就是「生命不息，鬥爭不止」。「朕即球」在望，是最高綱領；現實的鬥爭目標是抓緊坐上斯大林的「世界革命導師」寶座，著手領導社會主義陣營和亞非拉，先實現最低綱領：「朕即半球」。世人奇怪，毛澤東為甚麼死前最想見的是尼克松？就是為的以「洋半球」為物證，進行自我心理確認。

中華民族之所以要經受如此亙古未有的大災大難，不能怨天尤人、，只能慶幸我們民族要出一個世界領袖，因而才須付出必要的代價。反右派，把幾百萬知識份子和非知識份子劃做右派（包括中右），也無非算是必付代價之一而已矣。

。

4-1-2004 初稿；3-19-2006 二稿於日內瓦。

附註：

（1），（56），（58），（59），（60），（62），（77），（78）《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 258-259，325 和 263，293，273，305，三卷：182，209，211；

（2）（3）（4）（5）（6）（7）（15）（28）（36）（37）（38）（39）（40）（46）（50）《毛澤東選集》五卷：頁 437，438-439，412，333-334，414，355，424-425，432，四卷本：頁 1374，1375，1376，1384，1398，五卷：頁 279，435-436，

（8）舒湮《1957 年夏季我又見到了毛澤東主席》；

（9）（75）《走向混沌》：頁 18 和 87，35；

（10）《毛澤東怒批我們四小時》《爭鳴》（2001，2）；

（11）《伴君如伴虎》（《爭鳴》2001，4）

（12）《回憶與研究》（下）

（13），（14），（16），（17），（19）（20）（21）（22）（23）（24）（30）（33）（47）（51）（53）（55）（66）《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 189，188，114，111，174，185，186，187，188，190，195，188，137，442，191，204，117-118，322，

（18）《赫魯曉夫回憶錄》頁 659；

（25）（26）（27）《傅雷家書》頁 158，163，167，

（29）《中共風雨八十年》頁 124；

（31）（32）《鴻》頁 156，157-158，

（34）（35），〈最後的遺言〉417，540；

（41）轉引自趙瑄《北京政府的「日本情節」》，世界週報 1995，11，26）；

（42）（43）（44）（45）《廬山會議實錄》頁 221，238，223，333；

（47）轉引自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訪西北坡——來自俄國檔案的秘密》見《百年潮 1998 第 1 期

（48）徐鑄成《陽謀-1957》，《新華文摘》1989，2；

（49）《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頁 188；

（52）參看張紫葛《心香淚灑祭吳宓》頁 326-330；

- (54) 金鐘主編《反叛的御醫》頁 105-106;
- (57) 吳弘達《新時代應從批毛開始》《觀察》2003, 9;
- (61) 《文匯報》1957, 6, 16;
- (63) 轉引自廖天琪:《淒風苦雨四十年》序;
- (64) 《新月》第 3 卷第 12 號
- (65) 這是朱正先生的見解。
- (67) 《人民日報》1957, 7, 2;
- (68) 《懶錄舊夢錄》頁 559;
- (69) 《觀察》2003, 12, P25;
- (70) 轉引自王友琴《並非一個人的遭遇》, 黃花崗雜誌總第七, 八期
- (72) 《雨花》1957, 10;
- (71) (73) (74) 《論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頁 247-272, 207-211, 200-201
- 76) 《鳴放革命實錄史》頁 10-11。

[大陸直連看禁書禁聞禁文禁網禁片禁歌禁曲](#)